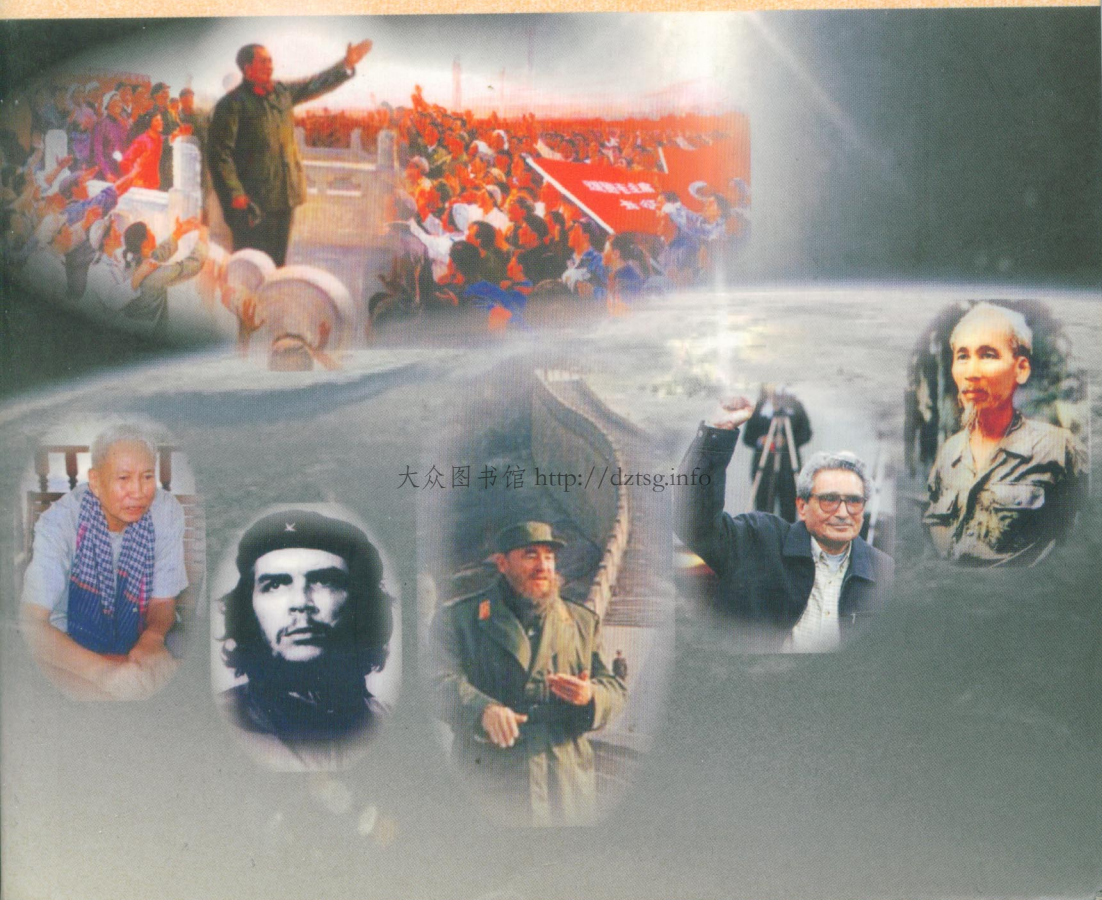


毛主義革命：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Maoist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程映虹著
Yinghong Cheng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毛主義革命：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Maoist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程映虹著

Yinghong Cheng

宋永毅 主編

Yongyi Song
Editor-in-Chief

21世紀中國叢書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Series

田園書屋出版

目 錄

總序：《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新版說明（宋永毅）	i
代序：為共產主義祛魅的歷史還原者 ——介紹程映虹博士與他的學術研究（何清漣）	iii

第一篇 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如何影響東歐和北越？ ——對「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的再考察

引言：從國際角度看「雙百」和「反右」	2
(一) 「莫斯科中心論」和「中國聯繫」	3
(二) 斯大林主義，還是毛主義？——中國模式對東歐的吸引力	6
(三) 「雙百方針」和「正確處理兩類矛盾」震撼蘇東	13
(四) 蘇東保守勢力對中共政策的抗拒	16
(五) 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北越	19
(六) 越南知識份子對毛主義的挑戰	28
(七) 北京與河內同施「陽謀」	43
結語：中共「反右」終結自由化	51

第二篇 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引言：「文革」的世界性影響：一個被忽視的課題	59
(一) 對「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斷和「輸出文革」的國際戰略	61
(二) 中共與亞非拉暴力鬥爭的關係	65
(三) 「文革」行為方式在亞非拉的影響	80
(四) 龍種與跳蚤——毛主義「文革」的餘波	88
結語：毛主義留給世界的未盡思考	95

第三篇 毛主義和文革是怎樣毀掉新加坡左翼運動的？

引言：「新加坡故事」與文革	102
(一) 為文革而亢奮：新加坡左派報章對文革的系統介紹	107
(二) 在南洋高唱「東方紅」——新加坡的毛澤東個人崇拜	114
(三) 歡呼世界革命，打倒本國政府 ——文革如何影響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態度	121
(四) 文藝大批判和「土產樣板戲」：文革影響下的 新加坡左翼文藝	136
(五) 派性林立和「路線鬥爭」——文革和新加坡左派的分裂	144
結語：追隨毛式文革的代價：新加坡左翼運動的瓦解	153

第四篇 塑造「新人」：蘇聯、中國和 古巴共產黨革命的比較研究

引言：創造人類進化史上的「新智人」——共產黨革命的最終目的	160
(一) 人的可塑性：從啟蒙運動到俄國「新人」	162
(二) 「蘇維埃人」：第一個由國家機器塑造的人	166
(三) 「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共產黨中國塑造「新人」的實驗	174
(四) 「把他們都變成切那樣的人」——古巴塑造「新人」的實踐	180
(五) 共產主義「新人」在世界各國的反響	187
結語：提升還是毀滅道德？	193

第五篇 毛主義的變種——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

引言：以徹底改造社會為目的的大屠殺	197
(一) 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199
(二) 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200

(三) 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204
結語：革命的加速度和衝刺：紅色高棉在二十世紀 革命史上的地位	207

第六篇 「革命攻勢」——古巴的「文革」和「大躍進」

引言：加勒比海的大折騰	214
(一) 歷史背景：經濟短缺，內外交困	214
(二) 揪出埃斯卡蘭特「反黨集團」	215
(三) 向小販開戰：「革命攻勢」的開始	216
(四) 全國總動員和勞動軍事化	218
(五) 一千萬噸糖與「島國巨人」：「革命攻勢」的主要戰役	219
(六) 創造「新人」：「革命攻勢」中的榜樣塑造	220
(七) 教育革命：「革命攻勢」的另一條戰線	221
(八) 蘇聯入侵捷克和「革命攻勢」的升溫	222
(九) 「革命攻勢」的失敗	224
結語：古巴模式的大躍進和文革	226

第七篇 秘魯的小毛澤東和他的「光輝道路」

引言：鄧小平——利馬大街上的死狗	231
(一) 從哲學教授到黨內親毛造反派頭子	231
(二) 從上北京見毛主席到成為秘共的紅太陽(Puka Inti)	234
(三) 秘共內部的「文革」和「路線鬥爭」	236
(四) 「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和「岡扎洛主席的光輝思想」	238
(五) 發動「人民戰爭」	240
(六) 「光輝道路」的社會基礎	241
(七) 典型的「光輝道路」戰士	245

(八) 「光輝道路」黯淡的盡頭	248
結語：革命政黨、恐怖組織、黑社會加哲學玄談	249

第八篇 古巴的毛主義者格瓦拉為什麼出走？

引言：格瓦拉回到人間	254
(一) 「人是一件半成品」：出走動機之一	255
(二) 「大陸革命」的夢想：出走動機之二	260
(三) 古巴依賴蘇聯：出走原因之三	261
結語：什麼樣的「氣魄」和「豪情」？	263

第九篇 政治朝聖的背後 ——西方知識份子對毛式革命的迷戀

引言：過江之鯽 游向仙境	267
(一) 知識份子容易受「理想主義誤導」嗎？	268
(二) 知識份子天生和權力作對嗎？	271
(三) 知識份子堅守道德原則嗎？	273
結語：現代哥倫布的想像和移情	276

第十篇 古巴甘蔗地裏接受「再教育」的美國知青

引言：心潮逐浪高	279
(一) 去古巴接受再教育：美國新左派運動史上奇特的一頁	280
(二) 排除萬難前往古巴	281
(三) 虛心學習 艱苦改造	283
(四) 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285
(五) 「古巴精神病人的政治覺悟都比美國的正常人要高」	287

(六) 卡斯特羅：「人類至今為止還生活在史前時代」	288
結語：美國：一塊革命種子可以生根但無望開花結果的土地	289

第十一篇 卡斯特羅為什麼拒絕中國模式的改革？

引言：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	293
(一) 中古結盟緣自「六四」事件	294
(二) 卡斯特羅對中共改革憂心忡忡	296
(三) 卡斯特羅和古巴改革的停滯不前：中國拉美學者的看法	300
(四) 美國的古巴研究界對「中國經驗」的看法	304
結語：抵制改革，至死方休	306

第十二篇 極權型領袖人格的雛形：涅察也夫現象

引言：一個禁忌的名字	314
(一) 靠欺騙建立「革命家」的聲望	314
(二) 「革命家手冊」：道德就是有助於革命勝利的手段	316
(三) 革命史上第一次清洗同僚	318
(四) 斯大林時期的諱莫如深	319
(五) 以涅氏為原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惡魔》	320
(六) 極權型人格：人類政治本能的惡性病變	322
結語：生不逢時	325
後記：毛主義革命：革文明的命	326

《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 新版說明

宋永毅

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決定出版一套新版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囑我作為叢書的總策劃寫這個出版說明。提筆之際，我首先感到由香港《開放》雜誌社、田園書屋、美國博大出版社等民間出版機構協助出版這樣一套叢書，對我們已經身置於其中的二十一世紀有一種自然而然的「顧名思義」之理：因為「二十一世紀」應當是一個最為「開放」的「博大」相容的新世紀。

如果說「邪惡帝國」在歐洲的徹底垮臺的二十世紀和電視、電臺、電腦科技的崛起所帶來的資訊滲透有極大的關係；那麼，以開放的互聯網對全球的覆蓋為標誌的二十一世紀，是一定會崩坍所剩不多的那幾個專制堡壘的。追求自由和民主，要求一個開放的社會，這已經為歷史證明是人類的天性。這裏便是一個有趣的例證。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有過風雲一時的「四大民主」，在這樣一種被扭曲了的民主形式下，群眾可以以大字報的形式變相地發洩對中共官僚階層的不滿。文革剛一結束，鄧小平便迫不及待地從憲法中取消了有關「四大民主」的條款，因為他們懼怕這種開放的形式，哪怕只是一種囚籠中的「民主」。歷史又似乎在頑強地重複，今天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的中國」裏的民意——數以千萬計的「電子大字報」，無論是對貪官污吏的揭露還是對公民權利的維護，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已經遠遠地超過了當年「四大民主」下的紙質大字報，而且正獨立地影響著中國的民主進程。

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套傳統的印刷出版物。是否在這一新的開放的世紀裏，傳統的資訊傳播手段就不那麼重要了？這顯然是一管之見。二十一世紀的開放性還高度地體現在它的博大相容的多元性上。如同電視沒有消滅電臺，飛機沒有取代汽車一樣，傳統的書籍在以互聯網為旗幟的二十一世紀中仍然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一套嚴肅的、以其思想和學術深度區別於一般通俗政治文化讀物的叢書，不僅為海內外學者提供了一個傳播資訊的平臺，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也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曾經把它的指導方針歸結為這樣四句話：「突破資訊封鎖，推動民主變革，促進族群和解，建立憲政民主」。我想，這大概也是這套新叢書的出版宗旨吧。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於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

代序：為共產主義祛魅的歷史還原者 ——介紹程映虹博士與他的學術研究

何清漣

在中文世界裏，程映虹已相當有名，在百度搜索欄輸入他的名字，高達 11 萬 2,000 多條，儘管有不少條目已經打不開，但這足以說明曾有那麼多的網友轉載過他的作品。對於一位原由於政治原因其作品絕少可能在中國出版的學者來說，足堪慰勉——因為他的讀者之多，遠遠超過了許多在中國能夠自由傳播的作者。我讀程映虹的作品，始於約十年前。吸引我的是他那篇發表於《讀書》雜誌上的「切·格瓦拉為什麼出走？」在我看來，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於把格瓦拉這位「塵世的耶穌」從超級神壇上請下來，而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共產主義理想的前路迷茫。共產主義信仰本身包含著對人性的極度貶損與改造人性的狂熱，這一精神特質必將使這個運動在人類社會陷入死胡同。而在格瓦拉身上，這種共產主義的基本特質更為明顯，這必將使他對現存秩序永不滿意，需要不斷尋找新的革命戰場。程映虹想闡明的格瓦拉出走，其實不僅僅只是行動上的出走，而是這種精神特質必然帶來的困境。因此，他在這篇文章中最後的發問是：「他(切·格瓦拉)卻為什麼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質需求？他有什麼根據把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說成是消除個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終革到了勞動人民的物質利益上來，這又是什麼『解放』？更進一步說，是什麼使得他自認為有權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會，而且再

造個人呢？」

我記住了作者的名字。此後，凡看到署有「程映虹」之名的文章我必然要讀。再後來，他成了《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的主力作者，多年來積累之功力進入噴湧狀態，佳作綿綿不絕。

程映虹對蘇俄十月革命時期的歷史挖掘，是網絡上的搶手讀物。對於蘇俄十月革命的介紹，中文書籍可謂汗牛充棟。儘管如此，程映虹的許多短文還是以其獨特性引人入勝。我記得自己就讀過他許多文章，如〈高爾基從「海燕」變為「烏鴉」的故事〉，〈列寧的齊人之福〉等。還有一篇文章我已經記不清標題了，但還很清楚地記得內容，那是談十月革命後蘇俄婦女的悲慘境況，她們不僅沒有在這場宣稱要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革命中分享到任何「勝利果實」，她們的肉體反而成為「勝利果實」被蘇維埃的革命者按等級任意分享。

但如果以為程映虹的長處只是寫些小文章披露一下共產主義運動中那被刻意掩蓋的陰暗面，那可就大錯特錯。那些小文章只是程映虹在完成大作品的同時，將大歷史的邊角餘料順手拿來雕琢的小品而已。作為一位有眼光的歷史學者，他的真正功力還在於他對共產主義運動史、尤其是對毛時代輸出革命時期那段國際共運史的宏觀把握與深刻分析。在分析「反右」與「文革」時，中國人一直有一個見仁見智、說過千遍但其實還是沒有得出合理解釋的問題，即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反右」、「文革」這種今天看來無異於自毀的運動？程映虹的研究正好從這個角度詮釋了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的國際背景，廓清了這團歷史疑雲。他的研究不僅展示了毛澤東為了爭當國際共運領袖與蘇共鬥法的歷史過程，還讓我們看到了毛澤東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帝王氣概，從紅色高棉大屠殺直到中共在東南亞國家的輸出革命，

這些東南亞人民不堪回首的痛史後面，處處閃動著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身影。這些中國人本應知道的歷史，在那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今仍是「國家機密」。作為這些文章的編輯者與閱讀者，我能夠估量出這些文字在祛共產主義之魅時將會起到的重要作用。

優秀學者對歷史研究的貢獻，可以分為幾方面，一是史料方面的貢獻，即挖掘整理歷史資料，為歷史研究做基礎工作。如宋永毅在爬梳「文革」史料多年之後，終於將他整理的文獻資料彙集為數千萬字的網絡和光碟資料庫，為「文革」研究作了一項利在當代、功在久遠的奠基工作。其間爬梳整理之苦、籌畫組織之難，作為學術界人大都能夠理解。但因此受到中國當局之拘捕，經歷牢獄之災卻是生活于民主制度下的人士絕難想像之事。二是對已有史料搜集整理，同時挖掘新的歷史資料，再在這一基礎上對歷史重新做出解釋。這方面，一個原非歷史學家的華人作家張戎女士作了傑出貢獻，無論當下一些毛澤東研究者感覺如何不舒服，她這本書今後都是研究毛澤東的人士繞不過去的一個讀本。

三是還原因種種政治因素而被嚴重扭曲的歷史。程映虹對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挖掘研究堪稱這一類型的代表。做到這點看似不難，其實卻非常不容易。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所決定的：

第一，從學術的政治需要來說，在當代國際社會，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同性戀權利、殖民歷史等才是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的時髦，共產主義運動史早已成為被研究者遺忘的角落。以美國為例，一度貴為顯學的蘇聯研究在1989年之後一落千丈，許多蘇聯研究專家不得不改行從事其他研究。此情此境之下，已經與現實國際政治無關的共產主義運動史自然很不容易申請到研究經費，更不是學術雜誌青睞的題材。

第二，從學術的理論創新來說，自由主義學說早就對共產主義理論做過入骨批判，這方面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其代表作。而對共產主義極權政治批判得最徹底的當屬漢娜·阿倫特，她在這個領域的學術成就，後來者至今仍難以超越。更兼「冷戰」結束之後，自由主義學者們失去了專制極權這個大敵而刀槍入庫，左派及其同血緣的新左派則因共產主義實踐的失敗而對這段歷史諱莫如深，所有這些，使得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不再受到關注。

第三，在中國，由於當局此刻還在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口頭上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種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扒糞」工作自然不可能成為中國學者的研究課題。

就是在這條冷清的小路上，在這塊被刻意遺忘的凍土中，程映虹憑藉學者的責任感，憑藉共產主義受害者要為共產主義祛魅的信念的支撐，十幾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從歷史塵封中掏挖出一塊塊歷史碎片，努力還原成完整的歷史拼圖，將本來屬於專業圈子共用的成果推向了公共閱讀的平台。每當聽到映虹在電話中告訴我與曉農，他又發現了新的歷史資料，可以做哪方面的研究時，我們也跟著他一道高興。

但如果將還原歷史拼圖理解為純粹的史料整理工作，那是不理解歷史研究的性質。一個好的歷史研究者，史識、史才、史德三者缺一不可。「史識」者，顧名思義，就是對歷史的見解要高人一籌，要能夠於細微處見大勢；「史才」就是歷史研究的能力，要能夠將散落在各種資料中的歷史片段穿珠成線，對歷史事件或者人物條陳縷析，最後自成一家之言。更重要的是，凡研究者，從俗入雅易，由雅入俗難。將一些簡單道理裝點成高深莫測的學術玄談比較容易，大多數研究者都有這等本事；但要將深刻

的道理深入淺出，把宏大敘事化為普通讀者都願意閱讀的文章，還少有學者能夠做到。從這點來說，程映虹還真做到了由雅入俗。而「史德」即歷史學家的學術良心。程映虹在美國大學任教，研究共產主義運動史雖然無政治壓力，但面臨另外一種現實利益的壓力。如果他能夠將精力花轉移到一些時髦課題上來，申請研究經費等會容易得多。但出於對母國的拳拳之心，出於對人類經歷過共產主義浩劫之痛，他選擇了一條崎嶇的學術道路。

人類歷史上，儘管不少統治者都有篡改歷史的癖好，但能夠自成一體的建構謊言，包括銷毀史料建構虛假的歷史，卻只有共產主義極權國家。而且這類國家的統治歷史越長久，在重重謊言之下辨識真相就越困難。我相信，中國總有一天會告別共產主義學說並清理這段歷史遺產。我也相信，人們也會記住程映虹這本學術論文集《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記住他的研究在祛共產主義之魅的過程中所起過的重要作用。

2007年11月上旬寫於美國新澤西

第一篇

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如何影響東歐和北越？ ——對「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 的再考察

引言：從國際角度看「雙百」和「反右」

1956 和 1957 年的「非斯大林化」標誌著冷戰時期全球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次嚴重危機，其間發生了很多重要事件。赫魯曉夫在 1956 年 2 月蘇共「二十大」上關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震動了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在很多國家導致對共產黨體制的挑戰，特別突出的是 1956 年底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他東歐國家雖然基本上未發生由政治抗議引發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但黨內辯論和異議知識份子的聲音還是非常普遍，同時也發生了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在亞洲，中國知識份子對共產黨體制的批評，尤其是在 1957 年春天的「整風運動」中的批評是眾所周知的。在北越，知識份子直接向黨國體制挑戰，在 1956 年秋發起了「《人文》、《佳品》」運動，同時北越義安省農民發動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個農村政策的武裝暴動，在城市也發生工人和學生的騷亂。

值得注意的是，1956 年 11 月，當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鎮壓了匈牙利革命之後，整個蘇聯東歐的政治氣氛發生了根本變化。但在中國，中共繼續允許知識份子批評政府，這不但給蘇聯造成了壓力，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東歐黨內改革派發出自己的聲音。「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不久，北越政府鎮壓了義安省的農民暴動，用取締報刊和發起批判壓制了知識份子的異議；但到了 1957 年春，隨著中共對知識份子批評的寬容和鼓勵，越共的「反自由化」運動失去了勢頭，越南知識份子也恢復了對黨的批評；直到 1957 年初秋，越共尾隨中共發起了大規模「反右鬥爭」，結束了所謂的「自由化」。在東歐，中共的「反右」給了東歐一些黨內改革派勢力最後一擊，「匈牙利事件」後殘存的改

革派人士最終在 1958 年初被清除，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次大規模政治危機至此告終。

迄今為止，有關「反右」的研究基本以中國國內政治為主要背景，本文選擇一個不同的角度，把中共的「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放到國際共運的大環境中觀察，著重分析 1956 年至 1957 年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由此可以發現，中共的「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之決策，不僅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而且與中共的國際目標有重大關係；「雙百方針」的提出，不單純是為了「引蛇出洞」，也是中共在國際共運陣營裏爭奪領導地位的舉措。如此才能充分認識「反右」運動的由來和毛主義的實質。

（一）「莫斯科中心論」和「中國聯繫」

在敘述和分析「非斯大林化」或自由化運動時，人們常遵循「莫斯科中心論」。在這個模式的敘述中，處於邊緣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初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反應是震驚和困惑，但很快一些國家的黨內外人士就利用這個機會發出那些通常不被允許的改革之聲，由此出現了一場自由化運動。考慮到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先後順序，「莫斯科中心論」基本上符合歷史真實，但有必要注意「莫斯科中心論」的一些盲點，其主要缺陷是忽視和低估了那些並非起源於莫斯科的政治變化，這常常導致對一些複雜歷史事件和對各國共產黨之間相互關係理解的簡單化。

「莫斯科中心論」還有一個重大缺陷，它強調在這場自由化運動當中受到挑戰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卻忽視了「毛澤東

模式」實際上同樣受到了挑戰。在中國和北越，「土改」、「鎮反」、「整風」、黨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和對文學藝術創作的嚴酷控制，這些相似的政策與其說是「斯大林模式」的產物，還不如說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發明創造。這些做法通過思想、組織和人事方面的渠道至少對北越的共產黨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1956年到1957年期間，這些毛主義的產物不但在中國「右派」的言論中，而且也在北越知識份子中受到了挑戰。

今天回顧20世紀的國際共運史時，很多人以為：「斯大林模式」（以農業集體化、工業化和黨內清洗等為代表的建立極權主義體制的道路）在50年代中期受到了清算；而毛主義（以「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用「不斷革命」來鞏固和發展極權體制）的被批判始於70年代末，是「文革」的災難性後果引導著人們開始否定毛主義，但毛主義關於「民主革命」和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很多政策還是「符合實際」的。這就是所謂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之區別，也是其個人功過「三七開」的主要根據。然而，回顧1956年到1957年的歷史，在國際共運陣營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同時，這個被「七分肯定」的毛主義實際上也受到了批判，但這個批判被非斯大林化所遮蔽，至今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本文從中共與北越黨和一些東歐黨的關係（中國聯繫）出發，考察共產黨國家在50年代中期由「非斯大林化」引發的自由化，並強調「中國模式」或毛主義在這場政治巨變中的作用。這是一個至今被「莫斯科中心論」所忽視或低估的問題，即使是在資訊自由的西方學術界也是如此。[1]

「中國聯繫」的內容非常複雜，它包含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共的「土改」、「鎮反」、「整風」，以及經過「延安整風」形

成的知識份子政策和文藝政策，這些對北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結果是北越在1956年到1957年間的「自由化」實際上不是反斯大林主義，而是針對這些毛主義的產物。但毛主義的這個側面在東歐國家基本上未產生重要影響。第二方面是中共當時的「雙百方針」、從1956年初到「反右」前寬鬆的知識份子政策以及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人民內部矛盾等。這些政策客觀上是對此前很多政策的修正，具有明顯的「解凍」或「自由化」傾向，在實踐中不但鼓勵了中國知識份子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啟發、鼓勵了東歐和北越黨內的改革派和異議知識份子的活動。東歐把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個方面借用來作為對抗斯大林主義和蘇共強權的意識形態武器。而在北越，異議知識份子則用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後一方面來對抗其前一方面。從這個意義上看，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後繼續發揮著影響，直到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為止。第三方面是毛主義和「中共模式」對其他國家共產黨處理危機的方式之影響，包括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策略的國外應用以及對自由化運動最終的鎮壓。中共的「反右」給了東歐和北越自由派知識份子和黨內改革派以最後和致命的一擊，從而宣告了斯大林死後共產黨陣營內自由化運動的終結。

應該指出，毛主義或「中國模式」的這三個方面在具體政策傾向上雖然有重大甚至原則性差別，但在兩個根本點上是相互聯繫且完全一致的。其一，在國內它們都是為了維護一黨專政這個目標，不同的僅僅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和途徑。中共建政之初，還處於體制上的摸索階段，尤其是在處理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問題上更是如此，因此在一定階段內表現出靈活性。那也是毛澤東掌權的26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上表現出靈活

性的時期；其二，在國際上，它們都服務於在國際共運中推廣「中國模式」和樹立毛主義的地位這個總方針。在斯大林去世並受到批判、蘇共領導地位受到「二十大」正反面影響的衝擊的形勢下，中共企圖通過推廣自己的模式來擴大它在國際共運中的影響、甚至和蘇共平起平坐。

本文討論的「中國聯繫」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共和東歐(一定程度上蘇聯也包括在內)從 1955 年到 1958 年初的關係；其二是中共和越共在相同歷史時段內的關係。通過分析「中國聯繫」，不但可以看到一個「莫斯科中心論」無法解釋的共產黨國家政治變化的源頭，而且可加深認識那個階段的歷史演變，進一步擴展分析的時間範圍，比如，有必要將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之前和匈牙利革命被鎮壓之後的諸多事件也納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和越南知識份子的抗爭實際上是一種不同于波蘭——匈牙利事件的政治抗議模式：波匈是有工人和市民大規模參與的政治暴力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政權更替成為公開訴求，知識份子最終被邊緣化；而中越始終以知識份子的抗爭為主，爭取言論自由始終是主要訴求。

(二) 斯大林主義，還是毛主義？

——中國模式對東歐的吸引力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在東歐事務中產生重大影響始於它在解決 1956 年 10 月和 11 月的東歐政治危機中。[2] 當時莫斯科決定動用武力鎮壓波蘭工人運動，中共反對，認為波蘭問題主要是由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引起的，抵制了蘇聯所說的「西方陰謀論」；在匈牙利問題上，當蘇聯徘徊於鎮壓和放手之間時，中

共先是持相似于對波蘭問題的立場，但不久又變為催促蘇聯出兵鎮壓。近年披露的中方材料證明，從1956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中共和蘇共之間的聯繫極為密切，中共積極參與了東歐問題的處理。

(1) 中共在波蘭和匈牙利危機中的立場和參與過程

1956年10月，當瓦迪斯拉夫·哥穆爾卡在國內嚴重的政治危機中當選為波蘭黨的領導人之後，莫斯科認為他對蘇聯的態度曖昧，波蘭局勢可能失控，於是決定鎮壓。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于10月19日會見毛澤東，通報了蘇聯的立場。毛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反對蘇聯干預波蘭。毛於20日和21日兩次召見尤金，通報了中方立場，凸顯出北京的強硬。蘇聯方面於是邀請中共派高級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當面協商解決東歐危機的方案，中共立即派劉少奇和鄧小平於23日赴蘇。中共領導人到達蘇聯後，一直與蘇共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繫，甚至列席了24日和26日蘇共主席團會議。10月29日和30日是波匈事件的關鍵時刻。29日晚蘇共領導人會見劉鄧，說明波、匈局勢大變，兩國政府已要求蘇聯駐紮在這兩國的軍隊立即撤出。劉鄧說，波、匈問題雖然是由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引起的，但目前局面下蘇軍不宜立即撤回。這時中共代表團接到了毛澤東電話，毛主席主張蘇聯立即撤軍，劉少奇馬上改變主張，向蘇方轉達了毛的意見。次日，中共代表團接到了蘇聯派往匈牙利的副總理米高揚從現場發回的報告。報告稱，隨著蘇軍撤出，匈牙利已發生反革命殺人事件，匈政府和保安部隊已瓦解。與此同時，中共也接到了駐匈牙利使館和其他派出機構的相似報告。經過一天的討論後，劉電告毛，認為匈牙利事件的

「性質」已變，力主蘇軍鎮壓，得到毛的同意。不過毛說，最好再給反革命幾天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這是典型的毛方式。得到毛的同意後，中共代表團緊急約見蘇共領導人，劉要蘇聯不要「放棄」匈牙利，鄧小平則直截了當地要蘇聯軍隊返回布達佩斯，鎮壓「反革命」，奪回政權。但赫魯曉夫說，蘇聯已錯過了干預匈牙利的時機，現在蘇軍再返回布達佩斯，會被國際上看作是對外國的軍事佔領，所以蘇聯領導人決定不加干預。聽到蘇聯領導人的這一決定，中方沒有堅持。但11月1日晨，赫魯曉夫前往飛機場，與即將啟程的中共代表團舉行緊急會談，告知他們蘇聯又改變了方針，命令蘇軍開回布達佩斯（實際上在和中共代表團會面時，蘇軍坦克前晚已經開進了匈牙利首都）。[3]

中共方面的材料披露了蘇共領導層在匈牙利危機中的動搖和猶豫，這可以在赫魯曉夫自己的回憶中找到佐證。他說：「我不記得究竟有多少次我們在『一舉粉碎叛亂』還是抽身離開之間舉棋不定。」[4]究竟中共在促使蘇聯下決心鎮壓上起了多大的作用，這是個很難判斷的問題。但根據上面所引的中方材料，至少蘇共領導人做決定時對中共的態度是非常重視的。至少可以說，中共對匈牙利事件在最後關頭的強硬態度促成了蘇聯領導人下決心。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蘇聯鎮壓，這是共產黨陣營中最早對鎮壓表態的黨報之一。1957年1月中旬，當匈牙利局勢還很不穩定、面臨巨大國際壓力時，周恩來訪問了布達佩斯，給了依靠蘇聯坦克建立的新政權極大的支持。

然而，中共在匈牙利問題上最後關頭的強硬立場和後來對鎮壓的全力支持，其實只是中共當時對「非斯大林化」的立場的一個側面。中共對「大國沙文主義」的批判，反對蘇聯企圖出兵波蘭，以及毛澤東在匈牙利事件的「性質」轉變之前要求蘇聯撤

兵，這些都說明中共在波匈問題或者更廣泛的蘇聯東歐關係上有更複雜的立場。

(2) 「非斯大林化」和東歐對中國模式的興趣

如果擴展視野，考察「非斯大林化」的整個過程，特別是考察一些不太被重視的歷史材料，就會發現中共立場和影響的另一面。如果用正統斯大林主義的標準來衡量，並把動機擱置一邊，那麼中共的一些政策無疑具有自由化傾向，從 1955 年起就在東歐國家的改革派領導人和知識份子中引起了共鳴，其影響早于蘇共「二十大」。在匈牙利革命被鎮壓後的半年多時間裏，中共繼續允許知識份子批評黨和政府的政策，也仍然影響著東歐國家，直到「反右」運動開始。

有證據表明，中共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在斯大林死後不久就開始了。斯大林死後，蘇聯領導人由馬林科夫為首發起了自稱為「新路程」(New Course)的改革。在國內政策上：「新路程」主張適度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放鬆對主要日用消費品的價格控制，在政治生活上緩和和政治鎮壓和恐怖；在對外政策上修正斯大林時期受到損害的與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關係，為斯大林時期各國黨內一些受迫害和排斥的領導人恢復名譽和地位，尤其是恢復鐵托的名譽(鐵托於 1948 年被蘇聯操縱的「共產黨情報局」開除，鐵托被宣佈為叛徒)，赫魯曉夫並於 1955 年 5 月訪問了南斯拉夫。與後來蘇共「二十大」造成的政治風暴相比，蘇共的這些政策不過是和煦的微風，但它們確實起到了「解凍」被斯大林主義僵硬了的政治土壤的作用。



這張漫畫出現於冷戰早期，表現了在蘇聯軍隊的駐紮下蘇聯對東德和整個東歐的控制。漫畫上是蘇聯駐東德軍隊司令在操縱東柏林市政。

東歐黨內的改革派也開始把這些政策引入本國的經濟政策和黨內生活中。為了從莫斯科的控制下得到更多的自治，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轉向北京尋求意識形態支援。它們的理由是，中國正處於同它們類似的發展階段(從「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蘇聯早已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

東德是較早受蘇聯「新路程」政策影響的國家，東德黨在1955年11月的全會上通過了按照「中國模式」對剩餘的大型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方案，對原業主提供相當於其資產50%的贖買金，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贖買而非全盤沒收，允許原業主參與國有化後的管理(至少在原則上如此)，這些都是中共革命有別於俄

國模式之處。[5]

1956年6月13日，東德黨報 *Neu Zeit*（《新時代報》）翻譯並發表了中華全國工商聯主席發表于《人民中國》上的文章〈為什麼我們資本家歡迎社會主義〉，作為對東德私營企業主讀者對「中國模式」之回應。該年9月，東德黨刊 *Einheit*（《團結》）翻譯並發表了一篇中文文章，題目是〈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新階段〉。同月，東德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應邀列席了中共「八大」，他回國後介紹中國情況時強調了中共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6]

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對中共的一些政策提法表現出更大的興趣。例如，匈牙利原總理伊姆雷·納吉對中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7]十分推崇。納吉原來在斯大林時期受打擊被下獄，「新路程」時期被平反和起用，1953年底擔任總理，但不久又被黨內以拉科西為首的斯大林主義者構陷，於1955年3月下台。下台後，納吉感覺到政治氣候會發生變化，於1955年底1956年初撰寫了〈為新路程辯護〉的長篇文章，向黨上書。[8]在這份匈牙利改革派共產黨人的政治宣言中，對外政策這一章的標題是「國際關係的五項基本原則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問題」，其主旨就是用中共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匈牙利的民族主權和從莫斯科的統治下獨立的要求辯護，納吉特別指出，它們的應用「必須被擴展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間。」[9]

蘇共「二十大」後，隨著斯大林主義受到公開批判，中共對東歐國家的吸引力不斷增強。中共對自己的一些政策在東歐的反響以及蘇聯和東歐盟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心中有數的，對東歐國家斯大林主義領導人在「解凍」和蘇共「二十大」後的困境也非

常注意。為了擴大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影響，中共十分注意發展與東歐那些改革派人物的關係。

當時匈牙利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的雅諾什·拉凡伊(Janos Radvanyi)與中共駐匈牙利大使館和大使郝德清的關係非常密切。據拉凡伊回憶，中共大使館在匈牙利的黨和政府機構內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情報網，通過這個情報網，郝德清不但得知納吉的上書，還通過在匈牙利黨中央秘書處的關係得到了一份複製件。當蘇聯大使館還在遵循過去的模式邀請「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斯大林體制下的勞動模範)作客時，中共大使館卻對作家、藝術家、經濟學家和記者的興趣更大，常在大使館用中國菜招待這些知識份子，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匈牙利政府不信任的。郝和大使館的其他高級人員以及新華社駐匈記者常常外出考察匈牙利社會。當「裴多菲俱樂部」開始活動時，中共大使館就通過自己的交換學生掌握其活動。這類活動在初期為中共瞭解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進展提供了途徑，在後期則為其判斷匈牙利事件「性質」的轉變提供了材料。[10] 匈牙利事件之後，當匈牙利領導人再次訪問中國時，毛澤東曾告訴他們，他當時每天都聽取從中國大使館和新華社發來的詳細報告，這些報告幫助了中國領導人對匈牙利局勢的轉變作了正確而及時的判斷。新華社駐布達佩斯記者為此獲得嘉獎，大使郝德清後來也官運亨通。

1956年10月30日，蘇聯發表「蘇聯政府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承認蘇聯在處理與「兄弟黨」的關係中有過錯誤。這是蘇聯公開表示軟弱和退讓，其內部已決定不干預匈牙利危機。當時，毛澤東也主張蘇聯撤兵。11月1日中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響應蘇

共聲明的文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蘇聯政府 1956 年 10 月 30 日宣言的聲明」。該聲明提到：「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同時又是以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團結在一起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就更應該建立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這種口吻表明，中共意識到這是歷史給予它的向蘇共領導權挑戰的良機，所以它抓住機會明確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匈牙利知識份子正是從《人民日報》的這種表態中，判斷中共站在他們一邊。

然而形勢瞬息萬變，就在中共 11 月 1 日發表這項聲明時，中共對匈牙利局勢的判斷已經改變(其間只差一到兩天)，蘇共也決定出兵鎮壓。因此，《人民日報》剛唱完「和平共處」、「不干涉內政」的高調，兩天後就發表社論，堅決支持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顯然，對視一黨專政為生命線的中共而言，崇高的「五項原則」其實不過是個美麗的肥皂泡而已。

(三) 「雙百方針」和「正確處理兩類矛盾」震撼蘇東

1956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雙百方針」的文章，引起了東歐國家知識份子的強烈興趣。該年 9 月，中共召開「八大」，所有東歐國家共產黨都派出代表團列席，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和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密切接觸，發展關係，介紹「中國模式」。匈牙利代表團團長是改革派領導人雅諾什·卡達爾。他和納吉一樣，在斯大林時期被迫害，1954 年恢復名譽並進入黨的領導層，是蘇共「二十大」後匈牙利乃至整個東歐陣營的政治明星。中共領導人對卡達爾非常感

興趣，毛、劉、周、鄧等都會見了他並長時間談話。10月1日，卡達爾再次帶領匈牙利黨政代表團參加北京的中共建政十周年慶祝活動。中共駐匈牙利大使郝德清抓住這個機會擴展中共在匈牙利的影響，他向匈牙利各界人士廣泛散發了中共「八大」的材料，在匈牙利電台和報刊上介紹中共的方針，使得許多匈牙利知識份子認為，「雙百方針」是中共誠心誠意實行的不同於斯大林主義的路線。11月初，當蘇聯軍隊開進布達佩斯時，很多匈牙利知識份子還誤認為中共仍然站在他們一邊。11月2日，匈牙利知識份子的刊物 Irodalmi Ujsag(《文學報》)還寫道：「西方和東方都站在我們一邊。美國已經清楚地表達了對我們事業的信念，其他一些大國如中國和印度也是這樣。」 [11] 當蘇軍進入布達佩斯後，很多匈牙利知識份子根據他們過去對中共的印象，紛紛前往中共大使館尋求庇護，但被中共大使館拒絕。

雖然中共在最後關頭全力支持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但在國內政策上，「匈牙利事件」後中共不但未收回「雙百」方針，而且毛澤東還在1957年2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表示出對民眾當中的異議的某種容忍。1957年4月，中共甚至大力號召知識份子幫助黨「整風」。中共在國內的這種放鬆控制和容忍自由化的政策，當時在一些東歐國家有相當的影響。

今天中國的不少研究者認為，1957年初春毛已決定「引蛇出洞」了。但那時東歐的知識份子和黨內改革派對此毫無所知，對他們來說，中共在「匈牙利事件」後堅持「雙百」方針、承認人民內部矛盾、鼓勵知識份子批評黨和政府，無疑是保護了「非斯大林化」的成果。所以，波匈事件後，一些東歐國家的改革派把中共看成是「非斯大林化」的「聖地麥加」，[12]中國成了暗夜中

一座令他們嚮往的燈塔。

在東德，改革派領導人卡爾·施德萬(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保羅·萬德爾(書記處主管教育的書記)和容格·庫辛斯基(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等人，紛紛稱讚中共通過區分「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矛盾，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尋求和諧並鼓勵對政府的批評。施德萬說，中共真正懂得如何「創造性」地利用蘇共「二十大」的方針。萬德爾認為，中國是唯一的「把黨和群眾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當作頭等大事的社會主義國家。庫辛斯基公開號召在東德實行「雙百方針」，說「讓百花齊放，讓它們表現出自己的色彩，因為每一朵花都用它們無數不同的色、香、形裝點這個世界。這是對待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的真正進步的態度。」[13] 這些人的言行給東德黨內保守派和斯大林主義分子造成了很大壓力。總書記烏布利希原來對「中國模式」很推崇，「匈牙利事件」後他轉向保守。1957年2月，針對黨內要求實行「雙百方針」的呼聲，烏布利希回應說：「我們的主要問題不是讓百花都放，而是有選擇地允許那些正確的去放，栽培真正新的、有益的花，而對那些在鮮花的外表掩藏下的毒草絕不姑息。」[14]

在「波蘭事件」中，蘇聯沒有出兵，而是與改革派領導人達成妥協。改革派領導人哥穆爾卡在匈牙利事件後擔任總書記，他企圖在斯大林主義和改革之間保持一定的中間立場。1957年5月他在黨的全會上說，波蘭黨懷著「深刻的同情」注視著中國的政策。他稱讚中共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應用新的方法解決非對抗性矛盾」和「讓百花齊放」，這些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中至今為止沒有嘗試過的」，因而是對「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15] 一個星期後，波蘭黨的一份刊物發

表的一篇呼籲移植「中國的百花」的文章表示：「人民內部矛盾(儘管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國也存在。如果我們要通過說服和討論的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就必須同官僚機構作堅決鬥爭，改善國家機器，對政治和階級盟友採用更靈活的政策。」[16]

(四) 蘇東保守勢力對中共政策的抗拒

自從中國提出「雙百」方針後，莫斯科就抱懷疑、批評甚至焦慮的態度，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後。當中共決定公佈「雙百方針」時，陸定一受派遣前往蘇聯大使館向蘇方通報。這是根據中蘇兩黨的約定，彼此有重要決定時儘量事先通知對方(儘管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時並未事先向中方通報)。據隨行的陸定一秘書于光遠回憶，蘇聯大使尤金聽了陸定一的介紹後，找出列寧的一篇文章，意在用列寧當年對言論自由的禁止反對中共對公開批評的容忍。離開蘇聯使館後，陸定一對於光遠歎息道：「他們的教條主義真是根深蒂固！」[17]

波匈事件後，中共對自由化政策的堅持更加深了莫斯科的不安。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據參與會談和接待的俄文翻譯李越然回憶，伏羅希洛夫至少兩次對毛澤東提出了對「雙百」方針的不滿，說他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竟然被允許登載報紙上。他引了「匈牙利事件」作為自由化氾濫的後果來警告毛。毛的回答是：請放心，中國不是匈牙利，中共不想做「溫室裏的花朵」；如果反黨分子想借機推翻共產黨，他們只會落到暴露自己的下場。[18]

赫魯曉夫下台後所寫的回憶錄裏提到了蘇聯領導人對中共自

由化政策和報刊上大張旗鼓地宣傳「雙百方針」的反感。他說，中國人「很會提出一些動聽的說法」，他們「很會掌握提出正確口號的時機」。回憶中共的方針在蘇聯所造成的影響時，他寫道：「我們自己的宣傳幹部問我應該怎樣對中共的方針作出回應。『我們的讀者在報紙上看到中國正在進行的新運動，』他們說，『這個百花運動已經潛入到蘇聯社會中了』。我們於是指示自己的報刊編輯和宣傳幹部不再報導這方面的內容，也不加評論。我們的立場是，中國的百花運動是中國為自己的內部需要而提出的口號，不適用於蘇聯社會。我們避免對這個方針作直接的批評，但我們也不表示支持……任何農民都知道什麼樣的花應該栽培，什麼樣的東西必須剷除。一些作物能結果，但味道苦澀，對健康有害無益，而另外一些則會瘋長以至與窒息那些鄰近作物的根莖。」[19]

赫魯曉夫當時已經因「非斯大林化」而陷入麻煩，他當然不想為任何進一步的自由化政策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雖然他理解毛不過是為了讓那些壞分子暴露自己而「引誘人們說出他們真實的想法」而已。赫魯曉夫也拒絕了毛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儘管這個觀點已在東歐國家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1956年6月2日，當中國正處於「反右」前夜時，赫魯曉夫接受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當問到他對北京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在人民和領袖之間存在矛盾」的看法時，赫魯曉夫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我們相信我們沒有任何這一類的矛盾」。[20]

1956年匈牙利曾受到中共很大的影響，匈牙利事件後上台的黨的新領導層對中共「反右」前的路線和口號仍然心有餘悸。1957年5月，就在中共極力鼓動知識份子向黨提意見的時候，匈

牙利黨的刊物發表文章，總結歷史教訓，警告那些眼睛看著中國、心裏想著在匈牙利實行「雙百方針」的人。文章說：「近幾個月中國(尤其是在文學、科學和藝術界)廣泛開展的『讓每朵花都開放』運動正在匈牙利引起越來越大的興趣……當這個運動剛剛開始時，曾經受到它導致思想自由化和壓制馬克思主義的指責……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知識份子非常瞭解，他知道他們的大多數是忠於社會主義的，所以他為『百花』的口號辯護……在經歷了過去的那場悲劇之後(指半年前的匈牙利革命——本文作者注)我們現在也許最好是對在匈牙利實行中國的方法保持警惕。」[21]

莫斯科對中國政策的警告、反對和禁止傳播的背後有兩個擔心。其一是本國和東歐的政治穩定；其二是對中共借機在國際共運中向蘇聯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政治威信受到「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損害的時候。周恩來在1957年初訪問莫斯科時，在「雙百方針」問題上受到很大壓力，他利用在莫斯科大學接受名譽學位的機會公開表明了中共的態度。他說：「為了推動文學和藝術的發展，我們中國提出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方針。當然，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發展和豐富社會主義文化，而決不是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會主義文化，列寧從來也沒有放鬆過對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尖銳批判。」[22]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及東歐共產黨保守勢力的這種憂慮很快就釋然了。1957年6月初，毛終於發起了「反右」運動，蘇聯及東歐國家的保守派鬆了一口氣。東德黨刊 *Neues Deutschland* (《新德意志報》)的記者于7月12日從北京發回報導說：「這次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右派』……現在那些過去站在『右派』立場上的人都暴露無遺了」。半年後，烏布利希在東德黨內發起「反對

修正主義分子」運動，清除了支持自由化的領導人施德萬、萬德爾、弗雷德·奧森納(政治局成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人)和其他一些同情者，很多鼓吹在東德實行「百花」方針的知識份子也遭到清算。

(五) 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北越

與對東歐的影響相比，中共對越南的影響發生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裏，能看到的材料也豐富得多。如果說中共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始於斯大林死後，而且受到蘇聯影響的限制，那麼中共和越共之間歷史上的關係要密切得多，甚至可以追述到 20 年代。

(1) 中越兩黨親如一家

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共產主義者曾經在「第三國際」指導下加入過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抗戰結束後，很多加入中共的越南共產黨人和軍人回到越南北部，開展了抗法鬥爭。1949 年中共革命的勝利為越南革命提供了直接支援，中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顧問和物資，中共革命的模式對越共也有深刻影響。1951 年 3 月的越共第二次代表大會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列作為黨的指導方針，毛的像片也與馬恩列斯並列；「中國模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專政」被確定為越南當時和未來的革命目標，「民族統一戰線」也成為動員各種力量(尤其是民族主義知識份子)實現革命目標的主要手段。此外，歷史上越南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儒家思想和中國文化典籍一直是越南知識份子學習的對象，使用中文的能力是衡量一個知識份子文化教養的標誌。

因此，很多越南知識份子可以從中文材料中瞭解外部尤其是北方鄰國的情況。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北越的「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與中共的關聯遠比與蘇共的關聯密切。東歐國家當時照搬「斯大林模式」造成的主要問題是過度強調重工業，缺乏日用品和農產品，斯大林時期黨內清洗留下的案件和積怨，秘密警察的恐怖統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的太上皇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給東歐國家帶來種種嚴重問題的同時，對自己的模式在北越所造成的問題從來諱莫如深。在中共正式公佈或間接透露的有關中越關係的文件資料中，充斥著中共如何在軍事、經濟、外交和人員上對北越的援助，但閉口不談北越在50年代上半期如何照搬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延安整風」）以及知識份子和文藝工作這三大政策，給北越社會帶來嚴重破壞的情況。

(2) 北越仿照中共模式實行土改

北越在1946年到1953年的抗法戰爭期間，對其控制區的地主富農基本上是實行「減租減息」，同時沒收法國地主和依附法國殖民當局的越南地主的土地，這是中共抗日時期土地政策的翻版。但到了1949年，中共就開始催促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實行「土改」以重新分配土地為名，其目的是要在農村摧毀以家庭和村莊為單位的社會結構，消滅社會精英，建立黨對鄉村的控制。但胡志明和其他一些越共領導人以越南情況和中國不一樣為由拖延抵制。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因此認為胡志明不願按中共模式實行「土改」，在農村階級鬥爭問題上表現曖昧。劉少奇在1963年一次反修正主義的內部報告

中，以「老子黨」自居，指名道姓地說，胡志明「這位同志歷來右傾。我們建議搞土改，他不搞……後來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斯大林一說，斯大林把他臭罵一頓。他才下決心搞土改」。劉少奇提到的胡志明的那次莫斯科之行發生在 1949 年 7 月。

從 1953 年開始，隨著對法戰爭的節節勝利，北越黨加快了社會改造的步伐，開展了「土地改革」。當時北越黨關於「土改」的宣傳提綱中特別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革命在抗戰時期(即民族革命)一直堅持了「減租減息」，而現在北越也還處於相同的歷史階段(仍在和法國殖民軍作戰)，為什麼卻要實行中國在下一個階段才實行的「土改呢」？越共中央對這個問題的答復是：中國當時由延安和重慶兩個政權組成民族統一戰線，後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況不是這樣，除了法國殖民者就是在西貢的保大傀儡政權，所以實行「土改」是有條件的。換言之，在北越，無人保護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革命」時期也可以將他們打倒。

中共的顧問參加和指導了北越很多地方的「土改」，介紹了中共「土改」中「鬥地主」的經驗，比如在農村裏劃分階級路線、用各種手段煽動對「地富」的仇恨、甚至用地痞和流氓充當打手等。越共幹部在參加「土改」前都必須專門學習中共的「土改」政策和經驗。直接領導這次「土改」的長征從 1941 年起就擔任總書記，在越共領導人中地位僅次於胡志明。他受中共影響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國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個人對北越革命最大的貢獻，甚至有時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隊稱為「我的」幹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勞動黨於 1953 年春節在農村發動了一場恐怖運動，為即將到來的「土改」鋪平道路。這場運動以北越黨中央的一道命令開始，名義上是打擊那些沒按照規定交

納農業和商業稅的富戶，但實際上幾乎波及全體農民。運動開始後，幹部組成工作組，帶著棍棒、繩索和武器下鄉，對那些未完成上交稅收的農民嚴刑逼問，強迫他們交代逃稅的後台和同夥，以及逃稅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頭頸上吊石塊，用繩索拴住手或腳吊起來等等。這場運動很快就產生了滾雪球效應，把越來越多的農民捲進去成為受害者。後來運動失控了，逃稅與否已不再受到關注，揪出反革命和鎮壓反革命成了主要口號。在很多地方，工作組和黨的幹部都只在幕後操縱，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貧苦農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則由鄉村的破落戶和痞子主導。恐怖籠罩了越北農村，很多黨員幹部由於其家庭背景和對運動的抵制也成為犧牲品，甚至一個回鄉探親的北越政府部長也被當作逃稅戶而關押，結果夫婦雙雙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殺。當時有數萬人被關押，直到1956年北越黨被迫「糾錯」時才被釋放。

越北農村的這場恐怖延續了兩個星期，有研究者認為，平均每個村有4到5人死亡。1953年2月底胡志明發表了講話，對兩個星期來農村運動的失控表示遺憾，向農民道歉，但並未否定整個運動。「群眾的義憤」和「群眾自發的行動」被黨用來為恐怖和暴力辯護，「群眾永遠是正確的」、「群眾可以自己領導自己」等口號也被用來在原則上肯定這場運動。這些實際上都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觀點。黨取得對農村基層的控制權後，收集了那些抵制運動、參加運動不力或企圖保護自己在農村的親戚的黨員幹部名單，然後把他們全部送進「再教育營」，直到1956年夏天才在「糾錯」運動中和那些被捕者一起釋放。這場「反逃稅」運動所造成的後果是，在北越農村造成了恐怖氣氛和對黨的絕對服從，為幾個月後「土改」的全面展開鋪平

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從 1953 年底國會通過「土地改革法」開始，到 1956 年底結束。在這場「土改」中，大量中農和富農被劃為「地主」而受到打擊，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槍決。同時，越共還對「土改」對象的家屬實行「社會隔離」政策，不允許這些家屬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導致大批婦女兒童在家中餓死。這實際上是黨的「消滅地富」政策的組成部分。在黨內，很多反對這種「土改」政策的原「老區」黨員幹部受到積極貫徹新政策的外來幹部的打擊、懲處甚至殺害。

(3) 北越仿照中共模式進行「整風」和「思想改造」

「整風」的越南文發音為 Chinh Huan。北越「整風」的歷史背景和中共的「延安整風」類似，都是對參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幹部和知識份子不信任，要從改造人性入手建立高度統一的極權政黨。很多參加過「延安整風」的北越共產黨人回國後，把他們在中共那裏學到的經驗介紹過去。這場針對黨內外知識份子和幹部的「整風」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是毛澤東「延安整風」的翻版。按照台灣學者陳永發對 50 年代早期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簡明概括，「中共的思想改造主要籍由兩個方式：一是邀請知識份子參加土地革命，一是成立各種學習班或辦理各種政治學習」。這兩個方式在北越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都被採用。

從 1951 年開始，「整風」運動在越北地區大規模展開，延續了幾年。這兩場運動波及北越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甚至那些在武裝和地下鬥爭中證明了自己對黨的政治忠誠的知識份子，也被強迫送進與外界隔離的學習班和特殊學校，經受系統的強化的思

想改造。很多人不堪忍受壓力和折磨而自殺，所以後來連剃鬚刀都被沒收，在電力緊張的情況下，「思想改造學習班」的燈火晝夜通明，對被改造者嚴加監視。從1953年到1956年，大批北越知識份子被安排參加「土改」工作隊，參與了農村人口「成分」調查、政策宣傳和撰寫通訊報導等工作，要求他們在此過程中既改造農村，也改造自己。

很多中國讀者都知道，有一個叫洪水(原名阮山)的北越共產黨人，參加過中共的長征和「延安整風」，曾任八路軍的高級將領。他1948年回到北越，以少將軍銜擔任第四軍區司令。他根據參加「延安整風」和解放戰爭期間「整軍」的經驗寫了小冊子，建議越共實行「三整」(整黨、整幹、整軍)。由於洪水主張毛式「自力更生」，在軍事方針和爭取中共援助上與胡志明、武元甲等北越黨、軍領導人有矛盾。洪水後來回到了中國，他的「整風」建議沒有馬上在北越實行。但1951年以後，越共在中共顧問的參與下還是發起了「整風」運動。洪水的建議說明，中共「延安整風」模式在北越黨政幹部中早就產生了影響並形成了接受這種模式的土壤。

中共對越共的影響不僅表現為北越的「整風」中大量使用了中共的「整風」文獻，而且「延安整風」與後來歷次政治運動中採用的很多做法也有其越南版本。例如「硬戴帽子」，即不管受審查者如何否認，他必須承認他從未犯過的罪行，絲毫沒有自我辯護的機會；還有「車輪戰」，即連續多個晝夜對受審查者進行盤根究底的逼問，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受審者心理崩潰。北越「整風」中的另一個常用手段是「連環套」式的追究「反革命」動機。有這樣一個案例，一位教師被懷疑為「反革命」，於是他的學生對他使用了這種方法，將他定為「反革命」。其過程是：你給了某學生一個他不應得的高分，我們就此認為：

一，你以此在我們之間製造矛盾；二，有了這種矛盾學生就相互爭吵；三，他們從此就不再進步；四，他們甚至會認為現在的教育制度不如法國殖民統治下的學校；五，他們會進而認為今不如昔，現在的整個制度不如法國殖民時期；六，所以用一個不符合實際的成績，你就達到了為殖民統治者服務的目的；七，可以得出結論，你就是法國殖民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23] 這種定罪法在中國文革中更普遍地使用。

在中共的「思想改造」中，認「罪」者常常在公開場合痛哭流涕表示自己的悔「罪」；在北越，這種方式演變為一種集體性的悔罪和施加壓力的手段。在「思想改造」會議上，聽取「悔罪」者認罪的人常常集體痛哭流涕，表示他們沒有聽從「胡伯伯」和「毛伯伯」的教導，讓這個人犯了罪；或者是集體到一個還拒絕認「罪」的人那裏，在他的門口大聲哭泣，用這種方法逼他就範。這種方法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集中了未成年「思想改造」對象的學校裏，造成精神失常。

需要說明的是，在國際共運中，北越只不過是受中共「延安整風」模式影響的一個事例。馬來西亞共產黨在 60 年代也曾多次發動「整風」，讓黨員輪流去「學習班」，由一些從中國回來的幹部介紹「整風」經驗。毛澤東的「整頓黨的作風」、「反對自由主義」等被作為馬共的「整風」文獻，每個人都要「活學活用，敢於在自己靈魂深處鬧革命，把自己的骯髒卑鄙思想挖出來消毒，讓自己放下包袱，輕裝前進」。[24] 馬共內部在 60 年代末還發生了「肅反擴大化」的情形，大批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青年被殺害。[25] 馬共 1989 年放棄武裝鬥爭重返社會時，大量受害者的家屬前往馬共營區追尋親人下落，馬共不得不專門發出文件，為這些受害者「平反」，追認其為「烈士」，並給每個受害者家屬

800 美元的賠償。

(4) 文藝為政治服務：北越對知識份子的控制

和中國一樣，北越共產黨的革命吸引了大量懷抱民族主義理想的知識份子，尤其是文學藝術家，他們在民族主義革命中非常活躍。如果說中國知識份子很難堅持第三條道路的話，越南知識份子更是如此，因為越南除了法國殖民當局就是保大傀儡政權，而中國畢竟還有一個獨立的國民黨民族主義政權在與共產黨爭奪知識份子，還有大量的城市供獨立知識份子活動。而民族主義意識強烈的越南知識份子在政治上除了北越共產黨以外沒有別的政治勢力可以選擇，除了前往北越根據地以外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他們作為民族主義知識份子而生存。這些參加抵抗法國殖民主義的知識份子被稱為「抵抗知識份子」，很多人長期在森林中生活，與「越盟」(越共在抗法時期的名稱)的幹部戰士一樣落下了一身疾病。

如果說中共在革命中曾面臨如何改造大量知識份子這個問題的話，那麼在北越這個問題就更加尖銳。很多越南知識份子其實對以毛主義為模式建立的北越政權有反感，但在民族主義的兩難處境中他們往往選擇了前往北方、加入革命。北越 50 年代中期「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潘魁 [26] 曾對這種兩難處境和無可奈何的選擇有過一個比喻。他招待客人喝咖啡時，由於「越盟」控制的越南北部地方沒有可以直接融於咖啡的白糖，潘魁就讓客人嚼一些土產粗糖。他說：「這些土產粗糖代表愛國主義，它可以沖淡咖啡的苦味，而這種苦味就像黨的領導。有了這種土產粗糖，我們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時欣賞它的芬芳，因為這種芬芳就是

我們知識份子的尊嚴。」還有一些知識份子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其含意是，不論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遠不會「明媒正娶」，改變你的「身份」。也有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忍受不了「越盟」的控制和改造，於40年代末50年代初離開越南北方的「越盟」控制區，回到了越南南方。

為了控制和改造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北越實行了軍事化管理，所有參加反法民族主義鬥爭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都歸北越軍隊的總政治部管轄(北越政府一直到1955年2月才建立起文化部)，接受軍事紀律的制裁。北越軍隊總政治部完全是仿照中共軍隊的模式建立的，很多越共軍隊政治幹部在中共軍隊中受過訓練，受黨的委派監督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的工作。在總政治部下有一個軍隊文藝工作處負責具體事務。北越也有模仿中共的文化藝術工作者聯盟(文聯)，但其權威無法和軍隊總政治部對文藝的控制相比。當時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甚至就住在軍營裏，受軍事紀律的約束，外出要像士兵一樣向上級申請離營證，社交對象也要由軍隊黨組織批准。

在文藝思想上，與毛澤東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統一黨的文藝方針一樣，北越也把知識份子和文化藝術創作嚴格限制在為黨的政治目的服務的範圍。北越黨的主席胡志明提出了「文化抗戰化、抗戰文化化」的口號，把文化完全看作是抗戰的一條戰線。北越黨的總書記長征在1948年7月的第二屆文化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了「馬克思主義和越南文化」的報告。他明確指出，西方文化中為藝術而藝術的腐朽傾向在北越革命中是不允許的，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這個報告後來成為北越文化工作的指南。北越黨也有一個類似於中共文藝領導人周揚的角色，即中央委員、詩人素友(To Huu)，他在1949年就提出，必須從文化領域

中徹底清除舊社會的全部遺跡，要讓藝術與政治結合，讓作品的政治內容決定藝術形式，文藝工作者必須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指導創作。在越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文藝家都首當其衝。

(六) 越南知識份子對毛主義的挑戰

(1) 陳寅：越南的胡風

和中國一樣，正是在這些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中，產生了共產黨體制下最初的異議思潮。中國儒家人文主義和精英文化的薰陶，使他們難以接受共產黨革命中的暴力和粗俗。法國長期的殖民統治使越南知識份子能夠接觸到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人權觀念，就像世界近代史上很多非西方民族從殖民統治下瞭解接受這些思想並用來和殖民統治作鬥爭一樣。越南知識份子對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歷史非常熟悉。越共也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比中共在抗戰結束前後對美國制度的讚美有過之無不及。抗日戰爭結束前，胡志明和武元甲等人不但熱情接待空降到越北遊擊區的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表示未來的越南要和美國建立親密關係，而且多次向美國國務院發電報，表示越共的運動完全是民族民主性質的。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內巴亭廣場宣讀的「越南獨立宣言」中，第一段就完全引用了「美國獨立宣言」的第二段，即那些「不言而喻」的基本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人民主權)，並稱這些是「不朽的原則」。胡志明還引用了「法國人權宣言」中的一段。《越南獨立宣言》的主要部分列舉了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如何公然無視這些普世性原則，踐踏越南的人權和民族權利。如果把這些段落與「美國獨立宣言」相對照，可以發現它們

在結構上幾乎是對稱的，語言上也十分相近。不但如此，「越南獨立宣言」的結尾和「美國獨立宣言」也幾乎完全相同。胡志明和「越盟」的政治目的是向美國表示，越共的革命是受自由、民主、人權的意識形態的鼓舞，並非共產黨革命，從而希望美國能支持他們在日本戰敗後防止法國殖民統治捲土重來。

據 Kim N. B. Ninh 的研究，北越黨和知識份子間的分歧早在 40 年代末就開始了，但一直沒有凸顯出來。[27] 北越共產黨 1954 年從法國殖民統治下獨立，結束了武裝鬥爭，進入城市，並建立了國家政權。城市生活助長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情緒。[28] 在「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產黨國家蔓延時，北越知識份子從 1955 年 2 月開始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當時，軍隊中大約 30 名作家和藝術家聯名向中央委員會上書，要求廢除軍隊總政治部對文化藝術工作的領導。這份上書的內容包括：「一，把對藝術和文學的領導權還給藝術家和文學家；二，在軍隊組織範圍內建立作家和藝術家協會；三，廢除現存的對文藝工作的軍事化管理。」[29] 領導這場上書運動的是年輕詩人和小說家陳寅。參加上書的有詩人黃琴（當時是越軍總政治部文藝部的營級幹部）、音樂家子朴等。在上書的同時，陳寅帶領大約 20 名文藝家面見軍隊總政治部主任阮志清，提出 3 項保障藝術創作自由的要求。阮志清拒絕了這次請願，當面斥責這些人受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襲。這些知識份子本來以為他們參加革命的經歷已經使黨相信自己的忠誠，這次請願的失敗使他們大受挫折，為以後向黨發出更激烈的挑戰埋下了伏筆。

陳寅領導的上書和請願是斯大林死後共產黨國家中文藝領域「解凍」呼聲的一部分。這種呼聲政治上要求放鬆對文學藝術家的控制，藝術上要求解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只准從正面表現

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統治)的束縛，是知識界自由化運動的先聲。一些北越文化界和知識份子的研究者認為：陳寅的活動與中國的「胡風事件」[30]有關；當胡風對中共文藝界領導人提出挑戰時，陳寅正由越軍總政治部派往中國，撰寫反映「奠邊府大捷」[31]的劇本，他在中國期間很有可能對當時中國文藝界人士中議論紛紛的胡風觀點有相當瞭解。和大多數參加革命的越南年輕知識份子一樣，陳寅是在對日抗戰結束時參加革命並開始創作活動的，1948年入黨。在40年代下半期，他就表現出反對官方文藝政策——即胡風所反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塑造模式化英雄人物的傾向。陳寅1951年參加過「整風」，是北越文化界中最早的一批接受中共「整風」方法的人，他對毛主義的一套和中共文化藝術界的情況非常熟悉，在北越文藝界同儕中有「中國大師」之稱。陳寅和胡風在文藝思想和對官方文藝權威的態度方面非常相似，可以說是在相同的政治控制和文藝政策下一對學生的異議分子。他1954年前往中國時，越共按慣例由總政治部派一位政工幹部伴隨陳寅，對他的創作活動橫加干預，陳寅不久就與這位幹部發生衝突。回國後在發起向阮志清請願的同時，他發表了長篇小說《前仆後繼》，沒有按照官方教條把戰士的形像拔高，而是儘量使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一篇文章，嚴厲批評和諷刺了越共文藝界權威人物、越共中央委員素友新出版的一本題為《越北》的詩集。官方認為素友的這本書貫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文藝創作的樣板。陳寅在他的文章中不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直接提出質疑，而且提出了「百家」的概念。他批判黨的文藝機構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教條下規定寫什麼和怎麼寫：「為什麼沒有人去寫政府機構？為什麼沒有人去表現愛情？為什麼只准寫工人農民出身的人物？現實主義應該

鼓勵形式和內容上的百家爭鳴。」 [32]

「百家爭鳴」作為學術研究上的指導方針，是毛澤東1953年應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歷史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的要求，就郭沫若和范文瀾之間在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所寫的題詞。這個說法不久就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傳播開來，後來又成了「雙百」政策的一部分。陳寅關於「百家爭鳴」的提法是否與他在中國的經歷有關？作為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南知識份子，他有可能知道

「百家爭鳴」的典故。但更可能是他不久前在中國時對這個原則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受到鼓舞。

陳寅的上述言行可以看成是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下越南知識份子的大膽發洩。研究越南1950到1960年代黨與知識份子關係的Ninh指出：「很明顯，中國進行的對胡風集團的猛烈批判提高了越南黨的警覺。」 [33] 隨著中共開展「反胡風」運動，1955年5月，陳寅被北



Cartoon by Ci Ngoc, Nhan Van, No2.
September 30, 1956 文字說明見下文。

越共產黨「勸告」退黨。1956年初，他又被送進「土改」工作隊

強化「思想改造」。不久，胡風被中共逮捕，1956年2月越共也逮捕了陳寅。一個參與決定逮捕陳寅的越共高級幹部認為：「中國有一個胡風，我們很可能也有一個」。^[34]在北越1956年9月30日出版的《人文》雜誌上，刊登了一幅諷刺黨的文藝界領導在越南抓「胡風」的政治漫畫。這幅漫畫的畫面上，越共管理文藝工作的領導人之一懷青左手拿著胡風的書，右手把拿著反映「奠邊府大捷」作品的陳寅當胸抓住。漫畫裏有這樣的文字說明：懷青說，「同志們，這就是胡風本人！」陳寅說，「親愛的同志和領導，我發誓我的名字叫陳寅。如果你們不信，可以去查我的出生證明。」^[35]

(2) 「一石激起千層浪」：蘇共二十大和中共「雙百」方針在北越引起的反響

陳寅被捕後不久，蘇共在1956年2月舉行了「二十大」，4月派遣米高揚去北京和河內通報「非斯大林化」的新政策。蘇共的變化給越共帶來了震動，它不得不重新考慮與知識份子的關係。米高揚訪問河內後，越共以逮捕陳寅的決定未經高層批准為由將他釋放(陳寅曾經在獄中自殺未遂)。5月，中共宣佈實行「雙百方針」，這立即激起了北越知識份子的共鳴。著名哲學家、新建的越南國立大學歷史系主任陳德草立即安排人翻譯了陸定一的講話，準備在北越發表。陳德草在法國獲得學位，用法文出版過研究現象學的著作，在西方哲學界很有影響。他于50年代初放棄在西方學術界的發展回到越南，參加了越共領導的反法鬥爭。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為了表示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縮短與參加過武裝鬥爭的越共成員的距離，陳德草曾故意不用蚊帳睡在森

林裏，讓蚊蟲叮咬，患上了瘧疾，這是很多遊擊隊員的常見病，幾乎成了參加革命的標誌。[36]

據 Bernard B. Fall 的研究，北越黨最初力圖限制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和中共「雙百方針」造成的影響，但北越知識份子不久就衝破了上層的限制，引發了 1956 年夏秋的異議浪潮。[37] 在自由化運動的初期，北越知識份子主要是討論創作自由以及黨對文藝的領導，但也涉及其他問題。8 月 1 日到 18 日，越共被迫讓文藝工作者舉行了「第一屆越南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北越原有中國模式的「文聯」，但從未開過代表大會），議題是學習蘇共「二十大」文件和中共的新文化政策，結果會議通過了要求黨中央修改文藝政策的 5 項要求，包括立即翻譯中共有關「百花齊放」政策的文件。[38] 1956 年 7 月底 8 月初，河內市議會舉行會議時，與會代表也對越共各方面的政策（從食品短缺到稅收）提出了嚴厲批評。

在國際國內形勢下，越共被迫就 40 年代末以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作總結和反省，於 1956 年 8 月底宣佈採用新知識份子政策。這些新政策是：「一，最廣泛地團結和動員知識份子的力量，完成新時期的革命任務；二，根據知識份子的能力使用他們並信任他們；三，在國家能夠承擔的基礎上，保證知識份子的工作條件，給予他們應得的報酬；四，繼續幫助舊知識份子瞭解革命思想，訓練新知識份子，不斷地擴展他們的知識，擴充他們的隊伍。」[39] 在主要內容甚至措辭上，越共的這些政策與同期中共的政策驚人地相似。周恩來在 1956 年 1 月所作的有關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中，曾宣佈知識份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當前的問題不是知識份子是否應該信任，而是如何合理地充分地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如何向他們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如何在國

家經濟條件許可的範圍內保障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周恩來的報告在北越知識份子和黨政幹部中有相當影響。越共中央黨校的編譯機構 1956 年 11 月翻譯了周恩來報告以及陸定一關於「雙百方針」報告，供內部傳閱。由於很多越南知識份子都能直接閱讀中文，所以中共文獻在北越知識份子中的實際流傳要早於越南文本的出版。[40]

在調整知識份子政策的同時，越共派人前往中國考察「百花齊放」。到 1956 年秋天，隨著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激化，共產黨國家的異議浪潮不斷高漲，越共中央開始全面修正政治經濟政策，於 9 月初召開了「十中全會」，由於爭論激烈，會議一直開到 10 月底。黨中央於 10 月 29 日發表全會公報，承認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犯了嚴重錯誤，絕大多數在「鎮壓逃稅」運動和「土改」中被捕的幹部、知識份子和農民被平反和釋放。越共總書記長征成為替罪羊，引咎辭職，由主席胡志明代理總書記。直接主持「土改」的政治局委員黎范龍被貶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胡越杭則被貶為普通黨員。越南通訊社 1956 年 10 月 29 日的報導披露了越共在「土改」中的一些「嚴重的錯誤」，包括依靠壞份子不分青紅皂白地選擇鬥爭對象，「大量貧農和雇農受到打擊，許多中農受損害，富農幾乎全被劃為地主」。越共黨報《人民報》1956 年 11 月 1 日的報導中也提到，「土改」中「很多地區用刑訊逼供，用偽造的文件將無辜黨員幹部和群眾送進監獄」。不久黎筍從越南南方的黨組織調到北方擔任黨的總書記。這一調動表明，北越黨組織的錯誤已嚴重到要由向來處於被領導地位的南方黨組織來幫助糾正的地步。此後，在黎筍的領導下，越共開始逐步擺脫中共的影響。[41]

「十中全會」之後，越共隨即開展了針對「土改」和知識份子

問題的「糾錯」運動。河內電台10月30日廣播說，「十中全會」後，黨的首要任務是民主化和改善人民生活，而過去一直列於首位的民族統一此時移到了第三位。[42] 越共還召開了「700人大會」，傳達中央全會精神。會上由軍事領導人武元甲作報告解釋中央的新政策。武元甲被認為和中共關係不深，與洪水在學習中國經驗上有矛盾，在領導「奠邊府戰役」中曾經不理會中共的軍事顧問，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比較開明溫和。北越黨選擇他在這個時刻作報告顯然是一種姿態。此外，越共主管文藝的素友和阮庭氏公開承認，犯了壓制知識份子自由創作的錯誤，主持審查和逮捕陳寅的懷青發表文章說，他把陳寅定為「反革命」是毫無根據和完全錯誤的。

當時的北越駐華大使黃文歡曾回國參加1956年9月到10月的全會，並在會上被提拔進政治局。當他回到北京後，周恩來專門召見他詢問北越「土改」中的錯誤是否與中共顧問團有關。黃文歡回答說，中國經驗都是好的，錯誤是越南人自己犯的。這很明顯是政治套話。[43] 周恩來如此關心越共的「糾錯」，顯然是因為中共對北越黨揭露出來的問題深感震動。

近年來中國學者開始對北越1957年的「糾錯」運動作有限的介紹。如周新城主編的《越南、古巴社會主義現狀與前景》一書，在肯定了「土改」中「貧困農民通過向地主階級展開暴風驟雨般的鬥爭」分到土地的「成就」時也說：「到1956年夏季，越共發現土改中在鎮壓敵人、整頓組織、劃階級成分方面犯有嚴重錯誤，即擴大了打擊面，錯劃了一些人為地主、富農，把在革命戰爭時期以『白皮紅心』面目參加革命的人，錯打成階級異己分子、鑽進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於是開始糾偏，到1957年底結束。負責土改工作的越共中央總書記長征引咎辭職。」[44] 這段

文字對越共搬用中國模式造成的「錯誤」之後果介紹得極其有限，不但迴避了中共對越南「土改」中「錯誤」的責任問題，而且對當時共產黨國家中自由化運動和反斯大林主義的大背景促使越共「糾偏」這一點隻字不提。

(3) 對毛主義的挑戰：北越知識界自由化的高潮《人文》、《佳品》運動

從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知識份子發起了「《人文》《佳品》」運動。這個運動主要以一批突然湧現出來的出版物為中堅，其中最具有影響的是《人文》和《佳品》。《人文》是一份公開的政治性週刊，其刊名意指「人文主義」，但也包含中國儒家在文學和哲學的陶冶中修養人性之意。從1956年9月到11月，這份雜誌只出版了5期，但刊登了大量尖銳的文章。《佳品》[45]則是具政治傾向的文學刊物。除了這兩份最重要的刊物外，還有《百花》、《新地》[46]、《說真話》、《創造》、《新河內》、《新時代》、《祖國》等。這些刊物都是民辦的，在報刊亭裏出售，對官方報刊的銷路造成強烈衝擊。民辦的明德出版社因出版《人文》和《新地》等刊物而令人矚目。當政府機關通過壓縮紙張的分配來限制其銷路時，編輯部門號召讀者捐款來解決問題。這些刊物或直接發起政治討論，或用文藝作品的形式發表政見，其內容從黨對文藝和知識份子的政策到官僚體制，政府的腐敗無能，有的甚至討論「黨國體制」是否具有合法性。

這些刊物發起的討論引起了廣泛反響，甚至擴展到河內人民代表大會和越南「祖國陣線」(越共的統一戰線組織)的會議上。據Boudarel的研究，北越知識份子對共產黨體制的尖銳批判超過了

當時的中國，更超過了蘇聯的知識份子。北越知識份子的目標集中在三個問題上：自由與民主，法制和人權，以及在思想和研究的所有領域開放言論自由。[47] 他們還借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的機會，對北越黨在人民中灌輸的對「胡伯伯」(胡志明)的帶有家族長老溫情色彩的個人崇拜提出挑戰。

例如，《人文》主編潘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用伊索寓言的筆調影射胡志明是越南農家放置檳榔的石灰罐，這種石灰罐時間一長內部的石灰就越積越多，容積變得越來越狹長，直到無法使用，但卻因使用年久而常被農家供奉起來。胡志明體型瘦長、年高，而且被崇拜，就像是這樣一個老而無用的石灰罐。潘魁還說，不久前對陳寅的批判中，陳寅的一個罪名是在其作品中用了大寫的「他」，長期以來，在北越這一人稱代詞只可以用來稱呼「胡主席」。潘魁寫道：「當我聽到這個指控時，我覺得仿佛是在皇家宮廷裏」。1956年10月，當北越自由化運動達到高潮時，潘魁正率領越南文化代表團在中國參加魯迅逝世20周年的紀念活動。由於中共對魯迅的推崇，魯迅在北越也享有很高聲譽。在北越自由化運動中，「魯迅精神」成為異議知識份子向專制文化政策挑戰的工具。在「《人文》、《佳品》」運動的高潮，選擇這個運動的領袖人物前往中國去紀念追求知識份子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的魯迅，這很難說是一個巧合，而有可能是越共向知識份子作出的妥協。潘魁在《人文》上發表文章談創作自由，舉了一系列事例，包括一年前寫紀念魯迅文章時受到來自權力機構的蠻橫干預。潘魁在文章中質問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麼創作？我怎麼可能保持我的個性？」[48] 顯然，當時在北越紀念魯迅有實際政治內容，與當時知識份子與黨的矛盾有關係，並和知識份子中最具有挑戰性的人物有關聯。

在「《人文》、《佳品》」運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來自中國的影響。中共的「雙百」方針和1956年對知識份子的新政策鼓勵了北越知識份子。越共理論家和領導人搬用馬克思、列寧的語錄來論證越南歷史也有那麼幾個「社會發展階段」，很多越南歷史學家對此感到十分厭煩，毛的「百家爭鳴」說法正好給他們提供了理論武器。越南著名的歷史和人類學者陶維英說：「在有關越南歷史和國家形成的辯論中，很多研究者不敢提出那些不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以及黨的領導人的意見的新觀點。誰敢越雷池一步就會遭到離經叛道的指控，就只能閉嘴。在很多研究和討論領域，很多人只有一個恐懼，那就是在無意中偏離了正統教條和官方思想規定的現成的路徑。對於他們來說研究工作成了馬戲團裏需要高度技巧的走鋼絲。」他大聲疾呼：「我們必須採用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領域的政策：『百家爭鳴』！」[49] 這些刊物和參與討論的知識份子意識到，在他們背後有中國的自由化在撐腰。Ninh指出：「事實上，《人文》對中國和東歐的發展亦步亦趨，在越南回應中國的百花運動和波匈的自由化……《人文》的作者們意識到他們是一個更廣泛的國際性運動的一部分。」[50] 此外，僅僅從一些刊物的名稱(如《百花》、《新地》等)上也能看出中國的影子。

「《人文》、《佳品》」運動和中國「雙百」方針的影響有關，而它嚴厲批判的又恰恰是越共從中共那裏移植或借鑒來的東西，而不是離越南實際較遠的斯大林主義。這與赫魯曉夫推動下出現的自由化導致東歐國家批判蘇聯模式如出一轍。從以上敘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過「延安整風」建立起來的、以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的、經周揚等人貫徹推行的中共文藝路線之北越翻版在1955年到1956年就受到了挑戰。北越知識

份子提出，文藝要擺脫黨的控制而獨立，文藝家要有創作自由，他們和黨之間應該是平等的。陳寅在 1955 年 2 月向黨請願時提出：「一個作家責任感的最高表現」是對真實的尊重和信念，它「超越一切指示和理論」；作家必須服從真實，不能為了政治需要而扭曲它。 [51] 潘魁則用直白的語言說：「文學為政治服務，政治領導文學和藝術，這已經變得天經地義了。但我們必須要問：如果政治要達到自己的目的，能僅僅依靠口號、旗幟、傳單和命令而沒有文學和藝術嗎？要誠實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政治必須拍拍文藝的肩膀，說『我和你聯繫是需要你，需要你的藝術』。只要政治這麼說了，文藝就會同意。但被政治所需要的文藝的功能只是文藝的一個部分。政治(連這一部分也)不能領導，文學和藝術必須要求自己的自由。因此，我想政治沒有理由不接受一個(政治和文藝)雙贏的結果」。 [52]

越共從中國照搬的以「思想改造」為主的知識份子政策，是另一個「《人文》、《佳品》」運動中被批判的重點。很多越南知識份子對「思想改造」深惡痛絕，他們敏感地認識到，在這種「改造」的背後其實就是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目的是把知識份子「搞臭」，這是毛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一，與「土改」中對「群眾」的「自發革命行動」的縱容出於同一根源。歷史學家陶維安強調說，這種「改造」的實際結果是摧毀知識份子的自尊，甚至使他們恥於承認自己是知識份子。著名律師阮孟牆說：「當發現黨對他們完全不信任時，參加抵抗鬥爭的知識份子……感到痛苦和失望，儘管他們為黨作出了無數犧牲。是他們索取過多嗎？他們提出要當部長或者大使嗎？沒有。完全沒有……他們的大多數只不過要求根據他們的才能服務於人民，捍衛他們的榮譽和思想自由，他們相信這是他們作為知識份子的尊嚴最本質的東西。」很多自由

化運動的參加者還對蔑視知識份子專業知識和才能的「外行領導內行」(對它的批判也是中國「右派」言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的做法大張韃伐。有一首詩這樣說：「喜歡說大話的領導人，雖然對文藝一竅不通，他卻一直在說教和批評。鸚鵡學舌地背誦從書本上看到的他自己還沒有弄懂的字句，他的心就像乾木頭，他的說教聞上去就像燒焦的米飯。當被問倒時，他拍著胸脯，揮舞著黨的文件，一心只想把人嚇倒」。

在「《人文》、《佳品》」運動中，異議刊物還大量揭露從1953年春到1956年的「土改」中對所謂「階級敵人」濫施暴力、折磨和殺戮的情形。北越的知識份子指出，甚至在1956年9月越共已被迫承認「土改」中的錯誤、發起了「糾錯」運動並大量「平反」和釋放被捕者時，各地「土改」中的既得利益者和有血債者仍然利用他們在「土改」中獲得的權力，以暴力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對被「平反」和返鄉者施加報復。例如，1957年3月14日出版的《新地》雜誌詳細報導了一個案例：一個村莊的前村長在「土改」中被劃為惡霸地主而遭逮捕，但在「糾錯」運動中被重新劃定為中農成分並被釋放。就在他返鄉途中，曾把他定為「地主」的新村長卻糾結手下人將他處死。

1956年11月5日的《人文》雜誌發表一篇文章，指出「在土改中，非法逮捕和關押、剝奪財產，對地主住宅的隔離(這造成了很多無辜兒童被活活餓死)，所有這些都不是黨的領導有失誤所能解釋的，而是因為完全沒有法制。」[53] 造成這種無法無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黨的專制和暴力摧毀了農村的秩序，建立了以「土改」工作隊為代表的絕對權力。一個參加過「土改」的知識份子發表文章說，他當時被派下去報導農民的苦難和地主的殘忍，但他看到的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他回憶道：自己所屬的「土改

工作隊」隊長進入一個村莊後沒幾天，就組織大會用槍斃一個「地主」來提高農民的「革命精神」，還要求工作隊員通過與農民結婚來「提高思想覺悟」。這位知識份子表示：「我對這種行為表示懷疑，但我一聲都不敢哼。他(隊長)動一動指頭就可以把我送進監獄！」[54]

越南哲學家陳德草尖銳地指出，在「土改」中，整個省和區一級的政權結構都被重新改造了，其目的是把「整個農民階級痞子化」。[55] 根據「土改」的教訓，陳德草強調，「自由的本質是個人自由」以及「自由的內容」必須由「自由的形式」來保障這個自由主義的原則。他的觀點對共產黨所主張的自由首先是集體的和社會的自由以及實質的自由重于形式的自由構成了直接的挑戰。他說：「自由的形式是個人自由……個人為共同體服務，但共同體必須建立在個人之上，在人民的法律範圍記憶體在的個人自由的形式使得個人能夠為建設共同體作出貢獻。」[56]

在有關「土改」問題的討論中，產生了對個人自由(權利)和法制的呼聲，而實現它們的首要條件則是確保言論自由。《人文》雜誌的最後兩期曾為言論、集社和遷徙自由大聲疾呼。當時河內還有很多殖民地時期或在法國受過專業訓練的律師，他們從法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的角度，總結了「土改」的教訓，甚至追究政府的責任。阮孟墻是當時的一位著名律師，他在1956年10月對越南國民大會提出了一系列建議：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調查「土改」中的「過火」行為；對幹部的工作建立制度性的監察；把非官方的群眾組織真正建成表達人民意見的渠道；實現建立在出版和新聞自由之上的言論自由。他強調說，在越南，政治權威至高無上，凌駕于經濟和文化生活之上，這是導致「土改」中災難性錯誤的主要原因。時任黨的總書記的長征和農業部長等黨的領導人

雖然承認了錯誤，但沒有觸及制度性的根源。他說，作為律師，在這樣一個黨政結構中，他無法判斷什麼樣的個人能夠為這樣大的錯誤承擔「責任」。

參加自由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可以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就長期堅持民族獨立立場的老知識份子；第二類是比較年輕的一代，他們的主要政治經歷是參加「越盟」或越共領導的抗法鬥爭，包括黨內的一些高級幹部。上文提到的陳德草、阮孟墻、陶維安和陳寅等人，就是這兩類人的代表。此外，還有很多知識份子站了出來。鄧范努是著名生物學家，他曾經在戰爭年代幫助越共就地取材製造抗生素，以克服森林生活中的種種傳染病；女詩人劉氏燕(筆名翠安)是越南著名作家，女性主義文學的代表者，她在30年代編輯了兩份很有影響的婦女雜誌，出版過愛情小說《魂》；長友則是40年代初把心理分析學引進越南的學者，他一直支持「越盟」的抗法鬥爭，儘管他反對它的很多具體政策；在年輕人中，文高是青年作曲家，北越國歌的詞作者和譜曲者；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值得一提的是阮友燈。他是越共政府青年部副部長，在越共政治活動中非常活躍。當胡志明1945年在河內巴亭廣場宣讀著名的「越南獨立宣言」時，他是廣場上群眾集會的發動和組織者，並以此成名。他也是陳寅1955年2月請願的參加者和關鍵人物，後來一直利用自己的地位、影響和關係，推動著自由化，保護知識份子，與素友、懷青等文藝界的黨棍發生過尖銳的衝突；在一些被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封為「民主人士」的知識份子和社會活動家中，出版家陳少寶具有代表性。他主持的明德出版社出版了《人文》、《佳品》和《新地》等刊物，為異議分子提供了陣地。

(七) 北京與河內同施「陽謀」

當「斯大林模式」在東歐受到公開批判時，以「土改」、「鎮反」、「思想改造」(「整風」)和「文藝為政治服務」為代表的毛主義模式，也在中國和北越受到挑戰。當然，在嚴格意義上，毛主義的這些政策都可以在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中找到對應的內容，並非毛主義的獨創。例如，列寧早就主張，文藝是黨的一條戰線；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也把大量農民劃為富農並消滅。儘管如此，這一整套政策畢竟是毛主義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主要特色，而且系統地構成了毛主義的精華。在中共能夠有效施加影響的北越，毛主義就是越共的精神武器。正因為如此，當蘇聯東歐的知識份子向斯大林主義發起全面挑戰時，北越知識份子所推動的自由化浪潮直接指向毛主義，而非斯大林主義。需要指出的是，越南知識份子爭取政治自由的努力與其中國同行的命運息息相關，而越、中兩國當局應對這一挑戰的舉措也基本上同步同調，因此，1956年到1957年間中、越兩國當局的知識份子政策呈現出有趣的馬鞍型同步演變。

(1) 北越鎮壓農民暴動卻允許知識份子繼續「鳴放」

就在北越知識份子向黨挑戰的同時，1956年11月，北越農民向「土改」和黨在農村的組織發起了暴力反抗。這次農民暴動發生在胡志明的老家義安省，1930年到1931年在這個地區發生的「義安——河靜」暴動造就了越南的「蘇維埃」運動。(值得一提的是，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中共30年代初就在中國民族國家的版圖內正式建立一個叫「蘇維埃」的割據政權是一個眾所

周知的事實，但很少有人堅持提醒讀者：這個國名指的並非僅僅是「革命」，而是明白地宣告它與蘇聯的關係。而當年的越共也是如此。)然而恰恰就在這個「群眾基礎」較好的「老區」，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令農民積怨甚深。1956年10月底，越共中央全會承認，在「土改」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這個消息傳到農村後，農民並未因為黨認錯了而感恩戴德；相反，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在11月5日發起了武裝暴動，大約有2萬多農民參加。越共被迫調動其軍隊中的精銳第325師，一個星期後才將農民暴動鎮壓下去，大約有6千農民被殺或被強迫遷移。當時，北越義安省農民對政府的反抗，在規模上或許僅次於「匈牙利事件」，但今天很多研究者對此知之甚少。

毫無疑問，這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威脅到北越政權的基礎，本來應該增加越共的恐懼，使它對任何異議更加敏感和不寬容，何況這次農民武裝暴動正好與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同時發生。如果北越政權把這次農民暴動和城市的知識份子抗議相聯繫，在鎮壓農民之後強化對城市知識份子的鎮壓，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但讓人意外的是，事實並非如此。在匈牙利革命和北越本國農民的暴動被鎮壓之後，北越黨不但放鬆了對知識份子的壓制，而且還允許他們繼續「鳴放」。單從北越的國情出發，人們很難相信北越共產黨1957年緩和對知識份子的壓制完全是出於其國內政治的需要。當時正是中共置蘇聯和東歐對「百花齊放」政策的批評和抵制於不顧，號召知識份子在單位裏和報刊上廣泛向黨提意見的時候。考慮到中共和越共之間聯繫的緊密，北越對知識份子的這種寬鬆政策很難說是偶然的。

當時越共在國內政策上對中共意見的重視，可以從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找到充分證據。至今中國當局對歷史上中共和越

共之間的政治關係(此處指中共如何影響北越的內政，而不是指軍事、經濟和南北統一問題) 透露甚少，但還有線索可循。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說：「日內瓦會議閉幕前夕，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勞動黨中央要求中國對越南鞏固和平、擴大土改、接管城市、恢復和發展經濟等工作進一步提出意見，並派人協助。」[57] 顯然，中共自己也承認，它參與了北越「土改」的決策和實行，所以北越「土改」中的「擴大化」無疑與照搬中共模式有關。

北越鎮壓農民暴動的槍聲未息，越共中央致電中共中央，請中共就下列問題提供意見：「一，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和意見；二，為實現日內瓦協議而鬥爭的工作任務；三，越南目前的財政經濟狀況與今後經濟工作的任務。」[58] 其中第一項「目前局勢」的含義非常廣泛，當時共產黨國家面臨的「局勢」中最重要的是「非斯大林化」和鎮壓匈牙利革命所產生的影響，而越南國內最重要的「局勢」當然就是農民暴動和知識份子的抗議。

1956年11月18日到21日，周恩來訪問了河內；對北越黨表示支持。中共前高級外交官李連慶介紹了周恩來在北越的活動：周「針對越共提出的問題，談了目前國際形勢，兄弟國家的關係，中越兩黨和兩國的關係，以及中國黨近幾年所辦的幾件大事和中國從這些工作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特別強調了中國黨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根據列寧主義的原則，貫徹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和糾正錯誤的長期性」。在與越共政治局會談關於越南國內的情況時，周恩來說：「北方是人民民主的基地，必須大力鞏固北方，才能爭取南方，統一越南」。周恩來還說：「土地改革的成績要肯定，有錯誤是難免的，糾偏不能拋棄正確的東西，這樣才不會使自己處於被

動，使群眾失去信心。」[59] 周與北越領導人會談時顯然涉及到北越「土改」的嚴重後果，他談到中共近年來的「幾件大事」和「經驗教訓」中，可能包括在蘇聯和東歐被拒的、但在北越卻推動了知識份子異議運動的「雙百」方針和對知識份子的寬容政策。

1957年4月，中共突然號召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幫助黨整風」。與此同步，北越當局也放鬆了控制，允許異議運動再次活躍起來。

(2) 北越當局應付自由化的政策之演變

北越的自由化經歷了一個馬鞍形的過程：第一個時期從1956年8月到11月，隨著匈牙利革命被鎮壓而中斷；第二個時期從1957年春到夏秋之交，在北京維持「雙百」方針的背景下，北越知識份子被允許重新「鳴放」；隨著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北越共產黨也徹底剿滅了自由化運動。

從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的自由化運動經歷了「《人文》、《佳品》」時期。從11月初開始，緊接著蘇聯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越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反擊知識份子的文章，特別是一些催促政府採取行動的所謂「群眾來信」。越共《人民報》在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後第五天發表社論說：「我們不應允許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離間黨和人民，誹謗我們的制度，在人民之間製造混亂，或者散佈有害的、反動的思想。」經過約一個月的宣傳，12月18日，根據北越政府主席令，河內市政府停止了《人文》和《佳品》的出版，關閉了出版這兩份雜誌的明德出版社，沒收了市面上的這些雜誌，還要求過去購買這些雜誌的人將它們交出。這無疑是「《人文》、《佳品》」運動的重大挫折。當

時國際上很多人都認為，就像在東歐一樣，北越的自由化就此告終。英國《經濟學家》特約記者在1957年1月5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在中國的陰影下：胡志明的方式〉的文章。該作者認為，《人文》、《佳品》是越共在「非斯大林化」的氣氛中和中共的鼓勵下放出的試探性氣球，看看知識份子想走多遠，黨能容忍多久。「現在看來，無論如何這個實驗是結束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1956年11月到12月河內的政治風暴並未持續多久。兩個月後的1957年初，《人民報》的反自由化運動就失去了勢頭，雖然不時地仍有批判文章發表，但不再像是一場大規模政治運動。所有在前兩個月中受批判或牽連的知識份子都安然過關，除了個別人調動工作外，沒有一個人被逮捕或開除公職，很多人只是作了自我批評。Ninh指出：這些知識份子「繼續保留黨和政府內的職位，在某些人那裏甚至是領導職位，例如在出版社和文聯執行委員會中」。如陳寅和黃琴仍然在文聯下屬的出版社工作。1957年2月，北越全國文聯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的決議竟然出乎意料地沒有提到「《人文》、《佳品》」事件，只是說要和「錯誤傾向作鬥爭」。就連被認為是黨在文藝界代言人的詩人素友（時任文化部副部長）也在大會的報告中說，「在文化和藝術活動中，我們可以也應該有在共同基礎上的不同的傾向，因為這是符合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所有觀點和藝術傾向都可以而且應該從討論中表現出來」。 [60]

1957年5月，北越文聯出版了一份新的週刊《文學》(Van)，作為新成立的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在這份刊物的旗幟下，那些《人文》和《佳品》的作者很快就聚集起來，重新發表對文聯領導機構甚至黨和政府挑戰的文章，「那些在前一階段對他們的批判看來絲毫沒有起作用」。因此，1957年上半年北越的文化氣氛和

1956年底明顯不同，越共不但沒有強化批判運動，懲罰那些在1956年夏秋向黨挑戰的知識份子，反而允許自由化的傾向恢復和發展。《文學》雖然時不時地受到《人民報》的質疑和批判，但當局沒有形成一個有聲勢的運動或迫使異議作者沈默。Hirohide Kurohara 在他關於北越1957年文化政策的研究中認為，當時北越黨有兩條「靈活」的路線：「一條是尊重作家和其他知識份子……不強迫他們從事政治學習或體力勞動」，而在50年代上半期則是必須人人過關的；另一條是「在貫徹黨的政策時採用溫和的方法，力圖通過說服和耐心討論和知識份子達成共識」，在貫徹這一路線時，「那些執行政策的黨的幹部受到警告，要他們不得粗暴行事。」[61] 這個被恢復的自由化運動持續了大半年。

1957年7月8日，越共領袖胡志明途經北京前往北朝鮮、蘇聯和東歐，此刻正是中共全面展開「反擊右派進攻」的時候。8月底，胡途經北京回國。兩次路經北京時，胡都與中共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在胡志明公開的政治日程表上，他與中共領導人談的只是越南南、北方為和平統一舉行自由普選的問題，但人們很難想像，中共領導人會對從「雙百方針」到「反擊右派」的轉變及其中之謀略不作任何說明。胡志明的中文非常好，[62] 他在中國期間，只要翻開中共的報紙，「反右」運動就會有聲有色地在他面前展開，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策略很可能會讓他心有所悟。

(3) 越共終於尾隨中共，展開「反右」

1957年7月和8月中共剛發動「反右」，越共理論刊物《學習》便開始發表文章，發動對《文學》的批判，聲稱它的內容「極大地偏離了現實，偏離了生活、偏離了革命的責任」，為「資本

主義文學的觀點」提供了講台。待胡志明回到河內，北越的政治氣氛立刻為之大變，北越黨開始部署全面反撲，完成在1957年初沒有充分展開的政治運動。9月16日，胡志明回國兩周後，他在北越《人民報》上用化名「陳力」發表文章(毛澤東也曾用《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名義在「反右」運動開始時發表過〈這是為什麼?〉)，標題是「粉碎右派」。胡志明用典型的毛式語言說：「右派是毒草。讓我們把他們連根拔除，化作肥料，改善我們稻田的土質。」[63]

國際學術界一些研究50年代北越文化政策的學者，也從共產黨國家政治形勢的整體演變角度，指出中共對北越轉向「反右」的影響。比如Kurihara認為：「蘇共的二十大和反斯大林曾經促成了《人文》和《佳品》，中國的百花齊放也起了相同的作用」；但到了1957年夏，他們都改變了政策，特別是「中國的『百花』運動已經變成了反右運動」。[64]

經過幾個月的宣傳和批判，1958年1月6日，越南勞動黨中央通過了「政治局關於文學問題的決定」，要求把那些「顛覆分子」從文學組織中清除出去，對知識份子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再教育」。於是，《文學》週刊被取消。接踵而至的是一場持久的大規模政治運動，當局企圖一勞永逸地清除北越知識份子中的異議人士和異議思想。越共沒有正式使用「右派」之類的政治整肅範疇，而是用「反革命」、「反黨」、「右傾錯誤」等罪名整人。1958年2月，首批172名參加了「《人文》、《佳品》」運動的知識份子被送進「再教育班」；3月又有第二批304名知識份子被送去。這些人大約300人是作家和藝術家，其他人則是教育、文化和出版機構的人士或幹部。與中共一樣，越共讓那些最有影響的知識份子(如陳德草 [65]、阮孟墻、陶維安、陳寅、黃琴

等)在報紙上發表自我批判的文章，名義上是清除散佈的「毒素」，實際是對那些「小」右派們顯示黨的威力，起震懾作用。《文學》被停刊後，新出版的《文學研究》由黨的文藝「理論家」阮廷氏主編，1958年5月出版的第1期就刊登了大量「自由化」分子自我批判。

越共對這些「自由派」分子的處理，也仿照中共根據「右」的程度不同而「區別對待」的做法。例如，上文提到的阮友燈、劉氏燕和陳少寶這三位被正式逮捕；其他人有的被開除出文聯(如潘魁)，有的人其文聯會員資格被停止三年(如陳寅)，有的被撤銷行政職務(如詩人黃琴的文聯執行委員會委員被撤銷)。1960年越共當局安排了所謂阮友燈、劉氏燕和陳少寶等人「特務案」的審判，在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的情況下，指控他們是「法國間諜」，分別判處5年到15年的徒刑。北越最有影響的知識份子潘魁被下放勞動，就在當局準備給他安一個罪名加以審判時去世，他在「祖國陣線」機關報擔任編輯的兒子不久也去世，死因不明。一個為越南的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奮鬥了三代人的家庭就此悲劇性地告終。

除了集中打擊「自由化」的帶頭人物，越共也全面整肅絕大多數知識份子。1958年夏，越共發動了大規模的「下鄉進廠」運動，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無論在「《人文》、《佳品》」時期的「政治表現」如何，都必須去農村和工廠，在從事體力勞動的同時接受「思想改造」。近年在中國大陸對北越的「反右」運動也有一些有限的介紹，有一本書提到：「1957年，在文化思想戰線上開展反修正主義的鬥爭，對在《人文》和《佳品》雜誌上發表『毒草』作品的人展開批判，把這批人定為『人文佳品』集團分子，

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有的被開除公職、軟禁，有的被勞動改造，有的被投入監獄，境況都很悲慘。越南實行革新(即改革開放，本文作者注)之後，打成『人文佳品』集團分子中的某些人的作品又重新發表。」 [66] 但和中共承認反右擴大化和為多數右派平反不同，無論對他們本人還是對整個運動，越共都一直維持當初的結論，沒有任何平反決定。

結語：中共「反右」終結自由化

從 1956 年到 1957 年共產黨陣營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和自由化運動，應該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考察。共產黨陣營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相互作用的世界，而不是一種簡單的「中心 - 邊緣」的政治結構。作為共產黨體制的主要模式，斯大林主義當時固然最有影響，但這並不排除毛主義作為另一種模式的存在和影響。對於研究毛澤東和中共革命的人來說，有必要認識到，毛主義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破產前 20 年，就在中國和越南受到很多知識份子的否定。換言之，共產黨統治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或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對毛主義的批判，自 1950 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不過，由於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是那場自由化運動的主流，也由於中國官方對歷史記憶的壓制、抹殺和對歷史真相有選擇的披露，才使得那段歷史的這個側面在中國大陸很少有人了解。

毛主義和「中國模式」當時的內容，既包括「土改」、「鎮反」、「思想改造」和對知識份子以及文藝的控制，也包括在新形勢下應運而生的一些新政策，如「雙百」方針、知識份子

政策的暫時調整和承認「人民內部矛盾」等。這兩方面的政策彼此密切關聯，它們代表了 50 年代中期國際共運發生巨大變化、蘇共的老大黨地位動搖時，毛澤東和中共在一黨專政體制內尋求一種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嘗試。當然在這種嘗試背後也有毛企圖充當共產黨陣營「龍頭老大」的雄心。這些政策在東歐和北越的知識份子中得到強烈共鳴，促進了自由化的發展。「匈牙利事件」後，中共不顧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黨當局的反對，不但堅持「雙百」方針，提出「在人民內部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還繼續鼓勵知識份子「向黨提意見」。無論毛當時是否決定「引蛇出洞」，這些政策在客觀上延續了「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這在北越的案例中尤其明顯。但最終這種對「自由化」的有意操控導致的是更悲劇化的結果：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策略和政策轉變後對知識份子的整治手段是極其陰險和徹底的。如果說在東歐國家，異議運動在匈牙利革命後遭到了壓制，那麼，在中國「反右」運動是力圖把中國知識份子的異議運動在社會各階層中連根拔除。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陣營的第一次國際性危機並非結束於匈牙利革命的被鎮壓，而是中共的「反右」以及它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

從研究中共黨史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在「反右」前採取的寬鬆的國內政策，不單純是為了「引蛇出洞」，還有在國際共運舞台上沽名釣譽的策略性目的。中共運用國內政策為提升和鞏固其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服務，始於波匈事件，終於「文革」。可以說，國內政策大幅度變動與在國際舞台上的表演相互配合，這既是毛澤東生前最後 20 年執政史的一個基本特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一條重要線索。

【作者說明】：

本文的初稿發表於美國的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4 年第 4 期, 487-517 頁)。中文稿增加了大量新材料。在越南名詞的翻譯上承越南友人段玉貞女士和陳黎瓊先生大力幫助，特此表示感謝。陳寅(北越 1955 年到 1957 年的「《人文》、《佳品》」運動中的代表人物，有「越南的胡風」之稱，1997 年去世)的兒子陳崇武與作者交換了電子郵件，回答了一些有關他父親的問題，在此也衷心表示感謝。本文主要依據的是英文和中文材料，作者衷心希望使用其他語言的研究者提出批評、修正和補充。

【注釋】：

- [1] 例如，Richard Hudelson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Willie Thompson 的 *The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1945* (Blackwell, 1998), Geoffery Swain 和 Nigek Swain 的 *Eastern 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Palgrave, 2003), Ben Fowkes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Astern Europe* (St. Martin's, 1993)，都沒有提到中共在「非斯大林化」運動中對東歐國家的影響。越南在 1956 到 1957 年的「自由化」和中共對越南的影響，更是在「莫斯科中心論」的視野之外(除了少數專門研究北越 1950 年代的歷史學家注意到這點)。Willie Thompson 甚至說：「可以肯定沒有哪個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受到它(非斯大林化)的衝擊，可能是因為它們都是建立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不深，它們的發展和東歐國家不同，較少受蘇聯的影響，對斯大林主義的記憶不那麼深刻。」(P77)很明顯，他把北越排除在「非斯大林化」運動之外，更不用說中共的影響了。
- [2] 對這個問題的早期研究見 G. F. Hudson 的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Thaw'", Epilogue for Roderick MacFarquhar's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aeger, 1960)。最近的有關研究見陳兼的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 [3] 以上敘述綜合了中國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和官方文件，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時任中共中央俄文翻譯的師哲的回憶文章，載《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1 至

- 17 頁。陳兼的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第 6 章也有描繪。
- [4] 《赫魯曉夫回憶錄》(The Thomas J. Watson J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2006), 418。
- [5] 見 William Griffith e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Continuity, Change,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MIT Press, 1964), Vol.2, p.101。
- [6] 出處同上。
- [7] 中共在 1954 年與印度的一份聯合公報中首次提出「五項原則」，在 1955 年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國家會議上，周恩來再次正式提出這些原則，在中共的官方表達中，這五項原則常常伴隨著一個定語「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中共之所以要強調這點，為的是打消亞非國家對中國輸出革命的擔心。至於這些原則是否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並不是中共當初提它們的主要目的。
- [8] 納吉在 1956 年春上書匈牙利黨中央，同時送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一份。
- [9] Imre Nagy, *On Communism*, (Praeger, 1958) p.23.
- [10] Janos Ra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China Quarterly* 43 (1970), p.23.
- [11] 出處同注 5，第 242 頁。
- [12] 出處同注 5，第 103 頁。
- [13] 出處同上。
- [14] 出處同注 5，第 104 頁。
- [15] S. Shneiderman, *The Warsaw Heresy* (Horizon Press, 1959) p.56.
- [16] 出處同注 2，第 304 頁。
- [17] 陳清泉，「陸定一推行雙百方針始末」，《炎黃春秋》，2000 年 9 月，第 6 頁。
- [18] 李越然，《國際舞台上的新中國領導人》，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第 127 至 128 頁。
- [19] 出處同注 4，第 271 頁。
- [20] 出處同注 2，第 307 頁。
- [21] 出處同上，第 304 頁。
- [22]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第四部，第 108 頁。
- [23] Hoang Van Chi, *From Colonialism to Communism: A History of North Vietnam*, 119。
- [24] 方山(編)《馬泰邊區風雲錄》第一集，吉隆坡 21 世紀出版社 2005 年，第四章「學習與黨校」，149-196 頁。

- [25] 見馬共總書記陳平 2004 年出版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新加坡 Media Masters 2005 年，第 28 和 30 章；方山(編)《馬泰邊區風雲錄》第二集，吉隆坡 21 世紀出版社 2005 年，第三章「蕭反擴大化與平反」(第 113-164 頁)；邱依虹編《生命如河流——新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04 年)一書中有很多個人經歷反映了參加馬共後被「組織」所迫害和同志被害的細節。
- [26] 潘魁是越南德高望重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他的父親在 1883 年是河內總督，在法國佔領河內前自殺，成為越南民族主義的象徵性人物之一。潘魁本人早在 1907 年就是越南知識份子反法運動的領袖，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他支持越共領導的反法民族主義革命，成了越共重要的統戰對象，他的兒子也被任命為越共統一戰線組織「祖國陣線」機關報的編輯。
- [27] Kim N. B. Ninh, *A World Transforme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Vietnam 1945-195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121-161。
- [28] 河內這個城市曾被認為是西方和殖民主義在北越的象徵。陳寅進駐河內後，與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擁有房產的女士產生了愛情，黨和軍隊不允許 5c 這種關係的存在，而陳寅卻不願為了黨籍和軍籍犧牲愛情。陳寅的作家好友、國家戲劇小組組長黃坎(他也參加了陳寅發起的上書和請願活動)也由於和一個類似身份的河內女子產生了感情而自發要求解除軍籍。
- [29] Nhu Phong, "Intellectuals, Writers and Artists", in P. J. Honey ed., *North Vietnam Today*, p.81. 有關中共革命模式對北越的影響，可參看 William J. Duiker, "Seeds of the Dragon: The Influence of the Maoist Model in Vietnam", 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y Books, 1997) 313-341。
- [30] 胡風是中共在文藝界的老戰士和理論家，他代表原來在國統區的共產黨文藝工作者，從 40 年代下半期以來就與周揚等代表的延安文藝界領導有矛盾，中共建政後這種矛盾發展成為文藝界的正統和異端之間的衝突。胡風於 1954 年 7 月上書中共中央，批評當時的文藝政策和文藝界的領導人，尤其是批判他們堅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希望能為文學藝術的創作爭取自由。除了創作原則上的分歧，胡風對中共文藝界領導人的專橫和官僚風也深感不滿。雖然胡風根本無意挑戰黨的領導地位，但他的行動確實表現了一部分知識份子和文藝家長期以來在創作自由問題上的積怨，中共文藝界領導人不久就發動了反擊。毛澤東本人將胡風及其追隨者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於 1955 年發起了「反胡風」運動，胡風於 6 月被捕，直到「文革」結束才被釋放。

- [31] 指 1954 年越共在中共支持下打敗法國殖民軍的關鍵戰役。
- [32] George Boudarel, "Intellectual Dissidence in the 1950s: The Nhan-Van Giai-Pham Affair", in *The Vietnam Forum*, Vol.13, p.158.
- [33] 出處同注 27，也見於 George Boudarel 的文章，見注 26。
- [34] 出處同注 27，第 140 頁。
- [35] 雖然絕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中國的胡風對北越的陳寅有相當的影響，但陳寅之子陳崇武(出生於 1963 年，越南改革開放後赴美留學，現居法國，美術家)告訴筆者，他父親在 1955 至 1957 年間의思想和言論主要是他自己思考的結果，和胡風沒有很大關係，研究者們只是根據胡風與他父親的活動在時間上的先後和觀點上的類似而想當然地認為他父親受到胡風的影響。陳崇武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沒有任何研究者能提出確鑿的證據證明，陳寅引用過胡風的觀點。如果陳崇武的說法成立，筆者認為，既然陳寅和胡風在重大問題上不謀而合，恰恰說明毛主義的文藝路線在中國和北越同時受到了自發的挑戰。文中提到的那幅漫畫見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wh/15.4/cheng.html>。
- [36] 有關陳德草參加越共領導的革命以及後來的遭遇，見 Shawn Michel "Vietnamese Marxism, Dissent,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Memory: Tran Duc Thao, 1946-199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1(2002).
- [37] Bernard B. Fall, *The Two Vietnams-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Westview Press, 1986) p. 188.
- [38] P. J. Honey, "Ho Chi Minh and the Intellectuals", in R. F. Wesley ed., *Vietnam: Anatomy of a Conflict* (Peacock Publishers, 1968), p.160.
- [39] Robert F. Turner, *Vietnamese Communis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152 頁。
- [40] 周恩來報告的越南文譯稿到 1957 年 3 月才出版。
- [41] 70 年代後期黎筍擔任領導期間，中越兩黨正式分裂，以致於爆發中越戰爭。1985 年底，黎筍去世，長征接任越共總書記，在越南政治經濟面臨全面危機的情況下，主張模仿中共的改革開放，主持了越共「六大」，廢棄了由時任政治局委員的老左派索友起草的政治報告。越共從此走上了「革新」道路。
- [42] Ang Cheng Guan, *Vietnamese Communis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Conflict, 1957-1962*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land & Co Inc 1997)
- [43] 黃文歡，《我的回憶》，(解放軍出版社，1987) 第 277 頁。
- [44] 周新城主編，《越南、古巴社會主義現狀與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 頁。

- [45] 這個刊物又分為《春天的佳品》和《秋天的佳品》兩份(即 Gai Pham Mua Xuam 和 Gai Pham Mua Thu。這兩個刊名也可譯為《春華秋實》。《佳品》還可譯為《佳作》，但《佳品》已成習慣譯名。
- [46] 這是一份大學生刊物，意為為百花所準備的新鮮土壤。在這份刊物上首次出現了「黨國體制」的概念。
- [47] 出處同注 32，第 165 頁。
- [48] 出處同注 39，第 153 頁。
- [49] 出處同注 32，第 167 頁。
- [50] 出處同注 27，第 146 頁。
- [51] 出處同注 32，第 158 頁。
- [52] 出處同注 27，第 150 頁。
- [53] Turner, *The Vietnam Workers' Party : Liberalization and Peasant Revolt*,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155.
- [54] 出處同注 27，第 125-126 頁。
- [55] 出處同注 23，第 111 頁。
- [56] 出處同注 27 第 152 頁。
- [57]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第一卷第 94 頁。
- [58]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四卷，第 138 至 139 頁。
- [59] 出處同上。
- [60] Nhu Phong, "Intellectuals, Writers and Artis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9 (Jan. - Mar., 1962), p68.
- [61] Hirohide Kurihara, "Changes in the Literarily Policy of the Vietnamese Workers' Party, 1956-1958", in Takashi Shiraishi and Motoo Furata ed., *Indochina in the 1940s and 1950s*,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Translation Series Vol 2, 1992) p.180.
- [62] 1966 年 5 月他在杭州休養，正是「文革」初起之時，他曾聽取毛澤東的建議，前往浙江大學看大字報。
- [63] 出處同注 32，第 170 至 171 頁。
- [64] 出處同注 61，第 189 頁。
- [65] 陳德草發表這樣的聲明後得以保全生命，他於 1990 年代去世。
- [66] 出處同注 44，第 11 至 12 頁。

第二篇

向世界輸出革命

——「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引言：「文革」的世界性影響：一個被忽視的課題

「文革」是一個世界範圍內具歷史意義的事件。對這一判斷，無論時光怎樣流逝，無論是對「文革」抱持何種態度，大概都不會有爭議。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輸出毛主義意識形態，「發動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義者那裏，這個目的並非一廂情願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這一判斷之上。因此，對「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須聯繫中共對當時「世界革命」形勢的判斷。

「文革」時最常引用的一句馬克思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在20世紀60年代這個口號所宣稱的革命的普世性其實是想表達如下觀念：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中國革命才有可能達到最終勝利。因此「文革」向世界輸出革命，就像列寧當年利用「第三國際」輸出革命一樣，不但源于「一國不可能或難以單獨建成社會主義」的革命原理，而且也包含對「世界革命高潮」的期待。在毛主義者看來，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共產黨國家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目標從而「變修」的歷史經驗更證明了這個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正確。從這一角度來看，「文革」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是如此「離經叛道」（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但其精神血脈上卻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一脈相承。

由於「文革的世界性影響」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有必要對本文探討的範圍作一界定。首先，本文主要是對「文革」在海外產生的衝擊和影響作概括性的敘述，並不試圖對這種衝擊和影響作

深層次的理論剖析。這種衝擊和影響的內容既包括毛主義在「文革」時期的理論和實踐，如「造反」、「破四舊」、依靠「覺悟」和精神力量實現社會變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模式的對外輸出，如黨的領導、依靠農民的武裝鬥爭、劃分社會階級、明確鬥爭對象等等。

其次，本文將集中介紹「文革」在亞非拉國家的影響，不涉及「文革」期間西方的左派和激進思潮，也不涉及蘇聯東歐國家對「文革」的反應。這主要是因為「文革」在西方產生的影響在中國已經有些介紹，而「文革」在蘇聯東歐的影響又非常有限——蘇聯東歐國家對「文革」意識形態的免疫力要強於西方國家的左派。在蘇聯東歐國家看來，「文革」是一種瘋狂，沒有任何浪漫色彩或借鑒意義。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輸出的毛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共的發展模式是以亞非拉國家為主要對象的，在這些國家裏，中共不但對民眾、而且對政治領導人和黨派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第三，本文論及的「文革的衝擊和影響」，既包括中國向世界主動輸出的「文革」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也包括亞非拉各種左派勢力對這種輸出的積極反應。分析並討論中國的「輸出革命」與亞非拉左派勢力對毛主義的響應之間的區別，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因為70年代「文革」高潮過後，中國出於國際政治的需要，放棄了鼓吹「世界革命」的路線，對以往向世界強行輸出毛主義和「文革」意識形態的行動有所節制，甚至開始和很多「反革命」政權打交道。然而，毛澤東思想發源地放棄毛主義之時，卻正好是亞非拉一些地區將毛主義發揚光大之日。在毛主義和「文革」薰陶下發展起來的政治勢力，此時以「文革」和毛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者自居，並開始發揮影響，例如在尼泊爾，直到本世

紀初，毛主義勢力仍然十分強大。此情此景，可稱為毛主義當年撒下的「龍種」，今日仍在亞非拉地區收穫「跳蚤」。將這一課題納入討論範圍，可以將「文革」的「世界性影響」看得更加清楚。

（一）對「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斷和「輸出文革」的國際戰略

從中共建政開始，向世界各國介紹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輸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共也致力於建立和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和經貿關係，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安撫擔心中共「輸出革命」的亞非國家，為此特別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於是用輸出毛主義來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就成為中共對外工作的主要任務。1965年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就是中共對這一形勢判斷的公開表述。這篇文章由王力起草——王力後來成為「文革」前期骨幹之一。該文從醞釀、起草到定稿，整個過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耳提面命，是中共60年代初連續發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之後最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導性文件，其內容即為後來「輸出革命」的主要內容。該文以紀念抗戰勝利20周年為名，總結了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人民戰爭」、「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黨的領導」等一系列所謂「中國革命的取勝法寶」，加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為當時推動「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戰略。

該文強調，在堅持共產黨的革命領導權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發達國家的革命具有階段

性，即先實現「民族民主革命」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文章說：「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共產主義責任。」在談到「輸出革命」時，該文指出：「革命的『條件』不能輸出」，「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不能輸入的。但是，這並不排除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們對各國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於他們自力更生地進行鬥爭。」概言之，這篇文章有三個要點：一，世界革命形勢已經成熟；二，亞非拉是發動革命的地區，是包圍西方「城市」世界的「農村」；三，中國理所當然地承擔「輸出革命」之大任。

該文的基本觀點很快成為中共「輸出革命」的路線方針。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肯定了此文的觀點，並指出當前的國際形勢「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慶祝國際勞動節的社論標題就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該社論聲稱：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如同馬克思創造科學社會主義、列寧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影響著世界的前途和命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以及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在給整個舊世界以摧毀性打擊」，美帝蘇修和「一

切害人蟲」被「徹底埋葬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正是在這一形勢判斷下，中共調整了對外策略。

這一調整體現了毛澤東本人的主張。早在 1963 年到 1965 年，毛澤東就對一些訪華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談到，中共內部在國際問題方針上存在著「三和一少」路線（對帝、修、反和氣一點，對世界革命少援助一點），這「三和一少」與國內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關聯，和「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兩全」相呼應；而毛澤東則主張「三鬥一多」（對帝、修、反要鬥爭，對世界革命多援助一點）。「文革」開始後，中共中央公開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指控此前 17 年劉鄧執行的是「三降一滅」路線（向帝、修、反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於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駐外使節都必須回國參加「文革」運動，接受批判，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往來被迫中斷，連主持黨與黨關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也受到衝擊。當時中共為了全力推動「輸出革命」，不惜犧牲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關係。

其實，「文革」前為了輸出革命和支持外國共產黨，中共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尤其在東南亞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較彰顯，而劉鄧為主導的黨內「務實派」始終積極參與這些活動。例如，據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回憶，1961 年馬共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換取合法政黨身份，加入國內和平進程；於是馬共領導人被召進北京，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與他們會談，要求他們堅持武裝鬥爭的革命路線。鄧小平說服他們的主要理由就是，東南亞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革命形勢將要發生重大變化，「革命高潮」就要到來，馬來亞共產黨必須配合這個高潮，中共將傾全力支持他們。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動下，馬來西亞共產黨重新投入武裝鬥爭，而陳平被認為對武裝鬥爭的信心不足，於是留滯北

京，由長期在中國受教育的其他馬共領導人回國領導武裝鬥爭。此後馬共的武裝鬥爭一直艱苦地堅持到1989年才終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80年鄧小平再次召見陳平，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撤銷設在中國湖南省的馬共電台並逐步放棄武裝鬥爭[1]。馬共的事例說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層，劉鄧為首的「務實派」對「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樣認為「世界革命」形勢「正在高漲」。顯然，毛澤東指責劉鄧等人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無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為推動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輸出「文革」意識形態這條總路線確定後，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了宣傳方針，打破了宣傳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業務和宣傳工作之間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革」作為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和很多「文革」時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這份「批准」的具體內容至今未見公開。為了貫徹這一精神，中宣部隨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澤東語錄。根據新華社統計，從1966年10月下發兩個「批准」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著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新華社說這一宣傳攻勢「將使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從而喚起世界廣大勞動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凌厲的總攻擊，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2]

從1966年10月開始，中國的外事工作貫徹宣傳毛主義和「文革」這一「主要任務」，一直延續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門，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澤東著作、語錄、像

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和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澤東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了毛澤東語錄和毛畫像。中共在很多鄰國有華僑組織、友協和僑校，這些組織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革命者」。

(二) 中共與亞非拉暴力鬥爭的關係

作為毛主義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經驗，「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人民戰爭」是「文革」期間輸出革命的主要方式。應該指出，在國際政治中，一國政府出於政治、經濟、民族、自然資源或宗教等原因，支持他國的反政府武裝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無論在西方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中都不鮮見。而中共在 20 世紀 60 年代至 70 年代支持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及左派激進勢力，是在「世界革命」的總戰略指導下，為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徹底改變世界政治版圖，同時為國內不斷激化的「繼續革命」創造外部環境，因此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並非出於與具體的受援國或政治勢力有什麼特殊利益或利害關係。這是將中共的「輸出革命」和出於國家或政權利益對「他國內政」的干涉加以區別的關鍵。

(1) 中國支持在東南亞國家發動武裝革命

中共當時以支援武裝鬥爭的方式輸出革命的對象國遍及亞非拉，尤以東南亞為最。由於東南亞鄰近中國，這個地區的多數共

產黨組織在中蘇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撾，後來再加上柬埔寨作為公開的反美戰場，所以被中共視為世界革命的爆發點。

前文所述中共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支持就是一例。據陳平回憶，由於中馬兩國沒有共同邊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間對馬共的支持主要採用金錢援助，讓馬共在泰國南部的黑市軍火商那裏購買軍火。此外，為了配合武裝鬥爭，中共還在湖南設立了馬共的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以及一些中國南方方言（對象是華僑）、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廣播。

印度尼西亞也是當時中共在東南亞輸出革命的另一個主要目標國。在當時的國際共運陣營中印尼共產黨是親華反蘇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親共立場，建立統一戰線擴大勢力，一度聲勢很大，結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轍，因過份張狂甚至企圖發動政變而遭到右翼軍事力量反擊，在1965年被鎮壓。據楊奎松的研究，毛澤東本來對印尼共產黨遲遲不願開展武裝鬥爭不滿，當印尼黨被鎮壓，數十萬黨員和左派分子被殺害後，毛澤東反而很高興，因為從他的「辨證觀點」來看這是件好事，這樣一來，印尼共產黨只好「上山」搞武裝鬥爭了。「所以他在內部明確講：不要認為印尼革命搞壞了」。此後毛「甚至不顧脆弱的外交關係，積極支援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的共產黨建立起武裝來了。」[3] 印尼共產黨轉向武裝鬥爭後，在1966年8月發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聲明，從內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該聲明幾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並列，提出黨的「三面旗幟」，把中共的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作為印尼革命的道路。該文還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路線，把前一時期革命的失敗歸咎於受蘇

聯路線的影響。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電賀印尼共成立50周年，說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證明了蘇修和平過渡與議會道路的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不移地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一定能夠奪得最後勝利」。

儘管「文革」前泰國和緬甸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兩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間仍然把這兩個國家視為「輸出革命」的重要目標國。根據楊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間毛澤東多次要求老撾共產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聲稱「一定要打到泰國去」。毛還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如果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就能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中國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國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面，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澤東親自批准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為了保護那些在中國受訓的緬共人員能安全進入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專門組織了護送部隊，深入護送到緬甸境內，直到被護送人員抵達安全地點。有時這些中共護送部隊還直接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鬥。

中共當時一個重要的戰略考慮是，利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和東南亞民族的親緣關係，將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作為東南亞共產黨擴大武裝時的兵源。毛澤東曾很明確地告訴老撾共產黨和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人：你們可以到中國邊境那些與老撾、緬甸民族接近的少數民族中去徵兵麼！這是他們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邊境地區可以作為你們的後方麼！1970年在和越共總書記黎筍的談話

中，毛澤東提出讓老撾共產黨到雲南的老撾族中去徵兵。在座的周恩來和黃永勝說，在西雙版納有老撾族，周恩來還說「我們的壯族跟他們非常相象」，毛澤東說將來老撾決勝的時候，「可以到廣西一帶招一些壯族人，到雲南招一些傣族人」。他還以歷史上廣西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隊伍為例，說這些少數民族都很能打仗。[4]

60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東南亞華裔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和大中國情結發展勢力，支援馬共影響下的左派統一戰線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但在決定新加坡是否與馬來西亞合併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左派因受制於馬來亞共產黨，故此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為名，反對新加坡獨立，結果失敗。後來在1963年的選舉中社會主義陣線又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1965年，社會主義陣線回應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線，放棄了合法的議會道路，批判蘇聯的「三和」路線，發動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訴諸於直接鬥爭，一些人參加了馬來亞共產黨控制的馬來西亞民族解放陣線，製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鎮壓。值得一提的是，與新加坡左派鬥爭而獲勝的經驗後來成了李光耀政府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李光耀說共產黨的威脅一直是他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決了這個紅色威脅，新加坡就會成為另一個動盪不安的東南亞國家。考慮到這個實實在在的歷史因素，那些有關新加坡經濟奇跡中「儒家倫理」和「東亞文化」所起作用的討論更像是玄談。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70年代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是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四小龍」獲得經濟成功的共同歷史經驗。李光耀一直視中共對馬來西亞共產黨和新加坡左派的支持為威脅新加坡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族群和諧的心腹大患。1975年他首次訪問

中國，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諾放棄對東南亞「輸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堅決要求鄧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馬共電台，以換取東盟國家對以中共為後盾的紅色高棉在聯合國地位的支持。鄧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在60年代到70年代，李光耀非常擔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產生影響，這一方面緣于「文革」的烏托邦色彩和青年學生的「先鋒」作用對年輕人頗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則因新加坡人口中大多是華裔，很多人對北京有「祖國」或「大中華」情結。1971年中國對新加坡開展了「乒乓外交」，邀請新加坡乒乓球隊訪問，接著新加坡邀請中國球隊回訪。令李光耀感到震驚的是，在中國和新加坡球隊比賽時，球場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觀眾嘲笑自己國家的球隊，並高呼讚美毛澤東的口號。李光耀說，他後來「公開嚴厲」地批評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為新加坡的「小毛澤東」。

筆者曾與一些經歷了那個年代的新加坡人交談，瞭解到以下情況：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仍然還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險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國遠洋貨輪上觀看《決裂》、《春苗》等宣傳「文革」成果的電影。在李光耀的建議下，新加坡政府在60年代到70年代頒佈了一道法令，禁止30歲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國去訪問，以防這些頭腦簡單的左翼青年被招募為「顛覆分子」，這條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1976年李光耀訪華，他的女兒隨行。這位年輕女子原來對遙遠的「祖國」有親近感，對毛的革命亦感神秘，但在訪華過程中，她親眼看見中國的封閉、落後、愚昧，於是改變了對中國的印象。女兒思想的轉變過程使李光耀悟出一點：要讓青年人放棄對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去中國，逗留得越久，放

棄得就越徹底。因此李回國後廢除了這條禁令。後來李光耀還注意到，很多在50年代回到中國的華僑青年經歷過「文革」後，「對中國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已經徹底破滅，他們回國後可以成為我們對付毛澤東主義病毒的最好疫苗」，因此他反對新加坡保安局不准這些人回國的禁令。[5]

在菲律賓，中共支持菲律賓共產黨毛派領導人何塞馬利亞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國受過至少3個月的訓練，被其追隨者稱為「菲律賓的毛澤東」。在毛主義的影響下，西松把菲律賓共產黨內的激進派糾集起來另立山頭，激進派當中很多成員來自左派大本營菲律賓大學。西松于1969年建立了菲律賓「新人民軍」(後改稱「民族解放軍」)，發起武裝鬥爭，爭取到中共的支持。為了介紹毛主義並使毛主義和菲律賓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西松撰寫了《為民族民主革命而鬥爭》、《菲律賓社會與革命》、《菲律賓人民戰爭的特點》等著作。在1969年3月發表的〈糾正錯誤和重建黨〉中，西松宣稱「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軍已經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魯卡為代表的以及其他現代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左』、『右』傾錯誤」。中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菲律賓民族解放軍的紀律。

1971年，為了迎接菲律賓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國路線」，派黨內第二號領導人裏卡多馬來率領一個14人的代表團連同其家屬一起到中國受訓——這是當時派遣去中國受訓的通常做法，因為受訓者往往要在中國停留很長時間。這個代表團的具體任務是：「一、在中國代表菲律賓共產黨；二、確保從中國獲取物質援助；三、和其他共產黨在中國的代表建立聯繫；四、領導在華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員；五、作為菲律賓革命在中國的人力資源；六、建立圖書館和檔案庫；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

作為一個組成部分而展開活動」。[6] 卡多馬來在中國一直住到1981年。當鄧小平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解除軍管後，卡多馬來離開中國去了荷蘭，8年後再回到菲律賓，擔任《馬尼拉紀事報》的編輯。他在採訪中說，中共當時除了提供軍火，還教他們如何使用針灸和草藥，如何在海上航行這些遊擊戰所需要的知識。他表示，自己當時已經認識到中國革命和菲律賓革命之間有重大差別，不能照搬毛主義模式。

(2) 中共對南亞國家暴力革命的影響

印度在1969年至1970年間曾出現過「那夏里特(Naxalite，源於地名Naxalbari)運動」，這是印度共產黨在農村發動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印共也在60年代中期發生親蘇派和親華派的分裂，親華派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以查魯馬祖達(Charu Mazumdar)為首，稱「印共(馬列)」。馬祖達是毛主義的忠實信徒，他稱頌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世界範圍全面勝利時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凡熟悉中共「文革」語言的讀者，不難看出這就是林彪宣稱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

馬祖達領導的印共(馬列)模仿毛澤東在1949年前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把印度定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依靠農民，發動和激化農村階級鬥爭。馬祖達領導的印度農村革命是中共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以及後來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力相結合的產物。在印度大吉嶺地區的那夏巴里(Naxalbari)，印共組織農民建立農民協會，取消債務，燒毀地契、重分土地。「那夏里特運動」的主要戰略是殘殺鄉村精

英：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用馬祖達的話來說，「這種肉體消滅掃除的不但是個人，也是個人所代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威。」在這種殺戮中，那夏里特運動鼓勵其成員不用槍枝，而是用其他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雙手和頭顱，分解肢體。

就像當年中共發動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樣，這種極端做法在「那夏里特運動」內部也引起了「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疑慮和爭論。在「那夏里特運動」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祖達宣佈：「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與中共如出一轍的是，馬祖達用來為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祖達說，「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級仇恨的表達。遊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祖達甚至還宣佈說：「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7] 值得一提的是，馬祖達本人和「那夏里特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都不是窮苦人出身，他們的家庭背景基本是印度種姓制度裏的最高階層婆羅門。婆羅門的種姓責任是祭祀，不是從事戰鬥(戰爭和殺人是第二種姓刹帝利的種姓職業)，由此可見「革命」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理論在改變人性上的力量。

在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中殺人是常見現象，但如此鼓勵濫殺並用原始手段製造血腥效果的事例卻不多見。一些研究「那夏里特運動」的學者在閱讀大量文獻之後提出這樣一種解釋：「那夏里特運動」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徒手殺戮看成是培養一個「革命者」的過程。在舊的社會秩序下，殺人和被殺者是統治關係，農民被地主和鄉村精英踩在腳下，心理上認為這些人高高在上，自己是

低賤的。這種社會身份差異帶來的自卑感日積月累根深蒂固，難以消解。而現在，每當農民向過去的主人砍一刀或打一棍，這種社會距離感就消失一點，自己的身份也就提高一點，直到最後把敵人消滅，自己也就獲得了一種新的社會身份，成為了「新人」。這樣一個血腥的暴力集團在「文革」時期卻被中國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發展。《人民日報》1967年7月發表社論，歡呼「那夏里特運動」是「印度的驚雷」。這篇社論很快就被「那夏里特運動」翻譯成本國文字，成為重要的學習文件。

斯里蘭卡(1972年以前叫錫蘭)是中共長期的友好國家。早在1952年，當中共因介入朝鮮戰爭而被聯合國制裁時，斯里蘭卡就和中共簽訂了長期條約，向中共提供橡膠，從而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滿足了中共的戰爭需要。1957年兩國建交後關係一直非常密切。斯里蘭卡領導人班達拉奈克和坦桑尼亞的尼雷爾、贊比亞的卡翁達等人一樣，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義意識十分強烈的領導人。班達拉奈克擔任總理後，改變了親英政策，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對內實行國有化，把外國資本的橡膠園和茶園收歸國有，取消英國的軍事基地。1959年他遇刺身亡後，其夫人繼任總理，並積極參加「不結盟運動」，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在印度洋地區保持軍事基地；同時她也反對蘇聯，譴責蘇聯入侵捷克。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所作所為使中共政府將其視為理想的國際統戰對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計保持和這個印度洋島國的關係，1961年還應斯里蘭卡政府的請求，將中國珍藏的佛牙送去供該國佛教徒瞻仰。佛牙到達之日，斯里蘭卡舉國上下以最隆重的儀式迎接。

然而，「文革」期間，斯里蘭卡卻成為毛主義極左派的攻擊目標和輸出革命的對象。因為斯里蘭卡是個佛教國家，政治上保

留了君主制，經濟上是大地產制(茶園和橡膠園)，又曾經是殖民地，和西方國家經濟關係十分密切。這些西方國家大多數是中共推行「世界革命」的目標國。「文革」前中共和斯里蘭卡保持友好關係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中國的「極左派」指控「務實派」推行「三降一滅」政策的證據，於是中國駐斯里蘭卡的外交官通過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當時斯里蘭卡將毛像和毛著列為禁運品，但中共仍然設法偷運。1967年8月，一艘中國船被攔截，搜出一箱毛澤東像章，斯里蘭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稱這是斯里蘭卡政府兩年來與國際反華勢力勾結的繼續。1970年10月中共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邀請了斯政府高級官員，但大使館門口卻掛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大幅標語，又引起斯政府強烈反應。

1971年，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斯里蘭卡人民陣線」發動反政府暴亂，糾結激進青年打砸搶，攻佔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並揚言這是呼應中國的「文革」，斯里蘭卡無產階級要堅決推翻資產階級當權派，打下首都科倫坡，推翻現政權。據當時在科倫坡的中共外交官回憶，「斯里蘭卡人民陣線」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館，要求面見大使，並要求中共公開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大使在向國內緊急請示後拒絕了這一要求，同時嚴令使館人員不得私下和斯里蘭卡的造反派接觸。不與反政府武裝發生接觸不但是駐外大使的許可權和責任，更是「外交承認」的題中應有之義，大使向國內報告是可以理解的，但還要向國內「請示」就耐人尋味了。

1972年，斯里蘭卡再度發生名為「格瓦拉叛亂」的左派軍事暴動。雖然並無證據表明中共支援這個組織，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場還是引起了斯里蘭卡政府的懷疑。親華的班達拉奈克夫

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壓力，被迫對中共大使館採取了一系列監視和檢查措施，拆封全部郵件，搜查新華社和中國工人的宿舍，連中共援助斯里蘭卡重點建設項目的物資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擔心使館會被關閉。為了保住和斯里蘭卡的關係，周恩來被迫接見斯里蘭卡大使，不但沒敢就斯政府的監控措施提出抗議，反而說班夫人很聰明，反覆檢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牽連，「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嗎？」周恩來甚至還說，中國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蘭卡政府在搜查中國駐斯機構時發現有這類人物，「請坦率地告訴我們，幫我們清理階級隊伍」。^[8] 周的用意固然是要顯示中共的清白，但使用的方式和語言實令人匪夷所思。

(3) 對拉丁美洲國家輸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遊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該遊擊隊還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建立的「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遊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武裝暴力鬥爭。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年到1968年間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毛思想精髓。玻利維亞毛派共產黨60年代中期的綱領和印尼共產黨同一時期的文獻一樣，體現了林彪文章的影響：「1、在人民戰爭中堅持政治掛

帥；2、人民戰爭是群眾爭取解放的武裝的政治鬥爭，為達到這個目的，在群眾中尤其是工人農民中堅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裝鬥爭分不開的，政治工作必須和武裝鬥爭相始終；3、人民戰爭要經過如下階段：A.和農民暴動相聯繫的遊擊戰；B.運動戰；C.陣地戰，或者以農村為依託奪取城市。」[9]

中共的「革命階段論」和「統一戰線理論」也充分體現在這些政黨或組織的路線中。它們強調在現階段，拉美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確定主要敵人，孤立或者中立其他敵對勢力。當時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面臨「格瓦拉——卡斯特羅主義」的挑戰。毛派共產黨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不懂得發動農民和解決土地問題，不懂得建立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建立統一戰線，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場。智利共產黨在文件中這樣總結毛派的「人民戰爭」路線和「格瓦拉——卡斯特羅主義」的「遊擊路線」之間的區別：「人民戰爭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遊擊戰』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中國大陸最近披露的材料說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還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遊擊隊在活動。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總統埃切維里亞決定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就在中國大使熊向暉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佈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遊擊隊」，此消息經報刊披露後給親華的埃切維里亞政府造成極大的困擾。埃切維里亞在接受國書的儀式上不得不異乎尋常地向中國大使熊向暉提出中共支持遊擊隊的問題。中共資深拉美外交官黃志良在回憶此事時，不但不否認這些遊擊隊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陳「這是中國『文革』混亂時期極左路線留下的惡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調整外交路線時在拉美取得的一大勝利。

為了鞏固和墨西哥的關係，周恩來迅速邀請埃切維里亞訪華，給予極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輿論表明中共無意支持反政府遊擊隊。不但如此，毛澤東在和埃切維里亞談話時還用開玩笑的口吻沖淡嚴肅話題，要埃切維里亞提防熊向暉(熊是情報官出身)在他的國家「搗亂」、「搞顛覆」。當時，拉美國家對中共「顛覆」普遍表示擔心。1974年，拉美另一個大國委內瑞拉和北京建交，據黃志良回憶，委政府宣佈建交後卻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觀察了一年多，確信北京沒有「顛覆陰謀」後，兩國才互派大使。[10]

(4) 為在非洲發動毛式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輸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獨立運動相關聯，然後是和獨立後由誰掌權以及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相關聯。據 Ian Greig 的《共產主義在非洲的挑戰》一書介紹，中國對非洲的支持可能早於蘇聯。早在 1961 年，就有 6 個喀麥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為期 10 周軍事訓練的情況。除了軍事技術，這些非洲人還學習了中共革命的經驗，「訓練的第二個階段集中在『中國革命鬥爭』、『人民戰爭』、『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這 6 個非洲人在 1959 年就被派回法屬非洲展開武裝鬥爭。據西方媒體報導，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他中國城市接受訓練。「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一個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時說，當時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遊擊戰。

一個阿曼遊擊隊員介紹了他 1968 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詳細情

形：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學習中中共教員認為，在非洲傳播毛主義的一大障礙是伊斯蘭教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學習中強調要批判伊斯蘭教。中共為他們準備的教科書規定，在回答「同志們，什麼是《可蘭經》？誰是先知？」這個問題時，標準答案是「《可蘭經》、先知和伊斯蘭教的其他表現形式都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英帝國主義的發明」。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及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相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參觀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麼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陪同人員告訴這些非洲人：「黑幫」是那些沒有教育好的、自以為有知識膽敢看不起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和教師。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11]

(5) 中共對外政策從革命狂熱到極端功利的突然轉變

必須指出的是，儘管「輸出革命」是中共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對外政策的中心，自從70年代初中美關係改善之後，中共的對外戰略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同時反對美蘇和一切反動派(即所謂「全面出擊」和「四處樹敵」)轉為重點反對蘇聯。這一轉變源於兩點：在國內，「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世界革命的狂熱也開始降溫；在國際上，60年代不顧一切地「輸出革命」不但沒有實現推動世界革命的戰略目標，反而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國

際影響大大減弱。即使從推動「世界革命」本身來看，策略也需要調整。因此，從70年代初開始，中共雖未完全放棄世界革命的目標，但聯美反蘇的戰略居於優先地位。

在70年代上半期，全世界目睹了中共對外政策從革命狂熱到極端功利的突然轉變，中共不但從多年的死敵美國邀請政治家訪華，竭力營造「中美友好」氣氛，而且很快就和一些過去被認為是「國際反動派」的政權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例如，扎伊爾的大獨裁者蒙博托曾長期與中共支持的遊擊隊作戰，不但被稱為「非洲的蔣介石」，而且在60年代中期中國編演的話劇《赤道戰鼓》中被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大惡棍。但到了70年代初他卻被視為中共在非洲對抗蘇聯的中堅，1972年和1974年兩次訪華，與毛澤東相談甚歡，建立起了異乎尋常的個人友誼。毛澤東不但批准給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會見中和他商談如何對付反政府遊擊隊，即中共過去的同志。

在拉美，中共原來和智利社會主義政黨領袖阿連德的政府關係密切並建交，周恩來還多次向阿連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意見。周恩來認為阿連德政府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政策過左，可能導致喪失群眾基礎，被右派軍人利用。1973年阿連德政府被皮諾切特領導的右派軍人暴力推翻後，這一事件和印尼右派軍人1965年政變並列，成為兩起國際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戰」時期「國際右派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罪行。當時全世界左派力量同聲譴責，蘇聯東歐共產黨集團和其他一些國家和智利斷交，和智利有外交關係的80個國家中只有38個表示承認軍政府。為了擺脫外交孤立，智利軍政府很快照會北京並召見中國大使，表示願與中共保持關係。周恩來為此召開緊急會議，衡量得失(主要是不願給台灣以可乘之機)之後，作出了所謂「冷而不斷」的決

定，保持與智利的外交關係。在全世界同聲譴責智利軍人的政變和隨後的鎮壓浪潮中，中共的「見利忘義」受到了國際左派的強烈抨擊。其實中共對智利軍事政變的態度不過是 70 年代初中共外交方針向右轉、和很多右派甚至反革命政府或是握手言歡或是眉來眼去的一部分。但這段歷史已經被今天懷念毛主義的中國的中外左派所忽視。

(三) 「文革」行為方式在亞非拉的影響

除了輸出革命和支持武裝鬥爭的官方政策之外，「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為模式也經由官方和個人輸出國門，成了「文革」的世界性影響的一部份。

(1) 中國駐外使館的「文革」行為

「文革」開始後一些中國使領館紛紛採取「破四舊」行動。中共駐埃及大使館的花園裏原來有十多尊精緻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還有帶翅膀的天使雕像，都是古羅馬雕塑的遺跡，但在「文革」初期被使館內的「造反派」連底座挖起，扔進垃圾箱，一些雕像就此斷裂，難以修復，在駐在國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領館和外交官生活「革命化」也是「文革」的重要行為方式。和國內幹部甚至中高級幹部相對簡樸的生活比較，當時中共駐外機構被認為是在「外事特殊」的藉口下滋生特權之地。在「文革」剛開始時，坦桑尼亞和奧地利的毛派人士于 1966 年 8 月寫信給中共有關部門，指責中共駐外機構生活方式資產階級化，毛澤東 1966 年 9 月 9 日作了著名的「九九批示」，要外交機構「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九九批示」有如外交系統的「五一六」

通知，其後果之一是很多駐外機構將字畫工藝品和傳統藝術品作為「四舊」撤除，改掛毛澤東語錄和圖像。但與「造反」、「造反有理」、「造一切權威的反」（當然毛本人的權威不但不能反，而且還要被神化）以及造反派之間的「派性」這類「文革」初期的行為方式相比較，以砸塑像換陳設來「破四舊」和實現生活方式革命化就微不足道了。「文革」初期中共外交機構也經歷了內部的「造反」和奪權，很多派出人員在駐在國向大使和領事等「當權派」挑戰，與駐在國的毛派或左派串連，他們內部往往又存在派性，這些都構成了「文革」在海外影響的一部份。

(2) 中式「文革」在坦桑尼亞

坦桑尼亞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國家。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是非洲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坦桑尼亞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擴展影響、對抗西方和蘇聯的基地。儘管中國經濟在「文革」中近乎停滯，但中國政府對坦桑尼亞卻有求必應。當時坦桑尼亞得到中國很多援助項目，其中坦桑友誼紡織廠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個，有130多名專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的。

上海是「文革」時期工人「造反派」的重鎮，紡織系統又是重中之重，王洪文就是在紡織系統「造反」起家的，因此派赴坦桑尼亞的紡織專家組裏有不少「造反派」。該組的英語翻譯原來就是上海紡織工業局「造反派」的常委，因為在國內沒有排上名次，1967年底來到海外「開闢第二戰場」。他一到坦桑尼亞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馬，提出要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語錄牌，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語錄歌，把

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並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專家組領導都是「走資派」。不但如此，他還仿效「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相互串連、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譯的語言優勢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佈「造反有理」的觀點。當時坦桑尼亞政府組織了「綠衛兵」，這個名稱雖然和中共的「紅衛兵」相應，也確實受到了中共的啟發，但這個組織的宗旨卻不是造反，而是貫徹政府的政策，是動員群眾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卻表示要用「中國紅衛兵」的名義和坦桑尼亞的「綠衛兵」串連，向他們介紹「紅衛兵」的「造反」經驗。1968年初這些人又開始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大肆活動，要求他們起來造本國政府的反。

連中國為坦桑尼亞培養的雜技團也深受「文革」鬥爭精神的薰陶。1968年7月，坦桑尼亞雜技團學成歸國，最初團內還相安無事，但很快就鬧起了派性，動不動就「造反」，以「革命」的名義為自己爭名奪利。連中共外交官也說這是他們在中國培訓時受了「『文革』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氾濫」的影響。結果是坦桑尼亞雜技團內部鬧得不可開交，演員們無法繼續合作表演，只好解散。一個成功的文化交流項目就這樣毀于「文革」的影響。[12]

中方「造反派」的上述活動引起了坦桑尼亞政府安全部門的注意，把情況上報給總統尼雷爾。當時尼雷爾正在推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政策，對銀行和大工業實行國有化。國際社會懷疑他受到中共的影響，國內很多人紛紛反對，尼雷爾本人受到很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造反派」在坦桑尼亞肆意妄為，必然會給尼雷爾的反對派提供機會。而剛果的盧蒙巴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被右派軍人推翻，就是前車之鑒。在這兩次政變中，右派軍人的藉口都是現政權親華親共，要把自己的

國家變成中共的附庸。這兩次政變使中共在這些國家多年的苦心經營和援助一夜間化為烏有。尼雷爾接到政府部門關於中國「造反派」活動的報告後，對「文革」在坦桑尼亞的發展非常憂慮。

1968年6月尼雷爾訪華時當面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中方「造反派」的問題。根據中共外交官的回憶，尼雷爾與毛澤東會見時，雙方一開始由於對「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儘管毛澤東後來也表示，不允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活動，但他的理由卻與「文革」沒有關係，而是說這些人「搞大國沙文主義，欺負駐在國。」有了毛的聖旨，周恩來與尼雷爾會談時表示，中共絕不允許援外人員把無政府主義帶到國外，更不允許他們在國外「造反」。那個企圖在坦桑尼亞開闢「造反第二戰場」的英文翻譯，被使館送回國後即下放勞改。除尼雷爾之外，中共在非洲的另一個盟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也向中共直截了當地表達他對中共外事和援外人員在該國傳播「文革」和毛主義的強烈不滿。

(3) 發展中國家的「校園文革」

中式「文革」的學生「造反」也在一些國家引起了反響。在菲律賓，以學生造反為中心的「校園政治」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盛行一時，國立菲律賓大學成為散佈毛澤東語錄和「文革」材料的中心，很多學生「造反派」自稱「紅色風暴」的傳播者，後來被西松的菲律賓共產黨吸收。

印度的「那夏里特運動」亦有大量學生參與。1970年春，這個運動的學生參與者在印度第二大城市加爾各答發起了一場校園「文革」。在很多大學，學生們抵制考試，衝擊學校辦公室，砸毀傢俱和設備，在牆上塗寫毛澤東語錄。他們還衝進書店，焚燒書

籍，被燒的有甘地、尼赫魯和泰戈爾等印度歷史文化名人的著作，甘地誕辰百年紀念中心的書籍和展物慘遭洗劫。學生還砸毀馬路上和校園內的歷史塑像，一時被砍下的塑像人頭滿地亂滾，後來政府不得不在每個塑像前派警察站崗。這場學生造反因此被稱為「砸毀塑像」運動(Smashing Statue)。印度的報刊嚴厲譴責這些行動，《政治家報》發表題為「毛對抗甘地」的社論，代表了當時的社會輿論。這篇社論說「文革」「愚蠢而令人噁心」，它反文明，毫無建設性，甚至是「邪惡」的。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參與這場校園「文革」的學生很多都是「那夏里特運動」的成員，但這場校園「文革」的最初發生卻與該運動的領導意旨無關。馬祖達雖然也號召學生離開校園，但卻是為了讓學生「和工農相結合」，並沒想讓學生去衝擊校園、燒書和砸毀塑像。因此，這場「砸毀塑像」運動最初是印度學生受中國「文革」期間學生「造反」影響下的自發行動。但馬祖達很快就從毛主義的立場和邏輯出發，看到了這場破壞背後的「建設性」並支持學生的行動。馬祖達說，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任何信奉毛澤東思想和革命意識形態的人」都必須培養起對這個制度的「仇恨」；學生的行動是破壞也是建設，因為「不破壞這個殖民主義的教育制度，不砸毀那些由買辦資產階級樹立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來」。[13] 從這番話中可以看到，馬祖達及其追隨者和毛澤東「不破舊就不能立新」這一「文革」邏輯之間的驚人一致性。

(4) 「文革」式宣傳如何惡化中國的對外關係？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表現為聖像崇拜(戴毛像章、張貼毛

畫像及樹立毛塑像)和傳播閱讀紅色「聖經」(毛著作)等——雖然在表現形式上並不激烈，但卻是最普遍和持久的「文革」行為方式，而且是傳播「文革」意識形態如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等觀念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徑，因而在海外有著廣泛的影響。這些行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中國官方推動的結果，因為毛像和毛著都是在中國國內印製後通過官方途徑運到駐外機構，駐外人員又將散發這些宣傳品視為日常工作，認為散發得越多就越能顯示自己對毛的「忠誠」。當時由於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原因，很多國家都把毛像毛著列為違禁品不許入關，但中共駐外人員則認為，這正說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與散發工作的「偉大意義」。

在東南亞，中共的友好鄰邦柬埔寨有好幾個省份受到中共影響下的「造反」的困擾。1967年5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驅逐了兩名中國專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華僑學校開刀，限制學校教授毛澤東思想，控制課程，不准散發毛澤東語錄和像章。西哈努克說，「文革」給中國帶來的不是國際社會的欽佩而是輕視。中共大使館發表公開信，說「崇敬毛主席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權利」，這裏說的每個中國人即包含華僑，因為他們中一些人仍是中國國籍。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訪華，要求中共放棄在柬埔寨的「文革」宣傳，但中方卻反過來要求西哈努克「允許在東華僑有熱愛毛主席、愛社會主義、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驚，認為這等於「授權我們的中國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間進行顛覆活動」。9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國的友好協會，其真正的目標在於解散宣傳「文革」不遺餘力的「柬中友協」，北京的「中柬友協」聞訊立即打電報給金邊的被解散的「柬中友協」，要求和「反動派」鬥爭。西哈努克在氣憤中下令召回駐北京大使，後經周恩來的苦心勸

阻，柬埔寨駐北京大使沒有成行。

在緬甸，中共大使館和新華分社在 1967 年成了「文革」宣傳中心，鼓勵華僑學生佩戴毛像章，攜帶毛著進入學校。緬甸本來就對北京支持緬共遊擊隊心存芥蒂，這種「文革」宣傳加深了這一矛盾。於是，緬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像章攜毛著，開除華僑學生，關閉華僑學校。中緬矛盾的惡化使得緬甸 1967 年 6 月出現了反華騷亂，華僑學校、新華社、武官處和大使館都受到衝擊，10 多名華僑和 1 名中國專家死亡。中共作出強烈反應，北京舉行 20 多萬人遊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溫(緬甸領導人)」的口號，群眾示威中隨即打出「絞死奈溫」、「油炸奈溫」的標語。[14]

在中國的北鄰蒙古，「文革」爆發後很多中方人員要在華僑學生中組織「紅衛兵」，被使館的臨時代辦勸阻，但在蒙古的中方人員採取了非常激烈的其他「文革」行為。中方人員除了在駐蒙建築公司和友誼醫院廣為散發毛像和毛著，還把烏蘭巴托的「華僑培才學校」變成在蒙古的毛澤東思想宣傳站，這個學校是受中共控制的當地華僑子弟小學。中共外交官回憶說：「在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強烈影響下，毛主席著作成為必修課，師生們的『革命』情緒很高漲，他們把《毛主席語錄》帶回家，不僅唸給父母聽，也向蒙古鄰居廣為散發。」蒙古政府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宣傳，尋找藉口將三名華僑學校教師驅逐出境。中方人員要在車站為這 3 個人舉行「歡送」儀式，要用「讀毛語錄，喊『文革』口號，唱《國際歌》」來表示抗議。蒙古政府得悉後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召見中國代辦，提出根據蒙方規定，不得在車站舉行這樣的歡送儀式。但是，中方一意孤行，堅持上述歡送儀式，結果和蒙古警方發生衝突，一些學生和中方人員受輕傷。中蒙關係進一步惡化。此後北京發生了「八九」事件：蒙古駐華大使館的車在友

誼商店門口不慎壓上一張掉在地上的印有毛頭像的海報，在場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圍攻這位司機，焚毀了那輛汽車。這位司機隨即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途經二連浩特時又被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從火車上揪下來，強迫站在高凳上為他破壞毛澤東「聖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鬥。[15]

「文革」前，中國的西鄰、喜馬拉雅山麓的尼泊爾也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國派出很多工程技術人員幫助尼泊爾修建公路和水電設施。「文革」期間中方「造反派」在中尼邊境樹起標語牌，要推翻尼泊爾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員也積極活動，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要求中方限制出售毛語錄和佩戴毛像章，但中方人員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於是搜查「尼中友協」，沒收「文革」宣傳品，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圖片展覽櫥窗，並和「捍衛」毛思想宣傳陣地的中方人員在現場發生衝突。中方強烈抗議，指尼政府與美國勾結，結果尼政府要求中國撤走部分駐尼人員。

在非洲，肯尼亞政府於1967年宣佈中國代辦李頡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肯尼亞。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國大使館不願駐在國的反對和抗議堅持散發毛像章毛著。加納甚至為同樣的原因和中共斷交。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後一年多時間裏，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中，有近30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而和中共發生外交糾紛。但這些事件在當時都被中共官方說成是國際帝修反的反華行徑，加劇了在國內製造的「中國被帝修反所包圍」的恐懼症和革命歇斯底里。[16]

早在「文革」開始前，中共和古巴的關係即因中共強行輸出毛主義意識形態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兩黨兩國關係一度非常密切，毛主義和卡斯特羅——格

瓦拉主義在國內和國際政策上有諸多共同點，如都急於超越蘇聯，依靠革命覺悟和精神力量向共產主義過渡，在國際政策上反對蘇聯主張的「三和」政策等等。1966年初，古巴方面首先發難，兩國公開決裂。古方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削減大米援助；另一個理由則是，中共不顧古方長期的勸阻和告誡，通過各種途徑向古巴黨政幹部和一般群眾散發中方的宣傳材料，甚至利用郵局直接把此類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中。1965年9月，卡斯特羅曾專門為此召見中共駐古巴臨時代辦，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傳材料，提出強烈抗議。中共使館受此難堪，立刻電告國內。儘管古巴和中共決裂有哈瓦那難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保持平衡的深層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無忌憚的宣傳無疑是兩國兩黨關係惡化的導火索。古巴和中共翻臉後，中方聲稱，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有趣的是，整個60年代後半期，古巴的政治氣氛和中國的「文革」非常類似，古巴當局在1968年到1970年間發起的「革命攻勢」，是古巴版的「大躍進」和「文革」的結合物。[17]

現在看來，「文革」時期所謂的中國被「帝修反」等「國際階級敵人」包圍，純粹是自食其果。

(四) 龍種與跳蚤——毛主義「文革」的餘波

「文革」在中國是劃上了句號，但60年代毛主義「文革」意識形態在「世界革命高潮」中播下的「龍種」，卻繼續在一些國家收穫著「跳蚤」。目前斯里蘭卡的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就自命為毛主義，尼泊爾的反政府武裝也被國際輿論稱為「毛主義叛亂」（泰米爾組織幫助訓練了尼泊爾反政府武裝）。這些毛主義組織固然

受到中共革命的世界性影響，但和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以及秘魯的「光輝道路」相比，它們僅局限于實踐毛主席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用暴力消除階級差別，不同于「文革」那種「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且它們產生時間較晚，也未受到中共支持。

「紅色高棉」和「光輝道路」的一些領導人 60 年代及「文革」時期就在中國，他們除深受「文革」影響外，還接受中共的資助。他們崇拜的不只是毛主席的一般理論，例如信奉槍桿子和用農村包圍城市，更是毛主席「文革」理論的實踐者。他們要繼承和發展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毛主席，他們認為這些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已完成；而有待繼承和發展的是 60 年代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即「文革」理論與實踐，但毛澤東死後中共當局所拋棄的恰恰就是這一點；中共拋棄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就為「紅色高棉」與「光輝道路」創造了歷史機會，讓他們自命為毛主席繼承人，甚至要超越毛主席。

(1)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比毛式「革命」更殘酷的「紅色高棉」革命

中國讀者對「紅色高棉」的血腥統治或有所聞，但對這些政策的目的及其與「文革」的聯繫則不一定有清楚的瞭解。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和 20 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

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18] 與印度「那夏里特運動」一樣，「紅色高棉」鼓勵用原始手段殺人，甚至用鐮刀、斧子和鋤頭。

那麼什麼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呢？「紅色高棉」認為：毛澤東用「文革」反修防修，但他不徹底；而沒有經歷「文革」的越南則變修了；紅色高棉要吸取這個教訓。一個「紅色高棉」的高級幹部對回國的知識份子介紹說，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革」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都在搞「文革」。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拿工資，而且還把錢省下來回國時購買免稅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文革」後中國人還是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在這個意義上，「紅色高棉」是吸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經歷了「文革」的中國都未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是直接進入共產主義，從而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于中、越的模式。

中共60年代中期發動「文革」，是認為世界革命形勢已經成熟，蘇聯變修了，中國可以乘機崛起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紅色高棉70年代中期採取大規模屠殺和清洗、廢除貨幣、拆散家庭、解散學校、撤空城市等極端措施，則是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越南變修了，柬埔寨已成為新的革命中心。這種相似性清楚地表明瞭「文革」和紅色高棉之間的血緣關係。

(2) 「紅色記憶」召喚恐怖幽靈

值得指出的是，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瓦解以來，一直有所謂「紅色記憶」在召喚恐怖的幽靈，中國和東南亞都有，但至今為止從來沒有誰公開懷念過紅色高棉的「鬥爭」和「犧牲」，因為紅色高棉實在太殘酷，它殺的自己人比被敵人殺的還多，無辜者更難以計數，實在令人無法「懷念」。問題是，紅色高棉取得了政權，所以有機會實施它的「主義」，而有一些毛主義影響下的革命並沒有取得政權，萬一他們成功了呢？

對於這個問題，馬共領導人余柱業晚年的思考很有轉述的價值。余曾經擔任馬共南方局書記，在印度尼西亞遙控新加坡的鬥爭，後來前往中國，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把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號召傳遍東南亞。他晚年回顧一生鬥爭，認為馬共反殖的功勞不能抹殺，但是後來幸虧馬共沒有成功。為什麼呢？他說根據他「對馬共幹部的認識，對共產黨組織的認識、對陰暗面、不好一面的認識」，「從歷史的觀點來說，馬共沒有勝利，還算是馬來亞的幸運。萬一馬共成功的把他們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我們會看到像現在柬埔寨的那種局面。共產黨馬列主義、列寧斯大林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有一些共同點，那就是實行

專政。所謂專政，就是獨裁，這點是共同的，所有的共產黨都是這樣。」這就是說，馬共的失敗，使馬來亞半島避免了一場象紅色高棉那樣的浩劫。[20]

但願余柱業以親歷者和知情人的身份說的這番話能在今天的「紅色記憶」中佔有一席之地。

(3) 秘魯的「小毛澤東」以及他比毛主義更「光輝」的思想

秘魯的「光輝道路」與毛主義「文革」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光輝道路」和毛主義「文革」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19]「光輝道路」的領袖古茲曼是大學哲學教授，「文革」時期在中國受過毛澤東思想的薰陶，回國後被迫隨者稱為秘魯的「小毛澤東」和「安第斯山的紅太陽」，綽號「香波博士」（指他善於用毛主義給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即「洗腦」）。

1968年，古茲曼從中國回秘魯後，開始造黨內最高領導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責帕是修正主義，走和平道路，說自己和帕之間的鬥爭就是毛主義和赫魯曉夫主義之間的鬥爭。秘魯共產黨原來有份刊物名為《紅旗》（該名稱是否仿效中共理論刊物《紅旗》尚不得而知），由帕雷德斯控制。古茲曼於是辦了一份名為《光輝道路》的雜誌。從此，秘共和秘魯左翼勢力就按照「紅旗派」和「光輝道路派」的分野站隊。

當時，秘魯的左派主要集中在華曼戈大學等高等學府中，而秘魯的大學又繼承了歐洲大學自治的傳統，政府很少干預。因此這場「路線鬥爭」就在這些大學校園裏肆無忌憚地展開，演變成了一場小型「文革」。對立的兩派在形形色色的辯論會、討論會和批判會上彼此指責對方是叛徒和修正主義，散發攻擊性的傳單

和小冊子，張貼誹謗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發表冗長的充滿了領袖和導師語錄的論戰文章；最後發展到在會場外面拳腳相向，一派佔領學生宿舍，另一派調兵遣將來圍攻，展開了武鬥。大學校園裏塗滿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岡扎洛(即古茲曼)思想萬歲！」、「岡扎洛主席萬歲！」、「打倒一切修正主義！」之類的標語。「光輝道路」的組織和活動中滲透著毛主義「文革」的影響，只要看看它所張貼的宣傳海報就會發現，無論從圖案設計到口號，都像是中國「文革」宣傳畫的翻版，只不過把文字變成西班牙文，把毛澤東的頭像換成古茲曼的。[21]

「光輝道路」是一個不擇手段的暴力組織，它擾亂秘魯社會近20年，殺人無數。被殺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職員，甚至有鄉村教師。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這些人都是為現政權服務的。「光輝道路」還把一些參加選舉和投票的農民的手指砍掉。他們毀壞的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共汽車、電站、郵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機構等的價值更是難以估算。

人們不太注意的是，古茲曼是在1978年至1979年間策劃、于1980年正式發動武裝鬥爭的，時值中共結束「文革」、清算毛死黨「四人幫」。當中共逮捕「四人幫」時，秘魯首都利馬的街頭出現了一些倒吊在樹上的死狗，上貼寫有「鄧小平」三字的紙條。儘管鄧小平與逮捕「四人幫」其實無關，但他的名字象徵著對文革的「右傾翻案」。當「四人幫」被審判時，中共駐秘魯大使館受到暴力襲擊，「光輝道路」的成員甚至把手榴彈扔進了中國大使的臥室。這是當時世界範圍內毛主義左派對中共結束「文革」最激烈的抗議。根據當時中國駐秘魯大使朱祥忠的回憶，80年代末的時候，中共外交官出去活動每次必須從不同的門出去以免被光輝道路摸到規律。大使的車出去連國旗都不敢掛。圍牆的

鐵絲網加了有好幾米高。1987年中共外長吳學謙出訪秘魯，不敢住酒店，國內和使館商量臨時改在了海軍俱樂部，每天的行程必須臨時決定，甚至外交部長自己都不知道變動。當時記者找不到人採訪，利馬的大小媒體報導說「中國外長失蹤了」。吳學謙苦中作樂，調侃說：「沒想到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了，我們還要在這裏搞地下活動。」

關於中共和以「光輝道路」為代表的國際毛主義力量的關係，中共前駐秘魯大使朱祥忠不能公開承認，而是說了一席曖昧的話：「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學習中國的革命經驗的。比如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這樣的小國家，人民的覺悟並沒有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以前周總理曾經勸說當時的智利總統阿連德，說你們現在還處於民族革命階段，不要硬搞社會主義革命，阿連德沒有聽，後來果然失敗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我們曾經對這些組織有一些錯誤的認識和指導思想。但事實上，當時有很多人和組織打出了毛澤東的旗號，他們卻並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 [22]

像「紅色高棉」一樣，古茲曼總結中共「變修」的經驗並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用「文革」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黨內出修正主義是正確的，但毛做得不徹底，所以他死後國家很快就變了顏色；為了反修防修，「文革」這樣的運動必須經常化、制度化；在秘魯，「人民戰爭」從一開始就必須考慮將來革命永不變色的大問題，甚至在奪權以前就要著手進行準備。這個「光輝思想」後來被稱作「岡扎洛主席的指導思想」，古茲曼的秘共把它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這個說法明顯來自於毛澤東的一個比喻：蘇聯人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正是在中共的「文革」結束、「紅旗落地」的大背

景下，古茲曼覺得毛以後的中共變修了，世界革命的火炬現在傳到他手上來了，他就是當代的列寧和毛澤東；因此，「光輝道路」必須挺身而出，反擊世界範圍內的修正主義逆流，在秘魯發動暴力革命。由於「光輝道路」沒有機會掌管國家政權，人們無緣領教這「第四把刀子」的鋒芒。但可以設想，如果整個秘魯被引上了「光輝道路」，那麼人們看到的恐怕離「紅色高棉」的「偉大實踐」相去不遠，更有可能的甚至是「紅色高棉」的失敗會刺激「光輝道路」走上更激進、也更滅絕人性的道路。

結語：毛主義留給世界的未盡思考

「文革」對世界的影響是「文革」研究和中國革命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 20 世紀世界歷史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還有賴於中國對有關歷史資料和檔案的解禁。經歷了那個年代的外交人員、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駐外記者已經發表了大量回憶錄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文革」在海外的影響，但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人員的身份發表此類文字的還非常罕見。不過，在目前可見的公開資料的基礎上，也完全可以瞭解中共「輸出革命」的基本輪廓與後果：

第一，「文革」期間，包括「文革」前數年間，由於毛有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的強烈欲望，中共推出了世界革命的總體戰略，試圖以東南亞和中國的近鄰為中心，將中國推動的「世界革命」輻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第二，「輸出革命」的戰略建立在如下判斷之上，即「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帝修反的滅亡指日可待，中國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中心。「輸出革命」和「文革」意識形態是中國成為這個

中心的標誌和需要。

第三，對「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動也是中共強化國內階級鬥爭的需要。中共不顧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以及國與國之間起碼的行為規範，向外輸出革命和毛主義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處於空前的國際孤立狀態，甚至連長期的友好鄰邦也都翻臉。但這種自己製造的困境卻被中共宣傳成是「帝修反」包圍和滅亡中國的陰謀，反過來更刺激了國內的政治緊張氣氛。

第四，「文革」期間向外「輸出革命」的內容是複雜的，既有「文革」時期主宰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毛主義理論和行為方式，也有「民族民主革命」時期的毛主義模式，根據輸出國的不同各有側重。

第五，「文革」初期一度出現的無政府狀態，例如外交部在1967年到1968年間一度「失控」，很多駐外使領館受「造反派」衝擊或控制，國內很多涉外事件由「造反派」和「紅衛兵」發起和主導，曾使「文革」意識形態的輸出帶有自發性色彩，打破了中共建政以來涉外事務的神秘性和決策權高度集中的格局。但這種自發性並不能說明它們和「文革」時期的中共最高權力無關。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自發性正是「文革」意識形態對外輸出的方便途徑，是「輸出革命」的特殊形式。

中共官方在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時，曾痛定思痛、心有餘悸地稱「文革」是「浩劫」——值得深思的是，今天中國當局在談論「文革」時，卻盡可能地回避使用這樣的辭彙。與今天對「文革」的遮掩相比，80年代初對「文革」的認識似乎還顯得誠實一些。「文革」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的世界性影響是災難性的。受「文革」和毛主義影響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制度極為多元，文化、歷史、宗教和政治傳統更是紛繁複雜，但毛主義影響

所及，造成的後果卻非常相似，只是受災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相似的後果是，社會秩序受到衝擊，傳統價值被顛覆，倫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毀，和平生活被破壞，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極致，那種原始屠戮即使在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中也不多見。

毛主義之所以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一度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和誇大了任何社會中都會存在的階級和階層差別，還有性別、年齡和社會角色的差別，從而把正常的社會生活狀態完全顛覆。例如，在「紅色高棉」和「光輝道路」的「革命實踐」中，人們不但可以看到大量的女性追隨者和女兵，更有大量的少年兒童，他們成了「組織」的重要成員。他們在被「解放」的名義下，從事與他們的性別、年齡和自然身份完全不相符的「革命工作」，甚至拿起武器。如果對方手無寸鐵，他們肆意殺人；如果對方是訓練有素全副武裝的軍人，他們則被大量屠戮，成為「烈士」。少年和青年學生還被煽動起來反叛社會和成人，把教師、教育制度和社會文明成果視為最直接的鬥爭對象，本來應該是接受教育、培養人格的社會成員卻變成了引導社會「變革」的「先鋒」。毛主義之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群體中有不少追隨者，並不是因為毛主義的革命具有正當性；恰恰相反，這說明了毛主義難以在正常狀態下承擔著社會責任且具有成熟理性的社會群體中找到大量追隨者，只能用「壓迫」去曲解社會秩序、用「解放」來為自己動員人力資源。這是我們今天回顧「文革」，回顧整個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歷史時必須充分注意的。

追根溯源，「文革」之所以產生災難性的世界性影響，原因在於「文革」意識形態中包含的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差別的惡，因此對人類社會具有的破壞性和對人性的摧殘超出了中國的國界。

從根本上來說，這種惡是對文明和文化的拒絕，對原始和野蠻的推崇，對傳統的否定，對肆意「創新」的迷戀，對秩序的厭惡，對破壞的喜好，對人性的否定，對獸性的讚美。

儘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等人對共產黨革命之前的文化成就有積極的評價，也欣賞莎士比亞和歌德這樣的傑出個人，但從整體上看，這種意識形態旨在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人類」，對共產黨產生以前的一切制度、文化、價值和道德往往採取否定態度，至多是「批判地吸收」。這種對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拒絕和批判，雖然在國際共運中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的國家其程度還是有極大的差別。程曉農在一篇文章中通過對蘇聯 20 世紀 30 年代「文化革命」的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在對待人類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成就乃至行為規範上，蘇聯和中國有著極大的差別。蘇聯 30 年代的「文化革命」雖然打擊了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但卻沒有否定整個人類文明和俄國文化傳統。相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在不放棄政治教育的前提下，不但提倡現代文明，而且不排斥西方和俄羅斯古典文化遺產，從來沒有「徹底打倒」莎士比亞和普希金，這對提高國民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質都有積極影響。[23]

回望 20 世紀，不難發現：世界範圍記憶體在著這種對破壞和毀滅的原始性渴望，在現代化過程中遭受挫折的國家和民族中，這種原始性渴望尤其明顯。這些國家與民族熱衷於否定秩序和規範、熱衷於打擊甚至屠戮體現秩序和規範的社會中上階層。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徹底反文明、反文化、反秩序、反人性的社會運動，是中共自 1927 年湖南農民運動以來內部所積蓄的破壞性能量的大爆發。這種對現代文明的反動不但是中國「文革」的本質，也為其他類似的社會動亂或「革命」所共享。

【注釋】：

- [1] 陳平，《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 2004年)，第383-388頁。
- [2]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4頁。
- [3] 楊奎松，《毛澤東與印度之那戰爭》，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之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第47-48頁。
- [4] 出處同上，第48頁。又見杜蒲、李丹慧譯，《中越等國領導人關於印支戰爭的談話》，同上書，第319頁。
- [5]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第659頁。
- [6] Emerita Dionisio Distor, "Mao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 P.371。
- [7] Sanjay Seth, "Indian Maoism: The Significance of Naxalbari," *ibid.*, P.289-302.
- [8] 王禹生，《難忘的外交歲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63-69頁。
- [9] William Ratliff, *Castroism and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1959-1976*,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76, P.93.
- [10] 黃志良，《新大陸的再發現——周恩來與拉丁美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第181、184、218頁。
- [11] Ian Greig, *The Communist Challenge to Africa*, Foreign Affair Publishing Co. Ltd., P.171-173.
- [12] 有關「文革」對坦桑尼亞的影響，見周伯萍的《非常時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20-26頁；又見尹家民、張鐵珊的《毛澤東周恩來與坦贊鐵路》，載李同成編《中國外交官在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9-212頁。
- [13] 有關印度的「校園文革」，見Sanjay Seth, "Indian Maoism: The Significance of Naxalbari," 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 P. 301-304。
- [14] 出處同注2，第149頁。
- [2] 第149-151頁。
- [15]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58-64頁。
- [16]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11頁。
- [17] 有關中古關係從1959年到1966年的發展，見本文作者發表于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的文章 "Sino-Cub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astroist Regime"，2007年夏季號。

- [18] 程映虹，〈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1999年。
- [19] 程映虹，〈秘魯的小毛澤東和他的「光輝道路」〉，《中國之春》，2001年9月號。
- [20] 余柱業《浪尖逐夢——余柱業口述歷史檔案》，為陳劍主編《風雲叢書》第一輯，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06年，第262頁。
- [21] Megan M. Ferry, "China as Utopia: Vision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2, No.2, Pp. 236-269。該文詳細介紹了「文革」宣傳畫在拉美的影響，包括和「光輝道路」宣傳材料之間的聯繫。
- [22] 朱祥忠是對《國際先驅導報》發表這一席談話的，見 http://cn.bbs.yahoo.com/message/read_-JUNFJUM0JUNBJUI3_333.html
- [23] 程曉農，〈毛澤東向斯大林學到了什麼？——中蘇「文化革命」的比較及其啟示〉，見《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化大革命40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匯編》。

第三篇

毛主席和文革是怎樣毀掉 新加坡左翼運動的？

引言：「新加坡故事」與文革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誼深，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這是文革時期一首人人會唱的歌。整個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政權在自我讚美方面能夠達到這樣境界，文革就是這種境界的登峰造極。但是本文要介紹的並不是這首歌在中國大陸的傳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迴響。

上個世紀60年代，就在中國大陸人人高唱這首歌的時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稚園，五、六歲的兒童也在台上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完之後他們還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親人」的小話劇，劇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時發現了受傷並被追捕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戰士，他們不顧生命危險把革命戰士掩護起來，最後以參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階級收尾。在很多當時的劇照中可以看到兒童手舞紅纓槍和木槍在毛澤東畫像下高呼「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口號雄赳赳氣昂昂地衝鋒陷陣的情景。劇情介紹的最後也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結束：「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這些兒童是在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主辦的幼稚園裏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是一個左派組織，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和馬來亞共產黨有很密切的關係，實際上是馬共在新加坡的統一戰線組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原來同屬英國的馬來亞殖民地，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分別獨立後，馬來亞共產黨要參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偉藍圖，在中共支持下不予承認這兩個新國家，認為是新殖民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堅持武裝鬥

爭。60年代馬共的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尼，由馬共領導人之一余柱業主持。當時印尼掌權的是親共親華的蘇加諾，余柱業就從那裏遙控新加坡的鬥爭。1963年余柱業擔任馬共南方政治局書記(負責新加坡的工作)，用周恩來為中共地下鬥爭所制定的十六字方針作為馬共在新加坡活動的原則，這就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1] 當時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可以公開活動的社會主義陣線實際上成為了馬共的前線組織或統一戰線組織，它退出議會，走上街頭，在不拿起武器的前提下緊緊追隨馬共的路線。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這個地區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認為是世界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來的標誌，於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造反，個人崇拜等等文革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滲透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公開左派組織中，在這塊被中國人稱為「南洋」的熱帶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的潮流。當時和社會主義陣線一起組成新加坡左派陣營的還有規模稍小的新加坡人民黨，加上很多左翼工團、職業工會、青年團體和文藝團體。此外很多大中學生以學生組織和個人身份參加了左派運動。



1966年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支持者發動街頭鬥爭抵制國會道路。
(照片來源：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第129頁。)

今天，雖然威權統治和一黨獨霸仍然給新加坡留下了實現民主化的重要課題，李光耀實際上的終身制和他的父權制的施政風格(即以政府和整個民族的家長自居)給新加坡的民族個性帶來了消極的影響(用中國傳統政治術語似乎可以稱為「順民」)，這些都時常使得新加坡在國際上被垢病。但毫無疑問的是，新加坡是擺脫殖民主義統治後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極少數國家之一，在短短數十年裏就被聯合國列為發達國家。在政治上沒有實現民主化的同時，新加坡建立了廉潔有效的政府，實現了法制，給所有公民提供了充分就業和較高的生活條件(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絕大多數公民都擁有住房的國家)，社會秩序良好，個人安全得到保障，環境整潔優美。在國際上，新加坡的良好聲譽完全不依賴所謂的「綜合國力」，充分說明小國弱國也完全可以贏得世人的尊重，那種「只有國家強大了，人民才有尊嚴」的說教不過是無稽之談。在這樣的發展基礎上，一個「新加坡人」的民族認同被公民普遍接受並引以為豪——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和多數新獨立國家可以把前殖民時期的歷史和傳統作為新民族主義的基礎不一樣，新加坡在被殖民以前基本沒有一個完整的歷史和民族概念，所謂「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民族」的觀念完全是在60年代中期獨立以後匆忙建立起來的。這樣一個沒有深厚歷史感作為依託的民族認同能夠在短短的數十年間確立並在人心中紮根，是一件比在政治上取得獨立更為不易的事。反觀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民族早已獨立，但人民難以產生引以為榮的民族認同感，困擾當今世界的大量的難民和移民問題就是例證。

但是，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完全可能朝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如當時一些觀察家所擔心或者希望的那樣，它有可能成為「東南

亞的古巴」，因為在馬共影響下的左派勢力在新加坡非常強大，他們推動反殖民運動的背後是要在新加坡建立親共的社會主義政權。以李光耀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為了從英帝國主義下取得獨立，曾經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和左派結盟，被認為是騎虎難下。但從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早期，就在獨立之後不久，新加坡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本來非常有希望主導政局的左派在短短幾年間完全失去了曾經擁有的群眾支持，不但沒有掌握政權的機會，而且喪失了在合法途徑下作為在野黨利用社會輿論和群眾組織影響國家發展的地位，甚至消失得無聲無息。今天的新加坡有一些要求多黨民主和公平選舉的政治反對派，但卻沒有任何成氣候的左派勢力。

新加坡左派的這個結局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二次大戰後曾經在民族獨立運動和社會改革浪潮中影響很多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左派勢力大多數後來都失敗或衰落了。導致這種結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者的衝突，這種衝突常常伴隨暴力和血腥鎮壓，在民族歷史上留下一個難以理清的冤孽。當然也有很多國家相反，是左派上台，不但鎮壓民族主義者，而且消滅傳統精英，改造知識份子，把社會置於全控體制之下，留下了更不堪的血腥記錄。因此可以說，在很多國家，左派和右派的消失都是暴力的結果。但是，在新加坡左派退出歷史舞台的過程中沒有留下一筆血債，民族主義政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雖然獨霸政權，把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監獄，但沒有判處一個左派人士死刑，沒有一起肉體折磨的案例，也沒有暗殺、綁架等行為，所有案例都依法解決，當事人如果悔過和願意出國，當局一概放行。可以說，英帝國留下的憲制和李光耀集團牢固的法制意識使得他們把和左派的鬥爭限制在法律的範

圍內。

那麼，在沒有嚴酷的政治暴力的情況下新加坡的左派是如何退出歷史舞台的呢？左派歷史學者常常歸因於李光耀集團從英國殖民當局那裏得到的支持，李的手段、策略和在法制範圍內對左派勢力的全面壓制。例如一個非常具體的因素是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改革為名把教育的主要媒介由中文改成英文，大大削弱了以中文為主要傳播手段、以華人為主要對象(新加坡人口絕大多數是華裔)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障地。

新加坡官方歷史有一個有李光耀自己闡述的從第三世界躍進到第一世界的「新加坡故事」——這是他的兩卷本回憶錄的副標題。在這個「新加坡故事」中，李光耀承認共產黨和很多左派是全心全意為他們的事業而奮鬥的人，很多個人值得他欽敬，但在取得獨立之後，他們盲目追隨北京在東南亞的路線，不承認新加坡獨立和新馬分治的現實，認為這是新殖民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完全不懂得新加坡人民到底需要什麼。最說明問題的是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的領導人李紹組在社會主義陣線在獨立後的國會中佔有 13 個議席(一共 53 個)、社會主義陣線是第二大黨的情況下宣佈社會主義陣線的議員退出國會，抵制憲制，「把鬥爭帶到街頭去」。「他從北京電台廣播的新聞中得到靈感，決定仿效瘋狂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當中國的紅衛兵走上街頭時，李醫生(注：李的職業是醫生)也下令新加坡的社陣支持者舉著橫幅和標語牌上街，在小販和流動夜市等群眾活動的地方示威，跟警察發生衝突。」正是這些行動顯示了這個政治力量的本質，最終導致了其群眾影響的衰敗。回顧當初的情形，李光耀不無慶幸地說：「李紹祖不但使共產黨統一戰線變得無能，他實際上也把憲制舞台讓給了人民行動黨。那是個

代價很高的錯誤，它使人民行動黨在之後的30年在國會未受到挑戰，佔盡支配地位。」[2]

這個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雖然表現的是官方的歷史觀，但離歷史的真相並不太遠。這裏的「並不太遠」，並不是說它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在新加坡的影響有所誇大，而是還很不夠。一位當年站在李氏對立面積極參加新加坡左翼運動的研究者也這樣指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左翼緊跟這股激進思潮(注：中共的世界革命和文革意識形態)，也以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形式，在新、馬開展對內對外的大批鬥。兩地的左翼最終放棄憲制鬥爭的途徑，走出國會，搞起所謂議會外群眾鬥爭……奉行毛澤東思想，走的是極左的革命路線。」[3] 如果仔細考察當時的情況，可以說是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意識形態和現實政策兩個方面都推行了一條完全脫離新加坡獨立後的社會現實的路線，從而導致了群眾基礎的喪失。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毀掉了新加坡的左派似乎並不過分。而這段歷史在當時世界範圍內又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以文革意識形態為代表的毛主義在很多國家把本來可能通過合法途徑和議會道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影響和平衡作用的左派推向極端，在經歷了短暫的亢奮之後走向了自我毀滅。

以下分幾個方面對中國文革對新加坡的影響做介紹和分析。

(一) 為文革而亢奮：新加坡左派報章對文革的系統介紹

文革在新加坡左派報紙上最系統的介紹是由社會主義陣線報進行的。社會主義陣線報是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的機關報，用

中文出版，公開發行，每週一期，每期有大約15-20頁。根據社陣領導人之一林清祥 1962 年的報告，它的發行量當時是一萬八千份，而新加坡當時的人口不過 160 萬人左右，應該說是一份相當有群眾影響的政治週刊 [4]。到了 1967 年，每期的銷售量也在一萬三千份 (根據 1968 年陣線報新年特刊的文章「做好出版工作，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這裏對這份報紙從 1966 到 1968 年對文革的宣傳做一點介紹。

陣線報比較早的一次對文革的正式的介紹是在 1966 年 7 月 30 日，在文革正式展開一個多月後，轉載了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在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的講話。說文革是一場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是一場挖掉修正主義禍根，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偉大運動。郭重點批駁了「有些外國的先生們」對文革的「誣衊」，例如說文革是「摧殘文化」，鬥爭矛頭「針對所有知識份子」。接著，陣線報用大量篇幅介紹了文革的發展，反擊所謂國際反動派對文革的誣衊和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人民的誤導，給讀者描繪出一幅轟轟烈烈的偉大革命的情景。8 月 20 日和 9 月 20 日發表筆名為「大喜」和「向陽花」的系列報導「中國文化大革命」，完全照搬中國報刊對文革的描繪，例如「億萬工農兵、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份子，正高舉革命紅旗，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腐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個史無前例的、群眾性的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迅猛地開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勝利……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要把『舊思想、舊習慣、舊風俗、舊文化』掃除乾淨，是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場『興無滅資』的及其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文章還強調了這場鬥爭的緊迫性，說是「你死我活」，不但關係到「中國人

民和國家的前途，也關係到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前途和命運」。9月24日的文章特別提到了馬來亞和星洲(即新加坡)的「資產階級報章」夾在「各國反動派、大小牛鬼蛇神的反華大合唱」中對文革發出「一聲聲反動嘶叫」。作者有針對性地說：「也許有人感到奇怪，被推翻了的反動階級和右派勢力，難道還有力量嗎？值得這樣大張旗鼓地鬥他們嗎？也有人會說，一些右派知識份子，沒有槍，沒有炮，『秀才造反』，成不了氣候。」針對這種想法，文章照搬中國的文革宣傳說「問題不那麼簡單」，這些人的力量不但在「四舊」，而且都是「所謂『名人』，『學者』，『學術權威』，『專家』，容易迷惑人，他們在黨政機關佔據不少重要地位，有些部門甚至受他們長期把持，他們又往往打著紅旗反紅旗，把自己的真面目掩蓋起來，以便暗中招降納叛，組織反革命黑幫，進行反革命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讓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統治舞台，因此怎麼可以小看呢？」

文革開始後，起衝鋒隊作用的紅衛兵吸引了國際輿論的注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報紙，尤其是南洋商報，大量轉載了國外的有關報導，僅在1966年9月27日就有路透社的「紅衛兵活躍下的北京」；9月29日日本共同社的「毛澤東決使紅衛兵組成武裝革命青年」；9月30日有「美國學者看紅衛兵」；10月3日有消息稱「廣州紅衛兵迫市民簽字，獻財產予國家，強制沒收歸僑所有金銀首飾與貴重裝飾品」；10月10日有「紅衛兵在西藏活躍，搗毀寺廟侵擾民眾」，10月13日有「北京校長與8教師貶為校工，奉紅衛兵之命掃地種菜」。等等。針對這些報導，陣線報於1966年10月1日發表題為〈中國紅衛兵〉的長篇報導。在北京發生紅衛兵迫害、折磨和打死大量教師、學校管理人員和普通市民的「紅八月」之後，這篇報導專門駁斥國際輿論對紅衛兵的歪曲和攻

擊。文章說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闖將」，「已經造成一個排山倒海、雷霆萬鈞的革命高潮……這些佩戴紅臂章，聲情並茂的『紅小軍』，成群結隊的湧向街頭，修改街道、商店的名稱；在熱鬧的市區、巴士車上、戲院裏等一切公眾場所朗誦毛澤東主席語錄、高唱革命歌曲；張貼大字報，抨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分子，及發表演說與散佈傳單。」文章否認紅衛兵暴力；說他們是「動口不動手」因為「粗暴的對待只影響到皮肉，不能打入人心。」10月22日陣線報又發表長篇報導〈紅衛兵的小故事〉，描繪紅衛兵深夜把迷路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照顧；拾到一分錢也要上繳；踴躍獻血；從火災中搶救工人；大量參加義務勞動等等。文章中還提到紅衛兵向勞模時傳祥學習掏糞。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時傳祥不久因為和劉少奇有關係被扣上「糞霸」的帽子遭受毒打，含冤而死。

隨著文革的發展，左派報章對文革的報導也更全面和深入。1966年11月12日的陣線報轉載了中國報刊發表的長篇報導〈破舊立新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記昆明一條街的大變化〉。這條街原名南強街，是昆明有名的老街，集中了很多「四舊」。文革開始後被紅衛兵改為紅旗街，所有舊風俗和舊習慣全部被掃除，讓居民撕掉神像，換上毛澤東畫像，撤下迷信品，換上毛澤東語錄。舊曆7月半本來是燒香拜神，接鬼祭鬼的日子，紅衛兵把它變成大唱革命歌曲的日子，把全體居民集中在街道「工農兵」劇場，老頭老太高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1967年元旦的陣線報全文轉載了中共報刊的長篇報導「中國人民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標誌著「革命造反派」從「走資派」手中奪權的上海「一月風暴」開始後，陣線報1月15日全文轉載了由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於1月8日聯合發表的長篇報導〈上海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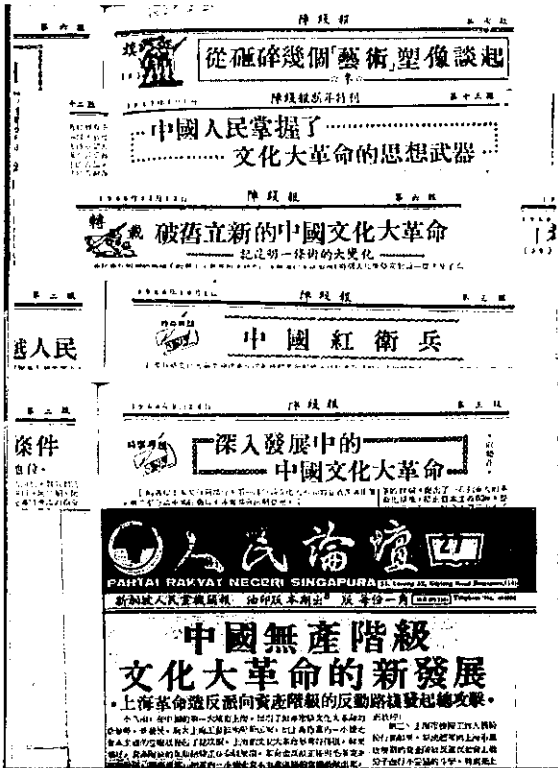
命群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並加了編者按，說「中國上海市發生的這一件大事標誌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各國反動派惡意的加以歪曲，製造大量的卑劣的宣傳材料，企圖模糊和欺騙。為了幫助讀者瞭解事情的真相，我們特地轉載」了這篇報導。另一份左派刊物人民論壇（半月刊）也在1月15日頭版發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發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說「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乘勝追擊，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揪出來，將他們鬥倒、鬥臭，像打落水狗一樣，打得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2月26日，陣線報又發表由盧章撰寫的〈文化大革命進入新階段〉的報導，介紹了造反派奪權，走資派反撲和革命群眾開始大聯合的情況。1967年2月26日陣線報發表由「李」（單名）撰寫的文章，題目是〈從砸碎幾個「藝術」塑像談起〉。文章說：「據悉，去年九月間，中國中央藝術學院的革命師生，也在該學院的廣場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把那些佛像、佛龕和牛頭馬面，妖魔鬼怪，把那些希臘、羅馬和中國的封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塑像，統統毀掉、燒光。革命師生興奮地說，我們砸碎燒光的絕不僅是幾個塑像，而是整個舊世界。」文章說這是革命師生掌握了「『不破不立』」的原理。他們的做法，是一種破天荒的有遠見的舉動。」文章批判了文革前中國的美術教育，說用「『為誰服務』」的尺來量，跟工農廣大人民群眾是毫無關係的。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教育出來的學生，他們熟悉的是表現人體美，對勞動人民的形像卻一無所知。」1967年5月7日的陣線報又及時發表了5月4日中共人民日報的「五四」社論〈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預示了大規

模的上山下鄉運動。1967年9月17日轉載了人民日報社論〈掌握革命鬥爭的大方向，深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1968年1月1日陣線報出版新年特刊，全文轉載了新華社長篇通訊稿〈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凱歌聲中迎新年〉。1968年8月1日的人民論壇頭版刊登關於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並全文轉載中共兩報一刊社論〈革命委員會好〉。中共「九大」召開後，陣線報甚至專門為學習九大政治報告開闢名詞解釋專欄。

為了顯示文革的世界性影響，抵制對文革的「謠言」和「歪曲」，陣線報還大量報導和轉載了「世界革命人民和進步力量」對文革的讚美。1967年3月19日發表題為「世界人民讚揚中國文化大革命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長篇綜合報導，列舉了剛果(利)革命委員會機關刊物《革命》的文章，《巴勒斯坦之聲》的廣播，希臘進步學聯給中國的致敬電，「美國進步人士」發表的談話等等。1970年10月25日轉載新華社長篇通訊稿〈英國勞動人民熱情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8月16日又在「新文選」欄目發表題為〈導航〉(無作者，可能轉自中共報刊)，的長篇報導，介紹了一個英國船長在危難中受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海員援助，從此愛上了毛澤東著作的故事。

除了文章，陣線報還用大量篇幅刊登反映文革的照片和漫畫。1967年8月13日發表了6幅照片，分別是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檢閱紅衛兵，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天安門上講話，北大師生和解放軍在天安門前遊行，以及廣州市50萬革命群眾大遊行。9月17日又在「毛澤東思想照亮了革命的道路」的標題下發表十多幅照片，反映各地個行業的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開展文革的情況。



新加坡左派報紙介紹文革的一些文章，最下面一篇是介紹上海的「一月風暴」。

新加坡左派對中國文革的瞭解和宣傳離不開中國的直接影響。當時除了對外廣播和宣傳，中國在香港的出版社和雜誌社把大量書報雜誌寄往新加坡。中國的海員把文革材料和貨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有毛澤東像章，毛澤東語錄，文革出版物，甚至印有毛澤東頭像和語錄的郵票，等

等。有一次一艘名叫「海琥珀」號的香港貨輪(船員多數是中國大陸派去的)因為裝載太多這類文革宣傳品，新加坡海關不准海員登陸，也不准新加坡人上船。船上的大陸海員控訴說這是法西斯迫害，是殘暴行為，於是把船身塗滿口號，什麼「李光耀集團反華決沒有好下場」，「強烈抗議新加坡反動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堅決捍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權利」之類。新加坡的左派學生和工人也到場聲援。結果新加坡政府只得讓步，除了不讓這艘船的海員傳播文革宣傳品，對接著到來的

有大陸海員的貨輪眼開眼閉。在左派宣傳中這是當時一場聲勢很大並取得最終「勝利」的「鬥爭」。當時新加坡是中國僑匯的第二大來源，僅次於香港，很多新加坡華人把錢寄回中國接濟窮困的親友，所以中國銀行在新加坡設有分行，這家分行卻利用直接接觸華人的機會在櫃檯上散發文革材料。最離奇的是，根據南洋商報1967年9月27日消息，在中國出口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兒童零食橄欖包裝紙中竟然也藏有毛語錄和有毛頭像的郵票。

(二) 在南洋高唱「東方紅」

——新加坡的毛澤東個人崇拜

作為文革的一個主要成分，個人崇拜也在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的左派中廣泛流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府都把毛著和相關文革材料(包括像章和郵票)列為禁書，違者罰款或入獄。例如據南洋商報1967年9月8日報導，一名男子因擁有31本毛語錄而須入獄一年。但實際上毛澤東著作、語錄(小紅書)、畫像和像章在左派群眾中廣泛流傳的程度到了難以制止的地步。1967年12月17日陣線報公開報導，援引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這個組織是馬共在中國建立的公開機構，不用共產黨的名稱，在海外遙控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革命)駐中國代表團的機關刊物《馬來亞公報》的資料，說在新加坡一地，每月就秘密售出大約8千份毛澤東語錄(這個數字顯然誇張，但既然敢說8千，那至少1-2千份是有可能的)，毛澤東像片去年也售出了數以千計。印有毛像毛語錄的郵票「已經成為傳播真理的一個普遍辦法」而被很多人收藏。有些人甚至把毛語錄印在紙幣上，在市場上一起流通，以傳播「革命真理」。背誦毛澤東語錄和詩詞也成為時尚。很多作者的筆名用的是毛詩詞

中的隻言片語以表達對毛的忠誠和對毛著的熟稔。1970年中共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把對毛澤東的讚美詩《東方紅》的旋律作為衛星訊號傳回地球，在人類歷史上完成了一件無數帝王可望不可求的個人崇拜的偉業。在新加坡，一個左派詩人這樣寫到：「那是多麼明亮的星啊／千顆星萬顆星怎能相比／它閃耀著偉大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苦難人民前進的方向。……請你們傾聽啊，傾聽／那音樂的雄壯節拍／鼓舞著人民向前進／在寬廣的宇宙裏／它發出人類的最強音。」[5]

左派出版物在建立毛個人崇拜中尤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是今天瞭解當年對毛個人崇拜的主要來源。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人民論壇》(新加坡另一個左派政黨的刊物，見下文介紹)在頭版發表長篇社論，題目是〈全世界人民仰望天安門上的紅太陽——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968年1月1日又發表署名「向陽花」的詩歌〈世界人民向毛主席致敬！〉，說「五洲四海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閃耀萬丈光芒，整個地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火一樣通紅，這是為什麼？只因為有了毛澤東！……全世界億萬人民同聲歌唱《東方紅》——歌頌偉大的領袖毛澤東！」這份刊物1970年1月1日新年特刊的「本報特稿」題目是〈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文章自問自答地說「為什麼全世界革命人民不斷地以最大的光榮，無限的欣慰、及革命的積極性和熱情來書寫、討論及宣傳毛澤東思想呢？」文章接下來一口氣列舉了七、八個「毛澤東思想是萬能的」理由。

陣線報在推動毛崇拜上更是不遺餘力。1968年新年特刊的陣線報發表兩篇詩歌，一是〈革命的寶書〉，說一個九歲的女孩小紅已經有「一顆小小的紅心」，「心中有顆最紅的紅太陽」，知道父母親每天捧讀的「紅寶書」裏講的「儘是『造反有理』窮人

翻身的途徑！」另一首是〈在收音機旁〉，描繪一家人無論清晨黃昏深夜都圍在收音機旁傾聽來自北京的聲音，「《東方紅》的樂聲一起/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那是從毛主席身邊發出的聲音。……收音機啊，你可要爭氣，可別發出嘈音，哪怕是微微的短短的嘈音，來自毛主席那兒的話，我們一字都不能漏過啊」。詩中還說這家的三歲小孫女還在牙牙學語，「但是『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她唸得比什麼話都清晰！」1968年1月22日陣線報又發表署名為〈一枚毛主席像章〉的詩，說「一枚毛主席像章，珍貴地、珍貴地放在那小木盒裏；珍貴地、珍貴地藏在他赤紅的心上；就像一輪紅日放射萬丈光芒。」

像中國在文革時一樣，文藝演出也成為新加坡的左派充分發洩革命熱情的渠道、佔領意識形態陣地的手段，文藝演出中虛構的「革命」景象代替社會現實給左派帶來短暫的亢奮和陶醉。每年的新春和各種節日，左派都大操大辦，舉行各種文藝匯演。在這樣的演出中毛崇拜成為一個主要內容。1968年新春社會主義陣線舉辦新年晚會，陣線報這樣報導說：「紅色的大幕拉開了，毛主席的彩色畫像在背景上映現了。『啊，毛主席！』『毛主席萬歲！』三千觀眾立即激動歡呼。大組合唱深情唱出『萬歲毛主席』這首歌。」接下來表演的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語錄舞蹈」，看了「等於接受一次深刻的毛澤東思想教育。」節目單上還有宣傳毛澤東「造反有理」的相聲，由一個青年向老漢宣傳，最後讓他接受毛的「造反有理」的教導。1969年新春匯演中的毛崇拜更上了一層樓。文藝演出的序幕是紅衛兵歌舞「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接下來是歌舞「萬歲！毛主席」，表演唱「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即把林彪所寫的「再版前言」配上音樂和歌舞），毛語錄舞蹈（即把朗誦毛語錄和舞蹈相結合，如「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

務」、「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革命文化」、「文學藝術都屬於一定的階級」、「聯繫群眾、表現群眾」和「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以毛澤東詩詞為內容的朗誦和歌唱「迎風暴、向太陽、看世界、一片紅」，民樂合奏「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戰士歌唱語錄版」、「毛主席的書咱最愛讀」、「北京有個金太陽」。有關報導這樣寫到：「『萬歲！毛主席』裏的一個歡騰的場面，尤其另我嚮往：演員們輕搖著手腕，使《毛主席語錄》像迎風的紅花，同時又歡唱『萬歲！萬歲！毛主席！』那矯健的身姿，仿佛映襯在紅日、雪山和綠水之間，顯得十分動人。」

毛語錄和毛萬歲的口號並非僅僅用於宣傳和歌頌，左派人士確實用它們來「鼓舞」自己去「鬥爭」。例如根據陣線報的報導，1967年12月，當新加坡政府以「非法集會」罪判處262名社陣成員監禁6個月時（這是當時的一件「大案要案」，被左派人士控訴為是「法西斯血腥鎮壓」），被判的社陣成員和在場的家屬以及同志高呼毛萬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歌，並一路唱到監獄。宣傳毛思想、散佈毛聖像成為「鬥爭」的一個方面，很多人是因為在大街或他人住宅外張貼毛澤東像或語錄，被警方以損害他人財產罪拘留，在判罰款後獲釋。很多參與者是中學生。無論是這種「鬥爭」的方式還是其結果今天看來都更像是一場鬧劇和笑劇。

各左派報紙每期都在頭版大幅方框內刊登毛語錄（陣線報始於1966年11月27日刊登毛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一段語錄），常常是和本期特定內容有關的，例如1968年3月1日的人民論壇在頭版發表文章〈以昂揚的鬥志迎接三八婦女節〉，文章標題的上面是大幅毛澤東語錄「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此外

就是大量刊登毛的像片，刊登或連載毛澤東著作(例如《論聯合政府》就被連載於從1972年1月30日到4月14日的陣線報)。一度還有「林副主席著作選讀」，尤其是發表於1965年8月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毛澤東詩詞也大量刊登(陣線報第一次是1967年1月29日刊登毛的〈七律，冬雲〉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兩首以反修和世界革命為含義的詩詞)。毛澤東語錄歌的歌詞和樂譜也大量被刊登，如「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71/9/12)，「革命不是請客吃飯」(1971/9/5)，「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971/8/29)，「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1971/8/15)，「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1971/9/26)等等。左派報刊還大量刊登毛澤東語錄畫，即用通俗形像的畫面表現毛思想(很多作品直接來自中國大陸)。除此之外，左派報刊還發表大量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文章。例如人民論壇1969年發表連環畫故事〈小販華叔掌握毛澤東思想堅決鬥爭的故事〉，用9幅畫面配上文字，很多畫的文字說明都直接引用毛澤東語錄。所謂「堅決鬥爭」是說這個香港小販用毛澤東語錄



人民論壇刊登的學習毛著的美術作品。

來和說他「阻街」，「攤子大」要趕他走或罰款的警察「鬥爭」，常常把毛澤東小紅書拿出來揮舞和朗讀。最後一幅畫面是人民手挽手，頭上是光芒四射的毛頭像。

1968年新年陣線報特刊發表〈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長篇文章，是把毛澤東個人崇拜和新加坡「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典型。文章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標誌著整個世界正進入一個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新時代。全世界億萬人民熱情仰望北京城，千萬顆紅心齊向毛主席，就是這一時代的特點」。文章在回顧了上一年世界各地的革命鬥爭後說它們「都灼灼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光輝。毛澤東思想已成為世界人民不可缺少的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今天世界各地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無不以能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而感到無比光榮。」陣線報為了完成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光榮任務，在「過去一年中曾經三番兩次努力加以改善」，尤其是開闢了毛澤東語錄專欄。

1970年1月11日的陣線報發表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長篇廣播稿〈馬來亞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民族解放軍(根據地建立在「反動統治薄弱」，實質是沒有政權機構的馬泰邊境)大量翻譯、翻印、出版和發行毛主席著作〉，向新加坡左派介紹馬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情況。文章說馬共不但全部翻印出版了毛選一至四卷，還分類出版了毛有關哲學、建黨建軍、人民戰爭的著作，尤其是「老三篇」。從1966年7月起，馬共專門派人負責收聽和記錄毛澤東語錄和「最高指示」，每收到一百條就出一袖珍本的《毛主席語錄》，作為最珍貴的禮物送給指戰員。他們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寫「再版前言」的毛語錄後，于同年翻譯出版，在年底分發給幹部戰士和其他人。分發儀式在除夕夜舉行，成為一個隆

重的場面。「戰士們除了個別學習外，每星期還舉行兩次集體閱讀。每天晚上睡覺前，部隊戰士以班為單位，結合班裏出現的活思想，選學一兩條語錄……部隊還經常舉行『語錄晚會』，進行背誦語錄的比賽。」此外馬共還收聽記錄了毛語錄歌 200 多首，在根據地廣泛傳唱。除了中文，馬共還用馬來文出版了大量的毛著。

左派報章還大量直接刊載中國大陸宣傳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文章和材料，如陣線報1968年的新年特刊全文轉載了新華社新聞稿，題目是〈毛澤東思想照亮了世界革命人民前進的道路〉，從小標題上就能看出文章的大致內容：「毛主席著作是革命人民的武器」，「世界革命人民的統一思想」，「印尼人民的唯一道路」，「掌握毛澤東思想埋葬帝修反」，「照亮我們前進道路的紅太陽」，和「非洲革命戰士最需要寶書」。1969年6月29日轉載多幅連環畫〈老貧農蘇風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故事〉。

有一件小事或許很能反映新加坡左派學生的毛崇拜熱和受文革影響的程度。1969年新加坡一份雜誌發表了一份讀書習慣調查，結論是孫中山、李光耀、甘迺迪(中國大陸譯為肯尼迪)和毛澤東在大學生心目中名列前茅。陣線報迅即發表署名「一群學生」的來信〈偉大領袖不容被侮辱〉，說那份雜誌是「烏煙瘴氣的『文壇』」「拋出的又一本黑雜誌」，是一棵「由一小撮『大專』學棍所編，旨在向馬來亞(新加坡)人民灌輸反動思想毒素」，「這黑貨本來就髒得很，臭得很！……拋出的黑貨只不過是糞堆裏的臭蟲」。但「使我們極端憤恨的是，黑貨中竟然出現對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極盡侮辱的能事」。把毛和「臭名昭著、罪大惡極的李光耀」和「死於黑社會子彈下

的美帝頭子甘迺迪排列在一起，「這是有計劃的，決非偶然的討好反動派的行徑……我們要正告你們這批躲在臭糞堆裏的學痞文棍，儘管你們挖空心思，竭盡一切誣讟之能事，你們的目的是永遠不能得逞的！」

可以說，新加坡左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表現形式上和當時被文革狂潮所席捲的中國相比，除了還沒有出現用毛主席著作可以指導外科手術、毛澤東思想可以使聾啞人恢復聽覺開口說話這些神話巫術之外沒有什麼區別。

(三) 歡呼世界革命，打倒本國政府

——文革如何影響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態度

在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那裏，文革絕不僅僅是一個國內的政治事件，而是所謂「世界革命」到來的標誌和動力(有關論述見筆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新加坡的左派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認識、宣傳和接受文革，並把自己的「鬥爭」看作是以文革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加坡人民黨是在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之外另一個有相當影響的左派政黨。以這個黨主辦的《人民論壇》(半月刊，公開發行)為例，1967年9月15日它在頭版刊登戴軍帽的毛澤東頭像，在顯著地位刊登毛澤東語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配發一副政治漫畫：一個形像高大的革命者右手緊握毛選四卷壓住一群形像渺小面目醜陋的國際反動派(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拉赫曼)，左手揮斥另兩個帝國主義者。漫畫下面是毛澤東語錄「不管中外反對派如何猖獗(這種猖獗是歷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們是能夠戰勝他們的」。這一期雜誌在同一版和其他版面刊登了長篇文

章，題目是〈把民族解放鬥爭進行到底！〉文章說：「今天，東南亞的人民革命鬥爭正出現一片大好形勢，一個偉大的、空前的革命風暴正在整個東南亞興起。這個形勢的最大特點，就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正在東南亞的廣闊土地上、海洋上傳播！……我們馬來亞(包括星島，下同)革命人民正是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同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走過進行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不論在城市或鄉村，我國的革命鬥志，政治水平都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覺悟也較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予我國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和偉大的指示。我國廣大人民已經拋棄了『議會道路』的幻想，認識到必須用革命的暴力去粉碎反革命的暴力，徹底打爛帝國主義支撐的拉曼李光耀政權的國家機器，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國家！」

1968年3月15日的人民論壇又在頭版刊登毛澤東語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要相互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在這條語錄指引下發表了長篇文章，題目是〈東南亞國家聯盟是美帝的反革命工具〉。文章用典型的中國文革語言說：「不久前，美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兩條臭名昭著的走狗——阿都拉曼(注：馬來西亞領導人)和蘇哈多(注：印尼領導人)在雅加達舉行了一系列的走狗會議，密謀反革命的活動。」這個活動就是建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文章說「只要看一看其成員國是什麼貨色，就可以知道它的本質如何了。」文章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國名打上引號，表示根本就不承認它們是獨立國家，而其餘的都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是英帝夥同美帝拼湊起來的。」而新加坡「以李光耀這個

宣傳畫

加刺打倒拉曼李光耀走狗集團



陣線報刊登的在毛思想鼓舞下打倒新馬政府的宣傳畫。

老狐狸為頭子的行動黨」也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加入，「它那件早已破爛不堪的『不結盟』外衣就連最後剩下的一點破布也也掉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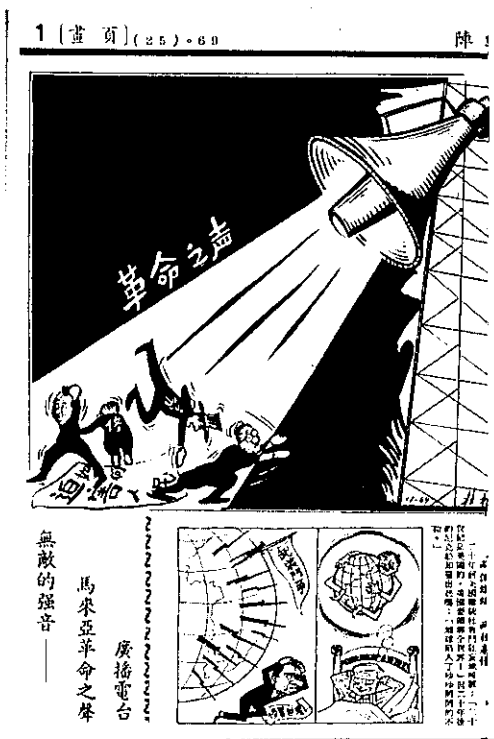
陣線報早在 1966 年 7 月 9 日就全文轉載中國政府 7 月 3 日就美國轟炸北越河內和海防、擴大侵略戰爭發表的聲明，特意用聲明中的一句話作為標題：「戰爭打起來是沒有界限的」，暗示東南亞革命可以從中國那裏得到最大的支持。7 月 23 日又在頭版發表題為〈朝向決戰的東南亞局勢〉，描繪了一幅以越南戰場為中心、以中共支持為後盾，遍及東南亞各國的反美反帝革命大好形勢，給人以「決戰」就在眼前的緊迫感，最後提出「身為東南亞人民一員的馬來亞(注：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術語中「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也必然會伴隨局面的發展，更好地打擊美帝國主義及本地反動派。」陣線報 1967 年 7 月 30 日頭版的文章〈加緊造反，粉碎敵人〉說「行動黨(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小傀儡政

權」正在準備慶祝他們的所謂「國慶」「所謂『馬來西亞』和所謂『新加坡』實實在在是美英帝國主義耍弄出來的新殖民主義產物」「我們要告訴反動派：你們的所謂國家觀念是灌不進人民的腦子裏的！……馬來亞人民將會更高舉起反殖反帝紅旗、更堅決造你們的反；一定要把你們打倒！」1968年新年特刊的〈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又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捲動著歷史的車輪飛馳向前，宣告了帝修反末日的來臨……馬來亞人民盡最大的努力學習和應用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執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標的正確政策，推翻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

所有這些都說明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意識中，他們的鬥爭是由文革所推動的世界革命高潮的一部分。用陣線報發表於1968年6月23日的一首詩中的話來說，「地球正在向左轉」。為了反映這個「向左轉」的世界，左派報刊大量刊登了有關報導，從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陣線報基本上每期都有世界各地武裝鬥爭、工人罷課或學生罷課的相關新聞或評論，並配發照片和政治漫畫，有時還有圖表，介紹某地武裝鬥爭的情況，例如戰鬥發生的地點，參與人數，消滅敵人的數量和繳獲的武器彈藥等等。1969年3月30日的陣線報就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近兩年來的主要戰鬥和戰果。此外，每年的新年特刊都有長篇報導，有時長達數萬字，分地區分國家詳細回顧上一年世界革命的進展，往往和毛澤東思想相聯繫，例如1968年新年特刊的文章題目就是〈毛澤東思想光輝照全球——1967年國際革命形勢綜述〉；1970年是〈陽光普照，東風萬里：世界革命勝利前進的一年〉；1972年新年長篇國際綜述的標題用的是毛澤東的詩句「冷眼向洋看世界，風物長宜放眼量」，這個題目本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革命形勢並沒有像原來想像的那樣「越來越好」。人民

黨的人民論壇也大量刊登「世界革命」的文章，例如1967年8月31日第一版整版發表〈武裝鬥爭烈火燃遍亞非拉〉，說亞非拉革命人民「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遵照毛澤東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教導」，不斷地「消滅敵人壯大自己」。1968年7月19日人民論壇第一版整版發表題為〈資本主義世界正在發生「大地震」〉的文章，詳細介紹西歐北美的學生運動、黑人運動和知識份子運動，強調指出「他們放棄了靜坐、和平請願等消極方式，而採取了罷工、罷課、佔領工廠礦山、佔領學校、逮捕和關禁作惡多端的資本家和反動學校負責人等革命性的步驟」甚至「向反動國家機器挑戰，以暴力反抗對付反動派的暴力鎮壓。這是資本主義世界人民運動的一項巨大的飛躍。毫無疑問的，這一巨大的飛躍，是當代最偉大的革命導師毛澤東主席的思想在資本主義世界廣泛傳播的結果，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影響，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威力無窮的鐵證。」

1969年11月馬來亞共產黨在中國湖南省建立了「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用多種語言向東南亞地區廣播，號召革命。這是毛主義當時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發動革命的一個重要步驟。新加坡的左派歡欣鼓舞，陣線報發表社論〈革命力量進一步發展的標誌〉，宣告「一個紅彤彤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國必將在不不久的將來光榮誕生。」此外還在「特大喜訊」的標題下將電台的廣播時間、頻率和波長刊登在報紙上，並不時更新。電台一建立，陣線報就組織了詩歌和漫畫等稿件，如11月3日發表了三首詩：〈傾聽〉、〈聽，馬來亞革命之聲〉和〈晴空中的巨雷〉，說「北方傳來了空前大喜訊」，「像長夜裏／盼來了光明。像生活中／重逢遠方的親人」。在漫畫上，經過醜化處理的李光耀、拉赫曼和身上寫著「美帝」、「蘇修」的丑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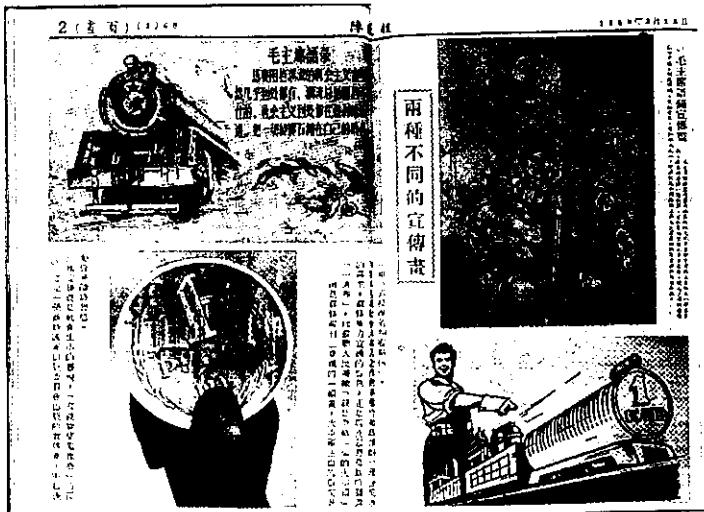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建立後
新加坡左派報刊的宣傳畫。

在一個高音喇叭的強力音波下驚恐萬狀、抱頭鼠竄。「馬來亞革命之聲」建立後，陣線報和人民論壇常常大量直接刊登它的廣播稿，尤其是反映武裝鬥爭和世界革命的內容。筆者在新加坡做研究時和一個當年馬共在新加坡的成員的交談中了解到，當時並沒有其他渠道傳送文稿，新加坡左派專門組織人重複收聽廣播，做速記，核對筆記，然後整理交給報社。這個成員當年就從事過這樣的工作。

新加坡左派不但反帝，而且跟在中國後面反修，大力批判和新加坡社會現實毫無瓜葛的蘇聯，大肆宣傳北京已經代替莫斯科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在60年代初展開了有關經濟改革的討論，主張對個人利益，利潤，和市場機制這些被計畫體制和指令經濟所排斥的問題重新考慮。蘇聯的這場討論在社會主義國家演變歷史上意義深遠，是80年代改革的先聲，當時受到一些東歐國家的支持，但中共卻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標誌。新加坡左派報刊也刊登了反映這一論戰的內容。他們安排了這樣一組政治圖

畫表明中共和蘇聯的區別：在版面的上半部分是兩幅中共宣傳畫，一幅是掛著毛澤東頭像的火車頭，文字說明是「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另一幅是光芒四射的毛澤東頭像下中國人民手握毛選，意思是毛澤東思想是鼓舞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版面的下半部分是兩幅蘇聯政治宣傳畫，一幅是一個掛著一個巨大的一盧布硬幣的火車頭，另一幅是一隻手高舉著同一個一盧布的硬幣。文字說明是這是蘇聯當局「赤裸裸地宣傳有錢能使鬼推磨」和「錢是帶動一切的火車頭」的反動思想。1968年捷克發生要求改革和擺脫蘇聯控制的「布拉格之春」，新加坡人民論壇8月15日(在蘇聯入侵之前)發表文章說「蘇修，捷修貨色一樣」，不同的是蘇修還要用社會主義的招牌欺騙人，而捷修連招牌都不要了，用形像的語言點明了新加坡左派反改革的立場。在很多漫畫上，蘇聯領導人常常被和美國領導人以及其他所謂「各國反動派」的頭目放在一起醜化。當時新加坡左派極力阻撓蘇聯和新加坡發展關係。有一個蘇聯舞蹈團來新加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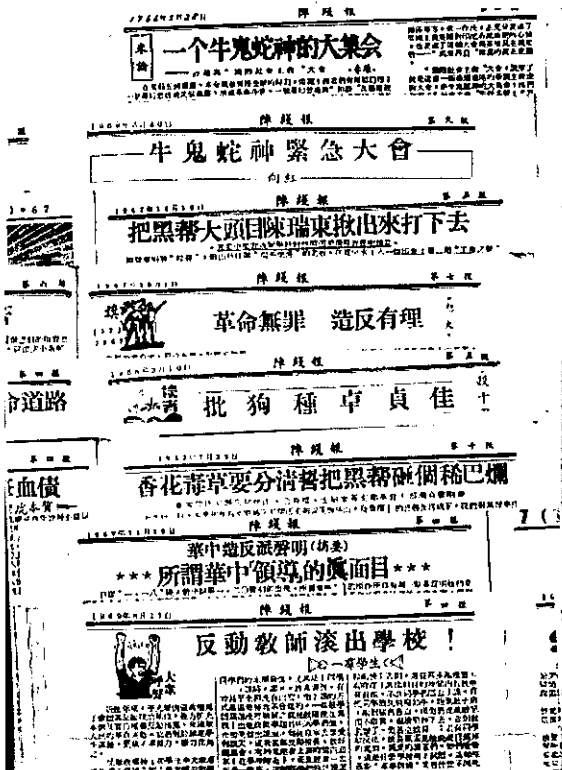
新加坡左派反修宣傳畫，說明見上文。

問，新加坡左派號召抵制，要人民不去買票，不去看演出，並且高呼「蘇修舞蹈團滾回去！」1967年中共支持下在北京公開活動的「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發表〈打倒蘇修、美英帝及其走狗〉的長篇聲明，無中生有地譴責「蘇修」對「馬來亞人民所犯下嚴重罪行」（注：大概是因為實在缺乏證據，沒有用「滔天罪行」）。所謂「罪行」無非就是蘇聯承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獨立並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罷了。陣線報立即全文轉載這份聲明。實際上由於新、馬在冷戰中站在西方一邊，蘇聯和它們關係的發展十分有限。

在這樣一個「世界革命」，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的背景下，新加坡左派和馬來西亞左派在馬共支持下一起制定了他們的國內政治路線：以「新殖民主義的陰謀」為名全面拒絕新馬分治、各自成為獨立國家的現實，將兩國左派鬥爭視為一個統一的政治運動，用「馬來亞革命」指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地的運動；將新馬兩國政府視為「帝國主義走狗」，不承認其合法性；全面抵制新馬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規和內外政策，不接受「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這樣的新民族認同，堅持「馬來亞人」的概念。可以說，在60年代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建立新民族認同的歷史過程中，這是一條用毛式共產主義取代民族主義、視本國的運動為達到世界革命的最終目的的一個手段、並以毛的中國和文革為精神和心理寄託的政治路線。儘管左派和共產黨人在推動新馬獨立的過程中有過貢獻，但那並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民族獨立不過是達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這從列寧開始就是非常明確的。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1962年10月（新加坡獨立前）就把這條路線闡述得非常清楚——儘管他始終否認自己是一個共產黨人——「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不否認，要實現社會主義的長遠目標，不是短時期可以完成的。對於我們來說，現階段的鬥爭是一項民族民主運動。」[6]

在這樣一條政治路線下，從一開始社會主義陣線就不會像民族主義政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那樣滿足於獨立後的政治現實，一心一意地從事經濟和社會建設，建立新民族認同(能否和其他政黨分享政權則是另一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那些政黨是真心參加民主制度還是將這種參與視為政治策略)，而是始終以「外人」的心態視這個新國家為一個外在的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服務於這個運動，甚至為這個運動而犧牲。從這個角度來看，左派和共產黨人之所以推動反殖鬥爭，並不是真的為了民族獨立，而是嚮往世界革命，因此在民族獨立後他們決不會滿足政治現實，參與國家建設，而是相反，會以各種藉口拒絕接受新的現實，發起新的鬥爭，從而成為政治和社會動亂的根源。當然，這樣的分析並非要否定共產黨和左派在推動民族獨立過程中的貢獻，而是相反，意在回答一個關鍵的歷史問題：為什麼在推動獨立過程中如此有群眾影響的左派勢力在獨立後迅速衰落？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新加坡左派(社會主義陣線和人民黨)採取了和新的民族主義政權誓不兩立毫不妥協的立場。1965年8月9日馬來亞聯盟和新加坡政府同時宣佈新加坡獨立，脫離馬來西亞，社陣和人民黨當即於10月8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不承認這個在英帝國主義操縱下產生的「假獨立」，並向行動黨政府發出三項挑戰。8月21日陣線報發表詩歌「槍尖上演的把戲」，極度誇張地說：「新加坡在英國槍尖上獨立」，「國防部長只懂『向右轉』，專心聽從英國軍官的指使(注：新加坡獨立之初連自己的軍隊都沒有，政府要求英國軍隊留駐一段時間保障新加坡安全)；外交部長的頭被扭歪了，只能朝西方點頭稱是；愚蠢的勞工部長白著眼說，移開槍尖工人會



這些文章標題集中反映了文革語言對新加坡左派的影响。

跌在地上餓死」。一年後，中國文革正式爆發，社陣九名議員8月10日宣佈辭去國會議員的議席，宣佈「大力開展議會外群眾鬥爭！」後來社陣在回顧這個決定時明確說這是「用毛澤東思想做指導，徹底批判敵人代理人

和牛鬼蛇神及右傾機會主義散佈的『議會鬥爭』和『議會選舉』的荒

謬言論和路線，高舉『議會外』群眾鬥爭的旗幟。」這就點明了中國文革和新加坡「議會外鬥爭」的直接聯繫，李光耀說左派退出國會「仿效中國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決非誇大。文革意識形態在世界革命問題上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批判「議會道路」，否定合法鬥爭，主張直接行動和武裝鬥爭，強調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視任何議會道路和合法鬥爭的主張為妥協和叛賣。

左派的「鬥爭」不但在原則上，而且在方式上也充滿了文革色彩、文革語言和文革心態，表現在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的

徹底否定，只要是它們贊成的，左派就必然反對；只要是它們倡導的，左派就必然拒絕。這種完全的敵對常常以一種極度誇張的姿態表現出來。例如一個左派詩人這樣形容新加坡：「這是生活在熱帶？天空沒有太陽／生命沒有光芒／人們的頭頂／一片黑暗／人們的心裏／一片寒涼」。對兩個新獨立的政府領導人，左派用種種方式醜化和妖魔化，大量使用謾罵和人身攻擊，「走狗」、「小丑」、「傀儡」、「困獸」、「奴才」、「匪幫」等等充斥著左派報章和標語口號。這種謾罵、醜化和人身攻擊也大量地隨心所欲地用在其他人士身上，只要左派人士看誰不順眼，就立即罵得他狗血噴頭。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陣線報發表文章題為「喪家的走狗梁國光沈秀寧」；1968年3月10日發表了題為〈批狗種卓貞佳〉的文章，作者筆名是「殺千刀」。一篇把本來屬於革命文學範疇的小說《青年人的鋒芒》批成「黑書」的批判文章，作者的筆名是「戮黑」，意為「殺戮黑文人」。在政治語言上，雖然「階級鬥爭」、「革命」等傳統的辭彙仍然在用，但更鮮明醒目的是「造反」、「打倒」、「永世不得翻身」等文革用語。「加緊造反」、「造反有理」等成為報刊文章常見的題目。此外左派報紙還發表大量文革風格的政治性漫畫。例如，在一幅漫畫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拉赫曼的兩個人頭被醜化後被壓在革命的槍桿之子下面，文字說明是對當時兩個官方口號的嘲弄。這兩個官方口號是：「馬來西亞共和國萬歲！新加坡共和國萬歲！」在漫畫上，「萬歲」的「歲」都變成了粉碎的碎，而且這兩句口號在文字上被拆散，東一個字西一個字，表達了「分崩離析」的意思。根據南洋商報1966年9月3日的報導，在新加坡影院裏每當毛的形像在螢幕出現，很多觀眾抱以歡呼；而聽到新加坡國歌時則喝倒彩。同樣的情況（親華崇毛，對國旗國歌和國家元首不尊敬）在馬來西



這張漫畫典型地反映了文革漫畫藝術在新加坡的影響。文字說明見上文。

亞華人中也大量發生。

這種誇張特別表現在動不動就用「殘暴」、「血腥」和「法西斯」來形容政府對左派運動採取的應對。實際上，如果這些左派真的瞭解他們所嚮往的中國當時正在發生的一切(例如大量處決「現行反革命」和以所謂「群眾專政」和「革命義憤」的名義用暴力迫害各種被認為有政治問題的社會成員)，只要他們有起碼的是非感和現實感，那麼他們應該覺得自己有幸反對一個如此仁慈的政府。

以下一段採自陣線報1970年5月30日的長篇報導，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左派行動的激烈和政府的節制。這個報導的內容是回應毛澤東發表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報導說從5月24日到30日，成百上千的左派群眾拉著大旗舉著標語進行遊行，口號是「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拉赫曼、李光耀走狗政權！堅決不當傀儡兵！」等等，把歡呼毛在北京發表的聲明和在新加坡拒絕徵兵聯繫起來。在遊行途中他們用棍棒襲擊警察，打碎渣打銀行的玻璃。在這樣的情況下，警察拘留了一批人，卻被報導稱為是「法西斯暴行」。徵兵是新加坡獨立後建立國防的重要措施，也是民族獨立的應有之義，但受到左派全力抵制。社陣主席李紹祖的兒子因為拒絕服役而被拘留，

後交保釋放但規定必須去服兵役，此人便選擇出國。這件事當時受到左派的渲染，作為「鬥爭」的一個事件。

左派不但「杯葛」(英文 boycott，意為抵制) 選舉和徵兵這些政治措施，而且對政府的社會政策也一概否定，以「陰謀論」和泛政治化的心態抵制政府的一切措施。李光耀政權標榜「民主社會主義」，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強調社會服務和福利，緩和剝削，改善民生。這種政策的性質和效果固然可以討論，但陣線報頭版發表評論的大幅標題就是〈李光耀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徹底的法西斯主義〉，說李一切都是為了外國資本家在新加坡的利潤著想。在新加坡已經獨立並大力吸引外國投資以發展經濟的情況下，左派堅稱新加坡的要務「並不是要如何進行發展，而是要如何驅逐外國統治和重新統一國家(即和馬來西亞合併)」。為了治理空氣污染，李光耀政府在 1970 年 3 月開始向噴黑煙的摩托車徵收罰款，規定摩托車使用五年後每年必須接受一次檢查；汽車使用十年後每年必須接受一次檢查。陣線報評論說這是一個「進一步迫害勞苦百姓」的「反動計劃」，「李光耀傀儡政府不但用罰款來擴充其『暴力機構』，而且以通不過檢查為名淘汰車輛，使帝國主義生產過剩的車輛可以大量地在本地傾銷，方便它們更大量地掠奪我國人民的血汗。這完全是為外國壟斷資本家利益而制定的計劃。」因此「黑煙毒，李光耀的心更毒」。李光耀政府制定了家庭計劃，強調計劃生育和小家庭對改善民生減輕負擔的重要，陣線報發表評論的標題是〈「家庭計劃」的目的何在？〉，說這是「完全企圖掩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是造成廣大人民生活貧困和痛苦的主要根由的事實，而欺騙和誤導人民相信資產階級的謊言，以為今天世界上人民生活的貧困，是由於所謂『人口爆炸』和

人民生育『太多子女』所造成的。」「決定性的因素，不是家庭形式的大小，而是統治階級的政策。」對政府發起的旨在解決華人社區常見的髒亂差問題的大眾衛生運動、對隨地吐痰進行罰款等，左派也一概拒絕，計算每年政府可以從罰款中得到多少去擴充「鎮壓人民」的暴力機器。教育部門號召教師以身作則，不去色情場所，也受到左派的嘲弄。

新加坡左派一直把他們的運動和馬來西亞左派的鬥爭聯繫在一起，在談論和支持馬來西亞左派運動時毫無顧忌，毫無國界的意識，正如中共在文革中談論和支持其他國家的「革命」一樣。例如，陣線報 1967 年 4 月 16 日發表充滿文革色彩的長篇社論，〈把革命造反進行到底！〉說「近幾個月來，馬來亞大陸的工人階級和各行業人民所展開的反剝削反迫害反法西斯暴行的鬥爭此起彼伏，熱氣騰騰。各階層人民發揚了敢於造反的革命精神，狠狠地打擊著拉曼傀儡集團和受它維護的反動資本家(尤其是外資)，大長了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反動派對威風……『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的意識為轉移的。經過革命鬥爭和生活實踐的教育，越來越多的人們覺悟起來，勇敢地造剝削階級和反動政權的反。」

在國際共運和左派運動中，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利用青少年的幼稚和反叛心理進行政治煽動，讓他們從事和他們的年齡和自然身份不符合的「革命」，把他們推向了政治鬥爭甚至暴力鬥爭的前沿。在這個意義上 60 年代的紅衛兵運動不過是 30 年代的「紅小鬼」的延續。受中共影響，新加坡左派運動的大量成員就是中學生。在中文教育和中文出版物的影響下，新加坡的華文中學一直都是傳播中共革命思想的天然土壤，並形成了獨特的校園政治文化，很多學生在校期間就參加了革命組織和政治活動。新加坡作為英國殖民地，從英語學校畢業的學生不但在語言上而且在實際知識和技能上在就業方面對華校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辦的幼稚園裏灌輸
的是和中國類似的紅小兵教育。

生佔有優勢，這個現實因素更促使華校生對社會現實的失望和反感，增強了他們的「造反」精神。因此紅衛兵運動一爆發，就在新加坡華校生中激起了反響。新加坡陣線報 1968 年 5 月 12 日發表文章〈馬來亞的革命青少年們，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吧〉，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革命鬪將——紅衛兵——給予我國的革命青少年巨大的影響，一批又一批紅衛兵式的革命青少年，如潮水般地湧現在我國革命鬥爭行列中。」文革初期(1966 和 1967 年)華校生以「紅衛兵」為榜樣「造反」的具體行動是拒絕參加校方按照政府要求舉行的升國旗、宣誓儀式和唱國歌，展開「反宣誓反升旗」鬥爭。他們不但在校園內展開「鬥爭」，而且走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是整個左派對民族獨立和新國家「不承認主義」、拒絕接受「國家意識」的鬥爭的一部分。在這些「造反」行動中學生不但和校方發生衝突，而且對「反動教師」採取了「革命行動」，意為肢體暴力，類似于中國文革中的「學生打老師」。

當校方和政府開除和逮捕(實際是短期監禁)參加學運的一些積極分子後，造反學生稱這是「法西斯血腥鎮壓」，又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逮捕反開除鬥爭」，受到社陣、人民黨、左派工團、校友會和藝術團體的聲援。

很多參加這些「鬥爭」的中學生後來欲罷不能，等於放棄學業，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們的很多「鬥爭」業績說來並不真的「轟轟烈烈」，例如據南洋商報 1967 年 9 月 5 日報導，一個被開除的中學生因大罵校方是李光耀傀儡政府的走狗而被罰款 30 元。9 月 28 日又報導一個少女因和兩男子在他人牆壁上張貼左派大會廣告被捕，罪名是觸犯他人財物(未經屋主同意)，法官判她有條件釋放：一年內不得滋事。當時幾件涉及左派非法集會的案件，被捕者中有大量中學生，在法庭審判時旁聽席上常常坐滿家長。有的家長本人也是左派，他們大罵李光耀是「走狗」，法庭是「法西斯殘酷鎮壓」，雖然所謂「判決」基本是罰款、短期監禁或有條件釋放，絲毫不比其他國家對不法青少年的處罰嚴厲。例如 70 年代初中共開始整頓城市中從文革開始後積累下來的青少年問題，很多「少年犯」在毫無正常法律程式的情況下被送去勞教，家長所能得到的，不過是一紙通知書而已，哪有什麼請律師和法庭旁聽一說？

(四) 文藝大批判和「土產樣板戲」：文革影響下的新加坡左翼文藝

文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文藝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佔據了和它本來的功能毫不相稱的重要作用，不但成為一條「戰線」，而且藝術化地歪曲歷史，虛構現實，從而不僅為政治目的服務，而且提供了一個讓左派陶醉的政治烏托邦。在很大意義上，20 世紀的共產黨革命所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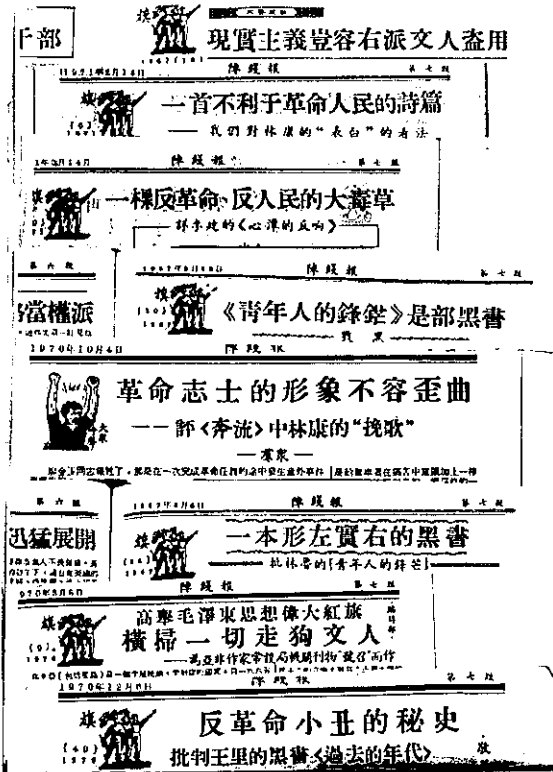
造的就是一個烏托邦，而革命文藝就是這個烏托邦的最高最精緻形式。在新加坡，文革中文藝的這個方面完全被移植了過來。

新加坡的華人本來就深受中國革命文化的薰陶，從「五四」運動開始，左翼文學和藝術就在這塊土地上紮下了根。魯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華文學校裏廣泛傳播，左翼作家郁達夫30年代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左翼文人胡愈之1940年受周恩來派遣應聘並擔任過馬來亞和新加坡最大的華文報紙南洋商報編輯主任。很多左翼戲劇也被搬上舞台。1949年中共建國後，左翼文學，包括蘇聯的革命文學(例如根據日文版翻譯成中文的蘇聯革命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節譯本，早在30年代末就在新加坡華人中傳播。40年代中梅益根據英文版的全譯本也很快就傳到新加坡，在這裏獲得了更大的傳播空間，革命電影、戲劇和文學作品擁有廣泛的觀眾和讀者。到了文革期間，新加坡左派文藝更是完全處於文革影響之下。在上文中，我們已經介紹了新加坡左派文藝匯演反映文革影響的情況，以下對文藝思想、文藝批評和新加坡土產樣板戲做一些介紹。

在文革的影響下，陣線報從1966年9月開始舉辦了〈文藝筆談〉，目的在於進一步貫徹毛在〈延講〉中的思想。1967年4月陣線報的文藝副刊〈新青年〉發表了系統地確立毛澤東文革文藝路線的長篇文章〈當前我國文藝工作的若干問題〉，以居高臨下指點江山唯我獨尊的毛式文革霸氣為新加坡文藝工作者指出了「當前的任務」，規定了「為工農群眾服務的方向」，強調了「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長期的改造」，確立了革命的「創作方向」，說要「大寫、大演、大唱、大畫、大歌頌工農群眾革命運動」。文藝的創作手法也必須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文章把一大批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文作家打成「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說他們表現的是「個

人主義、溫情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壞思想。」

在確立了毛主義文革文藝路線後，新加坡的左翼文壇出現了一個文革潮，創作出大量的歌頌文革和議會外鬥爭的文藝作品，甚至無視政府的法令，公開號召展開武裝鬥爭，響應和新加坡一峽之隔的馬來亞共產黨遊擊隊「鄉村包圍城市」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號召，「突出民族解放軍戰士的英雄形像」。用一個研究者的話來說就是「左翼文團，雜誌，戲劇團體等紛紛高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小說，詩歌，戲劇，文論等紛紛『變色』，左翼文壇一時間紅旗飄飄，槍聲卜卜，文革味十足。」[7] 陣線報每年的新年特刊除了發表黨領導人的新年講話、世界革命形勢回顧之外就是發表長篇文章，對過去一年的文藝作品從文革意識形態的角度品頭論足。例如1968年的新年回顧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在文藝戰線上衝鋒陷陣。〉此外，大量氣勢洶洶蠻不講理的文學評論或者叫文學大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問世，鋒芒所向，那些非政治性的文學作品，謳歌自然和人性的作品，一概被貼上「黃色文學」和「殖民地文學」或者至少是「無病呻吟」的標籤而被批判，其用詞之刻薄和惡毒，比中國文革中的大批判有過之無不及。例如一篇批判詩人黃懷雲的文章這樣寫到：「黃懷雲的〈流雲的夢〉是一株毒草，是一部反現實主義的歪詩……是一小撮文娼文氓（這裏的娼是娼妓的娼，氓是流氓的氓）以『詩人』的畫皮去害人作惡」。另一篇文章說：「文壇小丑趙戎又活躍起來了！……這種蒼蠅，偽裝君子、假冒英雄，整日嗡嗡營營，詆毀正直的人們，無論怎樣乾淨的東西，總喜歡拉上一點蒼蠅屎。」還有一篇攻擊詩人孟沙的文章這樣說：「大唱黑歌的詩人孟沙，竊據文壇的一角，培植毒草，為沒落腐朽的反動文藝效命……隨著新馬文壇的突呈熱鬧，以及各式個樣的文妖文娼文氓的湧現，這一團久經沉沒的渣滓又乘勢浮泛起來了。」1967年7月30日陣線報的文章〈一本形左實



新加坡左派報刊發表的一些
文藝大批判文章。

右的黑書——批林魯《青年人的鋒芒》開篇就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有錯誤就得批評，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現在，在我們革命文藝界裏頭有一顆毒草生了根，長了苗，同時借革命文藝的土壤冒了出來。《青年人的鋒芒》賣的到底是什麼貨色？不是別的，正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破爛貨，一分錢也不

值的東西」。60年代末現代派詩歌傳人新加坡，左派立刻發表文章說「妖氣瀰漫的馬華文壇又吹起了一股歪風」。

在左翼陣線內部，很多「自己人」也難逃被大張噍伐的命運。一個著名左翼文藝批評家忠揚被說成「逃兵」和「周揚文藝黑線」在新加坡的「忠實信徒」。其他一些作家不是「對階級鬥爭的概念還很模糊」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非常濃厚……假如不投身到火熱的群眾鬥爭中去進行徹底的、根本的思想改造……就很難經得起考驗，就一定跟不上群眾的隊伍。」有一個左派詩人寫了一首題為《挽歌》的文章



舞蹈：《不愛紅妝愛武裝》(毛澤東詩句)。

悼念一位去世的同志，結果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說他沒有表現出烈士的氣概，是別有用心。有時候左派報刊也會發表被批判者的自我辯護或者同情者的文章，但那和中國的文革一樣，往往是下一輪更深入的「批判」的前奏。

作為文革文藝代表作的樣板戲通過各種途徑流傳到海外，在華人世界中產生了影響。新加坡毛主義左派控制下的金銀業職工聯合會將《紅燈記》改編成話劇於1969年公演，並公開宣佈這是「為了歌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和偉大的勝利，為了宣傳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以及為了我國當前政治鬥爭的需要。」左翼文藝工作者還仿效文革的做法，組織了所謂的「文藝輕騎兵」，在鄉村郊區搭舞台，搞小規模演出，把革命文藝直接送到群眾當中。他們還利用各種群眾團體的聯歡會，學校的畢業典禮，甚至幼稚園的結業典禮上演文革類型的文藝節目。

在中國樣板戲和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影響下，新加坡左翼文工團也創作了三個大型的演出項目：音樂舞蹈史詩《歌唱馬來亞》，詩歌造型《抗日之歌》和詩劇《送軍糧》，被稱為「土

產樣板戲」。

音樂舞蹈史詩《歌唱馬來亞》歌頌的是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由於新加坡的共產黨和左派長期以來一直和馬來亞的共產黨和左派在組織和行動上密不可分，所以歌唱馬來亞的共產黨也就是歌頌新加坡的左派。這個節目明顯是模仿中共的音樂舞

蹈史詩《東方紅》，它們都把共產黨歌頌成是人民的大救星，唯一重大的不同是中共的《東方紅》以神話毛澤東為中心，而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共產黨和左派組織中則還沒有形成這樣的個人崇拜。這個音樂舞蹈史詩載歌載舞，結合了多種藝術形式歌頌馬共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一共分兩場七景，動員了近百名演員。據一位研究者介紹：「序幕以戰鼓和歡呼，展現氣勢磅礴的場面，紅旗招展。舞台上工農兵學以戰鬥姿態朝著紅旗所指的方向前進，展現出一幅『文革』式的舞蹈構圖。」節目中有一段直接上演了根據文革時毛澤東語錄歌〈造反有理〉編排的同名舞蹈。尾聲是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是一首文革時最著名的毛澤東頌歌，1969年4月27日陣線報發表長篇文章介紹「土產樣板戲」時這樣描繪說：「舞台呈現出東風萬里，紅旗漫天的偉大場面，讓人不禁歡呼火的旗，火的海，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

筆者在新加坡訪問期間雖然沒有機會看到這出土產樣板戲，但有幸聽到了《歌唱馬來亞》的主題音樂〈我愛馬來亞〉。不聽則已，一聽就明白這是完全照搬60年代一首大陸歌曲〈我愛我的台灣島〉，歌詞雖然表達的是解放台灣的主題，但音樂十分委婉動聽。究其根源，這個旋律原來是一首台灣民歌，被共產黨重新填了歌詞。這是典型的共產黨革命文藝對很多民間音樂作品實行

「共產」(如「東方紅」)的旋律原來是陝北情歌)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重演，這樣共產黨的革命口號無論多麼荒謬離奇，立竿見影地就「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了。根據有關材料，原來這個「移植」是由從中國歸來的馬共成員完成的。

第二部土產樣板戲是詩歌造型《抗日之歌》，突出了馬共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強調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教導。馬共雖然為東南亞抗戰作出貢獻，但畢竟和美英等主要盟國的正面作戰無法相提並論，但和中共一樣，在講抗戰時，馬共很少實事求是地介紹自己的真實作用，而給人以抗戰全是它在打、馬來亞是它解放的印象。在音樂方面，這個節目採用了中國《紅色娘子軍》和交響詩《嘎達梅林》的片段，被左派評論家稱為「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好作品，是紅色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成功作品。」

第三部土產樣板戲是詩劇《送軍糧》，描寫馬共抗英戰爭中的軍民魚水情。第一場是「突破火線送軍糧」，第二場是「解放軍來了」，第三場是「奔向民族解放的戰場」。當時有兩個筆名叫「霜天」和「宣紅」的左派評論家，這兩個筆名就體現了文革的影響：「霜天」來自毛澤東的詩句「萬木霜天紅爛漫」；而「宣紅」不用說是「紅色宣傳」的意思。他們在一篇「紅旗如火，星火燎原」的評論文章中說這個節目「體現了『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主題思想，從而歌頌了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歌頌了馬來亞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

當時新加坡發展工業，吸引外資，當然產生勞資矛盾，但左派文人緊跟中共文革文藝的模式，主題先行，創作了大量所謂「工人小說」，不但把這個矛盾上升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而且虛構出一個由形像高大的英雄人物領導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場面。例如，有一本題為《金光道上》的長篇小說這樣描

寫一個名叫清堅的主要英雄人物：「他拿出一本紅皮小冊子，開亮了台燈，堅持每晚的學習工作。這時，將近午夜了，宿舍外正下著傾盆大雨，寒風不斷吹進房裏，同房的幾位工友已經呼呼入睡了。清堅輕手輕腳，把被窩蓋在他們身上。」小說的結尾通過「正面人物」雅娟直白表達了要前往馬泰邊境參加馬共武裝來解救新加坡受苦受難的工人的信念：「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為了加促人民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我決心作出更大的貢獻……讓我們在祖國的遠方——在戰鬥中重逢！」

1970年，由於新加坡國家建設成功，「革命」越來越不得人心，左翼面臨困境和內部分裂（詳見下文），作為左翼意識形態先鋒的文革文藝自然了引起非議。左翼作家和評論家黃興提出了「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主張。這個主張聽上去仍是「革命」當頭，實際上企圖矯正自1966年以來革命文藝文革化的極端趨勢，用「馬來亞化」對抗「文革化」。所謂「馬來亞化」即是強調「馬華文藝」（即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華文文藝）的獨特性，這個獨特性在現階段應該是「愛國主義」。這個主張受到著名革命作家凌遠的支持，他婉轉指出，「外國革命文藝」有助於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覺悟，例如語錄歌和語錄舞蹈「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我們不能同意把學習的重點完全集中在外國的革命文藝，因為外國革命文藝所反映的，是外國的革命具體情況，和馬來亞（包括星島）工農兵的生活不能符合，和實際鬥爭需要也有著一大段距離。」然而極左文人集言發表〈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為工農兵服務〉的批判文章（陣線報1970年10月11日），指出「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口號「並不能突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並不能概括當前歷史階段所要解決的迫切任務，是革命文藝創作同武裝鬥爭的深入發展相配合」，強調「要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落實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偉

大教導……重新教育和整頓紅色文藝隊伍。」文章並說在50年代末期革命文藝曾經有「提倡健康文化，打擊黃色文化」的口號，是脫離了政治鬥爭大方向，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今天要這個教訓，抵制新的修正主義口號，堅持「革命化、戰鬥化」反對「馬來亞化」。

（五）派性林立和「路線鬥爭」

——文革和新加坡左派的分裂

如本文開始時所介紹的那樣，新加坡左派一度聲勢浩大，包括兩個政黨和眾多的群眾團體。1970年李光耀訪問蘇聯時正值中蘇對立最嚴重的時候，蘇聯總理柯西金問李光耀新加坡的毛主義者究竟得到多少支持。當時毛主義的影響在新加坡已經開始衰落，李光耀回答說在60年代上半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華人（新加坡絕大多數人口是華人）支持左派，現在則仍然大概有百分之十五。[8]

但是這樣一個強大的左派陣營並沒有使得左派在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局中發揮重要作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左派的分裂和內鬥。分裂和內鬥一向就是國際共運的特色，因為共運的本質就是用革命和暴力手段追求政治權力，用理想主義和烏托邦主義掩蓋膨脹的權力欲。這種權力欲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無法通過正常的個人努力或者社會升遷來達到，在一個民主體制下則更難，所以只有通過投身徹底否定現存制度的政治鬥爭來實現。毛主義和毛主義支配下的文革則把共運的這個本質推向極端，「有權就有一切」成了可以公開宣示的政治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內到黨外，不斷地分，不懈地鬥，幾乎每個城鎮和每個單位都有對立的群眾組織，派性林立，比賽革命，比賽激進，「路線鬥爭」成為爭奪權力的幌子，最後終於發展到對黨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和毛對黨權獨霸的威脅，所以後來又不得不強調「大聯合」和

黨的「一元化領導」，甚至把全國至於軍管之下。因此文革中「造反」的本質就是奪權，是共產黨奪權歷史的延續。毛主義的這種惡俗不但在中華民族中種下了至今仍然清晰可見的惡果，而且隨著中共國際影響的擴大發展到海外，於是世界範圍內就出現了北京向莫斯科叫板，中共造蘇共的反的所謂「中蘇論戰」。20世紀60-70年代在國際共運和左派運動中，中共影響就如癌細胞，所到之處左派內部肌體無不發生惡性病變，出現分裂、鬥爭和「造反」，或以親北京和親莫斯科分界，或以誰更親華更崇毛分界，比賽激進，比賽革命，有時一個黨或一個運動不但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三一分為四。就連所謂「亞非作家協會」也分裂成親華和親蘇派，前者以北京支持的「亞非作家常設局」為主，譴責後者「非法召開偽亞非作家大會」（1967年3月）。在資本主義危機和民族獨立運動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和左派運動本來可以有充分的發展餘地，但其結果往往是自我毀滅於內部分裂。新加坡的左派運動就是一個例證。

新加坡左派比較嚴重的分裂始於1965年新加坡獨立，因為獨立給左派帶來了是否承認獨立和如何處理和新成立的民族政府的關係的問題。新加坡左派的主流從一開始就確定了「不承認主義」的立場，此後的主要表現是比賽誰反現政府反得更徹底更不妥協。但是左派內部並非鐵板一塊。一些比較現實理智的左派認為不能因為這個獨立是民族主義者通過妥協和談判達到的就拒絕承認，主張觀望，認為李光耀集團的「社會民主主義」立場在獨立後又可能進一步向左轉。對於左派內部的這種意見，陣線報1966年7月23日在發表〈朝向決戰的東南亞局勢〉的文章的同時，發表了〈堅持正確路線奮鬥到底〉的文章，說這個意見不同是「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社陣、人民黨以及廣大工會的幹部與群眾，和那些有意散佈錯誤路線的人士之間的分歧，是要使鬥爭走向勝利與企圖將鬥爭引進死角

的兩條路線上的分歧。」在提出「路線鬥爭」的同時，文章還提出了「反動派及其在左翼內部的代理人」這樣一個同樣充滿文革色彩的概念，為黨內鬥爭「上綱上線」創造條件。

進入1967年，對左派內部的這種不同意見的清算進一步以文革的方式和中共黨內鬥爭的方式出現。例如1967年5月7日陣線報報導了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五一」大遊行，說「今年的『五一』是在左翼勝利地批倒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掃除了敵人代理人、黑幫分子、牛鬼蛇神的情況下到來和過去的」。8月20日陣線報發表社陣和縫業(縫紉行業左翼工會)聯合聲明，「嚴厲譴責一切牛鬼蛇神，和謝啟英這一小撮反工會、反黨、反左翼、反人民的反左翼分子劃清界限，堅決地暴露他們，孤立他們，打擊他們，把他們掃出左翼隊伍……我們呼籲一些被誤導的工友和幹事，認真研究事實，分清是非，堅決與謝啟英等反左翼分子劃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一邊來！」這是左派陣營內部第一次比較重要的分裂，發生於社陣和縫業工會前領導之間。同一天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左派緊密相連的馬來西亞勞工黨左派宣佈「造反」，召開「柔佛反右支聯革命幹部抵制右傾當權派召開之『代表大會』」，譴責「黨內右傾頑固當權派」推行一條「沒有魏利煌的魏利煌右傾機會主義反革命路線」，「扼殺、抵制真正的左翼群眾鬥爭路線」，敵視星島(新加坡)的左派社陣。9月，社陣「黨中央」發表聲明開除三個「三反分子」，因為他們一直拒絕在黨中央的聲明上簽字。開除聲明說「今天任何左翼組織和左翼幹部都必須明確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誰都不能藉口說什麼『還沒有一個正確的結論』，什麼『對問題還不清楚，不能表明態度』來掩蓋自己的反黨、反左翼、支持敵人的反革命陰謀的真面目」。聲明甚至把不願簽名的三人之「罪狀」一一列舉，很多其實不過是私下的交談和雞毛蒜皮的小事。

1968年，中國文革中的派性內鬥對新加坡社陣的影響更明顯。5月和7月陣線報接連發表〈打倒派性團結對敵〉和〈再論「打倒派性團結對敵」〉的文章，批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派性」，點了一批「鑽進左翼內部的陰險敵人」的名，呼籲「所有受一小撮所謂『華中領導』、『文序』、『光睦黑幫分子』、『金銀業領導』、『茶餐領導』等黑領導所誤導的幹部、同學、工友，猛醒過來，不要被敵人扭轉了革命鬥爭的大方向。」10月3日的「黨訊」（社陣的另一出版物，月刊）發表長篇文章，揭批社陣裕廊支部（社陣的一個主要支部）內以王理誼為代表的「別有居心的陰險人物，打著最『紅』最『左』的旗幟，向黨展開倡狂的進攻和破壞」，企圖以顛覆一些支部開始，最終篡黨奪權。有意思的是，王理誼向社陣黨中央造反的具體行動之一，就是在社陣洛陽支部建立「革命委員會」，宣佈奪權，和上海一月風暴向走資派奪權如出一轍。在社陣總結粉碎「王理誼反黨集團」鬥爭勝利的經驗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政治串連」，從5月到7月，各支部展開大串連，交流和反黨分子做鬥爭的經驗，揭露他們的真面目，加強革命派的相互瞭解和聯絡。這和文革時期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大串連非常類似，連用詞都雷同。但實際上，究竟王理誼有什麼具體的「反黨」罪行呢？說來可笑的是，事情的起因不過是黨辦幼稚園的教師續聘問題。主管幼稚園的黨執委會要換教師，部分黨員和家長不同意，「反黨分子」於是散發「告家長書」，主張將現有教師延聘三個月，結果出現一個班級有兩個教師（新一舊）在課堂上爭奪學生的情況。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說，這個爭執本來純粹是茶杯裏的風波，但在當時社陣黨內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就使得兩派矛盾借機上綱上線，成了「路線鬥爭」。

新加坡左派最主要的分裂發生於1969年以後，主要原因是社陣領導李紹祖提出「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口號。自1965年獨立後到1969

年，新加坡政府通過發展經濟和加強國際聯繫基本確立了合法性，新加坡作為新獨立的國家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左派領導的「不承認主義」在普通民眾和一般左派群眾中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為了擺脫政治困境，1969年6月社會主義陣線黨主席李紹祖發表長篇文告，提出「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口號，並引用毛澤東「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的語錄來為自己撐腰，用中國大陸和台灣要統一，南北越、南北朝鮮也要統一來相比，號召新加坡的左派和馬來西亞的左派一起為重歸統一而「鬥爭」。和「不承認主義」相比，這個口號同樣不具政治現實感和不切實際，只能視為社陣領導在失去合法鬥爭的途徑之後又面臨失去群眾支持時仍想在毛主義框架下尋找出路的窮途末路之舉。但和社陣以往推翻這個打倒那個空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高亢的革命口號相比，這個方針要低調一些，重新設定政治目標，以民族統一取代政權更迭，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社陣領導人對1966年以來盲目追隨中國文革的反思。但這個口號在社陣內部立即遭到非議，一些人起來造反，視李為反動的當權派，發表「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不容歪曲」的文章，說這個口號迴避了最重要的政權問題，不談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儘管新加坡左派從來沒有拿起過槍桿子，一直都是在口頭上談武裝鬥爭），取消了敵我之分，是修正主義。這種批判立刻被李紹祖在9月份舉行的「全黨性主講會」（即宣講其新路線的黨員幹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講予以駁斥。李在講話中每當提到那篇文章時，都用「那株毒草」代之。11月社陣召開第三屆黨代會，李紹祖說「重新統一」方針已經引起「黨內一場大論戰，一場激烈和尖銳的思想鬥爭」。他搬出毛澤東「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語錄，放在陣線報頭版頭條，強調他的路線不是堅持僵硬的教條，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李還警告說敵人「希望我們的代表大會破

產。而反黨分子、牛鬼蛇神更希望這次代表大會可以推翻黨中央，產生一個推行錯誤路線的新黨中央。

但是李紹祖顯然缺乏毛的權威，一些堅持極左路線的社陣成員繼續反對中央，具體行動之一是拒絕售賣黨報(當時社陣有兩份刊物，即陣線報和黨訊，售價分別為 15 分和 10 分，不但是黨的喉舌而且是經費的來源之一)。不久社陣屬下 6 個重要支部集體造反，向中央呈遞「意見書」，指責中央要爭取的是「敵人安排下的統一」，灌輸一個「反動的國家意識」，「處處強調合法地位」(注：社陣和人民黨等在新加坡一直都是合法政黨，只要它們在口頭上而不是行動上拿起武器推翻政府，李光耀的政府就不取締它們)，跑上了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道路。意見書說「我們黨雖然是一個合法組織的政黨，我們黨雖然沒有武裝力量，不能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但這並不能也不應捨棄我們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等偉大真理作為我們鬥爭的原則和奮鬥目標。」這樣，黨內的當權派和造反派打起了毛澤東語錄戰，爭相搬出「最高指示」以示自己是真正的毛派。值得注意的是，在回應黨內這批造反派時，窮于應付的李紹祖第一次打出了反「左」的旗號，說「人民的要求是鬥爭的基礎」，6 支部意見書「忘記了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忘記了只有人民的具體要求，才會掀起具體的鬥爭，所以『意見書』提出了許多不實際的和荒唐的、『左』的論調」。對於新加坡多數人民滿足於獨立後的現實和忙於民生、沒有那種「鬥爭」意識和「革命」要求這個事實，李只能這樣婉轉表示，不然又會被黨內造反派斥為貶低和誣蔑人民。

但左派更嚴重的分裂是社陣和人民黨的內鬥。這兩個黨都標榜

社會主義，親華崇毛。看他們的出版物，就像看一場誰跟文革跟得更緊、誰背毛語錄背得更多、誰罵李光耀罵得更惡毒的比賽。當 1965 年新加坡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主導下宣佈獨立時，兩黨結成統一戰線，向民族政府挑戰。但李紹祖發表為新馬重歸統一而「鬥爭」的路線後，人民黨以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自居，立刻在人民論壇發表一系列文章，指責社陣沒有得到其他左派政黨和組織的同意擅自行動，一評再評、一批再批社陣「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路線，就像中共 60 年代初發表「九評」挑戰蘇共領導地位一樣。1969 年 9 月 15 日人民黨以「部分黨員」的名義發表〈關於馬來亞統一問題的意見提綱〉，以毛澤東語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為大幅標題。10 月 15 日頭版頭條發表題為〈什麼是分裂主義〉的文章，反駁社陣的批評，標題上方是大幅毛語錄「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个重要任務，就是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與此點明社陣已經「變修」。11 月 1 日人民黨中央委員會發表正式聲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社陣的新路線，說「毛澤東主席教導我們」「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為了表示對武裝鬥爭的強調，人民論壇在同一期上還發表了長篇通訊〈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從勝利走向勝利！〉同一期還發表〈二評「馬來亞重歸統一」：在民族鬥爭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強調「革命人民永遠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70 年 1 月 2 日人民論壇發表〈再論關於「爭取馬來亞重新統一」〉的長篇文章，以另一段毛澤東語錄打頭：「不要總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以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麼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文章用質問走資派的口吻說社陣的「重新統一」路線的「要害問題是：到底是人民先取得政權，以實現真統一；還是先爭取『統一』（這是假「統一」）？……我們一直希望社陣領導正面回答這個問



35 期 5-4-1970 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陣線 本期 8 版 10 分 M.C.(P) 135 B.N.

反对机会主义的分裂活动

評《人民論壇》文章：“什麼是分裂主義？”

隨着托派第三任黨員代表大會勝利地召開後，人民黨領導同志進一步擴大左翼陣線，以所謂“左翼的戰鬥團結”，在人民群眾之中製造嚴重的活



37 期 3-1-1970 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陣線 本期 8 版 10 分 M.C.(P) 135 B.N.

一篇分裂主義的文章

評《人民論壇》文章：“什麼是分裂主義？”

社陣刊物光訊發表的和人民論壇的論戰文章。報頭上照例是毛澤東語錄。

題，明確回答這個問題！不要迴避！不要蒙混過關！」

對於人民黨的挑戰，社陣也發表大量文章和李紹祖主席講話，不甘示弱，對人民黨的問題一答再答，對人民黨的指責一駁再駁。1969年12月10日社陣中央委員會發表〈答人民黨中委會的公開文章〉，指出人民黨是在惡化兩黨關係，分裂左派隊

伍。聲明中一段話實際道出了自1966年以來盲目追隨中國文革後新加坡左派所處的政治困境：「表面上看來人民黨領導同志是很革命的樣子，其實是空口說白話。你們到底要人民通過什麼實際內容、什麼鬥爭方式和方法去支援和聲援人民戰爭呢？……這種空洞無物的亂發號召怎麼會真的支持人民戰爭呢？怎麼會促進革命運動呢？」由於人民黨大量引用毛語錄的戰法使得社陣十分被動，社陣聲明詳細引用人民黨文章中毛語錄的出處和人民黨的解釋，反擊說「『歪曲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著作大膽曲解』，不是我們社陣，而是這些反對統一，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來遮蓋自己的右傾機

會主者……他們引用毛主席的講話時，只引用開頭的一段和後段一些，狡猾地漏掉中間的重要的講話，狡猾地把講話的頭尾連接起來，企圖欺騙人們以為所引用的講話是毛主席的完整的一段講話。這是非常卑鄙下流的手法，不是真正左翼人士的作風。」1970年1月31日社陣的「黨訊」發表〈一篇分裂主義的文章〉批人民論壇的「什麼是分裂主義」，指責人民黨領導「歪曲歷史」，自己應該先「照照鏡子」，「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發出「分裂主義的叫囂」等等。

以文革意識形態為背景的這場論戰還頗有意味地表現在社陣被捕人員的出獄問題上。1969年7月李紹祖在社陣內部會議上表示一些被捕人士可以用出國交換出獄(新加坡政府對政治犯允許出國，只要發表悔過書)，只要不對組織造成損害，並說列寧、孫中山等革命領袖也在國外從事革命活動。李的這個意見和過去的立場相比有相當的緩和，也符合人性，很可能和他用重新統一取代奪取政權的新路線有關。這個消息透露後，人民論壇發表題為〈「妥協出國」和「被迫出國」不能相提並論〉的文章，批判李紹祖混淆兩個性質不同的出國。在發表這篇文章時，人民論壇在同一版下面附了一幅漫畫，畫面上一個頭頸上拴著鐵鏈的囚徒匍伏在地，準備在一張「出獄條件」書上簽名；在他的對面另一個人也匍伏在地，對他的出獄翹首以待，這個人留著大背頭，身上寫著一個「劉」字。很明顯，這個「劉」指的是中國的頭號走資派劉少奇，他在文革中的罪名之一就是曾經允許61個系獄的中共高幹在向國民黨簽署悔過書之後出獄。這樣，人民論壇就把李紹祖比作了劉少奇。由於人民黨和社陣當時雖然在爭論，但還沒有徹底決裂，彼此還以「同志」相稱，就如60年代初中共和蘇共那樣，因此，人民論壇的文章並沒有直接說李就是劉，但把這幅漫

人民論壇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號星期三

『妥協而國』和『被迫而國』不能相提並論 · 石齒·

李紹祖同志在七月二十六日社陣中央聯席會議上，批評「《政治條件書》出國沒有建國原則，也不是什麼……在任何一个敵人侵略國家政權的條件下，都有很多同志不可超越的，留在國外進行他們的鬥爭。」然後，他又舉例了馬來西亞城放鬥爭、孫中山、列寧、甘地成仍舊被留在國外進行鬥爭。這種說法，不難理解於社陣內部的問題，而基本及在黨內鬥爭的嚴重問題。

梁樹志上，他也可以說那係價值妥協，而為其目的……是為了鬥？這道理就是「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先生們……「左」立編者？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李紹祖同志也批評了「六大」的錯誤，但也是指留在國內十多年的，對最後革命的成功……「左」在國共，李紹祖同志家鄉地用廣大……梁樹志……



人民論壇刊登的把社陣領導人李紹祖比作劉少奇的政治漫畫，說明文字見上文。

畫和批李的文章放在一起，其含義已經很清楚了。

今天回過頭來看，社陣內部以及社陣和人民黨之間的分裂和內鬥不但表現了毛主義和文革在新加坡左派中的惡劣影響，而且向人們昭示了一個沒有成為現實的歷史可能性：新加坡左派還沒有取得政權時就已經如此熱衷於彼此口誅筆伐，用文字置對手以死地，如果真的「革命」成功，一旦手裏有了「專政工具」，這種「黨內路線鬥爭」又會導致多少人頭落地呢？新加坡這個小島難道不是要被淹沒在血泊中嗎？新加坡左派的分裂和內鬥再次向人們揭示：以毛主義為意識形態的「革命」，例如紅色高棉和秘魯的「光輝道路」和其他許多所謂「鬥爭」的內鬥和濫殺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遺傳中就繼承了毛主義的基因。

結語：追隨毛式文革的代價：新加坡左翼運動的瓦解

如上所述，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盲目追隨中共文革使

得新加坡左翼運動完全喪失起碼的政治現實感，提出的政治綱領和口號和作為新獨立國家的新加坡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局面毫不相干。一個事例是：新加坡一獨立，政府即化大力氣發展政府資助、由居民購買的住宅。這既是為了改善民生，也是為了社會穩定。這個政府組屋運動是左派全力反對的政策之一，其效果適得其反，反而使政府對「居者有其屋」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關係有更清楚的瞭解。1967年10月，新加坡舉辦第二屆亞非國家建屋研討會，以新加坡經驗為樣板。會議最後達成的一致意見是「人人皆自購屋，即不會變共黨」，不但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組屋運動的政治效果，也反映出與會亞非國家對共產黨和左派運動實在不勝其擾（見1967年10月18日南洋商報）。因此，當新加坡民族政府通過系統的經濟和社會建設迅速起建立合法性、一個「新加坡人」的民族認同開始被接受時，左派運動越來越被邊緣化，成為空中樓閣，五花八門的政治口號和爭論如同意識形態的迷宮，甚至連當事人自己都說不清楚這些概念到底有什麼現實意義，彼此之間的根本區別又在哪裏。唯一清楚的是，在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本來很有希望的左派運動被毛主義文革引入了一條死路。

就在新加坡左派運動分崩離析的時候，毛主義的中國給了它最後一擊。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隨後中美發表公報，中共宣佈邀請尼克森訪華。這個今天被稱為中共「偉大外交成就」的交易，其實質是毛挑動的毫無理性的反修鬥爭發展到迫使蘇聯領導考慮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的地步。一旦到了這個地步，毛又恐懼起來，不顧世界反帝領袖的身份，主動邀請帝國主義的頭號惡棍進中南海，做給蘇聯看：我現在有美國做後盾了。毛的國際政策從來

就和他國內政策一樣，一意孤行，出爾反爾，一切以自己的地位和影響為轉移。打倒美帝是為了讓他的思想光芒普照全球；在中南海和美帝頭子握手言歡則是為了擺脫自己造成的困境，至於這個突變會給全世界他的追隨者帶來怎樣的打擊，則完全不是他所關心的。今天很多中國人，新老民族主義者，甚至包括新老左派，津津樂道于毛的「戰略部署」，卻忘記了、或從來就沒有想到過這個「戰略部署」當年是給全世界毛主義的左派當頭狠狠一記悶棍。邀請美國領導人訪華本來無可非議，但正是毛主義和文革所全力推動的要打倒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把這次訪問變成了一個令全球左派不可思議、難以相信、更無法接受的事件，尤其是它發生得如此突然，左派們毫無思想準備。在國際共運歷史上，只有1939年8月斯達林出於對德國軍事力量的恐懼，突然放棄推行了很多年的反法西斯路線和宣傳，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德國於條約簽訂一周後就進攻波蘭，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可以相比。蘇德條約的簽訂在當時給世界左派陣營帶來沉重打擊，導致大批人退出共產黨或左翼組織。30多年後，毛在中南海和基辛格、尼克森的握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的正是相同的後果。

在新加坡，毛澤東和美帝頭子親切握手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使得本來就分崩離析的左派運動雪上加霜，這個局面充分反映在社陣主席李紹祖1971年下半年所發表的幾次「重要講話」中，綜合發表於9月23日的陣線報。李的報告的總題目是〈黨所面臨的危機〉。李承認「黨今天癱瘓的事實是不能掩蓋的思想分歧，組織的鬆散，財政的困難，我們人手的缺乏，士氣低沉，我們黨在群眾中已相當程度上被孤立，而這些困難，這些對我黨不利的情況正日益惡化，越來越難以克服和解決。」這些困難並不

是剛剛產生的，「我們談了兩年，思想還不一致，黨還是不團結，而且在談論的過程中，我們的組織日益鬆懈。」這就是說新加坡左派的危機是在1968年左右就產生了。在分析黨面臨的危機的時候，李紹祖公開承認「造成今天我黨癱瘓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極端『左傾』的思想、口號和言論』。一些『口頭革命派……亂說理論，大談革命，雖然他們明知其高論是辦不來，行不通。這些極端『左』傾人士只能製造黨內混亂，給同志失去信心。』更為諷刺的是，「一些以往大談『鄉村包圍城市』，濫引毛主席語錄的人士，他們今天做的，不是革命工作，而是照顧自己個人的生意和事業！」

那麼，這些極端左傾的思想是哪裏來的呢？李紹祖終於明確說「中國文化大革命大大影響我們黨同志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傳播出來，造成我黨很多同志犯上極端『左』傾的錯誤。一些言論，在中國具體情況下，可能是很正確。但搬到星島和社陣裏，就完全不同了……一些同志一個時期大談什麼『推倒當權派』，『推倒中央』！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我相信大家腦海裏都會清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言論對我黨的影響是不好的。」

對於中共和美帝握手言和給新加坡左派帶來的嚴重衝擊，李承認說：「一些同志因為不同意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的感到心灰意冷。他們失去信心，連一點情緒都沒有。他們甚至以為中國於尼克森搞好關係的話，那麼，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也將完蛋。」

在公開場合，相信李紹祖在當時情況下關於中國和文革所能說的就是這些了。到70年代初才認識到跟著文革走上了死路、毛澤東為了一己私利會毫不顧及千萬崇拜者和追隨者實在太遲。曾

經轟轟烈烈的新加坡左翼運動已經被毛主義葬送。此後，社陣連一個公開解散的日期和場合都沒有，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這當然是李光耀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中共改變外交路線，逐步放棄世界革命，不但和美帝和好，而且「各國反動派」一眨眼也成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李光耀不再是「帝國主義的傀儡」和「反華小丑」，在1975年毛澤東死前第一次成為中南海的坐上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光耀在新加坡代表團中以國會特邀代表的名義安排一個名額給李紹祖，而李也欣然接受，跟著曾經被自己用最惡毒語言詛咒的李光耀前往已經不再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北京。無論李光耀出於何種心理，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這應該說是為一個動盪紛爭的時代劃上了一個句號。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左派運動是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直接影響下展開的，新加坡左派把自己的鬥爭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都看作是整個馬來亞革命的一部分。那麼，對馬來亞革命又該如何評價呢？馬共領導人之一余柱業晚年的反思或可為讀者提供一個角度。余曾經擔任馬共南方局書記，在印尼遙控新加坡的鬥爭，後來前往中國，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新加坡左派傳播的很多有關文革和世界革命的消息和號召就是從他那裏來的。他晚年回顧一生鬥爭，認為馬共反殖的功勞不能抹殺，但是後來幸虧馬共沒有成功。為什麼呢？他說根據他「對馬共幹部的認識，對共產黨組織的認識、對陰暗面、不好一面的認識」，「從歷史的觀點來說，馬共沒有勝利，還算是馬來亞的幸運。萬一馬共成功的把他們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我們會看到像現在柬埔寨的那種局面。」這就是說，馬共的失敗，使馬來亞——新加坡也包括在內——避免了一場像紅色高棉那樣的浩劫。[9]

(說明：本文為作者 2007 年 5 至 8 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作訪問研究的部份成果。在此向該所致謝，同時向很多對本研究提供幫助和意見的同行致謝，尤其是陳劍、黃堅立和楊斌諸位先生。)

【注釋】：

- [1] 馬來亞共產黨和新加坡左翼運動之間的密切關係反映在很多歷史文獻中，最近的可參考《浪尖逐夢——余柱業口述歷史檔案》，為陳劍主編《風雲叢書》第一輯，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06 年；方狀《馬共全權代表方壯壁回憶錄》馬來西亞策略資訊中心 2006 年。
- [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2000 年，第 128-129 頁。
- [3] 陳劍〈意識形態與新馬四十年社會變遷〉(初稿，未刊) 第 4 頁。
- [4] 林清祥〈第一屆社陣代表大會工作報告〉，載〈馬來西亞歷史的另一面〉編輯委員會編《林清祥與他的時代》(社會分析學會與朝花企業聯合出版，吉隆坡 2002 年，下冊，第 149 頁。
- [5] 紅樺《赤道上的人們》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1971 年，第 34-35 頁。
- [6] 林清祥〈右派眼裏的國會民主是什麼？〉，同[4]，第 163 頁。
- [7] 朱成發《紅潮——新華左翼文學的文革潮》(注：「新華」意為「新加坡華文」)，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 2004 年，第 21 頁。本節中另有一些材料來自此書，為節約篇幅不再引出處，特此說明，並向原作者致謝。
- [8]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第 492 頁。
- [9] 余柱業《浪尖逐夢——余柱業口述歷史檔案》，第 262 頁。

第四篇

塑造「新人」：蘇聯、中國和 古巴共產黨革命的比較研究

引言：創造人類進化史上的「新智人」 —— 共產黨革命的最終目的

共產黨革命的終結目標並不只是建立新社會，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個在鬥爭中錘煉出來的、通過思想改造所昇華的、以「無私」為最根本特徵的集體人格，並通過塑造「新人」去創造歷史。共產黨意識形態有一個至今為止沒有受到充分討論的方面，這就是它對舊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對新制度的嚮往和許諾其實是有史以來所謂開天闢地和創世紀神話的現代版。共產黨革命之所以一度有那麼大的號召力，和這種宗教情緒的感召不無關係。1990年，當冷戰結束，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全面瓦解時，丹尼爾·貝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探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知識份子的吸引力。他的文章的題目就直指問題的要害：〈雷蒙·阿隆對抗讓·保羅·薩特：二十世紀之戰〉(The Fight for the 20th Century: Raymond Aron Versus Jean Paul Sartr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90)。雷蒙·阿隆是法國自由主義哲學家，在親共左翼思潮氾濫成災的60-70年代堅持捍衛個人自由和民主制度，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討論為什麼共產主義會成為知識份子的精神鴉片；而薩特則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先是斯大林主義的信徒，後來在斯大林神話破滅後又在毛澤東和卡斯特羅身上寄託了新的信仰。他成為西方左派的旗手，一度吸引了無數青年。貝爾指出，要回答共產主義為什麼一度有那麼大的吸引力，有一個最簡單的答案，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世俗宗教」。

所謂「新人」就是這個創世紀神話的一部分。這裏需要強調的是，這個「新人」不僅僅指人的精神和心理，在共產黨領袖那

裏確實具有人類演化的意義。著名的共產黨人托洛茨基和卡斯特羅都從生物演化的角度談論過共產黨新人在人類發展史上的地位（見下文有關部分）。80年代初蘇聯一本介紹「蘇維埃人」的對外宣傳手冊正式提出「蘇維埃人」是人類演化史上智人（即現代人，Homo sapiens）的一個最高級的分支，從這個角度稱「蘇維埃人」是Homo sovieticus，即人類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種。它說從細胞演化到智人經歷了數百萬年的時間，但「蘇維埃人」的產生僅僅用了60年的時間。當然，這個最新最高級的人類新種並不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是共產黨政權的創造。這個宣佈當時在世界上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今天當人們再談論這個Homo sovieticus時，往往把它看成是一個笑談，而忽視了通過這個如此自命不凡的抱負，其實可以看到共產黨革命的最本質、最具有誘惑力、也是最危險最可怕最非人道的方面。

筆者的這項研究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出發，以30年代的蘇聯和60、70年代的中國和古巴為對象，企圖揭示這項以徹底改造人性為目的的社會工程的一些共同點。共產黨塑造人性的理論基礎是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這種對人性的認識直接來自於歐洲思想傳統：啟蒙運動、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和俄國激進知識份子改造社會和人性的嘗試。在一定意義上基督教對人性的認識和改造人性的努力和共產黨的理論也有相似性。在實踐上，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統治是第一次用國家權力重塑人性的嘗試，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的烏托邦公社則是在較小範圍內的實踐。

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掌權是歷史上第一次由國家政權推行的、持續了數十年的「新人」工程，其結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蘇維埃人」。然而，到了1950年代，當蘇聯社會經歷了後斯大

林時代經濟和社會轉變時，「蘇維埃人」的一些本質特徵被弱化和淡化。

在1960年代，一個更加激進和徹底的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成了中國和古巴共產黨政權的基本任務。毛澤東和卡斯特羅以及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這種信念，經濟建設的需要和「蘇維埃人」蛻化的教訓也使得「新人」問題在這兩個國家變得更加突出。和「蘇維埃人」相比，中國和古巴式的「新人」(在中國可以概括為「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在古巴則是「讓他們都成為像『切』(即格瓦拉)那樣的人)強調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戰鬥精神、永不腐蝕和用精神力量創造物質奇跡。在這兩個國家，塑造「新人」的頂峰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和古巴的「革命攻勢」(1968-1970)。

共產黨塑造人性的社會工程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同情性的反響。西方社會那些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消費社會腐蝕人性、使人生失去意義的知識份子，對共產黨塑造「新人」的工程創造出一個不同於西方類型的「人」滿懷希望；基督教會第一次在一個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中發現了和基督教倫理相似的內容；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則把「新人」的無私奉獻看成是經濟建設和民族復興的捷徑。

(一) 人的可塑性：從啟蒙運動到俄國「新人」

在近代歷史上，重塑人性的想法直接來自於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重點是關於人的科學，即對人性的研究，人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和社會是怎樣互動的。大多數啟蒙運動思想家對人性的看法是唯物主義的，也就是說人性由環境塑造並直接對

環境做出反映，此即「環境決定論」，例如洛克曾經用「白板」來形容人性的可塑性。法國哲學家、百科全書派的重要代表和現代教育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愛爾維修提出了環境決定行為的理論，把人的心智和道德能力歸咎於外在的影響，尤其是教育。愛爾維修主張，為了公共利益，大眾教育必須制度化並由國家主導。但從政治角度出發直接提出改造人性的啟蒙思想家是盧梭，他把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精英的責任。盧梭說：「勇於承擔重塑大眾的人應該覺得他有能力去改變人性……。用社會的和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們從自然那裏獲得的個人的和物質性的存在。[1]」

歷史上第一個試圖用國家權力改變人性的政權是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專政。羅伯斯比爾是一個「揮舞著大棒灌輸美德的教師」。羅伯斯比爾塑造「好公民」的努力典型地表現在他對由國家實行的公共教育的無微不至的熱忱上。根據他的方案，從5歲起，所有男女兒童都必須離開父母，和家庭相隔絕，住進國家舉辦的住宿學校，接受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在雅各賓專政下，為了培養「好公民」，歷史積澱下來的和宗教的道德觀念被國家所倡導的基於意識形態的倫理規範所取代，各種政治儀式和革命節慶(例如每天清晨聚在一起唱馬賽曲，頻繁的遊行集會和紀念活動)培養了新政權下的公民意識。

20世紀共產黨政權繼承了以上觀念和實踐。愛爾維修一直被稱為是分析人類心靈的偉大的唯物主義者，盧梭是馬克思以前最偉大的革命家，而雅各賓政權則被布爾什維克引為自己的先驅。

基督教會也有過類似於共產黨政權改造人性的實踐。加爾文16世紀時在日內瓦建立的新教共和國人們耳熟能詳。同一時期天主教會在中南美洲的宗教烏托邦則是另一個範例。當時羅馬教皇

屬下的多米尼各、法蘭西斯和耶穌會把美洲土著居民看成是塑造理想的基督徒的材料，認為他們遠離歐洲文明，單純樸素，同時又有足夠的領悟和真誠去接受上帝。很多教士在美洲建立了用基督教義改造土著居民的公社，他們拒絕西班牙殖民當局對土著居民的迫害和剝削，甚至用火器武裝土著居民，在這樣的公社裏人們過著集體勞動共同消費的生活，以道德純化和精神超越作為公社生活的目的。

馬克思的影響對共產黨改造人性的理論和實踐是最直接的。這種影響主要在於對人性的認識。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影響下，馬克思的人性論也是唯物主義的環境決定論。馬克思認為，並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存在決定意識；人們的社會存在反映了他們的社會階級關係，而社會階級關係是隨著歷史的演化而變化的，因此人性就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如他所說：「所有的歷史不過是人性不斷轉變的歷史。」例如，對資本的貪婪並不是人類的本性，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將來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會環境。除了這些基本原則，馬克思也對未來的社會如何改造人性提出過一些具體設想，特別是在教育方面。馬克思主張，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教育不但應該由國家主導，兒童應該生活在集體之中，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兒童甚至應該用他們的勞動所得支付一部分教育和生活費用。馬克思雖然批判早期資本主義濫用童工的惡行，但根據他的觀察，在英國1830年代的《工廠法》實施之後，工人家庭的兒童有了半天做工半天學習的機會，他們比那些全日制學習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兒童更活躍，學習上進步更快，因此他主張勞動和學習

要在兒童早期教育中就融為一體。馬克思的這個主張後來一直是共產黨國家教育革命的一個基本點。

俄國 19 世紀下半期的激進知識份子對「新人」概念的產生有很大的影響。在思想上，俄國激進民粹主義知識份子啟蒙運動在俄國的產物，他們繼承了啟蒙運動唯物主義一元論的世界觀，把人看成為由社會的物質的材料所造成的，也是可以從物質的社會的方面加以改造的。車爾尼雪夫斯基 1861 年的小說《怎麼辦？》第一次提出了「新人」這個概念，並描繪了其基本特徵。小說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一個全心全意投身於社會改造的革命家。為了瞭解社會，他用雙腳走遍俄羅斯，和繃夫一起背織，和伐木工一起砍樹。為了培養堅定的意志和強健的體魄，他喝濃咖啡，堅持數日不睡，或者躺在佈滿鐵釘的床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對俄國年輕知識份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實行革命暴力和恐怖行動的彼得扎切涅夫斯基到謝爾蓋涅察也夫，到「走向民間」的



尼考萊·加夫里洛維奇·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

民粹派知識份子再到列寧都是如此。列寧甚至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對他年輕時期的影響不但超過了馬克思，而且使他終身受益。[2]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發表 40 年後，列寧用同一個題目發表了一個小冊子，成了布爾什維主義的經典。列寧發表這個小冊子是出於極端迫切的政治需要：克服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經濟主義」傾向。這種「經濟主義」已經使工人

對政治鬥爭不感興趣，只滿足於提高工資、削減工時和改善福利這些物質要求。列寧指出，工人階級不會自發地產生或接受革命思想，因此革命的意識形態必須從外部由先進分子灌輸進去，而這些先進分子就是嚴密組織起來的高度集權的共產黨。從對人的改造方面來說，這就是用「自覺性」取代「自發性」，用階級覺悟取代個人意識。1905到1908年，俄國爆發了一場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民主革命，俄國工人在一些城市組織了「蘇維埃」，登上了歷史舞台。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和俄國社會主義者關係密切的高爾基在1907年發表了長篇小說《母親》，描繪了一個目不識丁的工人家庭主婦如何轉變為一個自覺的革命戰士。這本小說成了後來世界「無產階級文學」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濫觴，就是因為它提出了黨文學的基本任務：為塑造「新人」服務。列寧認為《母親》的問世十分及時，他不但向黨的幹部推薦這本書，而且于同年邀請高爾基參加在英國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大會。

(二) 「蘇維埃人」：第一個由國家機器塑造的人

1917年的「十月革命」為布爾什維克在國家範圍內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創造了條件。托洛茨基的一段話說明，這種改造將不限於列寧所說的用自覺性取代自發性，用階級覺悟取代個人意識，而是將深入到人作為生物有機體的一面。他說：「他(指「新人」)將先控制他生理機制中的半意識，然後是下意識，例如呼吸，血液循環，消化，新陳代謝，接下來將在一定限度內使得這些機制完全服從理性和意志的操縱。甚至純粹的生理生活也將成為集體實驗的對象。[3]」其他蘇維埃領導人則

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斯大林的表達方式直觀形像，影響了蘇聯革命後的語言。例如：「我們共產黨人是特殊的類型。我們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又如他把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教師、文藝創作者都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很著名的一個比喻是在 1945 年慶祝衛國戰爭勝利的宴會上的祝酒辭：「我為那些簡單、樸實而謙遜的人乾杯！他們是運轉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機器上的齒輪。」斯大林並不是第一個把人比作齒輪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早就有過這樣的比喻，但康德強調的是人作為社會組織的一部分的自我意識，而不是無條件的服從和貢獻。在蘇聯領導人中後來回歸到一定的人道主義立場的布哈林也說，革命的目標是要「改變人的實際的心理」，「科學計劃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為造就『新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做系統的準備。」

俄國當時有一個著名生理學家叫巴甫洛夫，他通過長期對狗進行餵食實驗發現，如果你重複給予動物特定的信號，而這個信號又和一定的物質條件或環境同時發生，經過一定量的重複，動物的神經系統會自動地把這個信號的出現和相應的物質條件或環境相聯繫，從而自動地作出對那種環境的反應。這就叫條件反射。巴甫洛夫為此在 1904 年得到了諾貝爾獎。巴甫洛夫的理論無意中給了布爾什維克領袖以重大的啟發：環境可以改變人的生理和心理，創造出新的反應機制。通過重複的灌輸和指令，人的大腦會對一定的術語和名詞產生條件反射，自動地做出和灌輸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應。這真是太美妙了！因此列寧說巴氏的發現「對全世界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義」。列寧對高級知識份子一向十分鄙視，當高爾基寫信給他為大量被捕的高級知識份子和科學家求情，說人民的大腦正在被摧毀時，列寧回信說這些

人不是人民的大腦，而是糞便。當大多數科學家和學者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下忍饑挨餓時，巴甫洛夫的實驗室卻能根據列寧下的一道命令每個月從布爾什維克政府那裏得到不薄的補助。到了斯大林時期，蘇聯成立了「巴甫洛夫陣線」和「科學家巴甫洛夫的生理學理論問題委員會」，斯大林對這些組織的工作發佈過很多指示。蘇聯時期對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研究作了極大的投資，然而卻宣佈強調人的先天因素的遺傳學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使得遺傳學在蘇聯的研究大大落後於西方，甚至影響到其他共產黨國家。例如中國在50年代上半期就有過圍繞遺傳學的爭論。這一襲一貶並非偶然，而是和蘇維埃政權對人性的認識和以重塑人性為最終使命有密切關聯，在中國更是和形形色色的思想改造運動遙遙相對。

為了塑造「新人」，布爾什維克運用了各種手段。為了把兒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長完全置於黨的控制之下，他們成立了「小十月人」（五到十歲的兒童）、少先隊（11到16歲）和共青團（16歲以上），每一個年齡段都由相應的政治組織所控制，各個組織之間又相互銜接；同時開始了把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政治活動與兒童早期教育相結合的實踐。蘇聯著名教育家馬卡連科為流浪兒童建立起再教育營，用完全軍事化的方式進行管理，從組織、學習、遊戲、鍛煉、日常起居、服裝鞋帽到生活用語完全照般軍營方式。馬卡連科甚至說這種軍事化的生活為兒童培養起了一種集體的美感。

蘇聯的少年兒童必須像成年人一樣參加政治運動和所謂階級鬥爭。例如30年代早期斯大林推行農業集體化時遇到農民的頑固抗拒，因此農村的少年兒童通過學校和上述政治組織被動員起來反對成年人，出現了很多所謂榜樣和典範，有的甚至據說被「反

革命」殺害。最有名的是一個叫莫洛佐夫的 13 歲少年，官方宣傳說他和反革命的父母作鬥爭，向政府告發他父親的言論以及和反集體化的匪幫相勾結的罪行，結果被家人害死。對莫洛佐夫家人的審判一度成了蘇聯報刊的頭條新聞。後來這個少年的照片掛在了全蘇聯每個學校的教室，每個少年兒童都要向他學習。但到了 90 年代蘇聯瓦解後，隨著歷史檔案的解密，莫洛佐夫案的真相逐步披露出來，和蘇聯官方原來宣傳的大不一樣。莫洛佐夫反父母，但不一定是被父母所害，有的材料猜測他是捲入少年犯罪團夥而被害的。不管真相如何，蘇聯當局當時成功地利用了這個案例達到了教育兒童的政治目的。在中國，少年英雄劉文學的故事在 60 年代廣為流傳，這個小學生因為阻止一個前富農偷竊公社田裏的幾個辣椒而被害，成了全國少年兒童的榜樣，其照片掛滿各地的學校。這個故事典型地反映了大躍進後農村饑荒的慘狀和少年兒童被思想灌輸的徹底，為了幾個公社的辣椒可以犧牲生命，或者在官方的宣傳中「集體的」辣椒重於個人的生命。而歷史的悲劇就在於正是這個少年用生命去捍衛的公社是造成千萬人被餓死的、人們餓極跳牆，為

了幾個辣椒可以殺人的大饑荒的罪魁禍首。

蘇聯官方還用文學藝術的形式大力宣傳「蘇維埃新人」的榜樣和模範，其典型形像之一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筆下的保爾柯察金。奧斯特洛夫斯基少年時就加入紅軍，受傷致



這是蘇聯 60 年代一張以奧斯特洛夫斯基為題材的紀念郵票。

殘，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本自傳性的小說，用自己獻身革命並在革命中鍛煉成長的經歷教育青年，作為對黨的最後奉獻。書的題目《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形像地表現了革命對人性的改造。

這本書後來作為革命文學的經典，在其他共產黨國家和左翼運動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特羅1953年發動武裝起義失敗後被關押期間在監獄中為追隨者組織了政治學習，在書單上就有這本書。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人陳平在上高中時讀過這本書的片段，幫助他產生了革命信念，帶著它參加了革命。他後來當上黨的領導人之後再讀這本書的全本，體會更深。在中國，這本書的中譯片段最初是根據日文本翻譯的，在30年代下半期出版，不但在中國、也在東南亞華人中產生了影響。1942年中共文化幹部梅益根據英文本將它譯為中文。根據俄文原版翻譯的中文本出現于50年代初，是集體翻譯的產物。中共當時有一個叫吳運鐸的模範，因為長期從事軍工生產而負傷致殘，他纏綿于病榻上時寫了一本《把一切獻給黨》，被稱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一直到90年代末，這本書還能給左派文人和相當一部分5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帶來懷舊感，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部電視連續劇。但50年代中文版的主要翻譯者之一姜長斌發表文章，對這股「鋼鐵熱」進行批評。他不但指出保爾所獻身的「世界革命」的虛妄，而且告訴中國讀者：保爾所鎮壓的所謂烏克蘭反革命，歷史上卻是烏克蘭反抗俄羅斯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民族英雄，他們被當年的蘇聯帝國所醜化和強迫遺忘，但卻被今天的烏克蘭人民所懷念。在這個意義上，保爾在無意識中成了大俄羅斯帝國主義的走卒，在烏克蘭人民看來正好是打手和反革命。歷史諷刺的辛辣莫過於此。

蘇聯官方版本的「蘇維埃新人」體現了共產主義「新人」的

一些普遍特徵，其最主要的是，人作為個體的一面(個人意識、個人動機、個人利益、個人觀點以及個人行動的自發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集體的「人」和黨的「人」。雖然每一個人成為「新人」的途徑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體性而沒有個性，因此「新人」的誕生也就是個性的死亡。20、30



蘇聯時期的宣傳畫，表現斯大林和他培養的蘇維埃新人。

年代的蘇維埃文化讚美的「新人」通常都沒有個人的面貌，只有整體的品質，像鋼鐵一樣堅強，像機器一樣整齊而有效率。在近代歷史上，「蘇維埃新人」標誌著社會心理學家所定義的「大眾人」的產生。這個「大眾人」既是19世紀機器時代的產物，也是20世紀形形色色的強調整體性反對個性的意識形態廣泛傳播的結果。

到了30年代，為了實現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迅速工業化成為蘇共的首要目標。為此開始採用個人利益和物質刺激作為經濟發展的杠杆，工

業中普遍採用計件工資制，超額完成任務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不但得到高工資和獎金，而且有住房、假期和保健方面的優惠，可以有特殊配給並在特殊商店購買。學歷、經驗和年資也受到更

多的重視，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的地位也相應提高了，國家建立了嚴格的官僚等級制，如軍隊的軍階制。30年代以後，各個方面的模範已經不再僅僅意味著奉獻，在更大的程度上還意味著各種形式的獎勵。所有這些變化都使得「蘇維埃新人」的特徵超出了單純的階級覺悟和革命精神，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工業社會在技術和管理上對人的要求，而且在一個平均主義社會中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這種變化可以稱為共產黨體制下的「新傳統主義」，即用建立在個人利益基礎上的對統治集團的個人依附來維持政權，而不是像官方意識形態所宣傳的那樣用理想主義和階級覺悟。正是這種變化使得托洛茨基把斯大林體制視為對革命的背叛，因為在這個制度下「有人一個月掙一百盧布，有人則是八百甚至一千盧布；有人住在像兵營一樣狹窄的房子裏，穿著磨破了的鞋子；有人則坐著豪華的汽車出入於高級公寓 [41]」。

隨著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和整個蘇聯社會的城市化和現代化，在30年代開始的這種社會分化到了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上半期更為顯著，並開始反映在以經濟改革理論為代表的新意識形態上。60年代初經濟學家利普曼發起的關於獨立核算、個人利益和市場機制的討論就是一個例子。利普曼1962年9月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計劃、利潤和獎金〉的文章發起了討論。持改革意見的人包括知識份子、管理人員和思想開明的黨政幹部。這場討論波及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東歐多數國家反應比較積極，而在中國和古巴為代表的少數共產黨國家則遭到了抵制，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變修」的標誌。這場討論當時被一些西方社會主義者稱為「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冷戰」。由這場討論所引發的意識形態鬆動最終導致

了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知識份子和人民反抗極權統治的「布拉格之春」。

蘇聯社會的這種變化也反映在文學藝術上。60年代初出現了和傳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相背離的模仿西方先鋒派藝術的作品。詩人葉夫圖申科宣稱「我的職業就是我想無所事事」，這和過去蘇維埃文藝中的「新人」全心全意有目的地塑造自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下半期在蘇聯掌握權力的黨內改革派，正是在60年代初的政治和文化氣氛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還在50年代末，蘇聯青年中就出現了意識和心理意義上的反叛，表現在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新人」集體性的拒絕。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女兒斯維特蘭娜的叛逃可以說具有象徵性。從表面上看，斯維特蘭娜生在新社會，長在革命之家，經歷了培養「蘇維埃新人」的各個階段，應該體現「新婦女」的品德。但她遭受了父親的專制和暴虐，目睹了蘇維埃政治精英階層的黑暗面，產生了以個人意識為基礎的反叛思想。她的戀愛和婚姻橫遭斯大林的干預，使她進一步對蘇聯體制產生背離感。1966年利用去新德里安排其印度籍丈夫葬禮的機會，她進入美國使館尋求庇護，到美國後出版了《僅僅一年》和《致友人的20封信》，大暴蘇聯官方的黑幕和個人的對體制的絕望。

但是不管社會現實如何，蘇聯官方從來沒有放棄「新人」的目標，至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上是如此。1961年4月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載人飛船，震動了世界。在蘇聯官方的宣傳中，宇航員尤裏加加林「不僅是一個外太空的征服者，不僅是科學和技術的英雄，而且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真正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新人，一個體現了列寧的黨創造了數十年的蘇維埃特徵的新人」。

(三)「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共產黨中國塑造「新人」的實驗

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淵遠流長。它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自我修養，儒家思想中的仁和禮都是通過自我反思和改造所達到的道德境界；二是強調道德榜樣在轉變人性中的作用，如「君子」——儒家理想中的道德聖人——是全社會、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官紳階級的榜樣。培育德行、成為君子的主要方法是從思想入手，研讀先聖、亞聖的著述和其他儒家經典，直到融化在自己思想中，以體現在這些經典中的大道來克服自己內心的小我。儒家思想中也有用強迫的方法來改造人性的因素，例如有一定法家思想的荀子曾把未經改造的人性比作未經修整的木料，不但要用斧鉞，也要用高溫來把它塑成理想的形狀。

在近代史上重塑人性又和民族主義的訴求聯繫在一起。在德國和日本從弱國變為強國的歷程中，中國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看到富國強兵需要有民族精神的復興和民族特性的改造，因此「人」的問題應該和「國」或「族」的問題相提並論。黑格爾和康德關於理想人格和健康民族之間的聯繫，尼采的「超人」，以及日本明治維新思想家福澤諭吉改造日本民族性的思想，都啟發過中國知識份子。1920年以前，梁啟超的「新民」和陳獨秀的「新青年」不但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自我期許(儘管不同的人對「新」有不同的解釋，但在改造人性克服自我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而且與國家民族的前途聯繫在一起。此外「新婦女」也成了這一時期「新人」話語的一部分。毛澤東本人早在1917年就認為精神改造是民族復興的首要條件，並把德國的強盛歸功於黑格爾和康德——

——德意志民族的最高精神——的哲學薰陶。毛在這一時期提出一個「宇宙真理」的模糊概念，並把人分為聖人、賢人和庸眾，前兩者賦有教化和改造後者的責任。毛澤東在湖南組織的「新民學會」就是從思想到行動的一個例子。毛的這種由精英啟蒙和改造大眾，把他們轉變為「新人」的思想並不是孤立的。「新民學會」的成員常常在鄉間步行瞭解社會，餐風露宿，洗冷水澡等等以培養意志和體魄，這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以承擔歷史使命自居的「新人」如出一轍。李大釗還曾號召中國青年向俄國民粹知識份子學習，「到民眾中去」成了「五四」運動後期青年知識份子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除了《新青年》和「新民學會」，還有「少年中國學會」、「少年學會」、「青年學會」和「新人社」等等全國或地方性組織，這些名稱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培養新人類的願望。

但隨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一部分「五四」知識份子成為政黨領袖，「新人」的概念由內涵寬泛的用改造國民性達到改造民族性，轉變為用黨文化改造人性、建立高度集權絕對服從的組織，為共產黨奪取政權服務。完成這一轉變的是中共40年代的「延安整風」。共產黨革命本身就是對人性的改造，但延安時期是中共第一次在相對安定和封閉的條件下，全黨在精心組織下通過一系列運動和組織措施對黨的成員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這和一般意義上入黨就需要接受黨的教條、服從黨的紀律和對黨效忠的政治和組織要求是不一樣的。就黨的組織對其成員的控制來說，中共和大多數共產黨的區別就在於，通過「延安整風」中共對個人的思想、心理甚至個性的控制，達到了其他共產黨從未達到過的嚴密程度，這一傳統至今仍是中共維持統治黨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共黨的領袖毛澤東和負責組織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等，都相

信環境決定論並由此發展出思想改造這一中共特色的塑造「新人」的手段，由集中強化學習文件、向黨交心和坦白個人歷史、自我解剖和批判、用體力勞動來觸及思想等等組成。這種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讓個人有獲得「新生」的感覺，並把自己完全等同於黨的工具。關於思想改造，胡平的《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1999)已經作了充分徹底的分析，而「延安整風」作為思想改造的範型，已由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了透徹的解剖，筆者不作贅述。

中共 1949 年奪取全國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一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但隨著毛澤東和蘇聯模式的決裂以及中國在蘇聯「變修」中吸取的教訓，中國式的「新人」在「大躍進」和「文革」之間開始成型。60 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出來，其事蹟充斥報刊、電台、電影、舞台和文學讀物，成了這一時期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32111 英雄鑽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大慶油田在 60 年代初開發，意圖是中國實現能源自給、擺脫對蘇聯石油的依賴。按照官方的宣傳，王進喜的模範作用首先在於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破除對「資產階級技術權威」和「外國教科書」的迷信，戰勝被認為是不可克服的自然障礙和技術困難，創造出人間奇跡。他的個人犧牲精神(例如在井噴事故時跳入水泥攪拌池用身體代替水泥攪拌機)則是「新人」品質在新的技術和物質條件下的發展，他的「鐵人」稱號由此而來。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

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的模範。大寨的自然地理條件十分惡劣，但陳永貴帶領農民戰天鬥地，建造梯田水庫和灌溉渠道，不但解決了糧食問題，而且徹底改造了農民的思想，把農民從個體小農變成人民公社社員，從而解決了被馬克思看成是落後和反動的階級、被列寧認為是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也被毛澤東稱為是「嚴重的問題」的小農階級問題。

然而，最能在集體意義上體現「新人」的是軍隊。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具有多種意義。用軍事化手段把大眾動員和資源集中推到極端來從事經濟和其他工作，所謂的「會戰」就是軍事化手段之一——大慶和大寨以及幾乎所有經濟和科研成果都是「會戰」的成就。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也是軍事化手段的運用。就「新人」的個人典範來說，軍隊在60年代上半期為全國人民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麥賢得、蔡永祥、門合等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從「延安整風」開始，中國式的「新人」除了共產主義「新人」的普遍特徵(如政治忠誠和獻身精神)以外，強調的是「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絕來達到徹底否定「小我」(即個人存在)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大多數「新人」的典範在思想和知識上對傳統文化並無多少瞭解，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如高華指出的，這和儒家的「內省」和「修身」有一致之處，只不過是把這種傳統推到極端。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鬥私字一閃念」。被稱為「毛主席的好工人」的尉鳳英曾經說，

她是個小姑娘時也愛美，化很多時間梳頭，因為沒有任何洗髮液，就用榆樹皮浸過的水洗髮。雖然她出生于工人家庭，但這些表現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她在工廠的班組長教育她說：「今天你要榆樹皮浸的水，明天你還會要什麼？」尉鳳英後來成為摒棄自我的榜樣。她和男朋友談戀愛的4年中只看過半場電影（看到一半便回到工廠工作），懷孕後為了如常工作到最後，她用大衣把肚子裹起來不讓同事發現。

和塑造新人有密切關係的，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當然這並不否認在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從環境決定論的角度出發，下放是徹底改變人的生存環境，讓人脫離城市生活、在艱苦環境下改造摒世界觀的最極端措施。在人類歷史上，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象徵，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被各種宗教和烏托邦思想視為腐敗奢侈淫亂墮落的淵源，所謂「巴比倫」就是用兩河流域最繁榮的城市來象徵人類道德的墮落。但只有在共產黨制度下，這種對城市的批判和拒絕才一度成為體制性的目的。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一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一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席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在這個意義上，胡平「比賽革命的革命」是最精闢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式的用「觸及靈魂」來達到完全的脫胎換骨、和「舊我」告別並非僅此一家。越南共產黨照搬中共的思想改造模式來對付知識份子，達到了同樣的效果。有一個叫陳德草的著名哲學家，曾在法國留學和工作，對現象學的研究

究達到了很高水準。他在這方面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哲學界重要的參考書。他受民族主義思想的感召於40年代末回國，自覺接受思想改造。為了表示對自己沒有參加艱苦鬥爭的慚愧和懲罰，他不用蚊帳睡在叢林裏，故意讓蚊子叮咬，結果染上了瘧疾，而這是很多老遊擊隊員都曾經患過的疾病，很多人留下了後遺症。這位哲學家就用這種方式表示自己補上這一課。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援朝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份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和「延安整風」時一樣，大量的知識份子和幹部出於各種原因死於非命。馬來西亞共產黨在馬泰邊境建立起來的根據地中也發起過類似的思想改造運動，當時根據地的中心叫勿洞，人稱「小延安」。凡是有城市和知識份子背景的革命者都要接受再教育。有一個從新加坡出來的女性因為原來生活在城市裏、受過中等教育便被叫做「臭老九」，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她負責養雞場的工作，被要求用手直接清理雞糞，而不是用工具或者帶手套，直到她得了皮膚病；當她建議每天早晨倒掉集體宿舍中隔夜的便桶時也受到批判，因為農民不倒，而是積滿後再拿出去作肥料。[5]

共產黨的「新人」都有領袖崇拜情結，都從這種崇拜中找到心理歸宿、吸取精神力量。領袖崇拜從根源上說是共產黨革命所刻意造成的個人虛弱和個性泯滅的結果，因此個人需要與超越時空的一個絕對存在發生聯繫、從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義和力量。中共的「新人」把領袖崇拜發展到了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所不能的地步，近乎神跡。毛澤東思想在「新人」的思想改造和階級鬥爭中甚至被稱為「照妖鏡」，這就和巫術沒有分別了。

(四) 「把他們都變成切那樣的人」

——古巴塑造「新人」的實踐

和中國一樣，「新人」的概念在古巴可以追述到民族主義歷史中。

古巴民族主義領袖何塞·馬蒂一方面肯定，古巴民族有和其他民族一樣的建立自己獨立國家和發展民族文化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批判了在消極意義上的古巴的民族性，主要是缺乏對本民族的自信(表現在強烈的民族自卑感)，由此導致對政治的冷漠、集體意識的缺乏、古巴人之間的彼此不尊重、以及對體力勞動的蔑視、懶惰、酗酒和無所事事等等。馬蒂認為，這些都是由於殖民地統治所造成的。他認為和民族獨立相並列的是重建古巴人的民族性。他指出：「古巴難道只配是一個下等酒館、一個向閑漢提供啤酒的地方?或者它將成為一個獨立而勤勞的拉丁美洲民族?這正是古巴面臨的問題。[6]」他提出了兩個重要概念，一個是「尊嚴」(dignidad)，另一個是「新古巴」(Cubanidad，意為理想中的古巴民族性)。因此，馬蒂的民族主義思想具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培養和建立個人的美德是民族獨立的前提，民族獨立必須以對古巴人的教育相伴隨。美國研究馬蒂的學者科克指出，馬蒂的思想「非常強調道德意識並最終指向『新人』的形成」[7]。

但在另一方面，馬蒂所渴望的「新古巴人」和卡斯特羅以及格瓦拉的「新人」又有本質區別。馬蒂雖然受到一定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但他本質上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主張對群眾進行教育，但反對國家對個人實行強制的改造，並視人性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他說：「在改造人性中無論採用什麼方法，都不應

該把人性中惡的一面消除掉，不應該處處和它對著幹，而應該在承認它是一個既定的存在的前提下展開工作」。他還說：「人從不中斷對自己需求的考慮並試圖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既要為後者服務又不想損害前者，甚至在非常禁欲主義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是非常自然和符合人性的。」[8] 因此，另一位研究馬蒂的美國學者認為，「新人」和個人自由應該同被視為馬蒂重建古巴民族性的基礎 [9]。

和中共領導人一樣，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義一元論和環境決定論的信徒，在他們看來，人性中不符合他們要求的都是由舊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會環境下被消除的。卡斯特羅說：「從資本主義下過來的人充滿了自私」，「彼此像狼一樣。」[10] 他甚至認為人的進化在資本主義下停止了，而他的革命將重新啟動人類的進化過程。格瓦拉說，「我們都是那個環境的產物」，群眾並不是「單純」的。他們雖然把馬蒂說成是他們革命的先驅，但馬蒂的人性整體論的看法被他們排除在社會工程之外。格瓦拉對人性的理解更是機械的和甚至是非人性的。他說：「我相信最簡單的辦法是承認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產品。」[11] 他還說，革命者是「幸福的齒輪」。在他的代表作「古巴的人和社會主義」一文中，他說古巴革命要創造的是「21世紀的人」。

一位古巴革命的研究者認為，對於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來說，被稱為「烏托邦」的並不是改造人的可能性，而是那種認為人性是永恆的和不可改變的想法。古巴領導人關於改造人性的想法對一般幹部有深刻影響。一位古巴教師這樣告訴外國訪客：「我們不能接受那種認為人性的惡是不可避免的觀點。我們相信我們能

夠把人性中的善在青年中培養起來，那將是全新的人。這樣的人或許能自發地成長，如同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封建主義再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樣。但為什麼等待呢？我想我們必須創造這樣的人。[12]」在古巴，一個常見的口號就是「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沒有新人的新社會」。

除了環境決定論以外，古巴領導人對人性的看法也和古巴特殊的革命經歷有關。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等人是從82個遊擊隊員起家鬧革命的，短短3年後就取得了全國政權，這使得他們產生了一種和毛澤東極其類似的強烈的唯意志論觀點：只要有了具有堅定意志的人，就能創造出人間奇跡。他們對一般意義上共產黨話語系統中的「主觀」因素和「客觀」條件的解釋正好相反：主觀因素能創造客觀條件。因此在古巴革命以後，塑造人性不但是改造人的需要，也是在經濟和社會落後的條件下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出連蘇聯也望塵莫及的革命奇跡的唯一保證。與卡斯特羅關係密切的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說，卡斯特羅「有一種近乎神秘的信念，人類最偉大的成就就是意識和道德動機而非物質動機的形成，它們能改變世界、推動歷史 [13]」。

像中國一樣，古巴在革命初期也以蘇聯為模式，移植了蘇聯的各種組織形式以實現社會政治化(黨、少先隊、共青團、婦聯、工會等)，培養革命所需要的人。但隨著古巴領導人日益意識到和蘇聯在物質基礎和社會文明程度上巨大的差別，他們越來越感到古巴必須走和蘇聯不同的道路去實現共產主義。蘇聯60年代的經濟改革同樣使得古巴面臨和中國一樣的問題：是仿照蘇聯的模式，使用物質刺激，還是堅持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並相信它能創造出物質奇跡？這個難題反映在1961年到1965年發生的有關

道德動力還是物質動力的大爭論上。爭論的背景是古巴自1960年開始的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造成的生產下降和嚴重的經濟困難(古巴自1961年起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麵等等實行票證制)。爭論的一方是古巴農業和外貿的負責人，他們主張一定程度上採用物質刺激、放鬆國家控制，讓基層經濟管理部門有一定的自主權；另一方是工業和國家銀行負責人格瓦拉，他堅持原來的(在古巴剛剛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策，並把蘇聯的經濟改革看成是對「新人」社會工程的腐蝕和瓦解。他曾經說，蘇聯是個「豬圈」，蘇聯工人和美國工人沒有什麼差別，都是為了錢而工作。而他對毛澤東的中國模式非常讚賞，認為中國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方向。在他所主管的部門裏，他堅持使用精神鼓勵，即使在迫不得已給予物質獎勵的時候也儘量不使用貨幣形式，並避免在公共場合頒發物質獎品。在他的號召下，古巴掀起了義務勞動和勞動競賽，企圖用這種方法解決勞動生產力低下的問題。他說，勞動競賽應該成為工人工余時間考慮的問題。他還希望把戰爭年代的緊張氣氛和犧牲精神在和平年代保持下去，以避免安定有序的生活放鬆「新人」成長的節奏。

為了維護領導層的團結，這場爭論在1965年被卡斯特羅中止，格瓦拉的主張在60年代後半期成了主流。他所倡導的義務勞動被制度化，古巴全國有名目眾多的義務勞動日和義務勞動周，時間最長的是「吉隆灘雙周」(工人和幹部連續兩周每天下班後參加2到3個小時的志願勞動)，以紀念粉碎「豬灣入侵」(古巴叫「吉隆灘大捷」)。格瓦拉注意到，在「豬灣事件」期間，由於全國實行緊急狀態，平時的消極怠工和遲到早退都消失了，這就是這個長達兩周的志願義務勞動的來歷。

像中國一樣，古巴的「新人」工程也由典範來引導，「青

年島」就是最突出的一個。這個島原名松樹島，革命前是監獄，1965年在一次風災的善後工作中被整體移交給古巴共青團，從全國抽調了5萬名團員，建設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古巴的共產主義飛地。這個島上的生活設施全部免費，收入按家庭成員的人頭而不是貢獻，基本不用貨幣，生產完全按照軍事化的方式來組織。在經濟上這個島的目標是建立柑桔和奶牛業，數年內趕超當時世界上柑桔和奶牛業最先進的以色列和荷蘭，為古巴換取外匯並解決肉乳製品的供應(這個目標從來沒有實現，直到今天古巴人的這些基本生活品供應仍然是票證制)。根據古巴官方的宣傳，這個島的工人生產積極性奇高，「上班時從不看錶」。像中國的大慶和大寨一樣，古巴全國都派取經團來這個島受教育，少年兒童和大學生常常在這裏一住就是幾個月。這個島還是向世界展示新古巴的櫥窗，卡斯特羅常常把他的外國客人帶到島上，告訴他們哈瓦那是「舊古巴」，而這個島才是「新古巴」。

和青年島類似的集體典範還有很多，例如有一個叫馬亞里的礦區，由8千婦女組成，她們全都是志願工作者，礦區的生產、生活和分配原則和青年島一樣。除了這些社區性的典範，古巴有很多流動性的，例如一個叫「鋼鐵青年」的「縱隊」，由800大學生和300教授(古巴當時的教育改革和毛澤東在中國實行的教育改革類似，大大簡化了課程設置和修學年限，實行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很多教授都只有20歲出頭)組成，擔負修築公路和開闢荒地等等最艱巨的任務。工餘這些學生和教授常常席地而坐，打開書本繼續學習。

在個人典範方面，古巴的新人除了遊擊隊英雄，更多的是忘我的勞動模範。例如在格瓦拉的工業部有一個叫阿乃特的模範，

創造了連續6個月每天工作9小時、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領取加班費的記錄。他的這個記錄被換算成1,607小時，讓其他工人去趕超。這種「小時意識」成了古巴「新人」工程的一個特色。例如，1967年2月卡斯特羅前往古巴鋼鐵廠表彰勞模。他舉的事例包括那些「每天至少工作16小時，有4次連續工作24小時」的工人，還有累積了100到200小時的超時工作而不領取報酬的人。最突出的新人典範是格瓦拉，他身兼國家銀行行長和工業部長，國家給他兩份工資，但他只領取工業部長的一份(遠遠低於銀行行長的工資)。他從不濫用特權，嚴禁家屬使用自己的公車，甚至小孩生病時也是如此。只要沒有公務，週末他都參加義務勞動。為了世界革命，他最終辭去了古巴領導人的職位，去非洲和拉美展開遊擊戰直到犧牲。格瓦拉的革命清教主義既有一些真誠的追隨者，也給那些無心用新人標準衡量自己的下屬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他們必須參加那些義務勞動，尤其是格瓦拉在場的時候。「當心，切來了」，成了他們私下的警告。有一次格瓦拉的一個下屬看到他去出席會議時忘了帶手錶，就把自己有金錶鏈的手錶解下借給了他。當格瓦拉把錶還給他的時候，金錶鏈不見了，換上了一根皮錶帶和一張收據：「古巴國家銀行感謝你的捐贈」。格瓦拉死後，卡斯特羅把他奉為古巴新人至高無上的典範，「讓他們都成為切那樣的人」成了對古巴年青一代的要求。

和毛澤東一樣，卡斯特羅也把官僚機構和舊社會留下的影響看成是培養新人的主要障礙，只不過在古巴黨內沒有和劉少奇、鄧小平同樣級別的「走資派」。自從60年代早期開始，他一直把古巴在勞動生產力上的落後歸因於「官僚機構」的作祟，而把古巴工人和一般幹部勞動積極性的低落歸因於「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殘存的影響。為此在1968年到1970年，

卡斯特羅發起了「革命攻勢」，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培養「新人」的最激進措施。

「革命攻勢」的經濟目標是到 1970 年實現 1 千萬噸糖產量(通常年產量是 6 百萬噸左右)，但更重要的是，圍繞這個目標對古巴社會進行革命以來最徹底的清理和重建，為「新人」的產生創造最理想的條件，在這個意義上「革命攻勢」可以看成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的結合。1968 年 3 月，他宣佈黨內揪出一個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小集團，以一個親蘇的中央委員為首(此人叫愛斯卡蘭特，古巴革命前就是古巴共產黨領導人，但奉行議會道路，拒絕武裝鬥爭。卡斯特羅的革命勝利後他改變態度，幫助卡斯特羅「7.26」運動和共產黨國家發展關係，後來卡斯特羅的「7.26」運動和古巴共產黨聯合組成新的古共，他被「結合」進中央委員會，但一直對卡斯特羅的激進路線不滿)。以粉碎這個「走資派」集團為開端，「革命攻勢」轟轟烈烈地掀了起來。接下來，為了清掃妨礙「新人」成長的社會環境，卡斯特羅親自發起了掃除街頭小販的鬥爭，一晝夜之間古巴全國的攤販被廢除和沒收，小業主們被集中送進勞動營。為了迎接將要到來的甘蔗收穫季節，古巴全國城鄉實行軍事化：全國各地各單位按軍事編制組織起來，軍隊派遣自己的幹部和各級黨政領導人組成前線指揮部(設在甘蔗田或建築工地上)和後勤部(設在原來的辦公地點)，勞動紀律全部按軍法從事；一切和甘蔗生產無關的業務全部停止，學校關門，學生組織起來給「前線」送糧食和飲水；婦女在「後方」接管男勞動力留下的工作，或在街頭巡邏，一旦發現遊手好閒者立刻送進勞動營；在收穫季節裏，各地每天用戰鬥警報作為上工號令，很多地方為了創造出真實的戰爭氣氛，常常故意短時期切斷電源，讓工人在非常狀態下工作。這樣的模式可以說完全實現了

格瓦拉的心願。

然而，「革命攻勢」仍然以失敗告終。1970年初夏，卡斯特羅坦陳，甘蔗的產量沒有達到目標，「革命攻勢」失敗了。從那以後，古巴當局在政治和社會政策上逐步放棄了激進過渡的措施，蘇聯的一套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採用。雖然「新人」的口號從未被放棄，但像60年代中後期那樣的大規模運動沒再出現。

(五) 共產主義「新人」在世界各國的反響

在20世紀的世界歷史進程中，蘇聯、中國和古巴等共產黨國家塑造「新人」的理論和實踐上有特殊的影響。

上個世紀20到30年代，出於對西方社會的失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方國家的相互撕殺和1929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很多西方知識份子轉向共產黨國家尋找替代，他們認為，共產黨國家的「新人」把精神和道德放在物質和貪欲之上，讓個人服從於集體，為了一個更超越的目標而生活，這與西方社會個人所遵循的價值完全不一樣這樣的社會能避免很多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弊病。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者悉尼韋伯和比阿特里斯韋伯夫婦30年代中期訪問蘇聯時曾經對「蘇維埃人」印象深刻，在他們的《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文明》一書中留下了很多觀察和評論。他們的書中有一章的題目就叫「重塑人」(The Remaking of Man)。他們對莫斯科體育俱樂部牆上的標語「我們不但按照經濟原則改造人類社會，我們也按照科學原則重塑人類」感到十分振奮。蘇聯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那麼如果沒有宗教的天國和來世概念，「新人」的道德原則以什麼為基礎呢？韋伯夫婦提出了他們不無道

理的答案：共產黨用普遍的個人負債意識取代了宗教概念，在蘇聯每一個人人生下來就欠了黨、政府和社會的債，他的一生就是用貢獻來還債，這就為個人的倫理道德提供了基礎。韋伯夫婦也對蘇聯把生產勞動和教育相結合的教育制度深感興趣。他們認為，在西方實際上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提出這樣的設想，但只有在蘇聯才成為了現實。

美國記者艾拉文特(Ella Winter)在30年代訪問蘇聯後出版了《紅色的美德》一書，其中也有一章題目就叫〈設計新人〉，另外還有一章題為〈五百萬分之一〉(意為5百萬蘇維埃新人中的一個)，介紹了一個叫謝爾蓋·達維多維奇的「蘇維埃人」。這個蘇維埃新人只有22歲，但已經在集體化和反對富農的鬥爭中經受了考驗。他沒有任何個人財物，衣著簡單，生活樸素，睡得很少，有時根本不睡，特別是為委員會準備工作報告時。他隨時隨地都注意政治新聞，常常在雪地裏走幾個小時去傳達最新的政府公告。他一瞥之下就能分辨出來者是不是「我們」的人。文特說，對於這個「蘇維埃新人」來說，那些困擾著西方青年生活的主要問題早就都解決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當然也有一些西方知識份子從蘇俄的「新人」實驗中看到了令人憂慮的問題。例如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積極反戰並發表過嚮往社會主義的言論。他在1920年就前往蘇俄實地觀察，但在回到英國後出版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與實踐》(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一書中說布爾什維克的世界觀建立在一個人性可以由權力來塑造的信念之上，這將導致一個黑暗世紀的到來。德國哲學家繆勒(Rene Fuelleop-Miller)在親身觀察的基礎出版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心靈和面貌》(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他說俄國的「新人」是一個集體的人，

「一個有著數百萬顆頭顱和無數身體部件但沒有個性的龐大軀體。」這個集體的人吞沒了個體的人，在外人看來是陌生、古怪和不詳的，但對於那些對革命抱有狂熱信念的人來說，這個「新人」卻是劃時代的產物。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當西方社會面臨著新的心理和文化危機時，很多知識份子又轉向了中國和古巴。美國科學家亞瑟格萊斯頓說，對中國的訪問喚醒了他青年時期的理想主義，改變了在充滿競爭的西方社會形成的對人性的看法。英國社會科學家皮特瓦斯萊說：「中國試圖在日常生活中改變人類的價值和個人關係，對工業和城市條件下被認為是再自然不過的一些行為模式提出挑戰。[14]」英國坎特伯雷大教長休立特約翰森是基督教世界中盡人皆知的共產黨國家的辯護士，從 30 年代到 50 年代，他訪問了蘇聯和中國，出版過書籍和文章向西方介紹他的觀感。在 1953 年出版的《中國：新的創造性時代》中他說他在中國發現了 20 年前在蘇聯發現的東西：人間天國。他說：「中國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戲劇，它對



英國坎特伯雷大教長約翰森 1951 年訪華時
受到周恩來接見。

貪婪的憎惡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國「正在把人從物質佔有的本能中解放出來，為建立在更高基礎上的新社會鋪平道路」。「中國共產主義已經把冰冷的技術變成人與人之間溫暖交流的渠道。當一個人

走進他的實驗室、他的田野、他的工廠的時候，他心中有一種對於社會和生活的全新的概念。他和他的工作夥伴成了正在蓬勃發展的新生活的一部份。他們的小我消失了。我們夢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國實現了。」 [15]

美國著名的中國學者費正清 1972 年訪問中國後，在美國的《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高度評價中共在改造人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說，中共在中國進行的是一場「影響深遠的道德十字軍遠征」，把人性引導到「自我犧牲和為別人服務的方向」。他說，統治中國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範，這可以為美國社會提供榜樣。另一個訪問過中國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說，中國已經成功地把兩性關係的基礎從異性相吸變為建立在革命關係上的兩情相悅，挑選伴侶的條件是革命覺悟，婦女們也已經不再使用口紅和化妝品 [16]。

60 年代西方知識份子還頻繁地訪問古巴，在那裏找到了未來人類的希望。與蘇聯或中國式的「新人」相比，古巴有一個更具有魅力的「新人」典範：格瓦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知識文化界和青年學生中間，格瓦拉不但是對他們所以為的西方物質主義個人至上的否定，是他們所相信的存在于革命中的人類崇高信念和精神超越的象徵，也是對蘇聯官僚制度和異化了的社會主義的批判。一個在 60 年代訪問過中國和古巴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這樣分析格瓦拉的魅力：「對他來說只有一件事是真正重要的：創造新人，個人和共同體的完美結合從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質。……在他看來革命鬥爭是昇華人和解放人的手段，它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階梯上不斷攀登，直到完美。[17]」這些被「腐敗」的西方所「異化」的知識份子終於等到了一個第三世界的英雄：他以堂吉柯德的精神與人的物質欲望和生存本能戰鬥，以十字軍的氣概遠征，以藝術家的熱忱塑造人，

而且他又是那麼年青、那麼英俊，最後像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那樣獻身；這讓他們太激動了。法國哲學家薩特說，格瓦拉是這個世界「最完整的人」。在他訪問古巴時，卡斯特羅和格瓦拉曾多次與他徹夜長談。他也參加了從下午延續到深夜的數十萬人的集會，聆聽卡斯特羅長達 8 個小時的講話。對此，薩特驚歎於革命甚至把人的生理習慣和需要也完全改變了。古巴革命者征服了睡眠，征服了休憩，也就是克服了自我。



法國哲學家薩特和波伏娃 1960 年訪問古巴期間和格瓦拉會面。格瓦拉為薩特點雪茄。

美國有一個「我們必勝縱隊」，從 1968 年開始組織知識份子和學生前往古巴幫助收割甘蔗，在此過程中接受思想改造。「我們必勝」是古巴當時最流行

的一句口號，「縱隊」是古巴勞動管理軍事化的形式。在與這個「縱隊」的成員談話時，卡斯特羅提出了他的人類進化論：「人有能力做偉大的事情。但人的進化在歷史或前歷史(在卡斯特羅的語言裏，「前歷史」指古巴革命之前的人類歷史，就與中共的語言裏 1921 年中共成立是「開天闢地」同樣的意思)的某個時刻停止了。至今為止我們所瞭解的人類是前歷史的，是野蠻的。」「我們必勝縱隊」的成員於是得出結論：「在他的領導下古巴正在創造出菲德爾的一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真正人類的歷史時期——新人的時期。」 [18]

共產黨國家塑造「新人」的實踐也對第三世界國家產生了影響。第三世界國家在獨立後普遍面臨如何在較短時間內和缺乏物質和技術的條件下建立和發展現代經濟基礎的難題，也面臨用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或者道德哲學來凝聚民族，號召個人為社會奉獻的問題。在這兩個意義上，共產黨國家塑造人性的實踐都曾經在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和領導人中產生過影響。印度的民族主義領導人尼赫魯還在20、30年代就對蘇聯的建設、尤其是如何讓中亞地區的民族參與到國家建設中來非常讚賞，把這看成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實驗，因為在他看來，這些地區處於和印度大多數地區類似的發展水平。他在獄中給女兒英迪拉寫了很多信，作為給她的世界歷史教材，其中蘇聯是作為一個新文明來介紹的。50年代尼赫魯當政時，印度的國有化和社會化政策差不多是世界上僅次於共產黨國家的。

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坦桑尼亞民族主義領導人尼雷爾對毛澤東的中國的欽佩。尼雷爾苦於非洲新獨立國家的落後，曾經說：「我們的工具還是穆罕默德(伊斯蘭教創始人)時代的。我們住的房子是摩西(《舊約》中猶太人的先知)時代的。……當美國和俄國把人送上月球的時候，我們非洲人還在跳舞。[19]」尼雷爾在轉向中國之前就從坦桑尼亞在西方國家和蘇聯東歐留學的學生中觀察到了不同的態度。在一次為提高物質待遇而舉行的罷課中，他看到參加罷課的學生都是在西方國家留學的或是在獨立前的殖民主地受的教育，而唯一沒有參加罷課的是兩個在蘇聯和東德留過學的。對物質待遇的這種不同的態度使得尼雷爾得出結論：「西方太個人主義了。所有教科書都強調權利、權利、權利，沒有責任。……責任常常被定義為服從法律……」；相反，「在東方(指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對這種傾向的反動，就向鐘擺一樣指向另

一極。為了取得平衡，你必須在兩極之間擺動。……東方國家具有非洲需要的東西：對責任的強調。」[20]

尼雷爾在60年代兩次訪問過中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告別宴會上說：「你們的人民和政府有效和愉快地用覺悟和刻苦的節儉來從事工作，這對我和我人民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我相信我們能應用同樣的方法。」當他問中共外交部長陳毅，他的部裏有多少轎車時，陳毅說只有10輛。這個明顯不符合事實的回答卻使得尼雷爾十分震動。回國後他在議會裏發起了討論，用「中國的10輛汽車」作標準，要取消坦桑尼亞政府機構裏多餘的「賓士」汽車。對比中國民眾簡單樸素的衣著，他甚至覺得坦桑尼亞傳統的鮮豔服裝都是奢侈。使他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國援助坦贊鐵路和其他工程項目的技術和勞工，對比坦桑尼亞工人的懶散和效率低下，他說：「紀律嚴格的工作是絕對必需的。在這個方面，我們的中國技術人員已經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結語：提升還是毀滅道德？

時至今日，毫無疑問共產黨國家塑造「新人」的實踐都失敗了。由於這個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毀舊道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它的失敗留下的是雙重意義上的道德廢墟，使得虛無主義、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個有深厚宗教傳統的國家，恢復宗教傳統可以填補這種道德衰落帶來的倫理空白；但在一個缺乏這種傳統的社會，道德的復興和人性的回歸就要困難得多。

英國哲學家伯林曾經對20世紀改造人的社會工程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可以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充滿靈感的藝術家，他企圖把人熔注進根據他的獨一無二的眼光所設計出的模式，就像畫家攙

和顏料或者作曲家組合音響：人成為一種我可以把自己的創造性意志加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過程中受難甚至死去，他們也被昇華到了一個如果沒有我對他們生活的強制——創造性的強制——他們將永遠不可能達到的高度。[21]」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回顧「新人」工程，人們首先要問的並不是它在現實中的可行性，而是這種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自命的社會工程本身的道義合理性。

說明：本文根據作者即將出版的英文專著《塑造新人——從啟蒙運動的理想到社會主義的現實》(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簡寫而成。

【注釋】：

- [1] Jean-Jacque Rousseau, *On the Social Contract* (New York: 1978), p.68.
- [2] Dmitri Vol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1994), p.20.
- [3] Leon Trotsky, *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1970), p.158.
- [4] Mikhail Heller and Aleksander M.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New York:1982), p.284.
- [5]. 邱依虹編《生命如河流——新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04 年，第 302-303 頁。
- [6] Cited in John M. Kirk, *Jose Marti: Mentor of the Cuban Nation* (Tempa: 1983), p.87.
- [7] Ibid, p.86.
- [8] Carlos Ripoll, *Jose Marti: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ban History* New Brunswick: 1984), p.40.
- [9] Ibid., p.47.
- [10] Fidel Castro, "To Create Wealth with Social Conscience," in Bertram

- Silverman,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The Great Debate* (New York: 1971), p.340.
- [11] Che Guevara,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in Silverman, ed.,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p.338.
- [12] Elizabeth Sutherland, *The Youngest Revolution* (New York: 1981), p.190.
- [13] Fidel Castro, *My Early Years* (New York: 1998), prefatory page.
- [14] Peter Worsley, *Inside China* (London: 1975), p.20.
- [15] Cited in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New Brunswick: 1997, Fourth edition), p.318.
- [16] Orville Schel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An American's First View of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ina* (New York:1976), p.45.
- [17] K.S. Karol, *Guerrillas in Power* (New York: 1970), p.438.
- [18] Sandra Levinson and Carol Brightman, eds., *Venceremos Brigade-Young Americans Shar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Revolutionary Cuba* (New York:1971), p.344.
- [19] William Edgett Smith, *We Run While They Walk: A Portrait of Africa's Julius Nyerere* (New York: 1971), Pp.3, 18-19.
- [20] George T. Yu, *China and Tanzania: A Study in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rkeley: 1970), p.37.
- [21]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Pp.150-151.

第五篇

毛主義的變種

——紅色高綿大屠殺研究

引言：以徹底改造社會為目的的大屠殺

二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此後，有關這個政權血腥歷史的材料逐步公諸於世，主要見之於柬埔寨難民的陳述、西方記者的採訪、學者的調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來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佈的材料。但是有關紅色高棉的歷史記載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為紅色高棉制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秘性，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並沒有建立起系統的檔案。然而，這種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點：它如同一場颶風，肆虐過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蹤跡可尋。

但是過程和細節的有待填補或充實，並不妨礙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後果作出基本的判斷：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1975-19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40萬到有所誇大的300萬。一般認為，10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1] 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到800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 Lacoure)把柬埔寨的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genocide)。[2] 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2萬越南裔全部死亡，43萬華裔死了21.5萬，1萬老撾裔死了4,000，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9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3]

必須強調的是，有關紅色高棉大屠殺的調查最初是由西方新

聞媒體和西方學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現今有關這個題目的出版物也多來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國家還力主由國際法庭來審判紅色高棉。如果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例如冷戰思維、後殖民心態或國際霸權)的偏見的話，那麼筆者希望這種觀點不至於發展到對大屠殺這個基本事實也表示懷疑的程度。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饑餓與革命》(Cambodia: Starvation and Revolt)，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的政策宣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殺還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在他們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Paul Sweezy)在書介中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困難，但首先必須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後，以反體制立場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Noa Chomsky)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筆者認為，以上觀點隨著國際上對紅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過境遷，值得討論的倒是美國1973年對柬埔寨的大轟炸所造成的後果。美國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簽訂停火協定以後，轉而把轟炸的重點轉到柬埔寨，企圖用轟炸在金邊周圍製造一個安全區，在五個月的轉炸中造成有些美國學者自己估計為3萬到25萬人的傷亡。這場轟炸的後果一是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有上百萬)為躲避轟炸而逃進城市，加速了柬埔寨農村的崩潰，為紅色高棉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創造了條件；二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問題：究竟在現在所說的被紅色高棉

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應該算在美國的帳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認為 1973 年死於美國轟炸的人口能和紅色高棉四年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

(一) 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 1975-79 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規模的強制性人口遷移。1975 年 4 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後，在三天至一周的時間裏將全部城市人口強制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準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饑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劃的屠殺。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4]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佈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



這張政治漫畫表現了紅色高棉殺人盈野，最終自己也成為骷髏。

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21，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 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

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準備，而是在

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薩利(Ieng Sary)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1970和1971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為奪權後系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只是重複實踐由中國和越南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但是自1973年開始，紅色高棉的政策出現明顯的轉變，開始強調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是在黨內開始作和越南決裂的準備。紅色高棉原來是在以越共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產黨內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領導人和主要幹部都在越南住過或是由越共培養，但1973年北越和美國簽訂了在印支停火的協定後，柬共領導集團有被出賣感，表示不受此協定的約束，加上歷史上傳統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間開始分裂，越南被稱作「越南修正主義」，黨內的親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領導集團決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搶在越南南部實現社會主義之前在柬埔寨實現社會主義。[5]於是自1973年5月開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強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制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村莊；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制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捩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制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制訂了一個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暴力徹底

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相比，東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面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制，「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瞭解和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6]

然而歷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準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東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 1977 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適用於我們。」^[7]當 1975 年 9 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份子回國時，看到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超過了毛澤東」。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幹部對他們介紹說，東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制

度比中國人的優越。」[8]

可以認為柬共是汲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最左的中國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社會主義」，[9] 而且是進入共產主義，以此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紅色高棉當時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柬埔寨將成為新的中心)。這就是所謂「柬埔寨特色」。這是一個在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就徹底重構社會的模式，其開始付諸實行是 1975 年 4 月 17 日(即紅色高棉進入金邊 的當天)在各個城市進行的大遷移。當時，紅色高棉對城市居民和難民宣佈的理由：一是美國可能的轟炸，二是城市糧食的短缺。這一直是紅色高棉官方的解釋。直到 1977 年 9 月波爾布特才承認撤空城市是為了「安全原因」，即摧毀那些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基地。這項決定是在進城兩個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卻對相當高級的幹部都嚴加保密。這種保密使得一項涉及到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毫無物質準備，幾十萬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 年 5 月 20 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後)，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幹部公佈了中央進城後的各方面政策。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現在瞭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後來和紅色高棉決裂者如韓桑林(Heng Samrin，前紅色高棉將領，後投奔越南並成為 1979 年建立的新政權領導人)等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東邊界準備作戰；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醫院也在

其中。[10] 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劃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這次會上宣布的[11]。值得重視的是農謝(Nuon Chea，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12]

(三) 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會。根據波爾布特 1977 年 9 月 27 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佈柬埔寨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 2% 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 14 萬人。[13]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仍然有這麼大比例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以想像從 1975 年 4 月到 1978 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柬埔寨人口劃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後，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控制下的鄉村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裏遣散下鄉的稱為「新人」或「4 月 17 日人」，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後被接收的人。這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後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劃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

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後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只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既有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裏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權利者」，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選者」也劃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革命做過事的。[14]

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劃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復了南亞社會的種姓制度。「公民」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時通過把各種異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範疇，使得隨意迫害和剝奪他們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雖然總的來說，紅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柬埔寨革命一樣，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倖存的「4月17日人」回憶說，在每週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複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只好去幹？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群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面前他們照樣是沒有任何「完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後，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莊的自由，所有財產都被剝奪，私藏糧食查出後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集體食堂的飯鍋裏也和他們專政對象的一樣，都只有糠皮。

經濟上，紅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廢除商業和其他在正常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經濟和服務行業，而且是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口來建設國家。波爾布特強調一個「快」字，他說：「我們和他們(他指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我們比他們更快。」掌權以後，紅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頃產三噸大米的指標，[15]而過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頃只有一噸。後來在1976年8月正式宣佈了「四年計劃」，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個幹部所說：「當一個民族被政治覺悟喚醒時，它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師辦不到的，人民能辦到。」[16]他後一句話指的是知識份子受到物質和技術條件的束縛，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爾布特就曾經自問自答道：「我們能達到這個指標嗎？答案是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證據就是我們的政治運動。」

當時，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鄉的經濟考慮，也就是他們可以被用來當作無償農業勞動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方是主要產糧區，這項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萬被遣送到這裏的「4月17日人」來承擔。在兩年艱苦的開荒和修築水渠的勞動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饑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當勞動力大量減員的消息上報到金邊時，領導層往往遷怒於「階級敵人」搗亂，於是又展開在監工的紅色高棉內部的清洗和對被懷疑的「4月17日人」的處決。同時，由中央制訂的指標成了政治任務，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幹部問罪，這就迫使紅色高棉基層幹部把「4月17日人」和農民驅使到極限。以徹底改造國家經濟結構為目的的「每公頃三噸」和「四年計劃」就這樣成為了大屠殺的又一個組成部分。

歷史證明，在社會上實行恐怖專政的政權，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政。因為當有組織的恐怖成為慣性和構成體制的要素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有組織的目標，而社會和

個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組織的統治集團自身成了這種專政的對象。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成為紅色高棉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一環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為其黨內秩序的一部分之時。波爾布特的理論是搜尋和消滅「細菌」。1976年12月，當S21的審訊檔案越積越高時他召開了一次「學習會議」，說：

「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裏。病源必須要暴露出來才能被檢查。因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熱量還不夠我們在黨內搜尋細菌的工作還沒有成果。他們埋得很深。然而，當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時，他們滲入黨、軍隊和人民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找出這些醜惡的細菌但如果我們有片刻的耽擱，這些細菌就會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據我們十年來的觀察，很清楚，敵人根本沒有消失，因為他們不斷地進入黨內。」[17]

但他又保證說，這些「細菌」最終都會被揭露出來，因為「黨有著像鳳梨那麼多的眼睛」。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特點是其涉及面廣泛到了以某個地區的全部政權組織、軍隊甚至總人口為對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對東部地區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這個地區的幹部、軍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18] 結果在六個月中處決了10萬人，佔當時全國人口的1/70-1/80。這種大規模的處決已經不是為了解決黨內一部分人的問題，而是要把整個一塊地區通過消滅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達到政治上的純潔。

結語：革命的加速度和衝刺：紅色高棉在二十世紀革命史上的地位

筆者認為，能否理解紅色高棉四年多的執政史是對於人類理性

的挑戰。這並非說這裏有甚麼值得反覆探討的學術難點，而是從根本上說，人類理性有沒有認識和解釋這個空前荒謬和空前血腥現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認識自身歷史的極限。我們有一個種族主義理論來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提供基本解釋，但我們有甚麼理論能滿意地解釋一個政權在短短四年中關起國門，發明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來滅絕自己民族幾分之一的人口呢？

這裏只是想提出這個問題供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筆者自己同樣深感困惑。或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諸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努力，而歷史學只能起到一個收集材料，為這個體制的演變提供基本線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這個形而上的問題之後再回到形而下的範疇，從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紅色高棉的地位。或許這個角度能為上述問題再提供一點間接的線索。

西方學界對紅色高棉到底是一場甚麼性質的革命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說它是「一場徹底的農民革命」，是農民起義者對城市的報復，其暴力行為並不來自於波爾布特和喬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農民主義壓倒共產主義的結果。^[19]而且即使是柬共領導人自己也是充滿農民浪漫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但很有影響的《波爾布特體制》一書的作者柯能 (Ben Kiernan) 根據他所作的五百個採訪資料認為，即使是農民也不能在這個體制下生存，紅色高棉的農村政策是以犧牲小農為代價的，它摧毀了柬埔寨農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三個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們直接束縛在國家權力之下，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契約奴農業國」(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觀點。現任首相、原紅色高棉高級幹部洪森的《柬埔寨 130 年》在 1999 年 4 月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發行)。根據 4 月 5 日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的專題報導，洪森認為「中國文革的思

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實踐，但也證明是失敗的」。在洪森訪問北韓以後，他對紅色高棉路線的產生根源有新補充，認為波爾布特思想中超過毛主義的東西源於北朝鮮。

筆者認為紅色高棉無疑屬於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這條線索，但卻是這個革命的極端時期——俄國革命到1930年代末為止，中國革命到1970年代末為止，和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為止——的繼承。本來這三次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版。其證據是：紅色高棉在兩三年裏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裏走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歷史過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幾乎沒有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集體化，而在蘇聯和中國，集體化是奪權多年後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劃」也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和清洗是奪權政權十多年後才有的，而紅色高棉則幾乎是一進城就展開了。

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過渡時期」特徵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組織」的指令和AK47衝鋒槍。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群眾遊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見，紅色高棉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雖然從觀念到形態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奪取政權後在全國推

廣，合作社和各種強制勞動組織成為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一個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開。男子32歲、女子25歲以下不准結婚。廢除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吃飯，而是消滅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進餐看成最能體現柬埔寨革命創造性的成就，其幹部這樣說：甚至中國都還保留著這個「資本主義的結構」。^[20]

在高度集權方面，紅色高棉不但毫不遜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家族政治(Clant Politics)。柬共兩個最高級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是連襟，他們從巴黎留學時期就結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親戚關係」使得高級領導人的家庭成員遍佈各級領導職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國大陸媒體稱為最「善戰」、「威嚴」、受下級「敬畏」的紅色高棉西南大區領導人獨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東部地區而有「屠夫」之稱，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幾乎所有成員都安排進自己控制的西南區(個別的進入金邊地區)黨政軍要職，包括他的兩個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個兒子(從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揮官)，五個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一的波成東機場司令)，五個女兒中一個是Tram Kak區的書記(這是紅色高棉的樣板區，其書記原來由這個女兒的丈夫擔任)，另一個也是某個醫院的院長。正是這種家庭權力網使得塔莫得到另一個綽號：「塔莫大爺」。

紅色高棉在讓社會其他成員廢除家庭的同時，卻把自己家庭的功能發揮到了和政權結構相等的程度，這不僅僅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是在紅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來的體制中，血緣關係成了唯一能信任的關係。「屠夫」塔莫是紅色高棉堅持到最後的將領(1999年4月落網)，這是因為他屠戮太多，無

法回歸社會，但他能堅持到最後或許也說明了其家族權力網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紅色高棉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小學重新開放(有材料說「4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沒有權利入學)，幾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份子在或殺或關之後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們接到命令去辦一所技術學院，招收三百名10-16歲的學生。此外甚至還考慮過恢復使用錢。

紅色高棉以為歷史還會給他們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機會，讓他們再創造一次奇跡，在四年內從民族災難走到「改革開放」，向世界證明他們的「社會主義」的活力，以便繼續掌權永遠掌權。但他們錯了。柬埔寨社會被他們摧毀到了已經無法在他們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寧願接受一個由越南人扶植起來的、起碼可以讓他們家庭團聚的政權。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注釋】：

[1] Wilfred P. Deac, *Road to the Killing Fields - the Cambodian War of 1970-1975*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5; Ben Kiernan, *The Pol Pot Regime-Race, Power, and Genocide in Cambodia under the Khmer Rouge, 1975-7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6

[2] [5] [13] [14] [17] [20] Wilfred P. Deac, *Road to the Killing Fields —the Cambodian War of 1970-1975*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5; Ben Kiernan, *The Pol Pot Regime-Race, Power, and Genocide in Cambodia under the Khmer Rouge, 1975-79*, 456 ; David P. Chandler, *Brother Number One: A Biography of Pol Pot*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 Press, 1992), 4; 105; 143; 184-86; 136; 126.
- [3] [8] [10] [11] [12] 同注[1]，458, 147-154, 55-56, 57, 57
- [4] [7] Kenneth M. Quinn "The Pattern and Scope of Violence", 收入 Karl D. Jackson, *Cambodia 1975-1978: Rendezvous with Dea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6, 109
- [6] [9] [18] David P. Chandler and Ben Kiernan, eds.,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in Kampuchea: Eight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3), 4; 212; 138.
- [15] 有西方學者認為這是受到華國鋒 1975 年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的影響。見注[2] 122。
- [16] George Hildebrand and Gareth Porter, *Cambodia: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93.
- [19] Michael Vickery, *Cambodia 1975-1982* (Boston: South End, 1984), 286.

第六篇

「革命攻勢」

——古巴的「文革」和「大躍進」

引言：加勒比海的大折騰

四十年前，當中國大陸被文革的風暴席捲得天昏地暗時，加勒比海的社會主義島國古巴也經歷了一場類似的大折騰。不過和中國相比，這是一場把大躍進和文革相結合的折騰。古巴全國總動員，社會軍事化，要實現一千萬噸糖的指標和消滅一切反革命和反社會分子。和毛澤東的大躍進一樣，這場折騰給古巴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由於蘇聯的大力援助和古巴地處熱帶、有眾多可實用植物，沒有發生餓死人的慘劇。

(一) 歷史背景：經濟短缺，內外交困

古巴在1959年初推翻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獨裁統治後，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掌握了武裝，採取了一條激進的社會改革路線，導致在推翻舊政權中建立起來的聯合戰線瓦解，民主派和自由派紛紛離開政府或出走他國。在武裝鬥爭時期，卡斯特羅一再宣稱他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決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然而他掌權不到兩年，古巴就成為一個由「七二六」運動獨攬大權的高度計劃經濟的國家。同時，古巴又向拉美各國輸出革命，派遣遊擊隊，訓練各國激進份子，展開遊擊戰。

古巴的這種內外政策，使它在國內和國際都付出沉重代價。在國內，古巴自1961年起就面臨嚴重的經濟萎縮和商品短缺，雖然美國的封鎖有一定作用，但美國拒絕供應的能源和拒絕購買的蔗糖都由蘇聯東歐集團包了下來。導致古巴經濟困難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權的領導集團毫無基本的經濟知識和經驗，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經濟，同時把「共產主義覺悟」作為生產的基本動力，否認個人的物質利益。自

1962年起，古巴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資實行了配給制。

在國際上，古巴輸出革命的政策使得美國對它的制裁受到拉美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古巴陷於空前的孤立，只有墨西哥一個國家和它保持外交關係。到了60年代下半期，古巴甚至和它的盟國蘇聯集團的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其原因是蘇聯當時在國內實行了有限的經濟改革，承認物質利益和價值規律，國際上有「和平共處」的主張，反對盲目輸出革命，這些都和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極左路線發生衝突。

1967年底，是古巴革命勝利以來最困難的時刻：國內長期的經濟短缺日益嚴重；國際上自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殺後，卡斯特羅的拉美「大陸革命」計劃破產，蘇聯集團和歐美共產黨對格瓦拉的犧牲不但不同情，反而冷嘲熱諷，卡斯特羅一怒之下宣佈不出席蘇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慶典，蘇聯則以撤走部分專家和減少燃料供應作為報復。在國內外空前孤立和困難的時候，卡斯特羅不但不檢討其極左政策，反而準備用更大規模的運動來強化其路線。

(二) 揪出埃斯卡蘭特「反黨集團」

1967年底、1968年初，古巴國內的氣氛十分緊張，社會上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謠言。一切跡象都顯示將要有一場大變動。1968年1月28日晚，古巴全國人民都集中在電視機和收音機面前收聽卡斯特羅的重要講話，他宣佈在黨內揪出了一個以中央委員埃斯卡蘭特(Anbal Escalante)為首的高級幹部反黨集團。

埃斯卡蘭特是原古共領導人之一，他奉蘇聯之命在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從事武裝鬥爭時實行議會鬥爭，反對暴力

革命。卡斯特羅上台後，蘇聯要古共和卡斯特羅結合，卡斯特羅也看在蘇聯的面子上，在1965年底成立新古共時將一部分前古共領導人結合進中央委員會。埃斯卡蘭特一夥的罪名是主張物質刺激，反對卡斯特羅所主張的「道德動力」；污蔑格瓦拉是托洛茨基份子和冒險家，說他要為古巴的經濟困難負責；攻擊卡斯特羅盲目自大，好像古巴成了「地球的肚臍」（意為世界的中心）；以及預言古巴來年的一千萬噸糖的計劃會破產，等等。結果，這個小集團的多數人被判處了徒刑。從這些材料來看，埃斯卡蘭特等人大致上反映了古巴在內外交困時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幹部的認識，也間接反映了蘇聯的態度，而這都是卡斯特羅所不能容忍的。藉著這場黨內鬥爭，他不但壓制了不同意見，同時也向蘇聯顯示自己在困難局面下仍然牢牢地控制著黨和國家。

（三）向小販開戰：「革命攻勢」的開始

卡斯特羅發起的這場黨內鬥爭不過是為一場1959年以來最大的運動掃清道路，預先消除反對的聲音。1968年3月13日，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大學發表了向全國實況轉播的講話，宣佈革命的下一個目標是向小販宣戰。他先公佈了大哈瓦那市政管理局的一個關於街頭小販的調查報告，結論是絕大多數的小販都是反社會、反道德的，他們要為古巴的經濟困難和多數人生活物資的匱乏負責。小販們的罪惡是：不參加革命組織，不參加義務勞動，利用攤販非法贏利、剝削人民，目無物資配給制，從黑市進貨等等，而且在小販中提出移民美國的人最多。卡斯特羅宣佈革命不是為了做生意的權利，古巴必須消滅所有私人商業的形式。他的這次演講一直持續到午夜。當演講還在進行，古巴的「保衛革命委員

會」(一個以街坊為基本單位的負責動員基層群眾、貫徹政府各項號令和監視敵對份子的組織)和民兵就緊急行動起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私人小店和街頭攤販，沒收他們的財產。同時，私人酒吧也被佔領。這些酒吧出售用甘蔗釀造的蘭姆酒，提供一些桌椅給客人，和中國的茶館差不多，是古巴當時唯一沒有被組織化的場所。這些私人業主都被集中起來，統一分配到各個勞動地點。很多人被抄家，抄出來的東西在電視和報紙上公之于眾，作為這些小販生活奢侈的證明。一夜之間，小販和私人業主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除了抄家和沒收財產，很多店鋪被砸，業主被打。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華裔在古巴經商，他們成了這次運動的犧牲品。

在這場打擊和取締私人商業的運動中，一共有 57,000 多個私人產業(絕大多數是小攤販和小店)被沒收。它不僅有應付當時的政治經濟困難的用途，而且有更深刻的歷史背景，反映了國際共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一種烏托邦幻想：消滅商業和小生產，建立一個完全由國家統一調撥所有物資的經濟。古巴黨報週刊《格拉瑪》4月初發表的社論引用了列寧的「小生產是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量的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名言(這句話也是 70 年代中國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主要「理論根據」)，用它來說明這場鬥爭的性質，宣佈「我們必須徹底拔除商業制度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根源」。

古巴的特色是在消滅了私人商業之後，並不是像蘇聯和中國那樣由國家商業機構出面組織和安排生活物資的調配，而是成立了一個由政府 and 「保衛革命委員會」共同負責的「人民管理者委員會」的半官方群眾組織，其職能從調配生活物資到管理店鋪和監察生活服務部門，無所不包。卡斯特羅是想以此來開創一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管理社會流通領域的先例。

(四) 全國總動員和勞動軍事化

古巴社會自從60年代初就被逐步地組織化了，除了黨、團、工、青、婦和少先隊這些從蘇聯照搬過來的以外，上文提到的「保衛革命委員會」是古巴的獨創，它在形式上像中國的居民委員會，但職能卻大得多，從監視異己份子、貫徹政府號令到監督地方學校和注射預防針，幾乎無所不包，幾成半個地方政府。此外還有許多職能匪夷所思的組織，例如一個叫「教育的戰鬥母親」，其職能是統一監督小學生的課外作業和活動，在學校教師參加義務勞動時代替他們去教學。可以說，古巴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在組織的管理和監督之下。正是依靠這些組織，卡斯特羅得以動員整個國家投入「革命攻勢」。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線是最大規模地動員城市居民下鄉勞動或者從事建築工程。1967年卡斯特羅提出一個「環哈瓦那綠帶工程」計劃，要把哈瓦那周圍全部種上咖啡和柑桔，這個工程就靠哈瓦那居民的「志願」勞動，從1968年開始實行。卡斯特羅的理論是：城市是靠農村養活的，革命後城裏人必須自己養活自己。他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如果你要喝咖啡，就必須自己去種。」在數十萬哈瓦那人下鄉後，他宣佈「哈瓦那省現在不是國家的負擔了」。

勞動軍事化是「革命攻勢」的又一條主要戰線。1968年，古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成員都作為特派員分頭到各省去指導，省一級的書記和副手就是當地的司令和參謀長，各級地方黨組織和政府以及工廠和農場都照此辦理。每個地方和單位領導都分作兩部分：前線指揮部（設在甘蔗地裏或工地上，由「司令」掛帥）和後勤部（設在原來的機關裏，由「參謀長」坐鎮），人馬也相應分作兩撥。

卡斯特羅的家鄉奧連特省可以作為全省勞動軍事化的典型。

卡斯特羅的弟弟和繼承人勞爾(Raul Castro)親自坐鎮這裏，授予各級幹部象徵性軍銜。「戰鬥」就是假定某一天外敵入侵，警報響起，全體男女老少各就各位，青壯年男子前往「戰場」(即甘蔗地)，婦女在後方接替男人留下的崗位。奧連特省還根據這個軍事化的安排舉行了若干演習。如4月1日全省在淒厲的空襲警報下動員起來，93,000名男子登上卡車下了甘蔗地。在城裏，為了製造真實的戰爭效果，很多工廠甚至拉掉了電源，把工人先趕到防空洞裏，然後再解除警報，讓他們重返車間，有的還故意在照明不足的情況下生產，意在讓這種緊張的戰時氣氛刺激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勞動軍事化使得曠工、遲到早退以及磨洋工等等都成了由「戰場紀律」處置的問題。大量的勞動營被組建起來，收容那些受「軍法」制裁的工人，強制他們幹艱苦的工作。勞動軍事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大量的軍隊成建制地派到勞動前線，有的地方軍官直接代替了行政長官在指揮。總之，古巴全國在這種勞動軍事化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軍營。

(五) 一千萬噸糖與「島國巨人」：「革命攻勢」的主要戰役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役，是卡斯特羅提出的一千萬蔗糖的奮鬥目標。蔗糖是古巴唯一能換取外匯、維持國內經濟的大宗出口產品，自1965年卡斯特羅第一次為蔗糖生產制訂指標以來，沒有一次產量達標，長期徘徊在六七百萬噸左右。1969年是古巴革命十周年，卡斯特羅兩年前就提出要在這一年內達到一千萬噸產量。1968年3月，他甚至說這個產量已經不是一個經濟指標，而是革命的榮譽了。他把這一年命名為「決定性奮進的一年」(古巴

革命後頒布了新的革命曆法，每年都有特別的年號，如農業改革年、組織年、團結年、英勇的越南人民年、英勇的遊擊隊員年等等)，把整個古巴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動員到了極限，統統投入到甘蔗地裏。

1969年1月2日，近百萬古巴人從半夜就開始排隊進入哈瓦那的革命廣場，收聽卡斯特羅將在早上十點開始的講話。卡斯特羅在這次講話中宣佈為了讓更多的食糖出口，糖要實行配給。此外，他還宣佈將1969年和1970年的頭七個月加在一起算作一年，這是為了一千萬噸糖而戰鬥，而且取消1969年所有假日，把年底的聖誕和新年假日延至翌年的7月份，放在一千萬噸糖的勝利一起慶祝。這樣，卡斯特羅把日曆也改變了。1月底，他說一千萬噸糖「將使古巴變成巨人」，這種「島國巨人」的心態就是他發起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潛意識。6月14日，卡斯特羅來到奧連特省參加砍甘蔗開工儀式，並宣佈一千萬噸糖的戰鬥正式打響。

(六) 創造「新人」：「革命攻勢」中的榜樣塑造

古巴革命的一個特點是始終把塑造「新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格瓦拉首先提出革命要創造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人」，這樣的人是革命車輪上的「幸福的、有覺悟的、有自己特點的齒輪」。格瓦拉死後，卡斯特羅在發動「革命攻勢」之前曾把格瓦拉樹為全體古巴人，尤其是古巴青年的榜樣。在為格瓦拉舉行的追悼大會上，卡斯特羅提出讓古巴青年全都成為格瓦拉那樣的人。

古巴當時還樹立了很多「新人」的集體典型，最突出的是松樹島青年公社。松樹島在古巴南面加勒比海上，革命前是監獄，卡斯特羅等人曾在那裏坐過牢。1965年，這個島被交給古巴共青

團，先後有五萬左右青年人移居島上，在那裏開荒。卡斯特羅的目標是把這個島變成古巴出口柑桔的基地，產量要超過整個美國和當時另一個大量出口柑桔的國家以色列的總和。島上實行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報酬完全平均主義化，唯一的區別是每個家庭人口的多少。卡斯特羅曾經多次說過要取消金錢在分配中的作用，這個目的在青年島上基本實現了。青年島成了社會主義古巴的共產主義飛地。在「革命攻勢」開始後，大量的古巴人被組織成「縱隊」來到這裏，一邊參加勞動一邊取經，準備回去推廣。這個島也是外國客人來訪的必到之處，卡斯特羅常常親自陪同外國人前來，向他們介紹這裏的「新人」實驗。

(七) 教育革命：「革命攻勢」的另一條戰線

在「革命攻勢」和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中，教育是一條重要戰線。卡斯特羅本人對教育、特別是早期教育有特別的熱情。還在馬埃特臘山打遊擊時，卡斯特羅就對一個來訪的法國記者暢談了他心目中未來的農村公社：把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家庭分開，一出生就過集體生活，自幼年就參加勞動。這些都是農村公社道德教育的基本措施。

從60年代早期開始，卡斯特羅就根據這個原則大力改造舊教育，創造新教育。古巴斥鉅資在農村建立了許多新學校，把城市少年兒童送到鄉村，讓他們在和家庭、父母、城市環境相隔絕的情況下接受軍事化的教育，把學習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1960年古巴就建立了一個培養小學教師的學校系統，學校全部設在山村和邊遠地區，挑選13歲以上的少年男女住在那裏接受長達四五年的訓練。實踐兒童與家庭隔絕、受到無區別對待的寄宿制學校也

受到大力提倡。60年代下半期，略早於「革命攻勢」，卡斯特羅又提出了「學校辦到農村去」的計劃，古巴全國的中學，每年要有一兩個月把全體學生和教師送到農村去，在那裏邊勞動邊學習。此外，學校辦工廠、農場，和農場、工廠辦學校，當時也是教育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和中國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非常類似。

在「革命攻勢」中，這些已經實行的措施得到進一步強化，同時高等教育成為了主要目標。和毛澤東一樣，卡斯特羅對高等教育的基本態度是輕視課堂教學和高級研究，對高級知識份子尤其蔑視。他本人是學生革命家出身，一直主張學生造老師的反。在革命剛勝利的1959年4月，他就在哈瓦那大學對學生說要讓他們來修改教科書，讓他們教老師甚麼是對和錯。他還把舊大學貶得一文不值，說那裏充斥著騙子和不學無術的人，是一個「腐爛的、對欺詐比對教學更感興趣的地方」。1969年3月，「革命攻勢」期間，他又來到哈瓦那大學發表有關係統的大學改革的講話。他說古巴需要的是技術人才，高等教育要改變過去那種把腦力和體力勞動分開的做法。大學要大大縮減，變成技術學院，每個專業都要在實踐中完成學業，學農的下鄉，學工的下廠，學畜牧的進養殖場，學制也要縮短。他還提出要大大縮減乃至取消人文學科。總之，他說古巴要成為一個「技師的民族」。對高級知識份子，卡斯特羅有一個嘲笑的说法，叫做「人行道上的農學家」，用來指那些在他看來不學無術或是只有一些迂腐學問的知識份子，他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連一行莊稼都沒有種出來。

(八) 蘇聯入侵捷克和「革命攻勢」的升溫

古巴的「革命攻勢」是在和蘇聯集團發生理論和政策分歧的

情況下展開的，然而蘇聯 1968 年 8 月對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鎮壓卻為古蘇和好創造了條件，使得「革命攻勢」更加升溫。蘇聯入侵捷克後遭到舉世譴責，然而和蘇聯關係冷淡的古巴卻出乎意料地表示支持。卡斯特羅在 8 月 23 日晚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他完全同意蘇聯對捷克局勢的分析——在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和政治滲透下，捷克正在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倒向西方陣營。雖然他承認，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說，華約國家的軍事行動是對捷克主權的破壞，但社會主義者只能從政治的必要性去接受這個「令人痛苦的」事實。

卡斯特羅之所以支持蘇聯的行動，是為了達到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前一階段的改革思潮算總帳，讓蘇聯人知道捷克的演變正是他們曾經鼓勵的改革政策的惡果。卡斯特羅說，存在於捷克的很多現象也存在于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特別是對物質刺激的提倡和對個人利益的縱容。他引用塔斯社的聲明，其中說：不幸的是，在捷克，經濟改革的討論發展到了危害社會主義原則的地步。卡斯特羅問道：

「我們很想知道這是否意味著蘇聯打算在經濟領域限制那種日益導向商業關係和自發傾向的現象，是否打算限制那種日益為市場的用途和市場在決定價格的過程中的作用而辯護的做法？蘇聯是否意識到了必須制止這種傾向？」^[1]

他還大力批判了蘇聯東歐國家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的幻想。在批判社會主義陣營自由化的問題上，他把根子一直挖到了南斯拉夫和鐵托身上，反對蘇聯在 1965 年和南斯拉夫恢復友好關係，這樣卡斯特羅就把問題一直追到了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

卡斯特羅的這次講話是國際共運史上反改革勢力的早期宣言書。藉捷克事件，卡斯特羅宣佈了蘇聯東歐改革路線和和平共處

政策的破產。無疑，這次事件更堅定了卡斯特羅的信念。半年後，1969年初他就發起了一千萬噸糖的戰鬥，把「革命攻勢」推向高潮。

(九) 「革命攻勢」的失敗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役是一千萬噸糖，這個指標是整個運動勝敗的象徵。1969年11月，政府宣佈取得了按時達到第一個百萬噸糖指標的勝利，但接下來的百萬噸卻一次比一次晚。政府取消了星期天的休息，和平時一樣勞動十二個小時。為加強對工人勞動的監督，政府發佈了第1125號法令，規定為每個工人建立勞動檔案，上面載有個人歷史、勞動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覺悟」的程度，它是確定工資、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等等的憑證。

然而，全國總動員加上嚴刑峻法都於事無補。到了1970年5月，所有人心裏都清楚：一千萬噸糖是個無法完成的指標，但誰都不知道如何替卡斯特羅找到一個承認失敗的場合和台階。就在這時，流亡美國的古巴反革命在公海上綁架了幾個古巴漁民，提出用他們來交換古巴的政治犯，卡斯特羅利用這個事件掀起了一場新的反美運動。數十萬群眾包圍了瑞士駐古巴大使館(瑞士大使館的房子是前美國使館的所在地，瑞士大使館又是美古斷交後兩國之間打交道的中間人，因此是全古巴最能令人想起「美國」這兩個邪惡字眼的地方)，威脅要衝進去。這件事引起了一場外交危機，後來美國聯邦調查局迫使古巴流亡份子釋放被綁架的漁民回古巴。卡斯特羅親自去歡迎這些人，並把他們帶到圍困瑞士大使館的現場，作為一場反美鬥爭取得勝利的象徵。就在這次大會

上，他第一次宣佈沒有達到一千萬噸糖的指標。

7月24日是甘蔗收穫期的結束，政府宣佈產量是850萬噸。7月26日，在紀念「七二六」（即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羅帶領人馬襲擊蒙卡塔兵營，這是卡斯特羅武裝鬥爭的開始）的講話中，卡斯特羅承認一千萬噸糖的戰鬥失敗。他說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人對「客觀因素」判斷失誤，並說要為這個重大失誤追究責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自己提出「辭職」，但在群眾的反對聲中收回了這個要求（在群眾大會上宣佈重要決定並由群眾的呼喊來「批准」，是卡斯特羅「直接民主」的主要表現），然後他撤換了糖業部長和教育部長。

和一千萬噸糖差不多同時展開的「環哈瓦那綠帶工程計劃」這時也面臨失敗。無數工人、幹部、學生和家庭主婦辛苦了一年多，開荒種地，撒下了十億顆咖啡種子，長出來的咖啡樹卻不結果，原因是哈瓦那地區不適合種植咖啡。

由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和其他工作在一年半以來都圍繞著一千萬噸糖而運轉，這場戰鬥的失敗使得古巴的經濟陷於癱瘓狀態，其嚴重性到了無法掩飾的程度，連卡斯特羅自己也不得不在「七二六」的講話中承認，領導人已經讓古巴人民付出了太大的代價。8月份他對古巴婦聯大會發表講話的題目就是〈自我批評〉；9月份他在另一次講話中說：「讓我們再也不要像過去習慣的那樣把一個來自於我們頭腦裏的主意直接在實際中實施，這樣的方案常常在現實世界中碰壁。」[2]

以一千萬噸糖為中心的「革命攻勢」的失敗，在古巴革命後的歷史發展中影響深遠。在一段時間裏，卡斯特羅汲取了這次失敗的教訓。自1970年開始，古巴黨和政府逐步放棄了直接依靠群眾運動來完成經濟計劃的做法，對最高領導人在制訂經濟指標時

的隨心所欲和直接干預也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時，一些過去受到忽視的機構和制度開始建立和健全，向蘇聯模式看齊。西方研究古巴的人士將這種舉措稱為革命的「制度化」，意為革命有了一定的制度束縛，不再一味地激進化和用非常規的手段來達到經濟和社會目的。

結語：古巴模式的大躍進和文革

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是兩個分別開展的運動，前者以經濟指標為主，背後的動機是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後者則基本上是一場沒有經濟指標的純政治運動。而古巴的「革命攻勢」可以說是古巴模式的大躍進和文革的結合，兼具政治和經濟雙重目的。在現象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和古巴的這些運動之間存在著許多相同點，例如：用揪出黨內反對派作為運動的開始；在社會上確定一個階層作為公敵，然後發動群眾進行批鬥甚至抄家；全國總動員，使用遠遠超出常規的手段去達到一個並不現實的經濟指標，甚至正常的工作全部停頓下來，一切圍繞著中心任務運轉；在人民群眾中用個人和集體的典型強行推廣普通人難以做到的道德標準，存公廢私；在教育方面要徹底廢除重視基礎教育和高級研究、以全面發展人的個性、心智和道德為目的的教育制度，發展起一種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在知識上只強調實用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教育，目的是培養一種政治上完全定型的、技術上能適應普通工農業生產需要的中低級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際背景下，中國的大躍進、特別是文革和古巴的「革命攻勢」，都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和挑戰。所謂蘇聯模式，這裏指強調物質基礎、技術水平，現實地制訂經濟發展指

標，依靠官僚階層和技術人員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完成經濟計劃，以及有限的經濟改革，承認個人物質利益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等等。在6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圍繞「利普曼主義」的討論中，這些都是蘇聯東歐陣營的熱門話題。而中國和古巴這兩國之所以反對這個意義上的蘇聯模式(而非高度集權或計劃經濟意義上的蘇聯模式)，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外，經濟上是因為它們沒有蘇聯那樣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物質和技術水平，只能訴諸他們所獨有的或者說唯一的資源：群眾運動和政治覺悟。

在更深一層的意義上，古巴的「革命攻勢」和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一樣，都是一種尋求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形式。或者在保守一點的意義上來說，是希望通過和平年代的繼續革命，確保已經達到的覺悟水平不至下降，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作好準備。1968年，古巴總統多鐵戈斯(Osvaldo Dorticos)對外國客人說：古巴正在用最快速度進入共產主義，其主要方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轉變古巴社會。針對馬克思主義對物質基礎的強調，他說：「馬克思設定了最終目標，解釋了未來社會的性質，剩下的問題就僅僅是找到正確的方法去到達這個目的。手段越合適，達到目的的速度就越快。」在這個意義上，他用蘇聯作為反面教材：「自從1962年以來，俄國人共產主義講得越來越少，利潤和恢復市場機制講得越來越多。」他甚至對社會主義是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這個當時國際共運公認的原則提出質疑：「一些東方國家(指社會主義國家——本文作者注)的理論家試圖用他們的改革把社會主義階段永久化，而不是把這個階段看作從資本主義通往共產主義道路上的一個短暫的休息站。」[3]

令人深思的是，儘管古巴的「革命攻勢」和中國的大躍進、文革之間存在著現象和本質上的相似，但基本上卡斯特羅在發起

這場運動時並沒有受到中國的影響或啟發。古巴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1965年為界，之前雙方維持友好關係，卡斯特羅在中國和蘇聯之間維持平衡。但隨著古巴經濟日益依靠蘇聯，以及中國1964年開始削減對古巴的大米輸出，中古關係惡化了。卡斯特羅在1965年1月的新年講話中挑起了中古論戰，但這場論戰只持續了幾個月就沉寂了。此後古巴對中國的態度是不罵也不提，例如從1966年2月到1970年左右，《格拉瑪》基本沒有單獨的介紹或報導中國的情況，只有在1966年6月的一次報導中介紹了北京大學的人事變動，這是對中國文革和整個中國情況唯一的一次報導。相比之下，越南和朝鮮倒是經常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根據一些在這個時期訪問古巴並和卡斯特羅等高級領導人有過密切接觸的西方左派人士的記載，卡斯特羅對中國以文革為高潮的極左路線很有好感，但具體瞭解得很少。例如，波蘭共產主義者卡洛爾(K. S. Karol，此人因對蘇聯模式不滿而長期住在巴黎)60年代訪問過中國，並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另一個共產主義》(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的書。次年當他訪問古巴時，發現古巴政府把他書中的部分章節編成小冊子在內部發行。他所遇見的一些讀過這本小冊子的幹部都對中古之間的論戰表示不解，因為雙方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平均主義和反對物質刺激——實在太相近了。卡斯特羅這樣對他說：「中國人也許正在做令人感興趣的實驗，但我們比他們走得更遠。在他們的社會計劃中，錢還是核心，雖然是從平等的角度，而俄國人則處心積慮地鼓勵收入的不平等。我們則想擺脫金錢的神話，而不是去遷就它。我們要把錢徹底廢除。」[4]卡洛爾還提到，古巴一些幹部把他們的「革命攻勢」稱為「古巴版的文革」。卡斯特羅和古巴領導層就是從這些很有限的材料來源來瞭解中國的文革，因此可以

說，「革命攻勢」完全或至少基本上是古巴自己的產物。筆者之所以認為這個事實令人深思，是因為在採用計劃經濟和國家控制等方面，古巴都有清楚的先例可循。例如革命剛勝利時，他們在1959年和1960年(當時古蘇尚未恢復由於巴蒂斯塔1952年政變後中斷的外交關係)甚至請過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去給他們上計劃經濟的課，但在實行更左的路線時卻完全是自覺和自發的。在我們理解和分析二十世紀國際共運的本質時，這種自覺性和自發性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注釋】：

[1] [2] 古巴黨報英文週刊《格拉瑪》，1968年8月25日，1970年7月3日。

[3] [4] K. S Karol, *Guerrillas in Power: the Course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0) 357-359; 342-343

第七篇

秘魯的小毛澤東和他的「光輝道路」

引言：鄧小平——利馬大街上的死狗

1980年底，秘魯首都利馬的大街上，幾條死狗被頭朝下吊在樹幹下，血淋淋的身上貼著紙條，上面用西班牙文寫著一個中國人的名字：鄧小平。與此同時，中國駐秘魯大使館受到炸彈和手榴彈的襲擊。暗殺，襲擊警察局，破壞選舉站等暴力行動在秘魯的城鄉頻繁地發生，「人民戰爭」的傳單在大街小巷雪片一般飛舞。

把鄧小平比作死狗，並自命為毛澤東思想的傳人的，是秘魯共產黨的極端派別「光輝道路」(Shining Path)。從1980年到1992年，秘魯共產黨的「光輝道路」派在古茲曼的領導下發動了一場以毛澤東哲學思想、造反理論和痞子精神為基礎的「人民戰爭」。如果古茲曼的革命成功，他無疑會成為南美的紅太陽和哲學導師。然而，古茲曼的毛式造反沒有變成一場大眾革命，而僅僅流於暴力和恐怖。這段歷史告訴人們：大規模的毛式革命今天已經失去了發展和成功的可能性，但嚴重的社會不公(不但是貧富懸殊，而且也包括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和改變社會地位的途徑)會給無數小毛以可趁之機，不但為那些被排斥到社會邊緣地帶的群體提供打砸搶的發洩機會，而且可能把這種暴力恐怖活動政治化，使社會陷於難以解脫的困境之中。

(一) 從哲學教授到黨內親毛造反派頭子

「光輝道路」的領導人是古茲曼(Abimael Guzman Reynoso)。和20世紀世界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如列寧，斯大林，胡志明，波爾布特等等)一樣，他也有一個投身革命後為告別舊我起的名字，叫岡扎洛(Gonzalo)。他是在成為黨的領導人之後開始用這個名字的。在「光

輝道路」的黨內文件中和集會場合上他都用岡扎洛，黨員在提到他時用「岡扎洛主席」。用這個名字稱呼這個人本身就代表了敬意和服從，是一種政治表態，只有黨外人甚至敵人才用他的本名。

古茲曼在黨內有兩個稱號。一個是「Puka Inti」，在南美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語言中是「紅太陽」。和文革中中國人對毛的敬稱相比，少了「我們心中的」這個修飾，略遜了一籌。另一個稱號初聽上去不那麼令人起敬，但卻十分生動，叫做香波。香波是用來洗頭的，黨員們用這個詞來表示他們的領袖會給人做思想工作，即洗腦。

古茲曼是非婚生子(生於1934年)，原來由母親撫養，少年時其生父(是個商人)把他帶到自己家，送他進了一所天主教高中。高中時古茲曼成績優秀，但性格非常內向。高中畢業後古茲曼進了阿裏奎帕(Arequipa)的聖奧古斯丁大學(San Agustin University)學哲學，在那裏他遇見了兩個對他的生活和思想至關重要的人。一個是哲學教授羅德里格斯(MIGUEL Angel Rodriguez Rivas)。羅德里格斯以德 國古典哲學為業，自視甚高，周圍聚集了一批好學深思的學生，他像康德和黑格爾一樣指點他們，並辦了一份叫做《人與世界》的雜誌，其宗旨是通過哲學思考改造人進而改造世界。古茲曼為這個雜誌寫過一些文章。另一個對古茲曼有影響的人物是畫家德拉列瓦(Carlos de la Riva)。德拉列瓦是個共產主義者，但卻不是個共產黨人，不被秘魯共產黨接受，因為他比他們更共產黨。德拉列瓦崇拜斯大林，他認為斯大林道成肉身了所有為革命成功所必需的美德：不妥協，堅忍，克己，大無畏，貫徹革命的辯證法時毫不拖泥帶水。當赫魯曉夫背叛斯大林後，蘇聯的顏色變了，德拉列瓦就轉向革命烈火仍然毫不屈服地熊熊燃燒的中國。他在五十年代去了一趟這個他心中的聖地，回來後出版了一

本書，題目是《在那黎明誕生之處》。

從羅德里格斯那裏，古茲曼學到了對所有共產黨領導人都有吸引力的那種宏大壯闊而又不著邊際的哲學思辨和辯證法概念遊戲；而德拉列瓦吸引他的，則是把革命和藝術有機結合起來的浪漫激情，對原則的執著，對所有與革命無關的事物的不屑一顧，以及對毛澤東的中國的崇拜。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就使得這個世界上多了一個極其妄自尊大的，而對某些人來說又特別有吸引力的個性。

1960年，古茲曼唸完了博士，論文是關於康德的空間理論。可惜的是，古茲曼的革命沒有成功，不然秘魯人民會成為這個世界上繼毛澤東教誨下的中國人民之後最有哲學修養的民族，從煉鋼工人到放羊娃人人都會談對立統一和一分為二。就在那一年，古茲曼加入了秘魯共產黨。1962年，古茲曼被聘為秘魯國立華曼嘎(Huamanga)大學的哲學教授。華曼嘎在秘魯貧窮落後的阿亞庫喬地區，這個國立大學是政府用來培養技術人才，改變當地落後面貌的。但古茲曼另有使命。秘魯共產黨在阿亞庫喬地區的組織死氣沈沈，古茲曼受命改變這種狀況。他抵達後立刻接管了青年工作，領導激進學生做社會調查，和大學周圍的貧窮社區聯繫，利用大學自治的制度和學生組織招募和培養激進分子，為發動革命打下組織基礎。

在那些年裏，華曼嘎大學的校園裏常常可以看到這個年青哲學教授那清瘦而矯健的身影，飄灑的長髮，敞開的夾克(裏面從不打領帶)，臂下總是夾著一本書，身邊圍著崇拜者，他們多半是出身於貧苦人家(秘魯當時上大學不要錢)的大學生，古茲曼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帶領他們從半文盲一下跳到對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本事提供答案的哲學家。這種哲學家速成班讓很多哲學系的同事感到懷疑，但古茲曼根本不信那個邪。1964年古茲曼結婚，新娘是

當地黨委領導人的女兒，比他小十一歲，也是個忠心耿耿的黨員，死于1990年。

古茲曼投身革命時正趕上蘇共和中共鬧派性，毛澤東要造赫魯曉夫的反，從蘇共手上把世界革命的大權奪過來。在這場全球範圍的文革中，全世界的共產黨都要重新劃線站隊，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因此一分为二甚至為三為四，造反奪權不成就另立門戶，秘共也不例外。阿亞庫喬黨部也展開了路線鬥爭。聽命于蘇聯的一派在黨的會議上掛起了馬，恩和列的三大聖像。古茲曼深知掛不掛斯大林的相片是真假共產黨人的試金石，就像中世紀時羅馬天主教會和拜占廷東正教會爭論哪些算聖靈哪些不能算以及要不要掛聖像一樣，他挺身而出把被赫魯曉夫在蘇聯拿掉的斯大林的相片掛在了列寧旁邊。在激烈的路線鬥爭中古茲曼成長為秘共親華派的代表，開始受到中共的注意。

(二) 從上北京見毛主席到成為秘共的紅太陽(Puka Inti)

1965年，秘共又面臨一個重大考驗。古巴共產黨在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領導下，在蘇聯的全力扶植下站穩了腳跟，開始向拉美大力輸出革命。秘共從親華派中又分出親古派，主張立即展開武裝鬥爭。這種「立即行動」論吸引了很多對長期艱苦枯燥的政治鬥爭和思想教育日益不耐煩的青年。本來中共和古共一樣，也是主張武鬥的，但古巴當時已經投靠蘇聯並和中共交惡，卡斯特羅在群眾大會上大罵毛澤東是老年癡呆，因此親華派和親古派在組織上沒有妥協的餘地。為了和親古派爭奪群眾，親華派也著手進行武鬥準備，這正對本來就著迷於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

的古茲曼的胃口。由於處境危險，黨的領導要他立即轉入地下，並將他送到中國去培訓。

古茲曼究竟是何時去的中國，通過什麼途徑，由誰安排，在那裏呆了多久，這些都還被封閉在近年來避免出頭露面的中聯部的黑箱之內。西方很多文章都提到他到中國時正趕上文革大潮初起，毛澤東數次接見紅衛兵，古茲曼也在人群之中，遠遠地瞥見了天安門上那輪烤得大地萬物不生的紅太陽。考慮到古茲曼是從黨內激烈的路線鬥爭中經過考驗和衝殺出來的親毛造反派，讓他遠遠見一眼毛主席應該是中聯部能辦得到的。他本人也一直以此為榮。不過千真萬確的是，他在北京一處秘密營地或幹校接受了訓練，從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精神可以變物質到人民戰爭如何操作各種武器和發動農民分田分地。儘管古茲曼有德國古典哲學的高深背景，他對中國教官再三叮囑的「只要思想對頭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也可以有槍」的江湖綠林唯意志論哲學深以為然。他對結束爆炸訓練的最後一課印象也十分深刻，那是中國教官教他們如何巧妙使用炸藥，古茲曼說在中國教官手下真是遍地開花，讓你無處可遁。

大約在 1967 到 1968 年之間古茲曼潛回了秘魯，很快成為阿亞庫喬地區黨的領導人。這時他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和黨內的古巴路線作鬥爭。古巴路線是照搬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遊擊戰，以一小撮精幹分子組成遊擊隊四處出沒，打擊政府軍，顯示自己的犧牲精神，瓦解他們的士氣。而古茲曼從中國請來的真經是人民戰爭，要發動農民，建立根據地，轟轟烈烈地鬧一場。他斥責古巴路線是小資產階級軍事冒險主義，和中共當年對格瓦拉的批判一個調子。按說古巴路線已經在拉美經受了考驗，是馬列主義和拉美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倒是古茲曼反而有秘魯的王明或者「二十八個半」的嫌疑。但秘魯沒有毛澤東式的地頭蛇，加上當時中國的文革正使得從拉美到西方的所有左派熱血



光輝道路的宣傳畫，表現了其「革命」和馬列、尤其是毛主義之間的關係。

沸騰，誰要反對中國都先要掂掂自己的斤兩，所以古茲曼在黨內聲望日隆。他那哲學教授的派頭加上新近從中國取回的真經，使得他成為黨內獨一無二的理論大師和指路人，人人都敬畏於他那西方經典(康德黑格爾)和東方玄學

(毛澤東)的結合，他的長篇政治演說和思想教育使那些半文盲的黨員們聽得既不知所云又如醉如癡。

正是從那時開始，古茲曼的黨名「岡扎洛」開始取代了他的本名，黨員們也開始用「紅太陽」來稱呼他。不久，在古茲曼和秘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帕雷德斯 (Saturnino Paredes)之間發生了期待已久的分裂。伴隨這種分裂的，是外人永遠搞不懂也沒有必要去搞懂的「理論分歧」(正如非基督徒永遠弄不懂天主教和東正教當年到底為什麼爭吵一樣)。古茲曼給原來的上司戴上「取消主義先生」的帽子，而帕雷德斯則給他反扣上一頂「機會主義先生」，重演了國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以及文革中五花八門的相互革出教門和刻毒詛咒的一幕。

(三) 秘共內部的「文革」和「路線鬥爭」

這場「路線鬥爭」在華曼嘎和其他大學尤其激烈，演變成了

一場小型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辯論會討論會上彼此指責對方是叛徒和修正主義，散發攻擊性的傳單和小冊子，張貼誹謗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發表冗長的充滿了領袖和導師語錄的論戰文章，最後發展到在會場外面拳腳相向，一派佔領學生宿舍，另一派調兵遣將來圍攻，展開了武鬥。大學校園裏塗滿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岡扎洛思想萬歲！」「岡扎洛主席萬歲！」「打倒一切修正主義！」之類的標語。分裂之後，兩派都認為自己才是正宗的秘共，都不肯另起黨名，都指責對方盜用秘共的名稱。好在他們彼此都有自己的刊物，帕雷德斯的秘共是《紅旗》，古茲曼的秘共是《光輝道路》，他們自己和外人後來就用這兩個刊物的名稱來相互區別，稱為「紅旗派」和「光輝道路派」。

古茲曼一當上「岡扎洛主席」就正本清源，重新解釋黨史，以他為界標往前追述歷史，劃出一條紅線和一條黑線，並在黨內搞整風，幹部們都要學習文件，統一思想，和錯誤路線劃清界限。他說從1930年黨的創始人去世後，秘共就開始犯傾向性錯誤，一直犯到60年代的帕德雷斯，變成取消主義。在此過程中黨內的正確力量不斷進行鬥爭，最終在他岡扎洛主席的領導下才戰勝了錯誤傾向，確立了一條正確路線，從此秘魯革命的勝利才有了保證。這段故事讀來像是毛澤東一當上中共老大，就在寶塔山下清理中共歷史，搞延安整風運動的翻版。和毛澤東一樣，古茲曼也為他的黨分析秘魯社會的性質，澄清黨的綱領，統一大家的認識。他說秘魯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黨的最低綱領在目前是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奮鬥。

古茲曼的整風在黨內也有對象。在同一所大學(華曼嘎大學)內，有一個叫卡瓦塔(Luis Kawata Makabe)的數學助教，他是由古

茲曼發展入黨的，也是個校園裏的風雲人物。他雖然以數學為業，但卻像古茲曼一樣對哲學入迷，也崇拜毛澤東，有學生回憶說選修他的課只要讀毛著就能拿學分。像毛澤東一樣，他擅長把哲學通俗化。在和紅旗派的論戰中，他開設了題為「物質與運動」的系列講座，在兩個小時內能從無機物和宇宙起源一口氣講到秘魯社會的社會結構和階級矛盾，使很多在紅旗派和光輝道路派以及其他派別之間搖擺的學生最終相信光輝道路派掌握了宇宙的絕對真理，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擴大了光輝道路的陣營。他的風頭使得外人往往以為他就是光輝道路的領導人。1972年光輝道路派與另一個左派學生組織大學生聯盟之間發生了一場武鬥，光輝道路派盤據在學生宿舍樓，大學生聯盟化了三個鐘頭攻佔了宿舍樓，俘虜了很多光輝道路的人員，但他們沒有發現卡瓦塔，卡瓦塔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卡瓦塔在光輝道路派中的威望日隆，使得古茲曼有所猜忌。不久他以卡瓦塔的男女關係問題為藉口將他開除出黨。

(四) 「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和「岡扎洛主席的光輝思想」

古茲曼的光輝道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一直處於發展和擴大組織的階段，還沒有展開直接行動。推動這個革命黨通過暴力行動在秘魯社會閃亮登場作政治亮相的，是一個來自大洋彼岸的事件：中共結束了文革，開始了改革開放，這對無比崇拜毛澤東的古茲曼來說有如晴天霹靂。隨著中共「工作重點」的轉移，中南海懷仁堂裏進進出出的資本家日增，革命家日減。中共還和秘魯的軍人政權建立了外交關係。古茲曼憤懣不已，認為這是國際共運中蘇聯赫魯曉夫之後的又一次變修。有一段時間裏他曾經想和

阿爾巴尼亞的風中之燭恩維爾霍查接上組織關係，但阿爾巴尼亞人對紅旗派更有興趣，他只好作罷。古茲曼總結中共變修的經驗，得出了一個結論：毛澤東用文革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黨內出修正主義，但



光輝道路慶祝武裝鬥爭開展五周年
宣傳畫，畫面上是偉大領袖古茲曼。

他做得不徹底，斯大林更不徹底，所以他們死後國家很快就變了顏色。為了反修防修，文革這樣的運動必須經常化制度化。在秘魯，「人民戰爭」必須從一開始就要考慮將來革命永不變色的大問題，甚至在奪權以前就要著手進行準備。這個「光輝思想」後來被稱作「岡扎洛主席的指導思想」，古茲曼的秘共把它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這個說法明顯是來自於毛澤東 50 年代的一個比喻：蘇聯人

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在國際共運的親毛派中，70 年代中期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首先認為毛的文革不徹底（當時毛還在世），這就是他一進城就全盤摧毀城市文明和社會基礎結構的理論背景。在太平洋彼岸的安第斯山下，古茲曼也得出了相同結論，可惜略晚了數年，首創權不能歸他。

正是在中共「紅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茲曼覺得世界革命的火炬現在傳到他手上了，他就是當代的列寧和毛澤東。因此，

「光輝道路」必須挺身而出，反擊世界範圍內的修正主義逆流，在秘魯發動暴力革命。從那時開始，「光輝道路」的會場上，古茲曼那長髮和大鬍子的像被掛在了馬恩列毛之後(甚至斯大林都還排不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岡扎洛指導思想」成了「光輝道路」的標準提法，表明只有安第斯山下的岡扎洛主席才是馬恩列毛在當代世界五花八門的左派中的一線單傳，共產主義教會中碩果僅存的先知。

(五) 發動「人民戰爭」

古茲曼發動「人民戰爭」的社會背景是：自1968年起在秘魯掌權的軍人政權就採取了一些改革政策緩和社會矛盾，如國有化，農業改革，對政治犯循法律程式進行處理等等(古茲曼本人曾多次被捕，但每次都在「光輝道路」聘請的律師的雄辯下獲釋。1979年一月古茲曼再次因其激進的政治活動和暴力傾向被捕，但他不但請到了好律師，甚至還托人找了幾個將軍為自己說情，因而很快獲釋。)秘魯軍人政權的這些變化甚至受到了卡斯特羅的稱讚。在多數左派都緩和與政府的關係，尋求在體制內變革社會的時候，只有「光輝道路」認為現政權是法西斯主義，用假改革來剝奪左派用來號召人民的資本。七十年代末，軍人政權準備把權力交還給文人政治家，在全國籌備選舉，多數左派都準備參加選舉，只有「光輝道路」把選舉看成大難臨頭，在秘密地為暴力鬥爭作準備。黨內有一些老戰士也受到了「和平過渡」思想的腐蝕，對「人民戰爭」持有異見，古茲曼毫不猶豫地將他們開除出黨。

1980年春，「光輝道路」的領導核心舉行了暴力鬥爭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在會上，為了鼓舞士氣，古茲曼拿出1850年美國作

家華盛頓歐文的小說《馬胡買特的生活》(The Life of Mmahomet)，小說描寫幾個生活於荒漠的部落如何在堅定信念的激勵下征服世界的故事。古茲曼要告訴追隨者的是：他們雖然是少數，但最終勝利是在他們這一邊。一個月後，「光輝道路」展開了他們聲稱的「人民戰爭」和「持久戰」。「光輝道路」的第一次暴力行動是襲擊一個鄉村的選舉站，砸毀選票箱，燒毀選票。他們在秘魯首都利馬的第一次暴力亮相是1980年六月，組織200人用莫洛托夫雞尾酒瓶(燃燒瓶的別稱)襲擊一個區政府。之後，他們對交通和電力系統進行斷斷續續的襲擊，造成交通中斷或大面積停電。他們也選擇偏僻地區或孤立無援的警察局或地方政府下手。他們的另一個經常性的目標是地區性的選舉辦公室，摧毀選票箱，殺害官吏和候選人，威脅選民。所有這些暴力行動，被「光輝道路」稱為「用行動來宣傳。」

(六) 「光輝道路」的社會基礎

「光輝道路」的成員結構和世界上多數共產黨和恐怖組織起家時相似，領導集團是既狂熱自負又精於策略盤算的小知識份子，普通成員中多數出身於游離於社會邊緣的家庭：破產或入不敷出的城鄉小生產者，貧苦農民，以及其他因為種種原因淪為社會底層倍受歧視的人。和其他共產黨革命一樣，「光輝道路」的核心和骨幹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和理論背景，而多數成員的政治傾向是粗糙和情緒化的，他們甚至有意無意地放棄了對自己行動的政治和社會意義的深入思考，把這個責任完全交托給了黨的高層知識份子，在反覆的洗腦過程中把黨的理論植入自己的內心。儘管黨組織有大套理論來論證其政治行動的合理性，但在多數成員那

裏這種理論被簡化成了幾句口號。「光輝道路」的基層骨幹中，二十到二十五歲的大學生佔了多數，這是它的一個特點。

由於秘魯實行免費上大學，窮人子弟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然而這些人是帶著對社會不公的滿腔憤懣進大學的，加上其知識和思想準備並不充分，所以特別容易受在大學中自由傳播的激進思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自治制度成了激進思想和組織的溫床，在「光輝道路」正式亮相之前，秘魯激進左翼力量在校園中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了。閱讀「光輝道路」早期在大學中活動的材料，中國人會感嘆這是什麼樣的大學，學生們竟然如此自由自在無法無天！除了大學生外，出身貧窮的印第安少年也是「光輝道路」中活躍的力量，而且是最好戰，參加暴力鬥爭時最無顧忌的。「光輝道路」既然要發動「人民戰爭」，就必需在某些地區建立所謂「解放區」。他們所選擇的地方，和毛澤東當年選擇湘贛邊界一樣，也是那些不但貧窮，而且各種成體制的政治和社會力量都十分薄弱的地方，換句話說，是一個國家中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的真空地帶。這些地方主要在秘魯的中南部山地，如阿亞庫喬，黃卡菲立卡(Huancavelica)，阿普利買克(Apurimac)和普奴(Puno)。一位秘魯學者一針見血地說：「沒有什麼解放區，只有被棄區。」在這些真空(或被棄)地帶，一小撮有組織有訓練有武裝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加上部分力圖通過參預政治行動改變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的當地活躍分子足以控制一大片人口和地區。「光輝道路」在城裏是打了就走的恐怖分子，但在鄉下無疑得到了部分農民的同情，為他們提供吃住，通風報信，部分青年農民還加入組織。

農民為什麼會同情這個以小知識份子和大學生為主的恐怖組織呢？這或許是一個對研究當代中國農村危機和貧富矛盾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問題。秘魯的農業和拉美多數國家一樣，長期處於大地

產制(種植園制)影響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大地產制開始衰落，但土地佔有不均的局面沒有改變。六十年代末，秘魯軍政府實行土地改革，剝奪大地產，建立國營農莊，企圖以此來把大地產制改造成現代農業。這種改革是一個怪胎：右翼軍政權的國家壟斷加上社會主義集體化和國有化的政策。改革非但沒有滿足許多地區農民的土地要求，反而杜絕了他們進一步改革的幻想，因為改革已經完成了。在國有化的過程中，受命組織國家農莊的官吏和地方權貴勢力勾結，把改革變成中飽私囊的機會，成為農村中新的暴富階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種改革所建立的國有農場效率比過去的種植園更低下，因此 1982 年後秘魯政府再來一個私有化，把國有農場的土地分



光輝道路的宣傳畫：少年被動員起來張貼抵制選舉的口號。

給管理人員和職工。這樣，儘管土地數次易手，農民還是沒分到一杯羹。在那些特別貧窮的地區，農民對國家政權十分冷淡，對富人極其憎恨，農村中缺乏建設性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心理。許多農家子弟接受了一點免費教育(甚至是大學教育)，但在農村找不到出路，在城市又受到歧視，屬於典型的邊緣化群體，有強烈的反社會傾向。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光輝道路」與國家

政權、城市、現存秩序和富人為敵的暴力行動被許多農民尤其是青年視為報復和發洩。

「光輝道路」招募青少年的步驟常常是以集中強化的政治學習開始，以岡扎洛主席對秘魯社會的階級分析為主要教材，把這些青年的憤恨和不滿導向特殊的對象。當通過政治學習，為參加武裝鬥爭做好準備後，組織上會安排他們參加一次軍事行動，在這種行動中新戰士會被安排殺死一個警察或官吏甚至貧民，使得他們感到自己已經沒有退路，只有和組織共存亡。然而，「光輝道路」並沒能移植毛澤東的土地革命和建立鄉村政權的割據模式。這是因為儘管秘魯有政府控制薄弱的貧窮地區，但這種薄弱還沒有發展到能讓反對派從容建立鄉村政權的地步，農民也不相信「光輝道路」能正面對抗政府軍，幫他們保住分到手的土地。毛澤東的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雖然在第三世界國家有很多信奉者，但其實只有在中國才行得通。因此，支持「光輝道路」的農民只是通過這種支持來發洩仇恨，並沒有什麼長遠的政治經濟打算。除了部分農民的自願支援，「光輝道路」的暴力和恐怖也脅迫了很多農民承認他們所創造的新秩序。一位被「光輝道路」招募的農民的話可以讓人們一瞥這個武裝的政治組織是如何控制部分農村的：

「同志們很和善，對人有禮貌。他們幫我們趕走那些曾經聚在這裏的同性戀者，妓女和罪犯。他們命令這些人離開這裏，那些不走的不久就會暴屍於馬路上。沒有哪個當官的敢出來管。另外他們每個星期召集我們開會，聽政治報告。他們告訴我們什麼是剝削，讓我們知道現在黨會來幫助我們。但最好的變化是警察現在不敢欺負我們了，也沒有人敢偷東西。你可以把你的汽車放在馬路上，不用上鎖，放幾天都不要緊。」

「光輝道路」沒能建立毛澤東式的農村根據地，但在其他方面卻盡其所能地貫徹毛澤東模式。除了把暴力和破壞合法化理想化之外，在黨與軍隊的關係上，古茲曼的理論是軍黨合一，軍事行動就是政治行動，黨在農村的活動是通過武裝鬥爭來體現的。他們甚至把中國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照搬過來。一個把這事記錄下來的當地天主教傳教士因為不瞭解其背景，還誤以為這些戒律體現了宗教道德觀念。而在筆者所見到的西方學者論述中也沒人提到這些戒律是中國的舶來品。(與此類似的是也沒人提到「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的說法來源於毛澤東)。

在城市，「光輝道路」的社會基礎相對薄弱。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在所有成體制的社會組織中，「光輝道路」的影響都十分有限。例如，它從未能滲入秘魯全國性的工會和教職工會中，而這兩個組織恰恰在秘魯城市生活中影響很大。「光輝道路」也極少參加全國性的罷工(難得加入一次就大吹大擂，說它的加入在秘魯工運史上劃時代的云云)。在這一點上，「光輝道路」也沒能貫徹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一方面把凡是沒有被自己控制的工會一概斥為「黃色工會」，另一方面不妨利用「黃色工會」的合法身份進行政治活動。在革命的策略性上，古茲曼比毛澤東差遠了。

(七) 典型的「光輝道路」戰士

「光輝道路」的幹部戰士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一個名叫替娜羅森堡的研究拉美暴力問題的美國學者在一篇訪問記中為讀者留下了生動的描繪。

羅森堡訪問過秘魯多次。她有一個叫加非爾的「光輝道路」

朋友。加非爾十四歲就參加了革命，這在他的同志中並不稀罕(與此類似的是，紅色高棉的戰士中很多都是鄉村少年兒童，當紅色高棉打進金邊時，城市居民驚奇地看到很多「戰士」和他們手上的A47衝鋒槍一樣高。但他們不久就發現這些「紅小鬼」是最兇狠最殺人不眨眼的)。1990年當羅森堡再次和加非爾相遇時，他23歲，已經坐過四年牢，當時是個學法律的大學生，但大部分時間都化在參加老家的武裝鬥爭上。加非爾把羅森堡領到自己在農村的家中。加非爾的母親一見到這個美國人就開始訴苦：「要是你知道這個孩子給我帶來多少麻煩就好了。他的生活中只有政治，現在把他妹妹也帶到那個組織裏去了。什麼樣的孩子才整天什麼事也不幹，拿著槍四處殺人?該死的恐怖分子！」她覺得既然兒子把這個美國人帶到家裏，他起碼很尊敬這個外國人，於是說：「你能把他帶到美國去嗎?」而加非爾對羅森堡說：「我從不指望我媽能理解我的政治活動。她覺悟太低，我改變不了她的思想。有什麼辦法，誰讓她是我媽呢!我進大學學法律，已經是對她的遷就了！」加非爾還把羅森堡領到自己的大學裏。這裏到處可以看到大鬍子戴墨鏡的古茲曼畫像，背景是鐮刀斧頭的紅旗。牆上貼滿了標語，例如「打倒新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運動：戈爾巴喬夫背叛了人民革命！」旁邊有一條毛澤東語錄，加非爾要羅森堡唸給他聽：「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加非爾深深地點頭，回味著毛澤東的每一個字。

1986年時「光輝道路」在秘魯的幾所主要監獄中的囚徒發起了一場暴動。暴動是由古茲曼下令組織的，很多人都覺得沒有成功的希望，但他們必需貫徹古茲曼的正確路線，結果260多個骨幹死於那次自殺性的行動。加非爾也是那次行動的參與者，他問羅森堡怎麼看待那次暴動，羅說你們損失了260多人。「不對，

正確的看法應該是那次屠殺揭露了法西斯政權的真面目，向世界顯示了我黨的英勇氣概。那些犧牲的同志仍然活在我們中間，告訴我們怎樣為了革命而獻身。」羅森堡還在「光輝道路」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化裝成囚犯家屬訪問了一所監獄中的女牢。這個專門關押「光輝道路」的女牢區有 82 個囚徒，整個區域完全處於她們控制下。房間裏貼著毛澤東和古茲曼的照片，覆滿了紅色飄帶，上面寫著「新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囚徒們每天 6 點半起床，集體做早操，唱革命歌曲，聽早新聞，然後各人按組織分配的任務去打掃、烹調、做手工拿到獄外出售，或是準備在來訪日給客人做政治宣傳的材料。當客人來訪時，女囚們圍成圓圈，在吉他和印第安鼓的伴奏下載歌載舞。

羅森堡採訪了一個化名努里亞的 26 歲女囚。她問努里亞為什麼「光輝道路」如此崇尚暴力，努里亞說資產階級從來不會自願放棄政權，只有修正主義才對和平過渡寄與希望。在她看來「暴力」和「站在人民一邊」是同義詞。羅森堡問她如何看待那些無辜的受害者，那些因為擁有一輛自行車就被視為富人而受到暴力懲罰的人？努里亞聳聳肩說任何戰爭都有代價，「每天有 6 萬個兒童在饑餓中掙扎難道不是代價嗎？」那麼怎樣看待國際共運在 90 年代的巨變呢？中國不久前的天安門事件在努里亞看來是中國學生在毛澤東思想鼓舞下和修正主義作鬥爭，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揮舞毛澤東像！古巴還沒有經歷過一場真正的革命，一小撮資產階級官僚控制著國家。阿爾巴尼亞被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所把持。波爾布特有一些正確的思想但沒有一個正確的黨。

在獄中用過午飯後，訪客們觀看了女囚們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文藝表演。她們穿著紅色短衫，黑裙子，戴著毛式軍帽，步伐整齊，手中揮舞著紅旗、毛澤東和古茲曼的像，緊握木頭做的衝

鋒槍，單調而鏗鏘有力地唱著：衝衝衝，殺殺殺，我們要埋葬舊世界，創造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八) 「光輝道路」黯淡的盡頭

從1980年到1992年，「光輝道路」的暴力行動使得秘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數十萬人死亡，許多社會基礎設施被摧毀，一些地區陷於癱瘓，成千上萬農村居民逃到城裏。全國上下被恐怖活動搞得人心惶惶。曾經同情「光輝道路」的秘魯農民逐漸對無節制的破壞和毀滅感到厭倦，對用暴力迫使他們「革命」的行為深感恐懼，很多地方的農民響應政府號召組織起了民間自衛委員會。這就使得「光輝道路」的暴力行動更加不分對象，全社會都成為他們報復的目標。

1990年六月「光輝道路」襲擊了阿亞庫喬地區黃塔(Huanta)的一個農民村社，屠殺了二十個農民，包括婦女和兒童，還燒了四十所農居。這一事件震驚了全國。類似的打砸搶燒的行動有很多起。在一些地方，「光輝道路」的武裝分子攔下公共汽車，從車上把乘客趕下後集體屠殺。他們甚至把一些參加投票的農民的食指砍掉(秘魯的投票方式是用食指在選票上按指紋)。「光輝道路」襲擊和破壞的對象還包括大學在農村的實驗基地。這樣，「光輝道路」就從最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眾不滿的政治暴力組織變成純粹為暴力而暴力的政治恐怖團夥，其社會基礎大大萎縮。

1992年8月，秘魯警方一舉破獲「光輝道路」的領導集團，古茲曼本人也被捕。消息傳出後，秘魯全國都像是一顆久懸的心終於落了地，世界輿論也紛紛對這個拉美的重大事件進行深度報導，就連中國大陸的報刊，也透露出這個恐怖分子60年代曾經在

中國受過訓練。1992年9月24日，被囚禁在一個鐵籠子裏的古茲曼會見了記者，發表了著名的「籠中演說」，號召他的追隨者將正在展開的第六大戰役進行到底。但第二年，他的一封要求和政府合作的信傳了出來，使得其所剩無幾的門徒四分五裂。至此，「光輝道路」變成了窮途末路。如果說毛澤東的革命確實轟轟烈烈地鬧了一場，改變了全體中國人的命運，那麼古茲曼的「光輝道路」只是一個拙劣的摹仿，一出人見人厭的鬧劇，一場不折不扣的動亂。

結語：革命政黨、恐怖組織、黑社會加哲學玄談

把「光輝道路」的興衰放在二十世紀革命史的大背景下來看，人們可以發現很多有意義的問題：

「光輝道路」既是革命政黨又是恐怖組織和黑社會。說它是革命政黨，是因為它有大套理論，要推翻現存秩序，改造全社會；說它是恐怖組織和黑社會，是因為它崇尚暴力，不擇手段，置所有道德戒律於不顧，殺人不眨眼。它的個人崇拜也結合了革命黨的領袖至上和黑社會的老大崇拜；

它表面上有咄咄逼人的道義優勢，譴責社會不公，處處以窮人的代言人自居，自己實際上不但是不勞而獲、靠用暴力剝奪他人勞動成果度日的寄生蟲，而且還要破壞它寄生的肌體，在此意義上比寄生蟲更壞，是癌細胞；它自己拋頭顱灑熱血，但砍起別人的頭來更不手軟。自己的犧牲成為屠宰他人的理由，自己的生命沒有獨立的價值，別人的性命更不值錢；

它以「精神解放」為號召，實際上卻實現了領袖對追隨者的心靈奴役。「光輝道路」用古茲曼思想給信徒洗腦的結果是造就

了絕對服從、把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給領袖支配的群盲；

它自命為代表了社會上多數人的利益，實際上其組織是和社會相隔絕和對立的，對「社會」始終懷有戒懼心。「光輝道路」和外部社會之間界限分明，它有一些「週邊組織」(如婦女，青年協會等等)，既用作聯繫渠道，也用緩衝地帶；「光輝道路」的成員把組織當作自己的家，性夥伴和婚姻對象多半是同志。除了同志，沒有或者很少有一般意義上的朋友，即使有也是為了黨的利益去交朋友。因此，加入「光輝道路」，實際就是加入了一個有特殊利益和心理紐帶的群體，黨不但控制了成員的思想和政治觀點，甚至控制了他們的感情和心理，把他們從社會和家庭中剝離出來。所有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和組織的共同點。

然而，筆者覺得特別值得一提(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是「光輝道路」的哲學背景和組織發展以及暴力鬥爭之間的聯繫。「光輝道路」是一個極端崇尚暴力的政治組織，其成員在行使暴力時不但毫無顧忌，不分對象(尤其是在後期)而且手段殘酷。然而這個組織的理論核心卻和暴力初看上去毫無關聯，它建立在一種宇宙論(cosmic)哲學之上。古茲曼常常高談闊論所謂「哲學的基本問題」，如所謂萬物的起源，宇宙的本質，物質運動的規律，認識論，方法論等等。「光輝道路」的一個令人炫目的說法是「一百五十億年(不知所指為何，可能是指太陽系的起源?)的物質運動最終導向一個世界大同」，這個世界大同是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階級和國家，沒有政黨和軍隊，也不需要民主的社會。如前所述，「光輝道路」早期的另一個理論家卡瓦塔也是個談玄論道的高手，能在兩小時內從無機物和宇宙起源一直講到秘魯社會的階級結構。

這種玄談不是用博學來唬鄉下人。從現代科學和分析哲學的

角度來看，古今哲學家所談論的宇宙的「本質」、「本源」和「規律」等等命題是純粹的假問題，但在一個「上帝已死」的時代，這種言說卻具有準宗教性質，是盜用科學和理性的旗號去滿足人心中非理性的宗教性的渴望。近代以來，人類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組織日益世俗化，而共產主義革命的反現代性就表現為它是二十世紀屈指可數的準宗教政治運動，其宗教性的表現多多，而把整個運動的理論建立在一種宇宙論的哲學之上則是一個突出表現。這種宇宙論哲學以發現了宇宙的終結起源和普遍規律自命，為其信徒提供了精神寄託和心智上的巨大滿足。每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宇宙觀的人都會記得自己經過一番「探索」最終「發現」了這個宇宙真理時的那一刻，那是一種和宗教信奉者終於找到福音和上帝時相似的心路歷程，很多人甚至會有一種無可比擬的幸福感：我有了一個世界觀了！從此，他們自覺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別人根本不同，他們能把所有毫不相干的事件和現象，能把物質和精神，社會和自然用同一個規律去解釋。而這種與眾不同不但不會令他們反思自己有什麼地方不正常，反而會堅定他們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優越感，這正是那種「上帝的選民」的心理。在實踐上，這種高於一切人間戒律的「宇宙的終結真理」把這個政治運動的參加者從所有的道德顧忌中解放出來，正和歷史上和現實中種種宗教聖戰的殘酷和不擇手段一樣。

因此，當人們為「光輝道路」把哲學玄談和血腥暴力結合在一起而感到怪誕時，不妨想一想在延安，當思想整風運動借助著肢體暴力(有關延安整風中的暴力可以參看高華的專著或者過來人的回憶錄，如曾志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而展開時，毛澤東是如何通過他的《實踐論》、《矛盾論》和許多哲學演說把延安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話語共同體，使無數青年「樹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

世界觀」的。也不妨想一想，在文革中，當武鬥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和肉體迫害達到中國歷史上除公開內戰外史無前例的高峰時，毛澤東是如何在深宮禁苑中像歷代帝王著迷於長生不老術那樣津津有味地談論著物質的無限可分這個他心中宇宙的根本規律的。再想一想億萬中國人是如何鸚鵡學舌一般高談闊論「一分為二」和「對立統一」這種正確的廢話的。毛澤東對物理玄學的這種嗜好(他甚至干預到世界物理學界的討論中，要獨尊所謂「坂田模型」。而他對物理學的異乎尋常的興趣也博得了楊振寧之流的敬畏，在〔土字旁加反〕田和楊振寧等人的心中，毛成了啟蒙運動時傾心於科學和哲學的開明君主。)是要滿足他心中最大的奢望：發現並證實一個單一的根本的宇宙真理和普世法則，用來指導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從而成為現代的上帝，理性時代的上帝。翻一下文革中的報刊，毛澤東哲學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甚至現代醫學束手無策的疑難病症也在光輝的毛澤東思想面前迎刃而解。但願今天的中國人能有機會再讀一讀這些荒誕無稽的東西，更但願他們不僅僅把這些東西看作是非理性的瘋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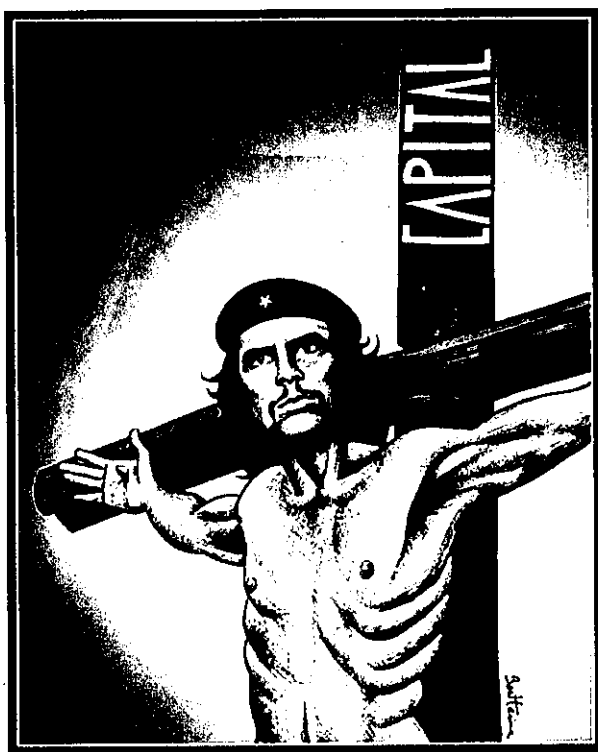
正是在這個根本點上，古茲曼不愧為安第斯山的紅太陽，南美洲的小毛澤東。如果古茲曼的革命成功，「古茲曼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不但將為秘魯的社會改造指明前進的方向，而且將成為秘魯人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哲學指南，取代天主教成為秘魯人民的新信仰。

第八篇

古巴的毛主義者格瓦拉為什麼出走？

引言：格瓦拉回到人間

一九九七年是古巴革命家格瓦拉三十周年忌辰。三十年前，「切」這個名字前面曾被西方和拉美報刊冠以「浪漫冒險家」、「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柯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的」、「塵世的那穌」等等令人目眩的稱號。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沉寂之後，在「革命」這個詞頗受冷落的後冷戰時代，幾個不同尋常的事件卻使格瓦拉的名字再度回到了報端。其一是1996年底秘魯的自稱信奉「格瓦拉主義」的阿馬魯



塵世的耶穌：左派眼中的格瓦拉。

遊擊隊佔領日本駐秘魯大使館並劫持大量人質；其二是曾經與格瓦拉共同戰鬥的薩伊遊擊隊領袖卡比拉推翻了蒙博托政權；其三是格瓦拉的遺骨在玻利維亞被發現。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就在1997年春天，紐約的Grove Press出版了最新的包含大量第一手資料的格瓦拉傳記：《格瓦拉：革命生涯》，在美、加同時發行，頗為暢銷。

遠隔重洋的中國也沒有忘記格瓦拉。七月某日《新民晚報》以整版篇幅用「漫漫革命路，縱馬走天涯」和「雖死猶生，精神永存」等標題對格瓦拉及其遺骨的尋找作了報導。令人略感困惑的是，格瓦拉其人固然大有新聞價值，然而較真起來，如果我們承認「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國」這一原則的話，格瓦拉那種企圖依靠由外國人組成的遊擊隊去推翻別國政府的行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飽嘗外國干涉之苦的中國人去讚頌，似乎已經超出了可以商榷的範圍。

然而格瓦拉對於今日世界、今日中國確實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歷史價值。如果我們對他當年放棄古巴高級領導的職位而重返遊擊戰的更深層的動機作一番思考的話，我們也許會發現格瓦拉的出走，實在是本世紀革命史上極富象徵性和耐人尋味的事件。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這個發生于大洋彼岸的傳奇故事實際上離我們自己的生活遠比我們所以為的要貼近得多。

（一）「人是一件半成品」：出走動機之一

格瓦拉為什麼出走？1965年四月一日，當他秘密離開古巴前往剛果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古巴黨和國家三個主要領導人（前兩位是卡斯特羅、其弟勞爾卡斯特羅）之一。在他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

他說他已經「在古巴的領土上」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的責任，「世界上其他國家在召喚著我去奮鬥。我所能做的是你作為古巴的領導人所肩負的責任使你不能去做的」。他宣佈放棄所有在古巴的職位，甚至古巴的公民身份(古巴革命後的新憲法有一特別條款，授予參加反對巴蒂斯塔政權鬥爭兩年以上並擔任高級軍事領導職務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古巴公民權，這條規定被認為是特意為出生於阿根廷的格瓦拉合法地成為古巴領導人而設置的)，這樣古巴不用為他在國外的所有行動負責。這封告別信無疑是格瓦拉自己和古巴官方對他為什麼出走的正式解釋，也確實可以視為格瓦拉出走的基本動機。但這種解釋又未免過於籠統，過於原則，它除了對格瓦拉的突然消失向古巴人民作個交待，以及向世界表明格瓦拉此刻和將來的行動雖然精神上仍是古巴革命的延續，但法律上已與古巴無關之外，沒有再為這個重大歷史事件提供更多的線索。

格瓦拉出走的背景無疑要複雜得多，而最關鍵的是為什麼他認為他已「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的責任」。在字面意義上，這可以理解為他在古巴已無事可做，但實際上古巴當時國內經濟狀況十分嚴峻，僅此一條就使我們有理由對國家最高經濟領導人的自己已完成了責任的說法感到困惑。實際上，格瓦拉告別信上的後一句話或許更有實際意義。筆者認為這前後兩句話應該解讀為格瓦拉所想做的在古巴已經無法去做(而並非無事可做)，他只有選擇出走一途。當然這並非意味著格瓦拉是被迫出走，只是說他必須在另一個地方以另一種方式去追尋他的理想。

那麼，格瓦拉的理想是什麼？這種理想又為什麼在革命後的古巴難以實現？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我認為從「人」出發——即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塑造「新人」——是首先值得考慮的，也完全符合格瓦拉革命勝利以後的主要活動及追求。格

瓦拉提出「新人」這個概念是在1960年八月一次對古巴醫務工作者的演說中，他以自己從一個醫生轉變為革命家為例說明革命的核心是消滅個人主義，號召用「徹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舊時代留給個人的一切，「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成為自己的設計師的話，創造一種新的人類——他們將是新古巴的象徵——就將容易得多」。

格瓦拉的這一思想被他用最直觀形像的語言表達在他一系列的演說和文章中，例如，他曾定義人為「一件半成品」，並把「新人」比作革命車輪上的一顆「幸福的齒輪」，一顆「有覺悟的，有自己特點」的齒輪。

格瓦拉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實現呢？60年代初古巴實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從體制上為格瓦拉理想的實現創造了條件。國有化的經濟目的是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把古巴從農業出口國轉變為工業國，這是由蘇聯經驗所提供的道路。然而古巴從此便開始陷入長期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產量下降或長期徘徊（當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國因其財產被古巴國有化和古巴向外輸出革命而對古巴實行的經濟封鎖）。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1962年到1965年古巴政界和理論界爆發了一場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曾發生過的理論論爭，其焦點是兩種經濟體制的矛盾：非中央集權的獨立核算制(decentralized self-finance)和中央集權的預算制(central budgeting finance)。前者在理論上享有財政的獨立自主權，通過市場與其他企業交換產品，其產品具有商品的性質，企業的成功視其效益而定，個人的收入直接與勞動量掛鉤。這種體制最先由農業部門提出並試行，後來外貿部門也隨之實行。後一種體制與它相反，每個企業都是國家計劃下的生產單位，產品在企業之間的交換不具有商品性質，勞動者的報酬與勞動量並沒有直接聯繫，這種體制主要在工業部門實行。論戰的中心問題實際上是社

會主義與商品、市場、利潤、價值規律和個人利益等的關係，而兩種體制的並存則表現了當時古巴經濟政策上的矛盾。

身為工業部長和國家銀行行長的格瓦拉是中央集權的預算制派的主將，然而他的立場並非單純地源於經濟問題，而是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態成分。從塑造「新人」是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這一點出發，他認為這實際上是一場「物質動力」(material incentive)和「道德動力」(moral incentive)之間的鬥爭。他的觀點首先以古巴革命的歷史經驗為根據。針對論戰對手，特別是當時擔任古巴政府顧問的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夏爾·貝特海的革命不能超越經濟發展階段和道德不能單靠教育灌輸的觀點他反駁道：古巴的革命就是在完全不具備客觀經濟條件的情況下由人的主動性和革命熱情所促成的(這一點成為他後來「遊擊中心論」的基礎，即革命條件可以由少數武裝人員用暴力去創造)。另一個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雷納杜芒在考察了古巴的農業以後建議給在農場從事額外勞動的工人一定報酬，以利於他們培養起主人翁意識，但格瓦拉說古巴工人不需要這種建立在報酬基礎上的主人翁意識，而是義務和責任感。總之，「物質動力」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標準。在一次採訪中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目的就是消除個人利益，用精神因素推動社會發展。在工業部一次勞模表彰會上他宣佈為勞模們準備了一點獎品，但卻不打算在大會上拿出來，因為這種形式會給人以物質刺激的印象，「那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實際上，他之所以成為最高經濟領導人，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因為他對經濟事務本身並沒有多少興趣，其注意力毋寧說完全在經濟工作的政治意義上。他的工業部長(最初應譯為工業化部長)一職是卡斯特羅點的將，出乎多數人的預料，因為這個工作的性質似乎與他傳奇般的遊擊戰領導人的形像不甚和諧。然而，後來的發展證明，這

樣的安排正是革命向經濟領域深入所需要的。他的銀行行長的任命無疑讓更多的人吃驚，尤其是他曾經說過要建立一個「不用錢的文明」。這裏有一個後來格瓦拉在很多場合下開玩笑地說起的故事：

在一次會議上卡斯特羅宣佈要為新成立的國家銀行找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格瓦拉聞言立刻舉手自薦，卡斯特羅驚道：切，我不知道你還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格瓦拉答道：哦，我以為你說你要的是一個好的革命家！翻閱格瓦拉在這一時期的演說和文章，可以看到他對解決經濟困難所提出的幾乎唯一的對策就是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因為這是唯一與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相一致的解決辦法，在1962年八月一次題為「對待工作的新態度」的演講中他說勞動競賽「是我們國家的核心任務」，「應該成為每個工人每天下班後的談話話題」。但與此同時他又深深地為已經「擺脫了異化」、「不再是商品」了的工人的現實勞動態度所苦惱。他大聲疾呼：工作應該是道德的必需！工廠應該是一個我們每天帶著新的熱情和樂趣前往的地方！勞動應該是美好生活中最幸福的時刻！在另一次對共青團的講話中他承認還沒有在工人中培養起為勞動競賽所必須的覺悟，他說他所領導的工業部老是在為勞動競賽制定規章制度，但「如果我們面對的都是只想回家的工人」，這些紙上的規定又有什麼用呢？

這場經濟論戰到1965年在沒有一個明確結論的情況下突然中止了。一直沒有表態的卡斯特羅這時說：「作為革命者，我們的任務不是在哲學領域進行抽象的論爭。」論戰中止的原因既有維護黨內團結的因素，又有古巴已放棄迅速工業化的打算，退回到以農業為主並以蘇東集團取代歐美為出口對象的格局。此後報刊上再也見不到論戰的文章，而在這種政策變化中位居要津的農業和外貿部門也沒有改弦易轍，用格瓦拉的「道德動力」去增加生產。無疑，以維護革命純潔性為己任的格瓦拉對這個結果不會不

感到失望。然而使他更為失望的也許是他已感到在和平年代塑造「新人」是一個幾乎不可能達成的目標。對人性中利己本能的克服乃至根除，只有在戰爭條件下才能實現。他在代表作《人與社會主義在古巴》中曾經說和平年間意識形態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戰爭年代的革命熱情灌輸到日常生活中去，為此整個社會必須變成一所巨大的軍營和學校。他多次說「新人」就在遊擊隊員之中，只有在戰爭條件下人與人之間才會有真正純潔的兄弟關係。很多和他關係密切的人都有這樣一種看法：切實際上一直期待著美國的又一次更大規模的入侵，這種入侵將會一舉解決古巴和平年代所產生的一切問題。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敢於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韙，於是離開古巴，尋找新戰場便成為必然的選擇。

(二) 「大陸革命」的夢想：出走動機之二

促使格瓦拉出走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大陸革命」的夢想。他一直認為古巴這個加勒比小島的革命是拉美大陸革命的先鋒和前奏，離開了拉美革命，古巴不可能「單獨建成社會主義。」事實上，從古巴革命勝利的那一刻起，他就竭力企圖輸出古巴革命的模式。1965年古巴尚未宣佈轉向社會主義時，卡斯特羅應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的邀請訪美時，留在國內的格瓦拉派出受其訓練的尼加拉瓜遊擊隊重返尼加拉瓜。此後他不但是推動拉美革命的官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訓練營地和派遣途徑，直接把來自不同國家的武裝人員派到洪都拉斯、多明尼加、尼加拉瓜、玻利維亞和其他一些拉美國家。他設立了「革命獎學金」用於訓練拉美各國的激進學生。美國對古巴的「豬灣入侵」失

敗後，他在公開講話中警告拉美各國政府，說倘若他們不改善內政，等待他們的就是古巴模式的革命。然而，年復一年，他所希望的大陸革命遙遙無期，他所派出的遊擊隊一再受挫，但這並沒有使他對拉美革命的形勢重新估量，反而使他感到拉美遊擊戰需要一個更有能力和號召力的領導人。1965年，當他出訪途經東京時，一個隨行人員就記下了他的一段與那次出訪毫無關聯的談話：在南美的玻利維亞或巴拉圭，找一塊與巴西、烏拉圭、秘魯



在玻利維亞兵敗被擒的格瓦拉。

和阿根廷接壤之處，在那裏投進一股遊擊隊，革命就會擴散到整個南美。他把這個最有想像力的方案最終留給了自己，要不是六十年代中期非洲獨立運動的發展一度使他產生了非洲已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個幻覺並選定剛果

為出走的地點的話，很可能他就會去了玻利維亞。

(三) 古巴依賴蘇聯：出走原因之三

60年代國際共運的分化也是促使格瓦拉出走的重要因素。他常

常對蘇聯持不加掩飾的批判態度，其原因之一是從「新人」的角度出發，他認為蘇聯對價值規律、利潤和個人利益等的承認與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馳，他說蘇聯工人的勞動目的與美國工人已沒有區別，都是為了錢。在他的剛果使命失敗後秘密返回古巴並等待去玻利維亞的幾個月，他寫了一些類似理論總結的東西，幫助他整理的人震驚地發現他竟然說自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開始蘇聯就有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先例。原因之二是他的拉美乃至世界革命的計劃與蘇聯的世界戰略尤其是「和平共處」方針相衝突。他說「和平共處」就是綏靖政策，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退讓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在私下說這是背



格瓦拉訪華時會見偶像毛澤東。

叛，而且在一次對英國記者的採訪中直言不諱他說當時如果按鈕在古巴人手裏，導彈很可能就發射出去了。他對中國的態度和對蘇聯恰成對照。他公開說中國的公社模式和對精神因素的強調為亞非拉革命提供了榜樣。在他的工業部裏的中國專家不從古巴政府那裏領取報酬，格瓦拉說這體現了「新人」的道德標準。相反，蘇聯專家的工資是從蘇聯給古巴的貸款中扣除的。此外，當時中國的對外政策在他眼裏也符合「全世界革命」的要求，尤其是林彪 1965 年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引起了他的重視。他的這種態度無疑是古巴當時在中蘇論戰中遲遲未公開表態的原因之一。

但隨著與蘇東集團的經濟聯繫日益成為古巴經濟的基礎，蘇聯對格瓦拉的反蘇親華立場有了強有力的壓制手段。格瓦拉最終的出走，正是在他 1965 年二月在阿爾及爾出席亞非團結組織的經濟會議上幾乎是公開地譴責蘇聯之後(他說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要求把他們與正在從事解放鬥爭的國家的經濟聯繫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這和殖民主義一樣)。而也正是在他出走之後，古巴政府於次年以中國削減對古巴的大米出口為由說中國加入了美帝對古巴的封鎖，挑起了中古論戰。

結語：什麼樣的「氣魄」和「豪情」？

格瓦拉在當時，無論在第三世界還是在西方國家都有著大量的崇拜者，這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人格力量有關。他是一個真正忘我的無私無畏的革命家。他放棄高位重返戰場並不惜犧牲自己的事蹟廣為人知，但他還有更多說明其個人品格的故事。例如，他身兼工業部長和銀行行長，但始終只拿一份工資，將國家發給的另一份交回；他公私分明，連年幼的子女生急病都不准用自己的公車送醫院，有次搬家時，妻子將原來公家住房裏的吊燈一起搬走，他見到後令妻子馬上送回；在經濟困難時古巴政府給高級領導人的家庭發了特殊配給證，他得知後也立即退回。這類事例的確不勝枚舉。他以身作則，工餘時間特別是週六都主要放在參加義務勞動上。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從小就患有嚴重的哮喘病(這也是他後來學醫的原因)，但這從未動搖他走進叢林和戰場的決心。總之，他決不是那種只會號召別人奉獻的「革命家」。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他甚至得到了敵人的尊敬。當時應玻利維亞軍政府的要求幫助追剿格瓦拉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羅德里格斯在回憶

錄中回顧了在格瓦拉被處決前他與格瓦拉的談話(中情局當時想把格瓦拉送到關塔那摩基地加以利用，但玻軍政府執意將他處死，為避免處決俘虜的指責對外宣佈格瓦拉死於戰鬥)，他說他當時心中不但已沒有對政治死敵格瓦拉的仇恨，反而感到了對這個人的一種敬佩。

然而，人格的高尚與否在我們評價一個有無資格和能力主宰千百萬人命運的政治家時究竟有多大份量呢？說到底，一個人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為了一個他認為值得的目的犧牲自己(只要不影響別人)純粹是他個人的事。如果事關他人，那麼對這種犧牲的評價就複雜得多。一個最基本然而卻常常被人們遺忘的倫理學常識是：犧牲仍然只是一個事實，它本身並不因其壯烈而自動成為唯一的評判標準。格瓦拉固然毫無我們通常所說的那種自私自利之心，他不但以解放拉美乃至世界人民為己任而且曾經說過對人民的愛是革命家最起碼的品質，然而他卻為什麼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質需求？他有什麼根據把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說成是消除個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終革到了勞動人民的物質利益上來，這又是什麼「解放」？更進一步說，是什麼使得他自認為有權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會，而且再造個人呢？當他把人比作「半成品」和「幸福的齒輪」時，他意識到這種用詞中所包含的對人性的貶抑，已經遠超出他所痛斥的資本主義下人性的異化了嗎？

如果這麼說仍然顯得抽象的話，那麼最後也許有必要就格瓦拉是如何看待古巴人民的再說幾句。在《人與社會主義在古巴》中他說：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鋒，是先鋒就意味著犧牲，以犧牲為核心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古巴人民不但是義務而且是需要。他用這樣一句話來結束他的文章：「我們的自

由隨著不斷的犧牲而膨脹，這種自由和它每天的營養物質就是鮮血。」1965年在哈瓦那召開的第一屆拉美青年大會上格瓦拉這樣告訴從各國來的代表：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讓你們知道，即使他們在一場為徹底解放而引發的熱核戰爭中被全部消滅，只要你們接過革命的火種，「他們也會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無比幸福」。

不知道是不是仍然有人認為這些話充滿了「氣魄」和「豪情」。

(主要材料來源Jon Lee Anderson. *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7; Bertym Silverman, ed.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the Great Debate*, New York: Atheneum, 1971.)

第九篇

政治朝聖的背後 ——西方知識份子對毛式革命 的迷戀

引言：過江之鯽 游向仙境

二十世紀西方知識界對經歷著社會革命的非西方國家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那些遙遠而陌生的、既在進行著激動人心的社會實驗又充滿異國情調的國度，對一些在自己社會中或是覺得單調乏味或是覺得壓抑無望的文化人來說是一塊可以任意馳騁其想像力的地方。從十月革命後到七十年代，他們如過江之鯽般游向蘇聯、中國、古巴、北越、阿爾巴尼亞以及莫三比克或尼加拉瓜。有些人在奢望能有一次戲劇性地與這些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見面、從而為自己的專欄或報導增添特別權威的色彩的機會之餘，也憧憬著能遇上一位傳說中的性開放的革命女郎。但無疑多數人的動機並非如此輕佻。在他們的下意識裏，他們是西方傳統中馬可「波羅、哥倫布和托克維爾的某種混合，肩負著發現精神上或社會制度上的新大陸的使命。」1919年美國著名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在訪問蘇俄後曾說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我已經見到了未來，它正在成為現實。」1936年英國費邊社理論家韋伯夫婦(悉尼和比阿特利絲)出版了訪問蘇聯後的觀感，兩厚冊一百幾十萬字的巨著取了一個與其篇幅相稱的書名：《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文明?》(第二版去掉了問號)。而法國的女權主義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對開放改革前的中國的印象是：在那裏生活是極其令人愉快的，那是一個美夢成真的地方：政府成為了人民的學校，而將軍和政治家都是學者和詩人。

用「政治朝聖」來概括這類現象是富有象徵性的，尤其因為它暗示著朝聖者在動身之前實際上就已經具備了一種信仰或信念，他們其實是去證實而非發現。正如沒有人是天生的聖徒一樣，政治朝聖者之所以集中在某個社會階層，並非因為它具有天

賦的道德使命，而是由種種複雜的社會際遇決定的。正是這一點成為美國麻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保羅·洪倫德(Paul Hollander)十五年前出版的《政治朝聖者——西方知識份子的蘇聯、中國和古巴之旅》(以下簡稱《朝聖者》)的主題。

(一) 知識份子容易受「理想主義誤導」嗎？

這是一本對「知識份子」這個題目感興趣的人值得一讀的書。洪倫德不但力圖矯正一種流行的觀點，即視此類政治朝聖為「受誤導的理想主義的表現」(引自一篇書評)，而且試圖通過對這個世紀性現象的分析，對一些雖然時有爭議，但相對來說仍受到普遍認可的所謂知識份子的特徵提出質疑，它們包括：理性主義、懷疑與批評、公正、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天然隔閡、道德絕對主義(即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始終堅守某種道德戒律)以及主張言論自由等等。他所描繪的知識份子肖像，也許是很多身為知識份子者所不樂意見到或承認的。

洪倫德指出，所謂政治朝聖，主要發生於 30 和 60 年代，是西方文明或是陷入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或是面臨深刻的精神和價值危機的時代，西方知識份子因而轉向其他社會尋找替代。然而社會危機僅僅是為政治朝聖提供了一個契機，更深刻的根源還在於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在當代西方社會中的現實處境。洪倫德分析了西方社會的世俗化、多元化、強調物質價值、大眾文化日益壓倒精英文化、政治權力受到整個社會結構的制約因而英雄時代一去不返，以及知識份子的作用越來越不可能像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時代那樣成為全社會注目的焦點，等等。然後認為這使得相當數量的知識份子在不同程度上感到自己

的無足輕重和與社會的格格不入。他用了「受拒斥」(alienation) 這個概念來概括這種社會處境和心理反應。(實際上，他的觀點和雷蒙·阿隆在分析西方——尤其是歐洲——知識界左傾化現象的著作《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中的觀點很相似。雷蒙·阿隆特別指出西方社會中技術對文化的壓抑、大眾對精英的牽掣是一部分知識份子對自己社會不滿的原因。)源於這樣一種分析，洪倫德認為要理解政治朝聖現象，關鍵在於認識到那些成為朝聖對象的體制，在何種意義上迎合或滿足了在自己社會中感到受拒斥的知識份子的心理和欲望。

洪倫德指出，社會平等與正義固然是這些新體制的最外在的吸引力，然而如果閱讀大量的「朝聖」文獻，不難發現實際上更為基本因而也更具吸引力的是這樣一種共同的感受：這些體制賦予了世俗生活以神聖的意義，使得全體人民具有了同一感和目的意識，整個社會因而凝聚成了某種共同體。例如，英國歷史學家伯納德·佩爾斯說他甚至在普通蘇聯人的面容和神態上也能發現那種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目的意識；德國著名作家孚希特萬格說他在莫斯科比在其他西方都市都更易獲得方向感；美國六十年代著名的左翼社會活動家托姆·海頓和斯塔騰·林德(前者曾與美國演藝界著名的左派女星簡·方達結婚)說他們在北京一下飛機就能感受到到處都搏動著熱氣騰騰的富有目的意識的活動，而另一位心理學家卡羅爾·塔夫裏斯則總結道：最重要的是，你遠離了多元性和爭議這些美國的特徵，被包容進一種信仰和目的的完全一致之中。

這種對意義、目的和同一感的追尋或者敏感，正反映了西方知識份子在一個日益世俗化、多元化、個人化的世界中的困境。洪倫德認為，對知識份子代表著理性這一假定的認可，使人們大大地低估了知識份子的宗教需求。實際上，在宗教退出世俗生活

的二十世紀，正是依靠象徵性和精神價值生活的知識份子最不能忍受這種無意義的生活。遠自法國大革命起，他們就用理性取代了對上帝的信仰，而這種對理性的態度本質上恰恰是非理性的。在二十世紀，他們進一步轉向政治和意識形態尋找信仰的替代，而其目光又常常落在那些宣稱建立在人類理性所發現的歷史法則和人類理性所設計的社會計劃的體制之上。在這些體制中，個人對社會、國家和未來的義務被神聖化了，世俗生活得到了昇華，困擾著西方知識份子的源于個人和物質本位的種種苦悶、困惑和孤獨感在這裏純粹變成了被嘲弄的東西。

並非偶然的是，很多宗教界的訪問者——很多人其實更可以稱為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既在宗教界活動，同時又是作家、社會批評家或教育家——認為這些意識形態上具有反宗教傾向的體制實際上遠比西方社會更宗教化。例如美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活動家謝伍德·艾迪曾在其《我們能向俄國學些什麼》(1934年)中說：「俄國取得了至今為止只有在很少的歷史時期中人類才取得的成就：全體人民生活在一種哲學之下，全部生活凝聚在一個中心意圖之下。」英國貴格派教會人士巴克斯頓說：布爾什維克實際上復活並採用了最重要的基督教理念，雖然他們在言辭上是反宗教的，但實際上其社會比我們的更接近基督教理想。在這方面或許更突出的例證是有「紅色主教」之稱的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休立特·詹森(Hewlett Johns 1874-1966)，他曾於三十和五十年代訪問過蘇、中，有比較這兩國社會與基督教理想的著作多種，並獲得過斯大林和平獎金。在他關於中國的論述中認為中國革命純粹是一幕宗教性質的戲劇，其對自私和貪婪的憎恨與基督教觀念如出一轍，而自我批評精神又類似原始基督教中的謙卑和悔悟。

(二) 知識份子天生和權力作對嗎？

知識份子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是洪倫德著力分析的另一個問題。與一些人(如曼海姆)強調知識份子的邊緣性和批評角色不同，他認為和其他社會集團一樣，知識份子同樣渴望權力，而這種渴望由於其自命為理性和知識的承擔者而更具有合理性。然而在多元化的西方社會中，知識份子的現實處境完全不能滿足其潛在的權力渴望。例如實業、商業、金融界人士的社會地位遠在知識份子之上，而議會政治家和工會活動家的群眾影響也大於知識份子(例外也是有的，如薩特)。這個事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知識份子總是在表面上對權力採取疏遠、批判或視其為骯髒的態度，因為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之下，他們的影響力註定是有限的。因此美國社會哲學家路易斯·費厄認為：知識份子並非對權力本身，而是對自己被排斥在掌權者之外感到不滿。喬治·奧威爾在脫離左派陣營之後也說：「權力意志的受挫是西方知識份子向左轉的最內在原因。洪倫德認為，一旦客觀形勢提供給知識份子以從政或進言的機會時(如六十年代美國社會改革期間)，他們那種既想掌權又怕被指責為與政府和既得利益者合作的心態便典型地反映了權力是一種令其苦惱的誘惑(a nagging temptation)。

那麼，在這一點上，那些被訪問的國家又是在什麼意義上吸引了知識份子的呢？首先，大量的「朝聖」文獻中充滿著一種驚喜和欣慰：世界上終於有一個國家，由一批通曉歷史法則的領導者率領，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監督下實行了包羅萬象的社會變革，用韋伯夫婦的話來說：「在全部社會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巨大而令人振奮的實驗。」這是人類第一次自覺地用理性指導和規劃全部生活。其次，合乎邏輯的是知識份子的地位和作用從根本

上不同於西方社會。例如，最高領導人本身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份子，通曉從哲學、語言學到當代物理學和熱帶植物學(如何提高甘蔗的產量)的所有學問，而一些特別受到政府尊崇的知識份子的聲望也充分說明了整個知識份子階層的地位，如美國著名作家、評論家愛德蒙·威爾遜說高爾基在蘇聯的聲望只有斯大林可以媲美。此外，也許更重要的是，在許多訪問者眼中，這些體制大大簡化了社會結構，許多階層、集團消失了，而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卻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它的作用因而凸顯了。所謂「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稱號不但同西方社會中知識只是眾多的謀生手藝中的一種形成鮮明對照，更形像地說明了知識份子與大眾之間的距離和優越感，正如愛德蒙·威爾遜所說：「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給作家如此高的榮譽，也沒有別的地方使作家有如此身負重任的感覺。」因此在這裏，西方社會中理想家(知識份子)與實踐家(掌權者)的分離被融合了，受拒斥感消失了。

這種對待權力的態度又和對待群眾的態度有著內在聯繫。洪倫德指出在很多知識份子身上存在著一種矛盾：既宣稱信奉平等而實際又感到自己從屬於一個精英階層。他們特別容易接受這樣一種理論：如果沒有外部的灌輸和引導，工人永遠不可能自發地產生革命要求，或者說如果不是自己代群眾立言，群眾自己永遠不會懂得其真正的利益所在。這是一種典型的父權主義態度。與此相聯繫的是，這些知識份子對自己社會中想方設法投選民所好的議會政治家充滿蔑視，而對慈父和先知類型的、同時又具有鋼鐵般意志的群眾運動家充滿欽敬。在西方社會中，一個令其焦灼而又深感無能為力的問題是：如何使得群眾放棄個人的、具體的、物質的要求而投身于知識份子所指定的方向。而在他們所訪問的國家中，他們認為這個奇跡實現了。毫不奇怪的是，幾乎每

個訪問者都談到了當自己置身於集體狂熱掩蓋了任何個性的場合(諸如遊行和狂歡)時的感受，他們視此為群眾整體被重新塑造並獲得精神再生的表現。例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就說她懷疑在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之後，一個人還有可能成為憤世嫉俗者。

(三) 知識份子堅守道德原則嗎？

當然懷疑甚至反感在這些知識份子的見聞中還是存在的，因為畢竟他們所見到的一切和所習慣的一切差距太大。但問題是——洪倫德強調說——知識份子和普通人一樣，容易在事關自己利益或好惡的問題上使用雙重標準，從而總是傾向於接受有利於自己既成信念的解釋。當他們見到消極面時，總是急於知道官方是如何解釋的。例如，羅曼·羅蘭曾經就蘇聯法律(三十年代)規定對十二歲以上未成年兒童可以因政治罪處以極刑的



羅曼羅蘭離開蘇聯時與高爾道別。

規定當面向斯大林提出質疑，認為這在西方人感情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會損害蘇聯的形像。但當斯大林向他解釋了「敵人」是如何

把仇恨傳播給婦女和兒童並已導致出現了「到處都是十五歲左右的地下匪幫」在殺害與他們同齡的「先進」的男孩和女孩時，羅蘭自責道：「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在西方所遺忘了的那個事實：布爾什維克仍面臨與殘忍的、野蠻的、陳舊的俄羅斯的長期鬥爭。」(本文所引有關羅蘭的材料，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莫斯科日記》)

任務的艱巨和反抗的激烈——這是幾乎所有的訪問者為許多不可思議的政策和措施作辯護的最有力的理由，就連愛因斯坦(雖然他當時並未訪問蘇聯)也說，在這種特殊性質和規模的社會實驗中，「個人確實需要暫時地、痛苦地放棄其自由」。很多知識份子在自己國內是路見不平拍案而起的平權運動的鬥士，但面對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一張工人的選票等於六張農民的選票的規定(關於此政策的解釋，參見列寧的〈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一文)卻認為在「當時的」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許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實際上導致了一種荒謬的推論：一些在被他們所否定的社會中尚能存在並維持的原則，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反而變得負擔不起了。很多訪問者歸來後總是不忘提醒後來者在評判他們將要看到的一些事情時必須完全拋棄「西方的」標準，必須從目的出發來評價手段。然而洪倫德指出：正是根據首先在西方國家確立的一些標準，如平等、正義、自由、物質進步等，這些非西方國家才能對西方知識界產生吸引力(更不用說馬克思主義本身，根據經典作家的說法，也正是來源於西方，或更準確地說是西歐思想界的積極成果，與其他文明的「標準」毫不相干)。至於目的使得手段變得正當的說法，筆者記得悉尼·胡克曾在一篇評左翼知識界的文章中提醒得很恰當：手段從來不僅僅是工具，其道德質量

直接反映或影響了目的的性質。

總之，種種社會和心理的因素導致了很多西方知識份子在「朝聖」旅途中完全或部分地喪失了他們在剖析自己社會時的那種犀利而敏感的懷疑態度和批判精神，而這又不能歸之於信息量不足。波將金村莊式的佈景覆蓋面畢竟有限，很多問題是無法掩飾因而一望即知的。問題是在這裏，資訊在心理上被接收者分為受歡迎和不受歡迎的。洪倫德說，當確定了一個事物「本質」的好與壞時，與此相矛盾的細節再多也難以改變既定的判斷。正如美國作家約瑟夫·弗里曼所說：你可以寫上成卷的有關這些社會的落後與艱苦的書，你的每一個具體事例都是真的，但你以此構成的整個畫面卻是虛假的。此外，消極的資訊也可以被賦予積極的解釋。例如生活必需品的配給制是好的，因為它體現了平等。而貧窮則被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舊制度的殘餘，二是有意義的奉獻，三是體現了一種純潔的、未受物質主義污染的生活方式，前者顯然與新制度無關，而後者則是值得讚美的。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知識份子似乎樂於見到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比較不發達的、鄉村化的生活環境中，在艱難困苦中顯示人類的英雄氣概如成千上萬的普通人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去完成巨大的工程之類，(如蘇聯的白海運河工程和中國的紅旗渠)。而一旦技術水平和物質生活提高了，其吸引力就大打折扣，這正是五十年代以後中國和古巴等第三世界國家在這些知識份子心目中取代蘇聯的重要原因(洪倫德特別分析了薩特的言行在這種偶像轉換中的作用)。此外，知識份子對前工業化時代的鄉愁也能在這些國家找到寄託。例如五十一——七十年代訪問中國的人都感到在人民樸素的穿著、簡陋的房舍和周圍的田野景色之間有一種令人感動的和諧，使他們覺得自己不但在進入未來，也在回到過去。例如英國作家菲利克斯·

格林說從他乘坐的火車車廂裏望出去，中國的鄉野景色一如他在宋代的繪畫中見過的那樣質樸而富有詩意。

在一些知識份子眼中，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和所訪問的社會是如此黑白分明，以至於一些兩個社會所共有的事物也有著不同的性質或解釋。例如機器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剝削和奴役的象徵，而在另一邊則不同。有一則軼事說：一個來自紐約布魯克林的教師在參觀蘇聯印刷廠時見到一台高效率的印刷機後十分驚喜，她說只有在你們的國家裏，在勞動是自由的、不受剝削的、為了一個共同目的的情況下才會設計出這樣完美的工具，我回去後要就此好好寫一篇文章。但當她走到機器背後時卻不無尷尬地發現了一行小字：產于紐約布魯克林。

結語：現代哥倫布的想像和移情

五百多年前哥倫布航行到了美洲，然而他卻以為自己到了傳說中的東方。在他那封返航途中致西班牙國王和王后的著名的信中，後人發現他把他所看到的地方(不過是幾個小島)的面積和出產物大大地誇張了一番以符合馬可·波羅等人的描繪。哥倫布固然可能是想得到王室更多的支持因而作了一番渲染，然而心理學家卻認為這也反映了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眼睛所見到的常常是心靈已準備接受的東西，這尤其發生在人們充滿期待地進入一個新世界之時。因此，這類文字表現得更多的與其說是敘述者所見到的景象，不如說是敘述者自己的期待和信念。

其實，即使沒有機會進入這樣的新世界，但只要對自己的社會不滿，單憑道聽塗說有時也能對另一個陌生而遙遠的社會產生

豐富的想像和移情，正如愛的需求會創造出被愛的對象一樣。在這一點上，啟蒙運動時代一些西方思想家對東方專制政體的讚美是學術界耳熟能詳的。正是在此意義上，《華盛頓郵報》對《朝聖者》一書的評論也許可以拿來作為本文的結束語：「這是一本值得放在手邊再三閱讀的書，尤其是當有人告訴你有那麼一個地方，在那裏政治權力正以全新的方式被行使，人心被重新塑造，人性得到昇華的時候。」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Fourth Edition 1998, original 1981)

第十篇

古巴甘蔗地裏接受 「再教育」的美國知青

引言：心潮逐浪高

1969年一月二日，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革命廣場上聚集了50萬以上的群眾在傾聽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紀念古巴革命十周年的講話。雖然這是一次例行的演說，然而古巴人經過幾個月的傳達和動員，都知道他們將要聽到一項新的驚人計劃。卡斯特羅說去年的糖產量沒有達到計劃的要求，但今年的目標是一千萬噸，比歷史最高水準還要多兩百五十萬噸。為此他號召全黨全國總動員，城市的工人、學生、幹部以及軍隊都要下鄉參加收割甘蔗。這一年被命名為「決定性努力」的一年，日曆也將有所改變，它將是十八個月而不是十二個月，因此將有兩次而不是一次收成；年底的聖誕和新年假期並到明年的六月去歡慶勝利(實際上聖誕假期從此被取消，直到九七年底在教皇來訪前才恢復)。同時，他宣佈為擴大糖的出口以換取國家所需要的外匯，食糖要實行配給。他通過擴音器問廣場上的群眾是否同意這種安排，群眾報以震耳欲聾的有節奏的呼喊：「菲——德爾！菲——德爾！」。這種領導人和群眾之間在廣場上的問答是古巴革命後創造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方式，卡斯特羅稱為「直接民主」，他說這不但比代議制要民主一千倍，而且它使得群眾可以隨時隨地表達自己的意願，而不是像美國人那樣，頂多四年才輪到「民主」一次。

在廣場上的人海裏，有一批同樣心潮逐浪高的美國青年(注：「心潮逐浪高」是毛澤東的一句詩，也是中國文革期間一幅知青上山下鄉的宣傳畫的題目，畫面上是一群剛從城裏下來的知青坐在手扶拖拉機上穿過豐收的麥田，豪邁的心情就像起伏不已的麥浪)。他們克服了重重險阻來到這個和自己的國家只差正式宣戰的西半球革命聖地，和當地人民一起沉浸在歡樂和豪情中。古巴領

導人宣佈的史無前例的戰鬥任務進一步激起了他們的熱情，他們商討要組織「縱隊」直接參與古巴革命，並立即向古巴領導人遞交了決心書，只是還沒有決定究竟從事何種具體工作。兩個多月後，卡斯特羅托人傳話表示贊許，並建議他們直接下到甘蔗地裏，為實現一千萬噸糖產作出貢獻。

同年夏天，一個代表美國國內形形色色的左派(大概除了毛派、托派和一個叫做「同性戀解放」的組織)的委員會決定用古巴隨處可見的口號「我們必勝」作為這個縱隊的名稱(Venceremos Brigade)，組織美國左派青年去古巴幫助收割甘蔗，以實際行動支援古巴人民的反美鬥爭。

(一) 去古巴接受再教育：美國新左派運動史上奇特的一頁

美國新左派運動史上極為奇特的一頁就此揭開了。歷來談論新左派運動的人，多把六十年代末作為這個運動的尾聲，並用嬉皮士、學術界的左派和最終認同現存體制變成新白領來對運動參與者的分化作歸類。然而「我們必勝縱隊」(以下簡稱縱隊)卻在這些主流之外另闢蹊徑，以一種迂迴的(迴避了用直接行動改造社會的任務)然而在某種意義上更為激進的(走與第三世界人民相結合的道路)方式繼承新左派的精神，為這個運動留下了餘音。

如果讀一讀根據頭兩批參加者的日記、採訪、書信、文章和詩歌而編輯的《我們必勝縱隊——與革命的古巴分擔工作，分享生活的年青美國人》(1971年出版，以下簡稱《我們必勝》)，我們不但可以對那個火紅的年代有一種比較切近的感受，而且可以瞭解西方的另一種政治朝聖——不是以官方客人的身份，而是與古

巴勞動者同吃同住同勞動並力圖達到同一精神境界。經歷過上山下鄉運動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比較一下在同樣艱苦的勞動環境下美國知識青年的思想改造過程，不但會找到許多相似之處，而且會發現一個更令人深思的共同點：在激進主義革命中，以現代文明為背景的知識份子的原罪感是普世性的，它可以發生在一個和自己沒有任何家族、社會和歷史聯繫的環境中，並不以有無貶抑或者迫害知識份子的傳統為前提；而贖愆也主要是通過在嚴酷的體力勞動中和群體壓力下的自我譴責或者精神自虐來實現。

(二) 排除萬難前往古巴

縱隊的組織工作由全國和地區兩級委員會負責，他們用多種方式從事宣傳和籌款，主要是介紹古巴革命，例如放映一部叫《菲德爾》的紀錄片，有卡斯特羅駕著吉普車翻山越嶺訪貧問苦的鏡頭。在招募人員時他們要調查其背景，嚴防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的滲透，被選中的人員還要經過一段訓練期。在發給縱隊成員的手冊上詳細規定了必須準備的個人國際旅行證件，包括十八歲以下去加拿大、二十一歲以下去墨西哥（這是當時前往古巴的兩條主要途徑，其中墨西哥是當時唯一與古巴保持外交關係的拉美國家）所需要的父母或監護人出具的表示同意的證明。組織者連攜帶何種個人物品都規定得非常詳細，例如何種牌號的電池在古巴可以替換，軍隊的厚褲子最耐穿，以及鑲牛皮的帆布手套是用古巴刀砍甘蔗時的必需，等等。

1969年十一月，第一批人員（叫支隊）共二百十六人經墨西哥抵古巴，在那裏砍了六周甘蔗，旅行了兩周後乘坐由載運種牛（當時卡斯特羅計劃培育出世界上產奶量最高的奶牛，從加拿大進口

了大量良種牛與古巴本地牛交配)的貨輪臨時改裝的客輪經加拿大返美。第二批六百八十七人部分乘坐送第一批返回的船由加拿大去古巴，部分經墨西哥達到目的地，其勞動安排與第一批相同。第三批次年八月動身，當時已過了甘蔗的收割期，古巴政府便把他們送到古巴未來社會的樣板青年島去受教育。那個地方革命前叫松樹島，在加勒比海上，曾經是前政府的模範監獄(卡斯特羅本人就曾因領導武裝暴動而被判刑十五年並在那裏關押了兩年不到後獲特赦，當時他的囚室甚至包括廚房設備，他曾在給親友的信中說自己每天可以做火腿、鳳梨片和義大利麵條)。60年代中期以後卡斯特羅說要把這個島建設成世界最大的柑桔產地，到七零年其產量要超過以色列和北美的總和。在島上勞動的主要是青年，實行供給制，基本取消貨幣。這個小島和另一個「聖安德魯斯公社」當時成了社會主義古巴的共產主義飛地和外國來訪者的必到之處，也是縱隊成員心神嚮往的地方。這種勞動為主參觀為輔的方式後來成為每年每個支隊在古巴的活動形式。

在組織縱隊前往古巴的過程中，組織者和普通成員都面臨著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很多人被迫辭職、輟學，或與家庭決裂。有人甚至變賣了家產籌措旅費。聯邦調查局對縱隊的活動派出大量探員跟蹤調查，在縱隊從紐約出發乘坐租來的大客車經新英格蘭地區前往加拿大的一路上，警方不但如影隨形，而且沿路事先通知商家旅店有一幫去古巴替卡斯特羅砍甘蔗的怪人將要路過，於是車隊所到之處聽到的儘是冷言冷語和惡意嘲諷，甚至路邊的廁所也被鎖上。在另一路，縱隊成員在墨西哥城的機場登上古巴客機之前通過海關時，聯邦調查局派員等在那裏擺出秋後算帳的架勢在近距離內給他們一一拍照(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會1971年還曾專門通過並出版過一份關於縱隊活動情況的調查報

告)。因此，當縱隊成員看到哈瓦那港和何塞馬蒂機場如潮的歡迎人群和如森林一般高高舉起的表示革命團結的拳頭時由衷地感到自己找到了家。

(三) 虛心學習 艱苦改造

一個成員在被採訪中回答到了古巴有何感想時說：「一個人(person)如果要成其為人(human being)就必須有家，必須生活在一個反映其心靈的社會中。在離開哈瓦那機場前往營地的路上，當我看到的第一個標語牌不是為可口可樂、凱迪拉克和口紅作廣告而是寫著『到越南去！』時，我知道自己到家了。」這種家園感和對美國的強烈的拒絕在下面這個故事中表現得很典型：出了哈瓦那機場，在高速公路上他們看見前方有一個收費站橫在路中央，他們本能的反應是「什麼？收費站？美國式的？在革命的古巴？不！不！難道他們要一隻手高舉革命的拳頭另一隻手收錢嗎？」使他們欣慰的是，當汽車駛過時他們看到這個革命前留下的小屋早已被廢棄了。另一個和美國的一切對著幹的極端事例是當他們在食堂用餐後，就要不要收拾桌子引起了一場爭論。在美國養成的習慣是把自己的杯盤清理掉，但現在有人提出了異議：在美國清理餐桌被認為是低下的工作，因此自己收拾杯盤就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虛偽；而在革命的古巴，一切工作都是平等的。討論的結果是應該用留下狼藉的餐桌來表示與美國和舊生活方式的徹底決裂以及和古巴服務員之間的新型同志關係。

然而，這種激烈的情緒也許正從反面暗示了要擺脫他們成長於其中的那個社會的影響是多麼困難。正如書的編者所指出的：本書所有材料的中心反映的是同一個主題：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之間的鬥爭。對每一個成員來說，古巴之行收穫的大小取決於在多大程度上心悅誠服地改造自己，這是兩種世界觀和兩種生活方式的較量。從縱隊成員踏上古巴客輪的那一刻起，這種鬥爭和較量就開始了。他們被分為二十多人一組，每組配數名古巴人(都是普通工人或水手，有的還是黑人)作為領導，每隔幾天開一次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內容的小組會(這種組織形式在勞動和參觀中一直保持下來)。對於縱隊成員來說，服從領導和接受訓練(集體紀律)是一個特別的挑戰，這不但因為他們是以從小就放縱個性出名的美國人，更因為他們在國內從事的運動就是以否定一切權威為特徵的，當時甚至有一句話叫做「不要相信任何三十歲以上的人。」帶著這樣的背景，現在怎麼會輕易接受一個新的權威並否定自己呢?何況發號施令的人來自第三世界，在種族和社會地位上向來沒有任何優越感(當然和前一點不同，這後一方面主要是心理問題而非認識問題，因為他們在國內的運動就已經以種族平等為目標了)。很多人的體會是：要克服這種對新權威的反感，必須完成對革命的從道義上的擁護到政治上的認同的轉變，必須真正承認第三世界的人民是比自己遠為純正的革命家，不論他們是古巴人，越南人或是朝鮮人，也不論他們的文化水準和文明程度如何。讀到這些文字，不禁令人想到我們中國人對此有著更為形像的表達，叫做徹底放下架子，真正拜工農為師，虛心接受他們的再教育。

另一個嚴峻的挑戰毫無疑問是艱苦的勞動。起初縱隊成員對勞動的反應——用古巴人批評他們的話來說——也是典型「美國式」的，即個人競爭的方式，急於表現自己。古巴人教育他們要學會集體勞動，不但自己要幹好而且要幫助別人，這是社會主義競賽和資本主義競爭的區別。然而當開始幾天帶著歡樂和豪情撲向甘蔗地的熱情消退以後，勞動對每個人都漸漸變成了苦役。每

天八小時在熱帶的烈日下戴著草帽和帆布手套，穿著厚衣服，揮舞著沉重的古巴刀與長得密密層層，又高又壯的甘蔗搏鬥。甘蔗地裏又熱又潮又悶，是各種蚊蟲理想的滋生地。赫魯曉夫當政時曾以他在烏克蘭主管農業的經驗許諾替古巴人發明一種收割機，把他們從甘蔗地裏解放出來，一度很讓人鼓舞，但嘗試過數次後和他的其他雄心勃勃的農業計劃一樣泡湯了。古巴人自己本來發明了一種就叫「解放者」的收割機，但效果也不理想，於是只能仍舊依靠人力。多數縱隊成員出生于中產階級家庭，除了修草坪從未幹過如此沉重的體力活。漸漸地，他們夜晚的夢中也滿是甘蔗，中午休息的時間越拖越長，很多人希望下雨，甚至有人謊報病假或偷偷溜回帳篷。一個成員在日記中這樣說：「現在我覺得每天走出帳篷去勞動是越來越困難了。共產主義難道僅僅是一種意志的行為嗎？」

(四) 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古巴人對這種活思想當然看在眼裏。他們宣佈病假要有醫生證明，此外週六的小組學習會重點討論勞動態度，每個人都要彙報自己的真實思想。卡斯特羅來到縱隊營地，他把砍甘蔗的勞動賦予了革命意義，說甘蔗是反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一劑良藥。沒人天生喜歡砍甘蔗，每天砍十小時的古巴人也不是超人，他們需要意志力去完成勞動任務。他自己經常故意把會議和公務排在砍甘蔗之後，使自己找不到理由逃避勞動。一千萬噸糖(順帶說一句，這個指標本來從未完成，官方宣佈差一百五十萬噸)是一場反帝鬥爭，它將向世界顯示根據社會主義覺悟來勞動將會創造甚麼樣的奇跡。他還指出輕視勞動是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留下的傳

統。在這樣的教育下，加上古巴帶隊者的以身作則，多數美國人的思想認識真的起了變化，有人這樣說：通過這一次的鍛煉，今天每看到一勺糖，他就會下意識地想到其中凝結了多少勞動。正像一個古巴人說的：「革命前我們流血，革命後我們流汗。」實際上，這裏已經涉及到了一個改造知識份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問題：勞動崇拜。沉重的體力勞動不但具有實用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改造人的功能。在勞動過程中知識份子從肉體的痛苦中無比深刻地認識到自己體力的無能和靈魂的自私，不但在道義上懷疑和反省自己過去賴以生活的手段，而且在人格上承認自己低於體力勞動者，從而在精神上對革命徹底繳械。在中國的文革語言中，這就叫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種族和性別這兩對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矛盾同樣在縱隊的活動中充分地得到了表現，儘管其參加者在理論上或者口頭上在這兩個問題上是最激進的，而且很多白人甚至常常為自己的種族出身而深感羞愧，但一旦朝夕相處，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黑人總覺得白人與古巴人容易溝通，他們總是被委以重任。當黑人與古巴人交換意見時白人常常在不遠處溜達。而白人則指責黑人勞動時不肯出力。這種種族之間的緊張甚至釀成了衝突。一個停電的晚上，黑人托尼乘機用手肘捅了平時他最看不慣的白人婦女佛蘭西絲卡的眼睛。這起「托尼和佛蘭西絲卡事件」成為種族矛盾的公開爆發。古巴人的決定是把托尼遣送回國。白人支持這個決定，認為它對事不對人(即不是針對哪個種族)。而黑人則公開從種族矛盾的觀點出發拒絕這個決定，他們認為營地已經不像是古巴社會而是北美社會了，其種族主義的氣氛如此嚴重以至於使得一個黑人在過度神經質下(paranoid)襲擊了一個白人姐妹，托尼固然有錯，但他本人也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事件後來以折衷的方式解

決了，古巴人從此對縱隊內的種族問題小心翼翼，力求未雨綢繆。在性別矛盾上，由於縱隊的主要活動就是砍甘蔗，婦女因為生理因素，遠比不上男子的勞動量，因此一方免不了有輕視之意，另一方則感到受壓抑，導致女性成員常常提出「男子沙文主義」問題，一些人一度甚至喊出「一切權力歸姐妹」的口號。而男性成員則抱有新左派運動中對最活躍的女權主義分子的偏見，認為最「嘰嘰喳喳」的(vocal)也是最「神經兮兮」的(neurotic)。

(五)「古巴精神病人的政治覺悟都比美國的正常人要高」

如果說，在縱隊成員的眼裏古巴有什麼東西最集中地體現出兩種社會的區別從而使得他們可以時時處處用來作為改造自己的參照的話，那就是古巴人。在勞動中，他們承認和古巴人相比，自己似乎什麼都沒幹，有人甚至懷疑：「古巴人會感到疲勞嗎？」在訪問古巴家庭的時候，他們為古巴人低標準的生活而吃驚。幾乎每樣生活必需品都要配給，每人每年只有一到兩雙鞋，兩條長褲。衛生紙已經兩個月沒貨了。中午開始停水，碗盞都堆在水池裏要等到晚飯前才能洗，廁所也沒法沖。每家都有一疊定量卡，但商店裏要麼空空蕩蕩要麼就是排起長隊。「這些都不重要，」一個成員說，「重要的是他們正在從事的事業。」

在他們訪問的一個家庭中有三個子女，老大剛砍了一個月的甘蔗回來，每週六還要下鄉種土豆；老二負責一個圖書館，每晚加上一個週五去咖啡地；老三在客人到來的時候匆匆離開餐桌去主持一個紀念列寧的儀式。他們都快活而興奮。另一個被採訪的古巴青年說十年前他只有十三歲的時候就參加政府組織的運動下

鄉教農民識字，告訴他們什麼是革命，怎樣實現農業改革法，等等。無論什麼時候，當他們問古巴兒童等他們長大時如果工作都已做完他們怎麼辦時，孩子們總是異口同聲地說：其他國家需要我們！這個回答使他們想起了他們最崇拜的格瓦拉。一九七七年美國《民族》雜誌的一位記者跟隨那年的縱隊在古巴參觀一所有名的精神病院並觀看病人表演的歌舞節目時聽到一個縱隊成員對其他人說：古巴精神病人的政治覺悟都比美國的正常人要高。沒有人表示異議（見《The Nation》July 2, 1977）。另一個使他們既激動又慚愧的榜樣是越南人。越南遊擊隊員的代表團頻繁來訪，他們和縱隊成員座談、聯歡、配對砍甘蔗。很多遊擊隊員還在少年時就已身經百戰，這使得縱隊成員對他們驚若天神。這就是自己的父輩想要消滅的人！很多成員都表示和越南人的相遇使自己真正理解了什麼叫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個成員在和配對的越南人一起勞動時告訴對方說自己身上的汗衫正是其兄長在越南打仗時穿過的。越南人答到：現在我們是兄弟了。有個縱隊成員寫詩讚頌越南人「人小靈魂大，笑容溫暖像陽光。」

（六）卡斯特羅：「人類至今為止還生活在史前時代」

卡斯特羅在視察營地時曾經對縱隊成員們說：人類至今為止還生活在史前時代，只有掃除一切罪惡和不正義，才會進入真正的人類歷史。縱隊成員的說法更為誇張：「古巴是一個歷史從那裏開始的地方。對於來自史前時代最黑暗之處的訪問者，古巴就像磁極一般引導著我們。」然而，類似的過頭話自二十年代起在西方前往蘇俄的朝聖者中就有人說過。問題是說過這些話以後，他們仍然要回到那個黑暗的、他們深惡痛絕但又十分習慣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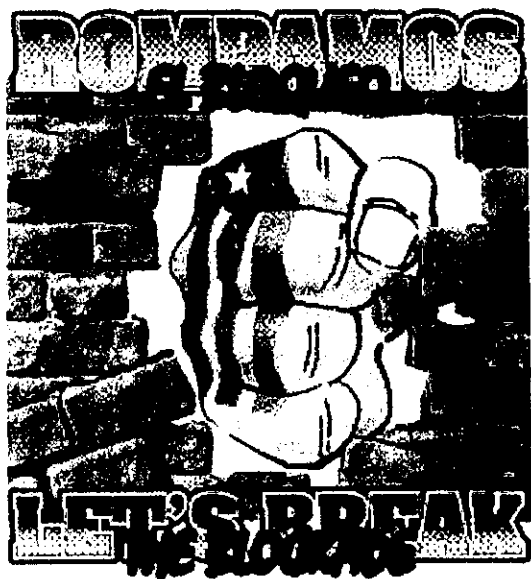
中去。和他們的朝聖者前輩不同，縱隊去古巴的目的不是「看」而是「幹」，並在幹中改造自己，為回美國以後的鬥爭做好準備。那麼，六周的勞動和兩周的參觀真能讓他們煉成金身，回美國以後刀槍不入嗎？從《我們必勝》一書中看並非如此。有兩種表面上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比較激憤，說只要聽聽邁阿密的廣播就會覺得再要回美國是多麼困難；另一則是比較悲觀，說相信多數人回去後將會回到原來的生活方式。其實它們是從兩個極端表達了一種共同的憂慮或者說預感：美國社會對於他們所嚮往的那種革命具有可怕的消解力。問題還並不在於能否發動群眾，而在於他們自己能否入污泥而不染，或者在長期的孤獨和歧視下仍矢志不移。

實際上，《我們必勝》的編者們(也是縱隊的組織者)在序言中已經從反面不自覺地表達了這種心情。他們說這本書「對我們必須在哪裏培養自覺的革命覺悟和意識作了強有力的表達」，縱隊為運動的參加者提供了一個「標準的」(ordinary)革命環境讓他們把鬥爭熱情帶到日常生活中。書中不但總結出美國的價值觀是發展革命潛力的最大障礙，而且一再出現這樣的感歎：只有在這裏，只有在古巴人的領導和監督下，革命的心理和習慣才能培養起來。換句話說，在古巴嚴格甚至嚴酷的環境下培養起來的革命覺悟反而成了溫室裏的花朵。

結語：美國：一塊革命種子可以生根但無望開花結果的土地

毫不奇怪的是：當縱隊成員結束古巴之行回到美國後，他們並沒能把在古巴吸取的熱和光在周圍輻射出來。如果說這是他們

的過錯的話，那麼他們唯一可以被責備的是選擇繼續生活在美國。這是一塊可以讓像他們這樣的革命種子生存下去，但卻無望開花結果的土地。而且，在縱隊成員之間，能把他們再度召喚在一起的也並不是在美國的共同鬥爭，而是報名參加新的支隊重回古巴，去暫時撫平由於社會的冷漠而帶來的心理創傷(雷蒙阿隆曾經說冷淡比迫害更令知識份子難以忍受，某種意義上確實如此。)



這張政治漫畫表現的是「我們必勝」
縱隊要打破美國對古巴的封鎖。

此外，和當年一樣的是，縱隊也成了能把形形色色的左派聯合在一起的唯一組織，古巴之行使得他們暫時忘卻了彼此之間關於如何革命的無休止的爭論。年復一年，縱隊成員數量逐步縮小，老面孔越來越多，在美國如汪洋大海一般的民間組織中聲音越來越微弱，以至於很多曾經對它印象深刻的人今

天甚至不知道它是否還存在。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它仍然存在。在英特網上打出「Venceremos Brigade」之後，這個名稱便會跳出來，它在加州的奧克蘭。在電腦螢幕上，它夾在三藩市灣區和伯克利的一大堆左翼右翼以及無

所謂左右但同樣激烈地反現存秩序和心理習慣的千奇百怪的組織之中。但它的宗旨簡略到幾乎只有一句話：努力迫使美國政府解除對古巴的禁運和組織美國人去古巴旅遊——而不再是砍甘蔗。

說明：本文原發表於海外，在網上廣為流傳並被多人抄襲，例如中國日報環球線上網站2007年10月刊登轉載於新華網的署名為劉作奎的文章〈美國「知青」支援革命古巴砍甘蔗〉就不加引號和出處地多次使用本文的語句。見：http://www.chinadaily.com.cn/hqbl/2006-10/27/content_718431.htm)

本文主要材料來源：Levinson, Sandra and Brightman, Carol, eds. *Venceremos Brigade - Young Americans Shar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Revolutionary Cuba-Diaries, Interviews, Tapes, Essays, Poetry by the Venceremos Brigad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第十一篇

卡斯特羅為什麼拒絕中國模式的改革？

引言：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

中國和古巴關係在後冷戰時期的恢復和發展是當代國際關係中一個重要現象。中共和古共都經歷了蘇聯共產主義崩潰和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雙方有多層次的相互需要。中古雙方的官方媒體都高度評價對方。在中國，不但新老左派崇拜卡斯特羅和古巴，新民族主義者也把卡斯特羅看作是反美英雄。中國人一向有「偉人崇拜」情結，在這種情結作祟下，中國左派和民族主義輿論把卡斯特羅看成是世界革命時代碩果僅存的偉人，全球化時代唯一真正的反美英雄，對他的吹捧有時到了令人肉麻的程度，不無痞氣地稱他為「老卡」、「大叔」。人民日報屬下的環球時報就是卡斯特羅在中國的「粉絲」之一。2004年底卡斯特羅摔跤住院，環球時報曾用大量篇幅集中報導古巴人民如何熱愛他們的獨裁者並衷心祝願他早日康復。對於中共官方來說，古共是在最壞情況下仍然拒不放權並挺住的典型，所以胡錦濤2004年曾經說要向古巴和北朝鮮學習，對輿論和意識形態嚴加控制。因此，卡斯特羅在古巴堅持個人獨裁對中共政權和左派有政治利用價值。

但是中國畢竟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在社會的開放上和思想認識上和古巴不可同日而語。在對古巴一片讚美的背後，中共政界和學界，都可以聽到對卡斯特羅頑固拒絕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不以為然的聲音，尤其對於那些對古巴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有感性認識的人。這些人曾經希望卡斯特羅能仿照中國模式進行改革，改善民生，穩固權力基礎，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卡斯特羅一再讓他們失望。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卡斯特羅不是不懂得改革開放可以搞活經濟，保障基本民生，但他所擔心的正是這種搞活和保障會引發進一步的社會政治需求，最終帶來體制性的危機。兩相權衡，他寧願在他有生之年

保持現狀。他的態度可以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名言來描述：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

其實不是別的，正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嚴重的政權合法性危機成了卡斯特羅患上改革恐懼症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文從這個角度入手，依據中共官方、學界和海外古巴研究界的材料，對卡斯特羅對中共改革的態度進行分析。中心論點是：中共的改革開放對卡斯特羅是一個兩難的挑戰：他羨慕中共的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但對這種變化必然會帶來的社會開放感到恐懼。在實踐上他對中共的影響採取的策略是把中共的經濟成功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勝利，為堅持他所謂的社會主義服務，尤其在古巴國內，在這個基礎上和中共發展關係，從中共那裏獲得巨額援助；但從不告訴古巴人民中國經濟奇跡的真相恰恰不是堅持而是放棄傳統的社會主義，在經濟政策上不允許在古巴實行任何實質性的以中國為模式的經濟改革。這雖然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但在卡斯特羅那裏是其來有自的：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他一方面把蘇聯說成是社會主義成功的榜樣，為他在國內向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過渡做宣傳；但在另一方面，他不但拒絕、而且批判蘇聯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物質刺激、個人利益和市場機制的改革。

（一）中古結盟緣自「六四」事件

中共和古共在60年代上半期曾經是盟友，後來主要由於卡斯特羅必須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作一個選擇，於是和中共交惡，借中共削減對古巴大米輸出為由說中共加入了美國對古巴的封鎖和扼殺，指責北京向古巴黨政幹部家庭郵寄宣傳品是干涉古巴內政。卡斯特羅甚至在數十萬人的群眾集會上咒罵毛澤東是老年癡

呆，以毛為例發誓古巴領導人將來決不超過60歲。到了80年代，由於中共和美國結盟以蘇聯為敵，而古巴又追隨蘇聯的世界戰略，中古又成仇敵。當時卡斯特羅在中共宣傳中的形像是蘇聯的走卒和反華小丑。1979年鄧小平對越南發動邊境戰爭，而越南一直是卡斯特羅心目中的反美英雄，於是他在群眾大會上大罵中共領導集團是一個「瘋狂的新法西斯」，鄧小平是一個「希特勒式的傢伙」。^[1]

但到80年代末，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改變，尤其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公開性使得卡斯特羅意識到必須未雨綢繆，為國際政治生態的劇變做準備。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給他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機會。「六四」發生時，中共外長錢其琛剛剛(6月初)踏上拉美作多國訪問，但天安門的鎮壓引起很多拉美國家的抗議，撤銷了錢的訪問和接待。錢被迫通過墨西哥(墨西哥政府沒有官方接待他，只是讓他過境，錢只好住在使館)提前來到哈瓦那。本來錢對哈瓦那的訪問是拉美多國行中的一站，而且是對古巴外長早先對中國訪問的禮節性回訪，加上中古之間多年的對立和冷淡，錢對這次訪問並沒有過高期望。但哈瓦那卻給予他熱烈歡迎。卡斯特羅在古巴國家宮為錢舉行晚宴，和錢長談，不等宴會結束就把錢帶入他的辦公室進一步交談，直到半夜。卡斯特羅表示他堅決支持中共的所謂「平暴」，這是當時國際上少有的對中共的公開支援。得知錢由於和國內失去一段時間的聯繫，對北京情況不太瞭解，卡斯特羅向他詳細介紹了情況和國際間的反應，還表示如果錢要對外發表聲明，他可以提供場所和條件。^[2] 錢在古巴停留了四天，明顯是因為拉美其他國家取消了他的訪問，而只有古巴願意接待他。

卡斯特羅在這個特殊時機給予孤立中的中共的支持，一定程

度上預示了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國際盟友的重新組合，給中共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為中古改善和迅速發展關係的起點。卡斯特羅後來多次重複過他對中共鎮壓的支援，但根據場合口吻有所不同，例如1990年6月在接受美國CNN電視老闆特納訪談時，他說中國人對付這些問題沒有經驗，不得不使用武力。但如果不鎮壓，騷亂和內戰將使中國陷於無政府狀態，因此中國政府「沒有選擇」。^[3]這些話表明，他心裏也很清楚：天安門鎮壓受到舉世譴責，一味強硬地為中共鎮壓叫好只會適得其反。

(二) 卡斯特羅對中共改革憂心忡忡

卡斯特羅利用「六四」讓中共患難見真情，北京當然給予回報。在蘇聯瓦解，古巴失去依賴了20多年的經濟援助後，北京的支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蘇聯留下的真空。90年代初中古雙方在國際上都處境不利：北京是因為「六四」的後果，古巴則是被蘇聯拋棄，因此雙方在國際場合相互支持，尤其在人權等問題上和美國等抗衡，結成了政治聯盟。

1993年11月江澤民訪問古巴，是中古兩國最高級領導人1959年以來第一次會面。古巴是江澤民拉美之行的一站，不但是到最後時刻安排的，而且江只停留了19個小時，但卡斯特羅把江的訪問看作是古巴打破國際封鎖的一個重要成果，不顧古巴正處於「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這是古巴官方對被蘇聯拋棄後經濟處於極端困難期的委婉用語)，傾力招待。在第一次會談中，江在大談一番社會主義的生命力之後，轉而向古方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很可能也是古方主要關心的問題。卡斯特羅邊聽便作筆記，不時發問，包括這個概念的定義和翻譯。會談直到將近午夜，卡斯特羅親

自把江送回旅館。江回旅館後，不顧旅途和會談的勞頓，親自為第二天的會談起草講稿，圍繞「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做文章。第二天的會談儘管只有兩個小時，江卻用了一半的時間來強調這兩個「只有」。在場的中國大使回憶說，這一次卡斯特羅和其他古巴領導人頻頻點頭，露出滿意的神色。顯然，江的第一次會談沒有打消他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疑慮。[4]

1995年卡斯特羅第一次訪問中國。在首次和江澤民的會談中，他提出了一個讓中共方面非常突兀的問題：中國的糧食進口和對古巴的影響。他說中國有充足的外貿產品可以用來換外匯，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中國的需求十分龐大，把國際市場上糧食的價格抬高了。但古巴的外貿產品有限，外匯就有限，付不起被中國抬高的國際市場糧價，這就是為什麼古巴兒童在挨餓，很多人患營養不良症的原因。根據當時中國政府陪同團團長、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的回憶，當卡斯特羅表達這番不滿時，他情緒十分激動。卡斯特羅的這番指責使中共方面非常震驚。會談後陳錦華專門向卡斯特羅介紹了中國糧食進口的情況。他說中國糧食基本自給，進口糧食佔糧食消耗只有百分之幾，而且是中國和美、加這些糧食出口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安排，不用外匯，不至於影響到國際市場的糧價。卡斯特羅聽了只是點頭，不置可否。在後來的訪問過程中，陳感到無論他如何解釋，中國的糧食問題始終困擾著卡斯特羅。例如卡斯特羅專門向他詢問中國汽車(尤其是家用汽車)生產的情況。在聽了陳的回答後卡斯特羅說中國雖然大，但耕地有限，發展私人汽車會帶來增加道路和停車場的問題，這些都會佔用農業用地。然後他教訓陳說：「中國人口太多，合理使用土地是你們的長期任務。」在西安，中共安排卡斯特羅訪問一

個農戶。卡斯特羅向農家幾個成員詳細地詢問了他們的土地使用和收成情況。在回程中，卡斯特羅突然要車隊中途停車，他走進一個路邊農戶，向主人詳細詢問了同樣的問題。這個突然襲擊明顯是表明他對中共方面的官方解釋和訪問安排不信任。作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想必他對糊弄客人裝點門面的「波將金村莊」是深有體會的。

在那次訪問中，中共方面重點讓卡斯特羅看了上海和深圳這兩個經濟樹窗，並在深圳安排了和江的第二次會談。但在離開中國前，當陳錦華問他有何觀感或留言給中共領導時，卡斯特羅沉吟半晌，泛泛而談地說他看到了中國的發展並對社會主義更有信心了。涉及到具體問題時，他說中共有八個「民主黨派」在幫忙，而古巴沒有。古巴靠的是和群眾的直接聯繫，他匆忙回國的原因是要在古巴中學生代表大會上露面。他說在蘇東波之後，西方國家也企圖在古巴煽動「街頭政治」，挑唆青年學生反對政府，這時他和其他領導人走上街頭和群眾對話，瓦解了西方的陰謀。無論古巴的真實情況(所謂黨和群眾的「直接聯繫」)是否如他所說，卡斯特羅的這番話不是無的放矢，很可能是對中共一向靠「民主黨派」裝點門面，關鍵時刻他們並不和中共同心同德的一種提醒，也是對中共當年拒絕和學生對話的一種間接批評，重複他早先所謂中國人「沒有經驗」的說法。[5]

第一次訪華並沒有打消卡斯特羅對中共的疑慮。1998年胡錦濤以未來中共黨魁身份訪問古巴，和卡斯特羅進行了兩次會談。陪同胡訪問的中聯部發言人裘援平回憶說，那次訪問的背景是古巴仍然有嚴重的經濟困難，但隨著經濟的有限開放和旅遊業的發展，也面臨新的社會問題，例如金錢崇拜，腐敗、犯罪和賣淫。

在這個打開的「潘朵拉的盒子」面前，古巴應該是急切地想知道中國究竟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如何對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但會談的實際內容表明，卡斯特羅對中國的擔憂似乎超過了他對中國經驗的興趣。在第一次會談中，卡斯特羅對胡盤根問底，從一畝地打多少糧、一個蠶繭產多少絲到從中國飛到古巴要多少油和中國有多少寺廟，在炫耀其博學的同時對胡進行接班人「考察」。然後他轉到政治話題：社會主義在當代世界的前途。他談到蘇聯瓦解的時候十分哀傷，說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就這麼完了。他說社會主義能在古巴堅持下來的原因就是古巴人民都有社會主義覺悟，然後他盯著胡，一字一字地說：「永遠、永遠不要放棄社會主義，否則死路一條。」在第二次會談中，裘援平說卡斯特羅又重提「誰能養活中國」這個老話題。卡斯特羅繞了一個大彎，從中國最近的洪災開始，談到美國的小麥和阿根廷的大豆，再轉回到他對中國糧食生產和糧食進口的擔憂。他搬弄指頭計算世界未來糧食產量，告訴胡錦濤中國糧食自給對於第三世界的意義。在宴會上，卡斯特羅還讓服務員從廚房提來一包大米，給胡錦濤上了一課，告訴他用先進技術處理食品和飼養家畜的重要性。[6]

這些中共高級官員的回憶表明，在蘇聯解體後，卡斯特羅一方面竭力推動古巴和中共關係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對中共改革的實質(即所謂「社會主義」方向)和對社會開放後中共應對危機的能力一直有疑慮，不斷測試中共新領導人是否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同時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擔心。中共高級官員則對卡斯特羅的這些疑慮和擔心至少不以為然，而在涉及古巴人民極端困難的日常生活時，這些文章的口吻讓人感到真正應該反思的似乎不是中共，而應該是卡斯特羅。

(三) 卡斯特羅和古巴改革的停滯不前：中國拉美學者的看法

在涉及古巴問題時，中國的拉美學者比官員說話要自由一些，但也很有限，特別是因為古巴方面對自己在中國的「形像」十分敏感。和國際學術界類似，中國拉美學術界裏左派的聲音比較強，因為作為研究對象，拉美的現狀不但是殖民主義的後果，而且是「新自由主義」失敗的例證。拉美本身的左派和反美勢力也構成國際左派的重要部分，和中國學術界的左派相呼應。中國有的左派出書的簽字儀式都是在古巴大使館舉行。2003年十月拉美社會科學理事會在哈瓦那舉行題為「全球新霸權、變化、選擇與社會主義」的會議，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的資深研究員徐世澄應邀出席，和國際左派頭面人物如薩米爾·阿明(埃及學者、作家)，諾姆·喬姆斯基(美國麻省理工科學院教授)、羅伯特·達爾(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和佩里·安德森(英國《新左派評論》主編)等同台，作了題為「新帝國主義和美國的新霸權」的發言。卡斯特羅不但全程與會，而且發表了5個小時的講話。但即使在中國的拉美學術圈內，仍然可以聽到對古巴長期在改革的基本目標上認識不明徘徊不前導致民生凋敝的直接或間接的批評。

1997和1998年，在古巴對中共的經濟政策有了相當瞭解並召開了古共五大之後，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的《拉丁美洲研究》發表了肖楓和徐世澄關於古巴的兩篇文章。雖然他們都對卡斯特羅「堅持社會主義」的信念表示讚賞，但重點都放在用很多資料和材料介紹古巴本來就有限的經濟改革，例如私人可以從事一些小型服務業如理髮、餐飲和計程車，允許美元流通，以及一定程度上多勞多得等等，並對改革的發展寄予厚望。肖楓

的文章根據中國的經驗甚至預言古巴經濟改革將邁向採用市場機制、經濟成分多元化、允許私人經濟發展、打破鐵飯碗和削減福利的趨勢。[7]

從那以後，雖然中國拉美研究界在公開場合從來沒有改變對卡斯特羅堅持他的社會主義的支持，但有充分的跡象表明很多人對古巴經濟改革停滯不前十分失望。拉美所副所長江時學經常接受新聞界就中古關係和拉美問題的採訪，是中國拉美研究界「出鏡率」很高的。他2002年10月出席了在英國舉辦的一個關於古巴問題的國際研討會，提交了一份題為〈中國和古巴經濟政策的比較研究〉。通常情況下這樣的文章通常很快會發表，或者至少文章的內容在該所的網站上可以搜索到，但這篇文章卻是例外，網上提供的只有文章的題目。江作了什麼樣的「比較」呢？美國邁阿密先鋒報（該報是美國對古巴問題最為關注的媒體）的記者奧本海默（Andres Oppenheimer，美國有關古巴事務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在訪問該所時得到了一份文章的拷貝，後來在邁阿密先鋒報上發表了長篇報導〈中國大哥對古巴的忠告：採用市場機制吧〉。奧本海默說，江的文章的基調對古巴相當不滿，「古巴的改革並沒有任何清楚定義的理論做依據」，古巴政府「並沒有改變它的理論基礎，公開接受市場機制」。文章甚至這樣公開發問：「古巴可以從中國學到什麼？」並列舉了一系列古巴可以從中國這裏學到的「經驗」，包括採用市場機制，所有制多元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這樣一份文章在中國不能公開發表，看來是理所當然的。

拉美所的徐世澄研究員60年代在古巴留學，是中國屈指可數的古巴問題專家，和古巴高層領導和學術界一直保持密切關係。他在200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古巴仍然沒有認識到全面改革的

必要性，始終停留在應急階段，以致改革的長期戰略目標含糊不清。[8] 2003年，徐世澄在上文提及的國際左派在哈瓦那召開的反「美帝霸權」的大會發言後又實地考察了古巴，回國不久發表了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古巴的經濟情況。徐說，古巴的經濟改革仍然處於十字路口，經濟雖然有所恢復，但還沒有回到90年代早期的水平，經濟總量低於1989年。徐用了一幅圖表詳細說明古巴普通人的配給情況，包括麵包、大米、食油、雞蛋、魚、火柴、肥皂、牙膏，甚至古巴特產的雪茄煙都要配給。最令中國人震驚的是，古巴號稱世界糖罐子，但2003年它甚至必須從哥倫比亞進口

糖(徐並沒有說明的是2003年並非古巴唯一的進口糖的年份)。[9]所有這些都只能使中國人回想起毛澤東時代最困難的時候。

國際輿論一般認為勞爾·卡斯特羅(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胞弟，也是他自60年代初就指定的接班人)對待改革開放的態度要開明一些。中國的古巴問題專家一般很少涉及古巴黨內在改革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但徐的文章說勞爾在承認「外部因素」是導致古巴經濟困難的原因之一時，也「尖銳地分析



Raúl and Fidel Castro

這張漫畫刊登在美國胡佛研究所的《胡佛文摘》上，形象地表現了卡斯特兄弟的關係。

Illustration by Taylor Jones for the Hoover Digest

了主觀因素」：「我們工作中的很多缺陷和帝國主義沒有關係，和『和平年代的特殊時期』也沒有關係……我們必須有勇氣承認、分析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徐讚揚了勞爾在推動軍隊經濟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勞爾主管軍隊，古巴軍隊的預備役部門最早在副食品生產中實行一定的承包制)。[10]

有關勞爾在推動古巴有限的經濟改革中的作用和對「中國經驗」的重視，中共駐古巴大使(1999-2001)王成家有更詳細介紹。王說，「勞爾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生的變化十分關注。他讀了6遍江澤民主席的15大報告。他訪華20多天(勞爾於1997年首次訪華，本文作者注)。每參觀一地，全團要開會總結，談體會。回古巴後，他根據古巴的具體情況，借鑒了一些中國的經驗。」古巴和中國過去一樣，軍隊(尤其是後備役)從事經濟生產，古巴有限的改革就是從軍隊的經濟部門開始的，取得經驗後，分步驟在有條件的國有企業展開。可以說是軍隊的政治特權使得他們成了改革的先鋒。古巴的菜籃子工程就是在勞爾倡導下在軍隊中首先發展起來的。[11] 古巴軍隊後備役司令紹黃是中國血統，古中友協主席，在勞爾的支持下他對菜農實行按勞分配，一個菜農每月所得超過部長的名義工資。這在古巴引起了一場「姓社姓資」的爭論，甚至有報紙公開批判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時勞爾出面說「為什麼一個農民就不能比部長掙得多，他是勞動所得，符合社會主義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12] 徐世澄和王成家對勞爾的評價可以從紹黃等人最近在美國出版的《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一書中得到印證 [13]。勞爾早在80年代晚期就主張一定的「工作重點」轉移，支援發展「菜籃子工程」，針對「有些領導人」對具體負責人的批評，他說他是這個工程的「教父」，有問題找他。

(四) 美國的古巴研究界對「中國經驗」的看法

自 90 年代後半期以來，所謂「中國經驗」——即採用市場機制、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同時維持一黨專制——對古巴的借鑒意義越來越引起國際拉美研究界的注意，尤其是對古巴的未來最關心的美國。這方面的討論主要反映在兩個研究項目中，一是「美洲內部對話」(Inter-American Dialogue 簡稱 IAD)，另一個是「古巴轉型研究」(Cuba Transition Project 簡稱 CTP)。

IAD 主要關心的是東歐、越南和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古巴的借鑒作用。曾經擔任世界銀行負責拉美事務的副總裁、印度背景的經濟學家伯可(Shahid Javed Burki)也有過主持世行中國專案的經驗。他認為古巴現體制更多地是民族歷史發展的產物，和東歐不同，因此東歐急劇轉型的模式不適用於古巴，倒是中國在這個意義上和古巴更為相近。他說「中國的很多經驗對於古巴可能更為切合」，包括「加入佈雷頓森林體制和世界銀行，和美國建立良好的關係。」^[14] 伯可的文章充滿了善意的具體建議，但這些都是關心國際事務的人不難想像到的。他的問題是在一個關鍵問題上顯示出對他所談論的那個政治體制缺乏起碼的瞭解：建議再多再好也無助於理解那個體制和領導人是否有誠信和決心走上這條道路。

相比之下，CTP 的研究者很多都是對古巴體制有深刻瞭解的歷史和政治學家，他們更關心的是古巴有沒有可能採用中國模式，即使他們提出建議，也是從對古巴現體制有切身利益關係的角度出發，而不是空想。例如，萊特里夫(William Ratliff，胡佛研究所古巴和中國問題資深研究員)在〈中國經驗與古巴轉型?〉一文中列舉了一系列不但改善國計民生、而且對體制本身也有穩定作用的措施，主要是用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來改變領導人恐懼改革的心態，消除對大鍋飯和鐵

飯碗的依賴，建立有序而穩定的權力交接，讓軍隊退出經濟領域，等等。不過，萊特里夫強調說歷史已經給了卡斯特羅充分的機會讓他扮演鄧小平的角色，但今天看來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小」。^[15] 在另一篇文章中，萊特里夫分析了卡斯特羅為什麼當不了鄧小平的原因：「就像毛一樣，卡斯特羅不能在他生命的盡頭放棄他追逐了一輩子的信念，同時又不承認他一生的政治事業是一個可怕的錯誤」。所以正像毛至死抓住他的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放一樣，卡斯特羅在這一點上也是堅定不移，只有在經濟實在一場糊塗時才階段性地允許一些刺激個人動力的措施。」^[16] 因此和鄧小平不一樣的是，卡斯特羅在處理經濟問題和對外開放時頂多是從策略而不是從戰略角度出發，他決不可能有任何全局性的改革思維。

一些 CTP 的研究者揭示了一些和「中國經驗」有關的古巴內幕。阿姆切斯特奎(Domingo Amuchastegui)原是古巴高級情報主管，後叛逃美國。他告訴萊特里夫「費德爾·卡斯特羅對中國的每一個方面都有很大的保留，包括改革的步調，強烈的貧富懸殊，社會對抗，普遍的腐敗。」^[17] 他對中國的態度和勞爾有很大的不同。1993年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下古巴國內的Cojimar和Regla兩地發生了動亂，受「天安門綜合症」的影響，勞爾據說在內部會議上說他「不想為把坦克開上街頭負責」，為了解決「食品 and 日常生活基本需要」，必須實行一些改革。自90年代中期以來，在勞爾周圍聚集了一批有改革思想的領導人和經濟學家，他們對中國模式在「政策設計和實踐效果」上普遍感興趣。卡斯特羅1995年訪問中國時並沒有會見中國經濟改革領導人朱熔基(朱直到2003年卡斯特羅第二次訪華時才和卡斯特羅見面，其時所有中國主要領導人都和卡斯特羅或是在中國或是在古巴見過面了)。而勞爾1997年訪華時和朱長談，把那次訪華之行稱為「取經之旅」。

後來他邀請朱的顧問訪問古巴，和古巴領導人就改革問題和中國經驗座談，尤其是如何吸收海外僑民的資金和技術。古巴全體領導人出席了座談，只有卡斯特羅缺席。阿姆切斯特奎說卡斯特羅「極大地削弱和限制了中國經驗在古巴的影響。」 [18]

以上美國的古巴研究界對「中國經驗」的分析和中國官方和學術界的觀察基本上可以相互印證。他們都認為大權獨攬的卡斯特羅沒有也不可能實行類似於中國的全面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在這個前提下古巴不可能有一個長期和系統的改革方案，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古巴領導集團內部不乏對中國經驗深感興趣的人。

結語：抵制改革 至死方休

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已經取代蘇聯成為古巴國際上的主要政治盟友，同時是主要的貿易夥伴(僅次於委內瑞拉和西班牙)、慷慨的借貸人(江澤民2001年訪問古巴時曾送上一筆4億美元長期無息貸款的厚禮)和日常生活用品(從自行車、電視機、電鍋到塑膠拖鞋)的供應商。很多國際觀察家都對中國能否影響古巴的改革開放深感興趣，但實際上，所謂中國經驗給卡斯特羅帶來的更多是困擾和懷疑，而非鼓勵和信念。

毫無疑問，卡斯特羅1989年以來在發展中古關係上起了主要推動作用。對於他來說中古關係有極大的現實意義。當「中國製造」的商品充斥古巴市場，古巴政府從中國那裏得到巨額援助的時候，卡斯特羅從未放過機會，告訴他的人民：這一切都因為中國堅持了社會主義和國家獨立。1999年中共慶祝建國50周年，卡斯特羅出席了群眾集會，在中國大使之後發表了「即席」長篇演

講(之所以在「即席」上加引號，是因為這是卡斯特羅的慣技：事先宣佈不講話，然後突然來一個「即席」，顯示對問題的重視，在這個場合無疑是要意外地給中共一個面子。)。卡斯特羅告訴古巴人民：中國已經維持了20年的百分之九點八的增長率，每年生產的雞蛋佔世界總量的百分之四十(在他領導下古巴從60年代初雞蛋就實行配給，因此這無疑是一個讓古巴人民印象深刻的資



這張漫畫表現的是卡斯特羅雖然80多歲但仍然把持政治講台。

Illustration by Taylor Jones for the Hoover Digest

料。)，每年的穀物產量是490億噸(他沒有說這是否足以養活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此外他還告訴古巴人民：中國非但沒有像很多亞洲國家的經濟那樣在最近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垮掉，而且人民幣也挺住沒有貶值，從而為世界經濟的恢復作出了貢獻。但是，中國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奇跡——卡斯特羅一字都沒有提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中國所進行的是一場「窮人所有、窮人所

治、窮人所享」的革命。當發表完這樣一番令任何瞭解中國真實情況的人目瞪口呆的講話後，他奮臂高呼「不是社會主義就是死亡！我們必勝！」[19] 在中共舉行建國 50 周年閱兵典禮的當晚，卡斯特羅來到中共大使館，觀看現場轉播的盛況。中共展示的武器裝備使他非常亢奮，對中國大使說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閱兵，「美國人、俄國人、德國人，沒一個能做到。」他向大使館要了一份錄影，要讓古巴每個老百姓都為中國的強大而自豪。古巴國家電視台把這份錄影放了三遍，確保每個古巴人都有機會和他們的主席同樣亢奮。不但如此，他還把這份錄影複製了一份送給來訪的瓜地馬拉總統，後者正考慮和台灣斷交。[20] 換一個角度，說卡斯特羅奴顏媚華毫不為過，這就是所謂「硬漢」的真相。不過在他，這也決非第一次，從 60 年代到 80 年代，他就是一直這樣吹捧蘇聯的。

就和 40 年前對蘇聯力量的吹捧一樣，在今天卡斯特羅對中國實力的吹捧背後是深刻的保留和懷疑。對於卡斯特羅來說，所謂的「中國經驗」究竟有什麼讓他止步不前？他的有限改革和中國模式之間的分界線又在哪裏？這個問題可能還是對中國和古巴都有瞭解的中國古巴問題專家最有資格來回答。徐世澄在 1998 年就對卡斯特羅在中國和古巴之間劃的分界線印象深刻，他引卡斯特羅在黨代表大會上的話說：「古巴不能照搬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的政策」，古巴經濟「決不向市場的盲目規律低頭，決不允許私有制，決不放棄國家計劃」。[21] 這三個「決不」非常具體和可操作，和鄧小平的所謂「四個堅持」不同。「四個堅持」只有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是具體的，即共產黨不放棄對權力的壟斷，其他都可隨意解釋。連鄧小平自己都承認「什麼是社會主義」都還沒有弄清楚，還堅持什麼？因此，只要這三個「決不」沒有廢除，古

巴改革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進展。6年後當徐再次訪問古巴歸來後，他用具體的材料說明了這三個「決不」是怎樣繼續束縛古巴經濟的：古巴的私營經濟限於服務行業和家庭規模，即計程車、餐館、理髮店、咖啡店等等，而且做老闆的只能是同一個家庭成員，不許雇外面的幫手。一個哈瓦那中餐館老闆對徐抱怨說政府規定像他這樣的外資餐館必須到指定的商店用外幣進貨，這就憑空增加了成本。徐委婉地說「古巴領導人一向十分重視社會平等和平均，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十分擔心。」[22] 這個觀察可以用卡斯特羅自己的話來說明。就在接待胡錦濤訪問古巴之前，卡斯特羅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強調說「我們不是為了創造個人百萬富翁而鬧革命；我們是為全體公民成為百萬富翁而革命。」這無疑是針對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 [23]。

卡斯特羅本來就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頑固的保守派。60年代他在古巴貫徹和毛主義十分相近的卡斯特羅主義，上台不到幾年就把一個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的島國弄得樣樣都要配給。後來他不但拒絕參考蘇聯有限的經濟改革，而且像毛一樣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只不過為了繼續得到蘇聯的援助和保護，這種批判沒有公開而已。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反抗極權統治的「布拉格之春」，卡斯特羅抓住機會和蘇聯算總帳，在群眾大會上指責蘇聯，說正是蘇聯的經濟改革導致了自由化，為捷克的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培養了土壤。與此同時他在國內發動了「革命攻勢」，用動員全國實現一千萬噸糖的經濟指標來實現社會的徹底轉變，向共產主義過渡，可以說是結合了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要畢其功於一役。當這個窮過渡失敗後，卡斯特羅的革命開始「制度化」，即不再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完成經濟指標和管理國家，而是參考蘇聯的模式，建立起官僚體制和高度中央集權的指

令經濟。蘇聯的演變和瓦解不但沒有使他反省共產黨傳統體制的致命缺陷，反而使他對任何會削弱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經濟和政治措施更加敏感。

在這樣的背景下，卡斯特羅對中共的改革開放一直有兩個主要疑慮，這兩個疑慮又反過來強化了他的反改革立場。疑慮之一是中共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中共堅持一黨專制的信念。他和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初次會見就說明了這一點。與此相聯繫的是他對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給一黨專政所造成的威脅的疑慮。卡斯特羅反對貧富分化，但這決不是為老百姓著想，只不過是因為和普遍貧窮相比，貧富分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是像他這樣的獨裁者更難以應付的。因此與其貧富分化，不如普遍貧窮。這就是他堅持他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因。相信如果毛在世，他也會用類似的立場來抵制改革。卡斯特羅的另一個疑慮則並非毫無道理，這就是中國的發展是畸形的，短視的，是以犧牲農業和環境為代價的，將給人類的未來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這個問題當然對於很多經濟學家、發展學家和環境專家，或者甚至普通人來說並不新鮮，但卡斯特羅表達這種疑慮的方式帶有他的鮮明特徵，甚至把中國的糧食進口和古巴兒童營養不良聯繫上，充分體現了後冷戰時期共產黨國家之間關係的錯綜複雜和光怪陸離。

雖然在改革問題上，卡斯特羅讓中國和西方很多人一再失望，但至少有一點他們應該感到慶幸，這就是卡斯特羅雖然不是鄧小平，但畢竟也不是毛澤東。毛在他的最後時刻為了剷除修正主義者和「黨內資產階級」，發起了對周恩來的批判，並再次清洗鄧小平，但卡斯特羅不但允許一些有限的經濟改革斷斷續續地出台(時常又收回)，而且沒有禁止黨內對「中國經驗」的討論。時

代畢竟不同了，卡斯特羅也沒有毛澤東那樣定期清洗自己接班人的記錄。古巴改革的大門被他關上了，但卻沒有上鎖。在他身後，如果古巴不能立即實現民主化和自由化，那麼新領導人很可能會採用一些被中國模式證明為是有效果的政策。萊特里夫預言道，當那個時候到來的話，為了減輕黨內保守派的阻力，改革派很可能會把卡斯特羅大段讚美中國的話拿來作為意識形態的武器。卡斯特羅曾經在中國人面前為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而悲歎，而如果古巴共產主義的瓦解始於他自己對中國言不由衷的讚美，那麼人們看到的將是一齣歷史的悲喜劇。

說明：本文基於作者發表於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07年春季號24-42的文章“Fidel Castro and China’s Lesson for Cuba-A Chinese Perspective”修改而成。

【注釋】：

- [1] *Granma Weekly Review* (古巴黨報英文版週刊)，1979年3月4日。
- [2] 以上見錢其琛《外交生涯》，香港三聯有限公司，2005年，第138-142頁。
- [3] 特納對卡斯特羅的訪談見 <http://lanic.utexas.edu/la/cb/cuba/castro/1990/19900709>。
- [4] 以上見徐貽聰(中國前駐古巴大使)(江澤民主席對古巴的歷史性訪問)，載《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4卷，第64-74頁。
- [5] 以上見陳錦華〈陪卡斯特羅訪華的見聞和感受〉，《縱橫雜誌》，2003年5期，第13-15頁。
- [6] 以上見裘援平〈世紀之交的情感和抉擇——隨胡錦濤同志出訪拉美三國印象〉，載歷史文獻編輯組編《歷史的瞬間》，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248-257頁。
- [7] 肖楓〈古巴在穩步地改革開放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三期，第24-29頁；徐世誠〈從古共五大看古巴政治經濟形

- 勢》，《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二期，第5-7頁。
- [8] 徐世澄〈古巴改革十年：成就和問題〉。文章沒有公開發表，網址是：
http://www.ease.net.cn/chinese/s27_1ms/zhuanti_bg/reforma/cuba.htm
- [9] 徐世澄〈目前古巴經濟和經濟改革〉，《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一期，第23頁。
- [10] 徐世澄《衝撞——卡斯特羅與美國總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158頁。
- [11] 王成家《解讀卡斯特羅神話》，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第30頁。
- [12] 同上，第31頁。
- [13] Armando Choy, Gustavo Chui and Moises Sio Wong, *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New York: Pathfinder, 2005), chapter3 “Facing Food Crisis”。
- [14] Shahid Javed Burki “China: the new global giant”, in Shahid Javed Burki, eds, *Transforming Socialist Economies: Lessons for Cuba and Beyo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5),
- [15] William Ratliff, “China’ s Lesson for Cuba’ s Transition”, in *The Cuban Transition Project*, University of Miami, 2004, 19-25。
- [16] William Ratliff “After Fidel”, *Hoover Digest* (2004)。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digest/3009951.html>
- [17] William Ratliff, “China’ s Lesson for Cuba’ s Transition” 21。
- [18] Domingo Amuchastegui “Cuba’ s arms forces: power and reforms”, *the Cuba Transition project*, University of Miami, 2003 http://ctp.iccas.miami.edu/Research_Studies/BLatell.pdf
- [19] 卡斯特羅講話見 *The Guardian*, 17 November 1999.
- [20] 王成家《解讀卡斯特羅神話》，第22-23頁。
- [21] 徐世澄《從古共五大看古巴政治經濟形勢》，第6頁。
- [22] 徐世澄《古巴改革十年：成就和問題》。
- [23] Larry Rohter, “Cuban Communist Party peers ahead, then votes to march in place”, *New York Times*, 12, October 1997.

第十二篇

極權型領袖人格的雛形：涅察也夫現象

引言：一個禁忌的名字

19世紀俄國革命史上，涅察也夫是一個今人鮮知的名字，至少很多對這段革命史有相當瞭解的中國人從未聽說過他。對於那些希望從正面意義上敘述這段歷史的人來說，涅察也夫的棘手之處在於他是一個信念堅定的革命家，同時又是一個極端專制和不擇手段的人。因此，長期以來這個名字成為了某種禁忌。然而，一部俄國革命史假如沒有這個人的名字和他的「革命家手冊」，那不但是一個缺憾，而且是對這個漫長的革命過程中某種內在連續性的忽視。

(一) 靠欺騙建立「革命家」的聲望

謝爾蓋·涅察也夫，1847年生於莫斯科以北三百五十公里的小鎮伊萬諾夫的一個工匠家庭。他個性早熟，少年時在家鄉就受到比自己年長的激進學生的影響。1866年他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到聖彼德堡的一所小學教書，同時通過在聖彼德堡醫學院(當時學生運動的中心)當旁聽生與旨在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學生運動發生了聯繫。從那時起到1882年病死獄中，其政治生涯可以如此概括：一



謝爾蓋·涅察也夫。
(1847-1882)

小鎮伊萬諾夫的一個工匠家庭。他個性早熟，少年時在家鄉就受到比自己年長的激進學生的影響。1866年他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到聖彼德堡的一所小學教書，同時通過在聖彼德堡醫學院(當時學生運動的中心)當旁聽生與旨在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學生運動發生了聯繫。從那時起到1882年病死獄中，其政治生涯可以如此概括：一

方面他是沙皇專制制度的死敵，說他把一生都獻給那場革命鬥爭並不為過；另一方面，他的全部活動是由陰謀、欺詐、恐嚇和暴力所組成，而這些手段所針對的不但是現存制度，也包括自己的同志，其目的是為建立和鞏固其個人的權威。

涅察也夫作為革命家的名聲最初是由一個「被捕和逃脫」的故事所建立的。那是1869年二月初的一天，一個深受涅察也夫影響的嚮往革命的少女查·蘇利奇(後來成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活動家，並曾向馬克思提出過那個著名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是否可能」的問題)收到一封匿名信，寫信者自稱是學生，說他在散步時身邊經過一輛沙俄第三廳(秘密警察)的馬車，車上有個人扔下一張紙條並喊道：如果你是學生請幫我寄走這封信！這封轉寄來的信是涅察也夫的手筆：「我已被捕。警察正把我押到一處不知道的地方。我們的事業會繼續下去的。」查蘇利奇當時與涅察也夫的妹妹(兩人都只有十七歲)得信後便出外打聽情況。很快，「涅察也夫」的名字便在學生中傳開了。過了一陣，國外傳來了意外但令人欣慰的消息：涅察也夫已成功地逃脫並去了瑞士，與那裏的流亡革命家取得了聯繫。

這個故事中只有一點是真的：涅察也夫去了瑞士，其餘都是他在密友奧洛夫幫助下自導自演的，目的是為了在群雄並起的學生運動中提高涅察也夫的知名度，從而有助於他在瑞士與一些著名的革命家見面，而這層關係又會反過來為涅察也夫日後在國內的政治活動帶來某種權威。涅察也夫如願以償，在瑞士他見到了巴枯寧、奧格遼夫和赫爾岑這些甚至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都聲名顯赫的俄國人。他竭力讓他們相信正是由於自己在國內已發展起了相當規模的革命組織因而才成了警察注意的人物。在這些大人物中，巴枯寧給了涅察也夫毫無保留的支持。他們發起了「宣

言運動」，即起草了一篇又一篇鼓動革命的宣言，與奧格遼夫合署後大量寄往國內。巴枯寧對涅察也夫的欣賞簡直到了入迷的地步，他曾在一封信中這麼說：「你從哪裏得到了如此堅定的信念和力量？這種不依靠上帝的信念，不摻雜任何個人利益和欲望的力量？」在這種忘年交的背後，是巴枯寧的認為俄國馬上就會有一場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幻想，這種幻想使他甚至產生了一種神秘的革命循環論：俄國農民在1670年有拉辛起義，1773年有普加喬夫起義，現在是一輪新的百年輪迴。在涅察也夫的身上他看到的不但是新一代新的革命家，而且是自己和國內革命之間的橋樑。

(二)「革命家手冊」：道德就是有助於革命勝利的手段

涅察也夫急於回國發動革命，在瑞士只耽了半年(1869年二月到八月)他就持偽造的護照潛回俄國並很快在莫斯科建立了稱為「人民的復仇」的秘密組織。除了在國外建立的聲望外，他還有一份「歐洲革命聯盟」委任他為「世界革命聯盟俄國部」代表的文件(這兩個組織都是子虛烏有)。他的打算是先建立「人民的復仇」的核心小組，然後由每個組員單獨發展出新的第二級，第三級的小組，其組織原則是組員服從組長，每個組長單獨對上一級負責，而只有涅察也夫自己與上一級的「委員會」保持聯繫，傳達指令(這個「委員會」就是他自己)。在行動上，計劃以刺殺沙皇來引發革命。

這裏值得介紹的是涅察也夫攜回國的一份稱為「革命家手冊」的重要文件(史家一般認為巴枯寧在此文獻的形成過程中起了某種作用，但是否達到合作者的程度尚難確定)，它代表了俄國十九世紀革命運動中最激進、最極端的思潮。「手冊」分四個部分。第

一部分是〈革命家對自己的態度〉，第一句話是「一個革命家是命中註定要走這條道路的人」。他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甚至包括名字，革命是他所有的利益、思想和情感。革命家的存在本質上就是對每一種束縛著他的社會秩序和整個文明世界的破壞，所有的法律、道德、公認的習俗和倫理都屬於與他為敵的世界。對於革命家來說，道德就是有助於他奪取革命勝利的手段。革命家是勇於獻身的人，他必須準備忍受任何形式的折磨。第二部分是〈革命家對待同志的態度〉，其要點是革命家不能牽扯上任何與事業無關的友誼或依戀，同志之間友誼的標準僅僅視其在鬥爭中的有用性而定。第三部分是〈革命家對社會的態度〉，它把這個「骯髒的社會的所有成員」劃分為以下六類：一是應毫不延遲地處死的；二是也應處死但暫且留著以便其行徑促使更多的人走向革命的；三是平庸而有社會地位的，對他們必須設法操縱和利用以間接為革命服務；四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和各種自由主義者，對他們要假裝追隨而實際上逐步控制，借他們的手給政府製造麻煩；五是教條主義者或口頭上的革命家，要利用他們去散佈革命言論；六是婦女，對於那些輕浮而頭腦空虛的，照上述第三、第四種人去利用，對有主見而不願跟「我們」走的，則照第五種人去利用，而對其中真正革命的，則當成自己的同志。手冊最後一部分是「革命組織對人民的態度」，說除了「徹底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外，革命組織沒有其他目的，為此甚至必須用一切手段去強化和加深人民的苦難直到無法忍受的地步，從而迫使他們走向革命，而這種革命絕不遵循「古典的西方模式」——那總是以一種壓迫代替另一種——而是要消滅和摧毀一切傳統、秩序和階級，在這場革命中「我們將同盜匪聯合，他們是俄國唯一和真正的革命力量」。

(三)革命史上第一次清洗同僚

涅察也夫在莫斯科的活動三個月後就遇到了麻煩。在他的「核心小組」中有一個叫伊萬·伊萬諾夫的成員，他是一個老資格的學生革命家。他和別人的不同是有時會和涅察也夫爭論，而每一次爭論都以涅察也夫從「委員會」那裏傳達對伊萬諾夫的否決而收場。伊萬諾夫產生了懷疑。在他們最後一次爭論中，他不同意涅察也夫要把宣傳材料直接散發到學生自己組織的飯廳和圖書館的計劃，認為這會導致更多的學生被逐出大學(其實這正是涅察也夫為擴大組織所指望的)。伊萬諾夫說即使這一次「委員會」再支持涅察也夫他也不服從，並不惜退出「人民的復仇」。於是涅察也夫作出了決定：伊萬諾夫已經構成了對組織的威脅，他必須被「清除」。「核心小組」的其他成員服從了涅察也夫。他們以讓伊萬諾夫幫忙尋找埋藏的印刷機為由將他騙到荒地，伊萬諾夫被毆暈後由涅察也夫向他後腦射了致命的一槍並將屍體沉入冰河。涅察也夫不但給每一個成員派定了任務，而且不准勇氣不夠的人喝伏特加壯膽，而是要讓他們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向昔日的同志下手。

伊萬諾夫謀殺案發生後不久，警察在一次偶然的搜查中從一處學生宿舍發現了與「人民的復仇」有關的文件、「革命家手冊」以及名單，他們立即意識到這些材料的份量，於是大量學生被捕，包括「核心小組」的成員，他們中有人供出了謀殺案(伊萬諾夫的屍體此前雖被發現但警察對作案者及動機一無所知)。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涅察也夫密謀案」，共一百五十二人被捕(但到審判前已有一半人獲釋)，最重的判十五年苦役(以謀殺定罪)。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被捕者的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二歲，正是涅察也夫自己當時的年齡。

涅察也夫這次真的逃脫了。他又到了瑞士，仍然受到巴枯寧的歡迎。在解釋「伊萬諾夫問題」時他說他當時已發現伊萬諾夫是叛徒和內奸。但不久一個叫盧巴亭的學生革命家也來到了瑞士，這是一個不但瞭解而且把向流亡社群揭穿涅察也夫的欺詐和專制作為使命的人。在他的活動和流亡社群的壓力下，巴枯寧放棄了對涅察也夫的支持。與此同時，沙俄政府以謀殺罪要求瑞士引渡涅察也夫。一八七二年八月涅察也夫被捕，瑞士政府沒有批准其政治庇護的請求（他力陳謀殺伊萬諾夫完全是政治行為）而把他交給了俄國。在莫斯科法庭上，涅察也夫拒絕以刑事罪對他審理，要求按政治犯對待。法庭的最後判決是二十年苦役。涅察也夫當庭高喊：「千百萬人民站在我的一邊！打倒專制！打倒嗜血的沙皇！自由萬歲！今天判決我的人明天就會被送上斷頭台！」深知涅察也夫危險性的沙俄第三廳為安全起見沒有把他送到西伯利亞（那裏不但有相當的活動自由而且很容易逃脫）而是把他關押在彼得保羅要塞直到病死獄中。

（四）斯大林時期的諱莫如深

冷戰意識形態主導下的西方學術界對涅察也夫的重視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為俄國革命或俄國激進知識份子追根溯源的著作都給了涅氏適當或大量的篇幅，另有專著和論文多種，其中美國學者 Philip Pomper 的涅氏傳記綜合了豐富的資料，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的館藏和瑞士蘇黎世的檔案，此外他甚至得到了蘇聯學者的支持（當時是 70 年代），從蘇聯國立十月革命檔案館和國立歷史檔案館得到了大量材料。而涅氏在蘇聯學術界的命運則有著另一種耐人尋味之處。從西方學者所引證的材料來看，

20年代，涅氏成為相當一部分著作和論文的研究對象，而在斯大林時期則基本是空白。影響廣泛的《讓歷史來審判》一書的作者麥德維傑夫兄弟在書中提供了一個細節：一位研究俄國革命史的專家卡利亞金告訴他們「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被認為已丟失的涅察也夫檔案，1953年後從『斯大林辦公室』退回原處」。那一時期對涅氏的瞭解被嚴格地限制在極狹窄的學術圈子中。1954年版蘇聯大百科全書用極短的篇幅介紹了涅氏，並說：「涅察也夫主義是密謀、暴動和無原則的恐怖主義，表現了對組織人民大眾反沙皇制度的失望。」非斯大林化開始後，涅察也夫也曾一度「解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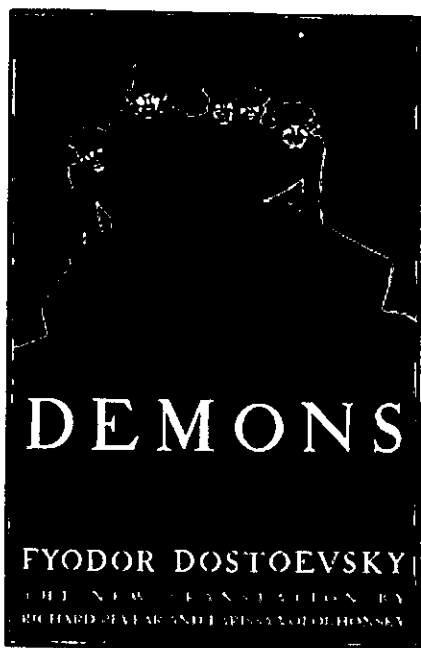
一百多年以後，回顧「涅察也夫主義」，蘇聯大百科全書劃定的框框——即某種個人的極端情緒和恐怖行為——顯然帶有某種匆忙定論以防深入探討的意味。涅察也夫固然可以被視為今日已屢見不鮮的恐怖主義運動的先驅，而以賽亞·柏林也確曾在他的幾篇論俄國知識份子的文章中稱涅氏為「職業恐怖分子。」然而，「涅察也夫主義」與一般意義上的恐怖主義相比，其歷史和社會內涵顯然要深廣得多：它和無政府主義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把同一時期俄國激進知識份子中那種以普羅米修士和彌賽亞自命的精英意識（以別、車、杜，尤其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為典型）發展到了極端。它和崇尚密謀、暴力和專制的雅各賓主義和布朗基主義之間也有繼承關係。

（五）以涅氏為原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惡魔》

實際上，涅察也夫的同時代人已經察覺到了他這一類革命

家的危害性。在當時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枯寧和他的「青年戰友」保持著警覺，他們並未被涅察也夫革命成癮的勁頭所打動。馬克思曾經批評威廉·李卜克內西不該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刊出涅察也夫的一封信，恩格斯曾經把涅察也夫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描繪斥之為「兵營式的共產主義」。當盧巴亭向馬、恩揭露了伊萬諾夫謀殺案的真相後，恩格斯曾在1870年七月六日一封致馬克思的信中說他很高興看到涅察也夫終於暴露了他「不過是一個惡棍」。在流亡俄國

人社群中，赫爾岑——他是那一代俄國革命家中最具自由主義色彩的一個——一見到涅察也夫就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厭惡感，他只是在奧格遼夫（與赫一起主辦《鐘聲》雜誌）的要求下才對涅氏的活動給予了有限的支持，但卻在身後留下了一些對涅察也夫不利的信件和日記。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惡魔》，這部過去被認為是歪曲和醜化革命家的小說正是以「涅察也夫密謀案」為原型的，而「惡魔」一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
《惡魔》英文版封面。

恰如其分地代表了陀氏的一種充滿憂慮的預見。

即使是最欣賞涅察也夫的巴枯寧和奧格遼夫對其道德品質也並非毫無覺察，實際上他們也許比別人更早發現這個問題。但奧格遼夫對這一點早有思想準備，他在1867年一封給赫爾岑的信中說：新的一代革命家在道德上有許多令人不快之處，這是非常自然的，因為舊道德所寄生的傳統和制度正在崩潰，而新的道德只有依靠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建立。至於巴枯寧，則有理由懷疑他不但瞭解，而且默許和慫恿涅察也夫用種種非道德手段去組織革命。

(六) 極權型人格：人類政治本能的惡性病變

閱讀有關涅察也夫的材料的过程中，我始終有這樣一種感覺：即使我們擺脫了蘇聯大百科的框框，承認涅氏為某種革命家（例如加一個「無政府主義和激進小資產階級」之類的定語），涅察也夫現象的本質仍然離我們的認識有相當距離。這主要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僅僅從政治概念和社會屬性上詮釋政治人物，而忽視其個性、心理或人格的研究。正是在這一點上，涅察也夫少年時代的朋友卡帕辛斯基早在1869年對涅氏的描繪相當具有啟發性：「他善於在論辯中設下圈套並羞辱其對手。他十分雄辯，深知如何用真理、誠實、勇氣等字眼從心理上影響青年。他不能容忍與自己平等的人。在強者面前他會保持沈默並製造出一種對他們的懷疑氣氛。他信念堅定，但卻是源於自大，並為此準備犧牲任何人。因此，其個性的主要特點是專制和狂傲。他善於吸引別人並製造出對自己單純和天真的崇拜。他只有兩種同志：一種是年長而被他利用的，另一種

是同齡或年輕而被他控制的。」而盧巴亭曾經對涅察也夫言談中使用「我們」這個詞的方式極為不滿，因為在那個小圈子的特殊語境中，這個詞即意味著涅察也夫個人的觀點和主張，盧巴亭有次在給涅氏的信中甚至這麼說：在俄國只有另外一個人用另外一個詞表達和你的「我們」完全一樣的意思，那就是沙皇和他的用詞：朕。

因此，我覺得，要進一步解釋涅察也夫現象，或許首先必須承認在政治活動家之中存在著一種特殊的極權型人格，它是人類作為社會動物所具有政治本能畸變的結果，而它又常常被這類政治活動家所信奉的種種主義、觀念或理想所掩蓋。不可否認的是，這類人格在某些國家具有特別豐厚的土壤，這是因為一個具有長期專制傳統的社會向人們顯示了個人的權力能夠在物質和精神上擴展到何種程度；而反專制者往往最終也成為專制者，其原因便不僅僅在於掌權後的蛻變，而是與早期——人格形成期——的潛移默化有關，其後的所有活動不論自覺與否，都是這種人格的實現。

以涅察也夫為例，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極權人格的多重側面。「一個革命家是命中註定要走這條道路的人。」如果我們注意到涅氏在他十八歲左右就決定終生從事政治鬥爭，那麼這句話確實意味深長。在他所有那些「忘我」的政治活動的背後實際上是「唯我」的實現人格的衝動。他從來不會認真考慮從事某種職業(在他短暫的教師生涯中，他常常把小學生留給不負責任的朋友照看而自己外出「革命」。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他發誓要消滅寄生階級，而他本人的生活正是靠各種來路不明的款項維持的)。他觀察社會的唯一角度是政治：政治權力不但導致也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他用於評價各類人的唯一標準是在何

種程度上可以利用來為權力鬥爭服務。他的道德標準更是如此，伊萬諾夫謀殺案不但說明了他為維護自己的權力可以不擇手段到何種程度，而且證明了他根本就不承認世界上還有政治以外的對其行為的評價和約束，因此刑事指控(殺人罪)對他自然是荒謬和侮辱性的了。至此，也許我們可以對以涅氏為典型的極權人格如此概括：它是在畸變的權力欲望的驅使下人性的徹底政治化。

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譴責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容為「惡魔」的涅察也夫對人類社會的現實危害是他並非把其追隨者引向墮落，而是相反，將他們導向他所定義的「崇高」。這裏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涅察也夫對洞悉和操縱青年的心理有著非同一般的直覺和天才。他利用青少年成長期的焦慮，對生活目的的追求，對父母、家庭和社會的反抗心理，以及在宗教傳統的薰陶下培養起來的聖徒崇拜和盲目的獻身熱情來為其政治目的服務。一旦他用革命的神秘性、神聖性和浪漫性將青少年網羅進其組織，便一方面讓他們在精神和心理上建立起對自己的依賴和崇拜，另一方面又用嚴格的等級、紀律和制裁控制他們。「人民的復仇」最後一次行動，是涅察也夫第二次去瑞士後派一個叫安德羅夫斯·卡婭的少女攜一份奧格遼夫給軍隊的策反信回國活動，她被捕後承認涅察也夫曾經用伊萬諾夫的下場威脅她。查蘇利奇對涅氏鼓動和驅使對社會政治問題缺乏理性判斷和自我保護意識的青少年投身政治的「技巧」瞭解頗深，她在回憶錄中說涅察也夫還對一些天真少女採用「革命理想與浪漫征服」雙管齊下的辦法。一個例證是為了達到控制赫爾岑的遺產和若干對自己不利的書信的目的，他曾對赫爾岑之女娜塔麗施展過此類手腕，無奈娜塔麗雖然

憧憬革命，但對涅氏為人實無好感，不然赫爾岑九泉之下要難以安眠了。

結語：生不逢時

Philip Pomper 在他的涅察也夫傳記中曾經這樣說：涅察也夫不幸生在一個其活動只能被看作是一場政治戲劇而產生不了群眾性政治效果的時代。用中國話來說，這就叫生不逢時吧。

(本文主要材料來源 Philip. *Sergei Nechaev*.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9.)

後記：毛主義革命：革文明的命

程映虹

本書是現當代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相結合的嘗試。更具體說，是對革命史和激進的社會運動在全球範圍內互動關係的研究，是對毛主義的中國在國際共運史上的作用和世界歷史上的定位的初步嘗試。本書各篇的寫作和修改經歷了多年時間，大部分篇目發表于中英文學術和思想雜誌，經修改後彙集成書。

直到修改定稿之後，我才覺得剛剛對一個困擾了自己多年的問題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但已沒有時間去展開論述，這就是作為一個歷經一個多世紀、涉及數十億人的生死和命運的共產主義革命和整個人類文明之間的關係。簡單來說，共產主義是對人類文明的挑戰。凡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受到共產主義批判、破壞或者最起碼是限制的，都是人類文明最基本的制度、規範和成就，例如階級、財產、城市、家庭、商業、貨幣、教育、道德、宗教和藝術等等。在各個國家的共產黨革命最激進時期，這些都受到了徹底改造或者破壞。文明建立在社會區分和勞動分工之上，文明的發展也就是這種區分和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而共產黨革命就是要從財產制度和職業定位上徹底消滅這種區分和分工，創造「全面發展」的人，同時消滅和這種區分和分工相聯繫的觀念，包括學生對師長的尊敬和「外行」對「內行」的服從。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說的「徹底決裂」和毛澤東所提倡的「破四舊」。文明的推動力離不開個人利益和個人追求，而共產黨革命要消滅的就是人的「私」。文明的進化也是人的自我意識不

斷發展，追求自由和權利的過程，而共產黨革命就是要用「階級覺悟」取代自我意識，用「階級」和「集體」的自由和權利(實質是黨的利益)取代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文明要求一種起碼的普遍性的道德作為人際交往的規範，共產黨革命否認道德的普遍性，說只有階級的道德，凡是符合這個階級的政治需要的就是這個階級的道德，在這個意義上道德又被轉換成利益，所以共產黨統治下人際關係最終變成毫無遮掩的的利益關係。文明產生了禮儀、修養、優雅和品味，共產黨革命把這些一概斥之為虛偽、奢侈和矯揉造作，代之以赤裸裸的野蠻和粗鄙。知識份子之所以無一例外在共產黨革命中遭殃，就是因為相對來說他們代表著文明所創造的知識和制度。列寧、毛澤東和卡斯特羅等人對知識份子的鄙視的背後實際是對人類文明的敵視。不錯，馬克思主義者也談學習談知識，例如列寧說過「用人類產生的一切現有知識來武裝自己」，有人也許會說這難道不是提倡文明嗎？但這句話體現的恰恰是在文明面前的妄自尊大(「一切」)和實用主義(「武裝」)，它正好表明像列寧這樣的人不但不懂人類文明的博雅精緻，而且還把自己高高置於文明之上。也許它唯一值得稱道之處是畢竟好過毛澤東時代的「知識越多越反動」。

在反文明這個意義上，共產黨革命本身是一個不斷粗俗化和野蠻化的過程。《共產黨宣言》中至少還有一點知識，還有一點文明，雖然它們被用來裝點一個反文明的核心觀念，即用階級鬥爭史來取代人類文明史，高揚的是一種憎恨和憤世嫉俗。到了毛澤東那裏這種粗俗和野蠻不再有任何掩飾，簡化到只剩下四個字：「造反有理」。但正是這四個字畫龍點睛地道出了共產黨革命尤其是毛主義的革命就是要造文明的反的實質。毛澤東反文明的態度始於他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到60年代的

「造反有理」，宣佈知識份子「臭老九」，揚言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登峰造極，甚至連別人的姓名是「文質彬彬」都覺得討厭，體現了一種被很多人指出的痞子精神。所謂痞子就是不承認文明規範和社會禮俗之徒。毛澤東一輩子最討厭的就是受「規矩」束縛，到了晚年尤其好稱「不信邪」。這種「規矩」和「邪」往大說是人類文明的政治、道德和職業規範，往小說是他自己這個黨內部的一些最起碼的運作程式。不過，毛澤東和許多共產黨領袖畢竟還為改造和限制文明的基本制度和規範而絞盡腦汁，發動了大規模的社會實驗，而紅色高棉則乾脆不再改造，而是把它們全部廢除。

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和參加者常常感歎他們事業的「艱難」，奪取政權後的社會改造要比武裝鬥爭更為不易，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奪取政權說穿了不過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改朝換代，而建立政權後的社會改造要破壞的是人類文明的基礎，要扼殺的是基本的人性，那當然決不會容易了。蘇聯和中國的農民對各自的政權要徹底毀滅傳統鄉村以個體家庭為基礎的生產和生活、建立「集體農莊」和「人民公社」的抗拒和抵制就是無數「反革命」的事例之一。

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也可以有新的解釋。所謂「改革開放」到底是什麼？它實際是共產黨政權把文明破壞到了危及本身生存後，走投無路之際逐步向傳統和常規回歸，開始承認一些文明的基本規範，很多政策和「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其實並沒有多大關係。例如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一個重要政策是取消知識份子、幹部和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不再強行把父母和子女拆散，這實際上是承認必須尊重家庭結構和親子關係作為人類文明最基本單位的完整性。應該指出的是，人類自有家庭以來，只

有奴隸制才挑戰過這個制度(奴隸主可以隨意拆散奴隸的家庭，把夫妻分開，把親子拆散)。改革開放之初的另一個重要政策是恢復正規高等教育和高校招生，這無疑是宣佈「工農兵上、管、改大學」的反文明的「教育革命」的失敗。

然而，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要把它說清楚，又需要另外一本書了。至於為什麼共產黨革命要革文明的命，它和其他反文明的社會運動之間有什麼異同，反文明又有什麼魅力，能夠吸引這麼多的參與者，招惹那麼多的朝聖者，至今還有那些「紅色記憶」在召喚恐怖幽靈，則是一個更複雜的歷史和理論問題了。需要指出的是，人類文明當然充滿了矛盾和問題。文明的發展(尤其是現代化)在社會的層面(政治經濟)和個人的層面(精神和心靈)上始終有兩面性，但毫無疑問的是文明終究勝過野蠻，對文明的批判不能逾越文明本身的底線。共產黨革命對文明的破壞是在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破壞了這個底線，而當代西方學界很多時髦的學說則企圖從觀念上解構文明，這種解構本質上是智力、語言和概念遊戲，是文明本身發展到一定階段後自我異化的產物，其導向是反文明的。難怪很多西方「後學」大師和信奉者對共產黨革命不但當時情有獨鍾，今天也還在千方百計杜撰出很多聽上去很有學問的廢話來為大躍進和文革辯護。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過是當年「政治朝聖者」的嫡系後代。

漫長的歲月使我從很多師友那裏得益良多。例如，胡平、程曉農、何清漣、吳國光、王友琴、陳彥、郭建和何曉清等友人曾經和我討論過很多文章的思路和觀點。本叢書的主編宋永毅先生幫助我確定和修改書稿的中心內容和篇目的組織，包括很多技術性細節，使之最後成書。我在美國東北大學讀書時結識的好友楊斌(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和我同為世界歷史研究生，在學術

上一直有很多交流。在美國學者中，我的老師 Patrick Manning (現為匹茲堡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幫助我建立以國別和地區史為基礎的世界史研究框架；Adam McKeown (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一直對我的研究深感興趣，交流頗多，並始終給予支持。胡佛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 William Ratliff 是古巴和中古關係問題專家，他從我做開始做博士論文時就一直從思路的形成到資料的收集方面給予我幫助。威斯康星大學政治系的 Edward Friedman 教授是我在最後成書階段交流頗多的師長。特別值得感謝的是社會學家 Paul Hollander，他關於知識份子、左派和共產黨革命之間關係的研究近十年來一直給予我啟發。

最後，此書得以出版和我的妻子張穎多年來的支持和理解是分不開的。

在此，我借這一小文表達我銘心的感激。本書有些文章中的幾處圖像資料係很久以前收集，成書時一時找不到詳細出處。如蒙讀者提供出處，筆者不勝感激。有關版權事宜，均由本人負責。

是為後記。

2007年11月11日

于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

宋永毅 主編
Yongyi Song
Editor-in-Chief

21 世紀中國叢書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Series

**Maoist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毛主義革命：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作者 / 程映虹
出版印行 / 田園書屋
地址 /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電話 / 852-2385 8031
傳真 / 852-2770 2484
電郵 / gjbook@netvigator.com
初版一刷 / 2008 年 3 月
國際書號 / ISBN962-339-071-8

定價港幣 80 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共產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國際性的運動。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國際共運的產物，中國的變化又反過來對國際共運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尤其是在毛時代。遺憾的是，對於後一方面的問題，國人的研究還很不夠。程映虹這本書應是迄今為止在這一領域的最有份量的著作。本書結合歷史敘述與理論分析，作者尤其善於選取特殊的人物與事件，通過引人入勝的描寫，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雖然講的是毛主義對世界的影響，但它又反過來加深了我們對毛主義的認識，並進而加深我們對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認識。全書史料豐富翔實，敘述條理分明，文筆生動流暢，讀來不但增長知識，而且發人深省。

—— 胡平（紐約）

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與衰變無疑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但對這一事件的有價值的研究與分析至今仍然極為有限。如何解讀中國共產主義不僅是理解和把握當今中國的關鍵，也與中國的未來命運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息息相關。程映虹的《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跳出民族主義、權力鬥爭的傳統分析框架，從世界與國際共運的大視野觀察中國共產主義，為主宰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毛主義的運作機理提供了新解，也為我們瞭解世界共產極權主義的共同本質提供了鑰匙。

—— 陳彥（巴黎）

本書描述和分析了毛主義和文化大革命對世界上若干地區和國家的影響及其後果，對於回顧、總結 20 世紀共產運動這個歷史性任務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開創和填補空白的作用。雖然毛主義是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的產物，但它仍然具有東方專制主義的特徵，由於毛的個人野心，毛主義也是蘇聯模式與意識形態的競爭者，它的影響與作用有其獨特性，當然它的後果、結局、災難、慘劇與失敗與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完全一樣。本書雄辯地闡述了這一論題，是很有啟發性的歷史教科書。

—— 徐友漁（北京）

程映虹博士以他對毛主義的中國與共產主義世界革命之間的相互關聯的研究而享譽史學界。本書可以稱為他的代表作之一。他在英文世界的深湛學術研究成果，在這裏轉而以清新可讀的文字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在在顯示了一位史家的德、學、才、識。對成長在中國大陸的讀者來說，本書所發掘的史料及闡明的觀點，應該是振聾發聵的。當代中國任何一位有初中以上文化水準的人，如果尚未讀這本書，恐怕還不足以說是真正受過了教育。

—— 吳國光（維多利亞）

此書出諸國際共運史權威之手，理論精緻、資料翔實、文筆優美（也就是義理、考據、詞章俱佳，如果使用古代中國治學標準的話）。蠻橫地反對議會道路、為所欲為地依靠暴力來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犧牲多少生命、傷害多少無辜都在所不惜，這便是毛澤東主義的本質。然而，令正常人毛骨悚然的毛澤東主義，不僅曾經使千百萬中國人象中魔一樣如醉如狂，而且也曾經使很多洋人大上其癮而深受其害，甚至於至今陰魂不散。程映虹博士此書，對毛澤東主義病毒的解讀異常深刻。當今又有別樣的「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不絕於耳，此時奉讀此書，意興盎然。

大眾圖書館 <http://dztsq.info>

—— 馮崇義（悉尼）

ISBN 962-339-071-8



9 789623 390712

HK\$80.00

